廿一世紀文庫
明報出版社

本書提供大量第一手資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



王若水 遺著

毛澤東的新畫像

毛澤東，孤獨的老人

毛澤東身邊的女同志

毛澤東的權術

毛澤東與斯大林

毛澤東與彭德懷

新發現的毛澤東

—— 僕人眼中的偉人

近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主宰着中國的命運，回首當年神州大地風起雲湧，巨浪滔天，特別是在他的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毛澤東逝世後，他的影響猶在，迄今仍未有一部對毛澤東及他的思想作全面解讀的作品，誠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空白。本書作者王若水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理論家，曾任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本書是他傾大半生心血的遺作，書中對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性格、他的心態、他的權謀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其中蘊含大量從未聞問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自出機抒，論點精確，可讀性極高。


ISBN 962-973-697-7
9 789629 736972 >

CE01 HK$ 69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廿一世紀文庫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

王若水 遺著

明報出版社

顧問委員會名單

王　蒙　　李澤厚

李歐梵　　余光中

余英時　　吳冠中

吳宏一　　金耀基

周策縱　　柏　楊

馬悅然　　高行健

劉再復　　劉紹銘

聶華苓　　饒宗頤

（以姓氏筆劃為序）



［冯媛摄影］



王若水、馮媛夫婦攝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馮媛提供）

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和江青在延安楊家嶺。（明報資料室）

一九四九年四月，毛澤東同長子毛岸英（右二）、長媳劉松林（右一）、江青（左一）及小女兒李訥攝於北京香山。（明報資料室）



一九五〇年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明報資料室）

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北戴河騎馬（明報資料室）



有關毛澤東在兩性關係上的傳聞很多（明報資料室）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出決定，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把劉少奇（左一）「永遠開除出黨」。（明報資料室）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遭受一肚子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明報資料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首次出國訪問莫斯科（明報資料室）



一九五九年與赫魯曉夫會晤，當時中蘇關係已呈裂痕。（明報資料室）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將元帥軍銜授予彭德懷（左二）。（明報資料室）



上眼鏡的
澤東，於
九五四年
觀北京故
出土文物。
明報資料室）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周恩來最後一次在毛澤東的書房與毛澤東握手告別。
（明報資料室）

（由左至右）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在會議上談笑風生。（明報資料室）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攝於天安門城樓休息室內。（明報資料室）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與蔣介石（中）、赫爾利（左一）等合影。
（明報資料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毛澤東最後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
（明報資料室）



毛澤東和林彪等人乘敞篷車檢閱紅衛兵時的情景
（明報資料室）

总序：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从《20001 文库》到《廿一世纪文库》

潘耀明　明报出版社/《明报月刊》总编辑

在廿世纪之交–我们编了一套《2000 年文库　当代中国文库精读》中国当代文学五五彩缤纷，十分丰富。这套文库从选择到解读，每个程序都有难点，最后我们邀请海内外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专家和作家檐任丛书顾问。听取他们的意见，才确定了精读的对象和负责解读的文学批评者 ·终於使这项工程开始建设起采. 从二 00 一年夏季起，分期陆续出版，共出版了二十位作家的自选集或选集。其中包括後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套文库的代表性。

这套《文库》从筹备到出版经历了二年时间在商业社会里，编辑这套《文库》，原是吃力下讨好的事 · 销量实在有限，毫务商业价值可言《文库》》的编辑出版，时值《明报》成立四十周年，所以我们特别设计四百套 "作家签名编号珍藏本，销了三百多套，大致可以弥补散本的亏损。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激烈动荡的世纪，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阳始形成并逐步发展成熟的世纪。而刚刚开始的二十一世纪又是中国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大变动时期 · 中国在新世纪中将真正结束以农业为中心的 "乡村时代"，进入以产业与贸易为中心的 "城市时代"，也将结束以革命为动力的社会形态，进入以财富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在此大变动之际，中国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未来的极为重大的课题。

在寻找中国道路的思考中，上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已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形成一批杰出的带有经典性的创作、学术与思想成果，在新世纪开始时，又有许多学者、思想家舆作家面对全球化的潮流作出新的思索。然而，由於这些学术、思想成果属於高层次的精英文化，它虽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却不一定有市场效益。香港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皆陷入低谷，香港图书市场一蹶不振。在此情形下，作为一位出版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理想与市场矛盾的挣扎苦斗中。但理想像一道阳光，仍然在我们的脑海闪烁。没有阳光的生命，肯黯然失色，所以雨果说："梦想就是创造，希望就是呼唤，制造幻想就是向现实挑战" 我们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编辑新的一套文库《廿一世纪文库》，不敢言向现实挑战。只是略尽绵力，朝着迢遥的理想境界进发，并散发出一抹幽微的光。

《廿一世纪文库》與《2000 年文库》不同，後者选择的是文学作品，前者选择的则是人文科学精品为主，未免曲高和寡，在冷酷的商品社会，我们只好步步为营，不求完整，只希望能够出一本就是一本。这是我们一个不倔的志向。随着日子的消逝，时间的漏斗筛下相信不仅是一份理想的冲动，而是一颗饱满的果实，所谓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陶渊明）。这是我们编辑这套文库的心声。

二 00 二年六月廿八日

王若水简历

王若水·一九二六年生於上海，二００二年在美国波士顿去世　一九四六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０年任职《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一九七七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三年）学术方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哲学研究》编委、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辽宁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先后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邀请，赴美作访问学者，一九九四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　一九九八年任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及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著作有《桌子的哲学)》(一九六三年)、《在哲学战线上》(一九八０年)、《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九八六年)、《智慧的痛苦》(一九八九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九九七年)等。

目 录

前言　毛泽东的新画像——仆人眼中的伟人

西方有一句谚语：“仆人眼中无英雄”。英雄东征西讨，叱咤风云。可回到家中，照样要饮食起居，有七情六欲，和普通人一样·这些只有伺候他们的仆人看得最清楚，因此，在仆人眼中·英雄也没有什麼特别之处。

毛泽东这个英雄和一般的英雄不同，他在仆人眼中仍然是英雄。近年中国大陆兴起的“毛泽东热”，和毛泽东的仆人有密切关系。

从回忆录开始的“毛泽东热”

一九八七年美国的施拉姆教授(S．Scharm)的《毛泽东》一书的中译本出版，第一次就印了二十八万册，一年后第三次印刷，总数达五十五万册，这是这股“毛泽东热”的第一个迹象。一个外国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无疑是对国内作家和出版家的刺激。

一九八九年，大陆一下推出了二十多种有关毛泽东的书·总销量在百万以上。这正式宣告了“毛泽东热“的开始。

这些书大部分是回忆录，其中的主要几本出自部队作家权延赤，他大量采访了毛泽东的身边人--贴身卫士、警卫、护士、保健医生、秘书。这些书的销量都很大：《红墙内外》首版十五万册'到一九九一年北京第八次印刷时，累计印数已达四十三万册。《领袖泪》我看到两个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第一版·当年七月第三次印刷时，累计印数达二十六万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版本在一九九一年第七次印刷时，总数达四十二万五千册。这两个版本加起来的印数是六十八万册。《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没有所明印数。一个月后，这家公司又出版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此书两个月后就第三次印刷，累计印教十七万。两书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前者署名为“李银桥著，权延赤执笔”. 后者署名为“权延赤著”。听说为此还闹了一点著作权纠纷。从出版情况来看，这些书显然是十分抢手的。此外，一九八九年首版在十万册以上的还有《毛泽东的孩子们》、《毛泽东轶事》、《毛泽东逸闻录》等等。

这股“毛泽东热”迅速从出版界波及到影视界，一九九一年中共建党七十周年时，出现了一大批以毛泽东为主角的电影和电视剧，而绿音带《红太阳》则以它几百万盒的销量震撼了文化界！

一个政治领袖越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越是被人敬若神明，人用就越是不敢客观地、具体地叙述他的生活，因为这可能被视为亵渎。过去，在所有描绘毛的作品中，毛泽东的形象必须符合“伟大领袖”的理念. 要成为真理和无产阶级美德的化身。毛主席太伟大了 •作家描绘他时手中的笔都会发抖。他们要为他精心设计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因为这都是政治问题。他们对画出东的形象要小心翼翼地描了又描，唯恐“有损”。于是最后创造出来的毛泽东就成了一个木偶：一切都合格，只是他不是活人。

五十年代初李伯钊的歌剧《长征》中有一倜场面：在长征路上出现的毛泽东（于是之饰）竟然头发梳得油亮，一身整整齐齐的新军服，甚至裤子上还看得见笔直的裤褶！

这个毛泽东没有唱，只念了一句台词：“同志们好！“把手一挥--他不能有更多的表演了。

新发现的毛泽东

只是在毛泽东逝世了十多年後，他似乎才确凿地成了历史人物。写他的生活琐事也不再是忌讳了；何况，毛生前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愿。于是这些回忆录陆续问世。

这些作品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毛泽东的新画像。

由于对“两个凡是”和文革的批判，毛早已失去了眩目的光环，人们不再把他当神来崇拜。中共中央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有缺点也有失误，同时强调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只是给人一种政治概念。毛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但他还住在中南海，高高的围墙把他和老百姓隔离了。只是现在从回忆录中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人情味，富有性格魅力的毛泽东。这好像是一个新发现。这就是仆人眼中的毛泽东。他不是神，他有缺黠，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缺点，也许正因为有这些缺点他才显得离我们很近，这不妨碍他仍是一个英雄，一个伟人。

内卫张木奇在结束他的回忆时说：“这就是生活中的毛泽东。想起未见和初见他之时，我那种“视若神灵”的神秘感和种种猜测想像，已经恍若隔世。然而，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觉出毛泽东的伟大，也更觉得他可亲可敬。”

人们从这些回忆录里得知，毛泽东生活朴素，作风廉洁，公私分明，律己很严。他的饮食简单'一般来说，有辣椒就行；他不吃补品，偶而想补补脑子，也不过是一碗红烧肉。他的袜子和睡衣都有补丁。他习惯睡硬板床，使用荞麦皮枕头。他不用牙膏而用牙粉，也不用香皂。他很勤奋，常常因工作而废寝忘食。他博览群书，是个读书迷。他不允许对子女和亲友特殊照顾。

然而毛绝非不近人情。相反，他通情达理，富于风趣，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他曾为遭灾的农民伤心落泪，也曾为送走瘟神的百姓而欣然赋诗。他曾经手拉手地和卫士边散步边聊天。卫士封他可以无话不谈，甚至没大没小，耍贫嘴。全国人民都尊他为“毛主席”可他的贴身卫士居然敢称他为“老头”！他督促卫士学文化，关心他们的家庭'有时还自己掏钱接济生活困难的卫士。他还有一副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热心肠，替卫士出主意找对象，甚至帮助卫士修改情书！

对照一下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官气十足，挥霍浪费，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人们怎么不觉得毛泽东可亲可敬呢，甚至毛的弱点也唤起了人们的同情。过去他和江青的婚姻大大损害了他的声誉。以後人们知道江青当初并不坏，是後来变坏的；毛和江青长期不和，毛对他的最後一次婚姻感到后悔和苦恼。伟大的毛泽东，也有他的隐忧，需要人们理解啊。

毛泽东的一个侧面

毛泽东意识到身边人可能写他的轶事。他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甚至鼓励他们写。他曾对他的贴身卫士说“我和我的亲人见面不多，只有你们和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的情况你们最了解。“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

我相信这些身边人回忆的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是属实的。但这并不排斥有“为

尊者讳”的地方。《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比《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多了三万字的内容，显然这一部分是口述者李银桥不愿意发表，而执笔者权延赤舍不得割爱的材料，诸如毛泽东在看戏实掉下裤子之类的趣闻。李银桥在一九九一年把他那本书重新整理，改名属《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他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修订过程中，胡乔木、王任重、邓力群、逄先知等同志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可能他们纠正了一些年代一类的错误。不过在涉及毛的形象上，可以看出是加了工的。这反而是这本书的价值打折扣。

当然，身边人对许多事情是保密的。内卫张木奇说：“比如你值班，听到祈年堂里政治局开会内容及毛泽东的谈话，不许对我说也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轮到我值班，听到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或批评表扬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样也不能传给你或其他任何人。”这在当时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相隔几十年，这些完全成了历史，也不能“解密”吗？张木奇接着说：“这些我们当时能做到，至今也没有一个人乱说过一句。所有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进入我们的耳目便如埋入了黄土地，再不会出土，直至我们自己也化为灰土。”

这样的纪律当然不仅适用于警卫战士，那么，许多重要材料就必然被“埋入黄土”了。

即使这些回忆录没有隐讳，那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仆人眼中的毛泽东，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毛泽东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的雄才大略，老谋深算，在这里是看不到的。仆人眼中可以有英雄，但英雄仍然不是仆人可以完全了解的，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对“仆人眼中无英雄”这句谚语作过深刻的评论，他说：“这并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只是朴人。”黑格尔的观点，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理解英雄的伟大。仆人替英雄脱下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他们只能从这些日常生活琐事中观察和评论英雄，所以无法认识英雄。

我还想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仆人眼中也也奸雄。这不是因为奸雄不是奸雄，而是因为仆人只是仆人。“大奸若忠”，奸雄在朝廷中操纵权柄，纵横捭阖，勾心斗角，残害忠良：回到家中却完全可以是个规规矩矩的丈夫和教子有方的父亲。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度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黠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但是这些回忆录仍是有价值的。“见微知著”，“又小见大”，我们也可以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中，认识他的性格特徽，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窥见其内心世界。

孤独的老人

看了这些回忆录，得到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毛泽东的孤独感。

贴身卫士李建成在给毛泽东按摩完後，毛泽东拉住他的手，喃喃地说：“陪我一会儿”李连成觉得，“按摩本身有时候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是身边有人。...... 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到踏实，他就可以安静。”

在公众眼中，毛泽东充满了大丈夫气慨，他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家：是身经百战，抵抗过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军事统帅.. 是改变了中个面貌的政治强人。然而他却像小孩子那样脆弱，需要人陪伴，他对卫士说的话筒直像央求。没有人在身边他就觉得不踏实，觉得无所依托，难以安宁。可以看出。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秘的、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恐惧感。

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很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地走到人群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工作之余他最怕孤独，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现得随便些，可以开玩笑、起哄、骂娘，造成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的气氛。如果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他简直无法忍受。我理解，卫士们也理解。毛泽东是人，他需要过人的生活。”

这句话很耐琢磨。毛泽东需要国“人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吗？

身边人只是觉得他太寂寞，无法接近群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要受到安全的限制。”“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也不可能。”

这真像囚禁在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了。这可以怪从苏联搬过来的安全体制。但仅仅是这一点吗？如果让毛每天生活在群众中，从早到晚受到群众的包围、欢呼，他也是受不了的。毛对贴身卫士说过：我需要一些这种很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是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然而群众总是把他当主席的。可见，毛并不只是需要接近群众。尽管毛欣赏个人崇拜，可这样生活他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处处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实在精神太紧张了，太累了。毛只能在和身边少数服务人员一起时，解除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这些身边人和毛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权力之争。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低，单纯天真，封毛具有不容置疑的忠诚。本来•毛完全可以挑选一些文化水平稍高的，可是他宁要小学程度的，这不是没有考虑的。文化越低的人越容易盲目崇拜。毛不用对他们有什么防范，完全可以在他们面前放松一下，从主席的角色回到普通人的身份。

所以，李银桥这样说：“就我十几年的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士，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徐涛所说的，“过人的生活”，其实就是过普通人的生活。

毛泽东不是普通人，他是领袖：不，他是神。作为神，他必须高踞云端，远离人间烟火，下能轻易和凡人接触。他必须在老百姓心目中保持一种神秘感；太容易见到了，就下稀罕了，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所以，毛泽东是异化的人。

恩格斯曾在《费尔巴哈论》中感慨地说过：“在我们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裹，同他人交往时实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恩格斯没有想到，在共产党内部，在革命同志之间，这种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至於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也产生了“异化感”，只能在少数几个身边的人中去寻找这种感情的沟通。

但是，如果以为毛泽东在仆人面前表现出的就是他的真正的自我，就一点掩饰都没有，那就和那些仆人一样天真了。

这些身边人也务法真正消除毛泽东的寂寞。张玉凰描写了毛泽东怎样度过了他的最後一个除夕之夜：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外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

清。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個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徊春节。. . . . . .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着眼前日日夜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鞭炮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郑宜、贾梅编《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毛泽东生活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一九 O 页）

一个全国人民都对他唱“我们日日夜夜想念你”的伟大领袖，竟是这样孤独，当普通老百姓在喜气洋洋的届日中享受天伦之乐时，他却只能靠放几挂鞭炮来驱散那夜晚的冷清，给寂寞的庭院添几分生气。

他的确是太孤独了。

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

人们会问，毛泽东不是有那么多亲密战友吗？他和他们天天相处，也应该算是他的身边人，他为什么还会感到寂寞？谁造成毛泽东的孤独？他的战友都到哪里去了了？

毛本来有一大批革命战友。在“文革”中毛把他的继承人刘少奇和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打倒了。

一个文工团员通过陪毛跳舞感到“文革”给中南海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之前•中南海春藕斋的舞会是很热闹的，党的领导人都来参加。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舞会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冷清而沉闷。刘少奇和王光美不来了；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了；春藕斋里只剩下毛泽东•而他也很少来，即使来也显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

毛怎样和党内同志相处？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以用於法，用於法则有效；力不可以用於私人之交谊，用於私人之交谊则无效。岂唯无效，反动随之矣。”毛把这两方面分得很清楚。在私人交菹之外，他崇尚“力”与“法”。这后一方面，是身边服务人员不大能看得到的。

不过他们也有所感觉。

李银桥说：“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国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务来往。”

李银桥在这里用“同志”和“战友”这两个词来表明非情谊的关系，并不符合中国大陆以前的用语习惯。大陆常用“同志情谊”这个词来表明一种高尚的友爱关系。也许这个词用得太滥了，对随便什麼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叫“同志”，就不表达什么亲密关系了。但“战友”之间无论如何应当是有情谊的。而且，毛和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同志和戥友关系；他们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同生死共患难的。为什么没有情谊呢？

这些人和毛可以是共事关系，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都属于行政关系的范围，不是恩格斯说的纯粹人与人的关系。说得坦白一些，他们在毛的眼中部不国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毛泽东只承认过一个人是他的亲密战友，这个人就是林彪。他让林彪作了新的继承人。毛泽东的地位太高了，亲密战友这倜称号不是可以随便封给谁的，连周恩来也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林彪一出事，毛泽东就没有“亲密战友”了。毛泽东逝世时，人们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位伟大领袖的许多照片都是他一个人，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了。

毛泽东对身边服务人员持平等态度，封亲朋、党外人士也保持中国传统的礼貌和好客。可是对待党内同志，他的举止是有严格分寸的，这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毛泽东有一种威严叫人生畏，“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斡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

毛不是多次鼓励别人大胆讲话吗？说是这么说，其实他并不觉得别人在他面前不能畅所欲言是一种遗憾．还是让大家怕他好，只是对那些身边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他倒真正喜欢他们在自己面前务拘束地说说笑笑。

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是坐在沙发上不起身的，只是怍个手势让他们坐。“毛泽东与亲密战友相交是很随便，不拘礼节的。比如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同志还有林彪进来，他躺在床上辩公会继续躺着辩公，招呼一声即可。”然而这种随便并不限于对“亲密战友”，也不表示亲密。笔者就见到过一回，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我随同邓拓等几个《人民日报》编委到毛的寓所。毛在卧房里接见我们，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我们每人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和毛的不拘礼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并不是一次无拘无束的会见。那一次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邓拓，这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不是和我们聊闲天。我们都很紧张。刘邦见郦食其时，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伺候洗脚。毛泽东也有刘邦之风。

门槛

身边人观察到一个关于门槛的细节，很有意思。据说，对较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老同志，毛泽东要送别握手，但是绝不迈出门槛。甚至对兄弟党领袖也是如此。有次胡志明来了，卫士通报后，毛泽东即起身，走到门口就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槛了。毛等胡迈进门，才伸臂握手。同样，谈话结束后，毛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握手告别。

并没有什么礼仪准则为领袖见客做这样的规定，这个门槛是毛泽东自己设定的界限：别人跨进这个门槛，表示是别人来就他：自己跨出门槛，意味着他去就别人。这就不一样，毛泽东不能显示出他要见别人更甚于客人要见他。门槛成了一个符号。也许门槛两边的地是一样的平，但是门槛内外却有尊卑之别。

一般说来，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豁达大度，落拓不羁，但他怎么会如此计较门槛这种细节呢？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十分敏感，不拘礼节是表明他这样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权，拘泥与门槛这样的细节是表明他处处要显示他的比人尊贵。

在毛和他的同事之间，上下级关系压倒了同志关系，“力”与“法”压倒了私人情谊。

周恩来在几十年间一直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可以说是毛的大管家；不仅是国家大

事，就是毛的衣食住行，周也要关心照料。毛泽东的住处是周恩来选择的，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战争年代，毛要走的路周恩来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建国以后，毛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可是毛对周呢？尽管身边人也说几句毛泽东对周很信人很关心之类的抽象的话．但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李银桥说：“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说过一句超出同志

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李银桥讲这句话说得很有分寸，但已经足以使一些天真的读者震惊了。一些电影和文章不是宣傅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革命情谊”吗？如果连在毛身边服务了十五年的卫士长都没有听到毛封周说过一句带私人感情的话，这种情谊在哪里？关于毛对周的情谊的具体例子・人们只知道毛给周送过一对沙发。其他还有什么呢？

和周恩来谈不上私人交情，那么，在毛泽东周围的高级干部中，还能找出他的私人朋友吗？

据李银桥的观察，认为只有两个人说得上和毛泽东有私交，一个彭德怀，一个陈毅。可是这两个人部没有好下场。

这里只说彭德怀。李银桥说：“彭德怀玉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是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内卫田玉云说：“党政军负责人中，彭德怀是唯一一位敢跟毛泽东要性子的人。”

跟毛泽东要性子，这可不简单。卫士长曾多次目睹毛严厉地驯斥党政军的高级负责干部：“元帅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发脾气，立正站着不动的多；党政领导干部遇上毛泽东发脾气，低头不安、作检查的多。”有没有人敢不同意毛的批评、與他争辩呢？我只知道“文革”前刘少奇和毛争吵过（他的秸局是大家知道的），另外大概只有彭德怀了。卫士们目睹了庐山会议有一次散会后的一幕：毛泽东走出会场，和彭德怀打了个照面，毛主席说：“彭总，我们谈谈心吧。”彭一甩手，大声说：“有什麼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说到“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句话不仅份量很重，而且太离谱，难怪彭德怀受不了。

中共高级斡部都知道彭德怀的性格特徽，一是性情耿直・二是脾气暴躁，所以他们称彭德怀是“张飞”。过去彭德怀也同毛泽东吵国，这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非昔日的“老毛”了，如果彭德怀以为他和毛泽东有多年的老交情就可以继续顶撞毛，那他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彭德怀的上书害得毛泽东失眠。有一次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未能入睡。他在想什么？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突然对伺候在身边的田玉云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小田茫然地摇摇头，毛泽东下面一段话便使他大吃一惊：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

这句括是暗藏杀机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毛泽东怎能不对彭德怀耿耿与怀！

李银桥以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私人交情很深，大概彭德怀也自以为是这样、但是，毛泽东不管这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概括他和彭德怀长达三十一年的关系是“合作，

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下来七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第二二一页）所以毛泽东袷彭德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老账新账一起算，还莫须有地说彭德怀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阴谋篡党”。卫士们不无同情地怪彭德怀不该赌气，“他一赌气，事情变大了。”但是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彭德怀的脾气；他给彭德怀加上那么大的罪名，彭德怀的反应可想而知。毛泽东并不是把这件事当做彭德怀的一时赌气来看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豁达大度”到哪里去了呢？毛泽东把彭德怀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对彭德怀实行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後令彭德怀死在“文革”中。这还是仆人眼中那个听说老乡吃不鲍就掉泪的毛泽东吗？

逞强好胜

“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权延赤这样问李银桥。

“挑战。迎接挑战。”李银桥回答。

他解释说：“就我所见•他从不认输，从来不层在任何屈辱旳环境下低头。于任何事情，不获全胜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我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征服”。

下面两件关于游泳的事，就能看出毛泽东的逞强好胜。

一九五四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那天海上刮七极大风，波浪滔天。毛泽东要下海游泳，大家纷纷“劝驾”，保健医生也陈述了三条不能游泳的理由，最後一条是说李维汉游泳鉡了一跤摔断了腿。这第三条理由反而对毛泽东起了“激将”的作用，毛泽东更来劲了：“李维汉摔断了腿，我就要摔断腿吗？你这么说，我今天是非游不可！”

七八名卫士和警卫不得不护卫着毛泽东冲向大海。那真是一場與大风大浪的搏斗。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都被大浪抛起又拍倒，反覆几次，保卫人员精疲力竭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不行了吗？你们不愿跟我走，你们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组织人马另组织队伍跟他斗！”

这是毛喜欢说的话。他是以打仗的心情来对付海浪的。类似的话，他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说过，在“文革”初期时也说过。李跟桥回忆说：“那天游泳回来，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游长江，遭到一大群人的反对。最後还是毛胜利了，他得意地说：“罗部长——罗瑞卿）不叫我游，我偏要游。”保健医生徐涛觉得，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就像一个逞强好胜终于如愿以偿的孩子。

挑战接受挑戳，这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性格。没有这种性格，毛泽东就不可能把共产党人和军队团结起来，排除万难，取得最後的胜利：外国人说毛泽东生性好斗，这大概不错。青年毛泽东说过：“与天奋斗，其了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老年毛泽东也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革命者当然要斗争，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然而毛泽东这种好斗的性格中夹杂着任性的成分。卫士说：“毛泽东在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顽强和他的任性一样惊人。当他由於任性而出现错误时，由於他的自信和顽强，仍然能说服和团结

一大批人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毛泽东是马克思 •韦伯(MaxWeber)所说的那种“卡里斯马” (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为他的号召而献身。早期毛泽东的确是代表人民的，他为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和路线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因此才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晚期的毛泽东被神化了，无论他发出什么荒唐的号召，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东响应。

身边的女同志

李银桥走后，毛的身边人换了。侍卫左右的再也不是那些魁梧强壮、充满阳刚之气的的贴身警卫，而是漂亮的女性。

张玉凤是一九七 O 年夏调到中南海的，后来任毛的生活和机要秘书。

孟锦云早年是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在一次中南海伴舞为毛所认识。“文革” 中她受到迫害，后来托另一个文工团员带信给毛，得以重返中南海，毛把她留在身边当护士。这是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事。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的作者用这样的语言来描写毛泽东再次看到孟绵云时的心情：

“他还记得，那次舞会上，他与另一个文工团员跳舞，跳着跳着一下子发现孟锦云坐在那里看着他。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发现小孟，他的小同乡的目光是那样明亮，那样灵活，那样纯情，那样闪着异样的光彩，那样灼热而且飘忽。他发现，她那白细的面容上，泛着淡淡的红光。他忽然觉得，小孟是他的女儿，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知己。这个瞬间的情景，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天地图书，一九九一年，香港，四六--四七页）

这当然是作者的想像。但书中也记载了毛泽东对孟绵云说的话：“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而，也是我的朋友。”毛还称带孟绵云去见他的那位女文工团员是“红娘”、“鹊雀”。

毛对小孟说：“在我这里工作，是吃饭不要钱 • 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 • 看书管够。你的衣服可以在这里做，我出钱。”

孟绵云刚来时，毛身边有一个护士小李。李玲师也是六十年代去中南海跳舞和毛认识的. 一她是舞蹈学员，当时才十三岁。後来改行学麻醉，在四川一个医疗队干了几年。“文革” 中，别人带她来看毛，毛说：“你长大了，又成了医生。我现在是个病人，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 就这样，小李成了毛身边的医护人员。开始，毛很满意小李，但后来渐渐不喜欢她了。小李就调雕中南海了。

毛对孟绵云的一举一动都看得顺眼，也肯听她的劝说。毛当时患最重的白内障，很多人劝他做手术，他都拒绝了，但在小孟的劝说下，他却同意了。

张玉凰和孟绵云轮流值班陪伴毛泽东，每四小时换一次班。她俩都可以代毛圈阅文件。毛称呼张玉凰是“张姐”，孟锦云是“孟夫子”。

毛有几名保健医生，三名厨师，还有有工作人员专门为毛管图书、管账。毛的房间外的工作人员，不能随便进入毛的房间，只有张和孟两人能随便出入。其他任何人，包括政

治局常委和毛的家人，都必须经过她们向毛通报得到同意後才能进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最後一个生日。毛的女儿李敏、李讷来看父亲了。但据孟锦云的叙述，最使毛高兴的是他从前的护士长吴旭君和护士俞雅菊、李玲师的到来。她们三个加上张玉凤、孟绵云，给毛泽东磕顽拜寿后，陪毛泽东吃饭，有说有笑，吃得很开心〔不知为什么没有包括李敏和李讷）。那天江青也来了，但毛没有理她，她没趣地走了。

闲谈中的流露

小孟在毛身边的日子里，看到毛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这里面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面列的《自然辩证法》，多半是毛喜欢看的那份杂志，而不是恩格斯的那本著作。另外，毛似乎也很少读西方的著作，尽管他一直在学英文，他读的书的确很多，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可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

毛总把《资治通鐾》放在床头。他曾经告诉孟绵云，他把这部言读了十七遍。这是燕法置信的。大概跟年轻女人说话，毛更加随便，流露的真情也多一些。

一次，毛和孟锦云谈《资治通鉴》。小孟提出武则天的问题。毛认为武则天不简单'了不起，还给小孟讲武则天的故事：

一位大臣看到武则天动下动就杀人，就向她谏议，说这样杀人，谁都不敢当官了。武则天听后就叫那位大臣晚上来，大臣嚇得要命，不知会遭遇什么。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上点一把火。许多飞蛾看见火就纷纷扑来，结果死在火中。可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封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

讲完这个故事，毛评论说：看来，只要高官厚录，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在掌握最高权力后的几十年期间，毛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僚，看来他确实不担心没有人接替。

毛对《红楼梦》也读过好几遍，他对王熙凤评价很高。说王熙凰处理尤二姐事件“有理、有利、有节”；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入不见血的飞刀，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死而无悔。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点影《云中落绣鞋》n 点影故事是：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倜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纲，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昀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把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的，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只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萝，萝见天上飘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绣鞋。以後果然是井下那位青年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倜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

陪毛泽东看这部点影的有张玉凤、孟绵云、李玲师。毛看完後问她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浮东的看法确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

“那倜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愚了，还是井上的青年聰明噢。”

张玉凤反对说，他太奸猾了，不老富。毛争辩说：“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兄解，我很同意。”

小孟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呀!”

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

那些虔诚学习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和已，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

周恩来逝世

毛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流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

毛对身边的服务远确实有感情。延安时代，他为一个勤务员张思德写过悼念文章，即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跟他十五年的李跟桥离开时，毛确实依依不舍。可以看出，毛对身边服务员的感情超过与他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雏的战友的感情。

毛为战友的死而掉泪，我们得知的有两个例子：一是陈毅，一是周恩来。

据孟锦云的叙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前的十几倜小时内，周的病危报告便不断地松到毛这里来。的生命只能用小时来计算了。毛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毛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全集》(换了别人，此时未必有心情看这种书吧)。毛看得很专心，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在擦泪水。这大约是上午十时的事(周逝世的时间是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到中午，毛吃饭，然後休息了两个小时，到三点多种，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逝世的补告清样。小孟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显然，至少在这五倜多钟头内，毛根本没有问起周的病情，否则小孟不会拖那么久才告拆毛。小孟念讣告时泣不成声。毛呢，慢慢地闭上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始终没说一句话。

不过，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三二事》中的叙述有些不同：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十点，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此刻他正卧床，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周总理逝世後有关的一切活勤。”

毛是不是问过追悼会的事呢？他是不是对自己不能去参加表示过遗憾呢？如果有这样

的表示，那时一定会报道的；现在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毛没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毛确寅为周的逝世感到悲哀，按照常情，毛应当表示要参加追悼会，而政治局成具，包括汪东兴在内，则加以劝阻，然後毛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可是，政治局是知道毛的心理的，这就是他们敢於不通知毛的理由。而且，即使毛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他的感情，例如他可以写几行字（牛年多以后他还为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即使他连字都不能写了，他还可以说几句话，表示对周的哀悼，或对周做公开评价。然而，这样的话也没有。

在审阅中央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参加的负贵人人数和悼词的报告时，张玉风脱口而出地问他：“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毛泽东只是在送审的悼词（这个悼词没有说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上画了一个圈，连张玉凰也说：“这个圈表达了毛主席对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太弱了，太弱了……这一比怎么能表大得了对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对周的死，毛只是沉默。周恩来逝世的悼词，毛是认真审阅过的。据汪东兴说，毛修改了三次。这是够用心了。可正是这个悼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为它既没有说周恩来是毛的亲密战友，也没有说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走回头路，不干后悔事

尽管毛泽东多次说到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他自己却是不肯认错的。他认定要怍的事，是不会回头的。“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封。”“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权廷赤《红墙内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第一 O 七、一一四页）

列车员姚淑贤讲了一件小事：毛泽东夹酱豆腐，没有夹碎，半块酱豆腐腐滴溜郎当全被带起来。毛泽东稍一犹豫，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我叫起来：“哎呀，多咸呀！”毛泽东笑着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我说：“快吐了吧。”毛泽东放下筷子，嚼着酱豆腐说：“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同上书，一五 O 页)

毛泽东的这种好斗意识甚至贯彻到吃饭这种的小事中，这是他把那牛块酱豆腐当成了敌人，它在挑战：“我这么咸，你敢吃吗？”所以毛泽东偏要吃，不管多么咸也不吐，吐就是输了，就是後侮了。

田玉云也说到过一件小事：毛泽东在野外散步，看到前面有个石岗，岗上有棵树，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去。本来有条小路通向石岗，毛泽东没有沿这绦路走，他趟着青草碎石，走了一条不是路的路，结果越走越不好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还有沟堑。一些工作人员走的是另一条小路，贴身卫士和警卫尾随着毛走。另一条路的人快到岗顶了，向毛泽柬这边的人打招呼：“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毛泽东摇摇头：“我这倜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接着问身後的人：“你们跟谁走？”

在这种場合，毛泽东想的不是走哪条路方便这一简单的问题，而似乎是要不要坚持革命道路的大问题，是政治路现的大问题。别人走的那条方便的路大概是机会主义昀，而他走的哪条崎岖难行的路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肯认错和回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观上认为自己没有错：另一种是明知自己错了，

都不肯承认。不幸的是，这两种情况都在毛泽东身上发生国。

在“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虽然意识到“文革”是搞糟了，但是他不顾意承认。因此他才要打击他认为可能会纠正“文革”错误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审讯“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还说，要硬着头皮顶住……：

封建时代的皇帝都可以向人民认错，但毛泽东不能！

在生命的最会岁月，毛泽东把自己禁錮在中南海的住所里，周恩来病倒了，代替周恩来的邓小平难得见到毛泽东；邓小平被打倒了，代替邓小平的华国锋也难得见到毛泽东。江青等人就更不消说了，毛泽东把自己埋在古纸堆里，吟诗诵赋，身边只有秘书和护士陪伴他。他既不愿承忍错误，又无力收拾局面，只好采取逃避的辨法。这就难怪他越来越孤独。他究竟怎么想的？他认为他还会赢吗？他会想到见到马克思时怎么交代吗？

不论多度伟大的人物，历史的判决是无情的。

（写於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夕）

第一部　毛泽东的权术

第一章　延安整风（上）毛泽东最高权威的确立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继续遵义会议之后又一重大事件。只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才使党摆脱了来自莫斯科的束缚，建立了他在党内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铺平了道路。

中共的党史上，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毛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他的“人民内部矛”学说时，曾把他的这种思想追溯到延安整风，说那时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实际上当时毛并没有明文提出这样的公式，只是提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则，用以代替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毛说；由于采用了这个方法，“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六九页）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对这次整风作百分之百的肯定，就是抹杀了事情的另一面。

整风之前

遵义会议只是纠正了“左”的军事路线。毛之所以东山再起，主要是靠他在军事领导上的杰出表现。遵义会议并没有触及党的政治路线。这原因是简单的：军事路线可以要李德、博古负责：政治路线可是由莫斯科决定的。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

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的道路，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通过王明及其教条主义小宗派来控制中共的。在遵一会议上，这个宗派的统治结束了。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共失去了联系，对中共中央发生了权力转移的事一无所知。

据毛泽东自己说：

“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封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王力《现場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三年，一二六页）

然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会承认毛泽东的地位吗？这不能不是毛泽东感到不安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陈云、曾三一行从莫斯科到延安。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爬上了中国共崖党的最高宝座，同年十月就离开中国去苏联，一呆就是六年。这个时候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又是共产国际孰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孰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这时他已不再是那个跟在米夫屁股后面的翻译，而是一个革命的大人物了。

在王明回国以前的八月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了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任务。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这个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大转弯，而党内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也很小。他但心中共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说：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现在这个肩负着帮助中共中央重任的共产国际的宠儿回来了。

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发表了以饮水思源为题的歌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蒋拳蜂《在毛主席周圄》，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合肥，二九八页）

经过王明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到十四日召开：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传达和解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和国民党全力合怍。在谈到领导权问题时，王明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如西班牙现在实际上已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现在欧洲资产阶级也看马列主义，资产阶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这个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法，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但王明自己也提过。

王明传达的新方针，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政治局委具的一致拥护。周恩来且不指名

的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九九O年，北京，三九三页）这个会上增补了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准备在一九三八年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后，在中共党内实际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到三月一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意见由于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又一次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兵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康生、陈雲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毛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利用抗戟机会全力发展中共武装'八路军不与日军正面对抗而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将中共主要作战力量用於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了中央核心层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参见《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三八六页；张国涛《我的回忆》；《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这是自遵义会议后，毛遭到的第一次严重挫折。此次事件不懂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末完全确立，更预示已和毛合作三年之久的周可能同即将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动摇毛已在中共政治核心建立的优势。此事对毛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内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的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与军方疏离的现实危机。（《周恩来年谱》. 三七三、三七三、三七四、三七五，三七七页；《彭德怀自述》，二二三页)令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竟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汇报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具，新四军的政委--毛的政治老封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於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高华《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夏，是遵义会议毛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己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但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此时王明、周恩来正轰轰烈烈、频频曝光於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上，而毛却在不动声色，潜心观察，以待时机：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际毛的活勤：

（一）用一切方法，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尽管毛控制舆莫斯科的通讯，但王明回来后，毛原已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实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大旱之望云霓，视王明传达之斯大林指示为甘霖，而把毛泽东的肺腑之言撇在一边。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回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当这个转折性的提纲获得共产国际的通过後，毛在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就已获得初步的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支持毛的口信，则不啻是毛的巨大胜利了。这个口信对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影响之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的政治地位的承认书。

（二）积极引导军方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尽量避免与日方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一九九O年）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的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的胜利后，毛亦表示嘉许。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无友军可配合，八路军事实上采纳了毛的战略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从不到三万发展到三十万厚，军队将领桨已信服毛。

（三）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毛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的关系。一九三八年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刘所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为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参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二一二--二一三页）毛还加紧拉张闻天，不仅使张闻天同意自己对国民党的方针，而且加速了舆王明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长期和王明共事的康生，毛先让他坐了一个时期旳冷板凳，在证实康生对自己的忠诚后，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毛联合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一事，展开了电报战。虽一时难分胜负，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一度拥有的政治局的完全支持。

（四）推迟召开七大。六大後，由于环境险恶，七大迟迟未能召开。国共合作后，中共成属合法政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禽裁决定在 1 最近畴期内 L 召箭七大，蓝成立了由毛泽东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七大准备委具会”。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张闻天且代表中央就此事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不愿意在形势封己不利的情况下召开七大，张闻天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東之高阁未发出。

到整风前，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为：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

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凯丰；

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陈云、康生。

在这个领导集团中，可以与毛抗衡的只有王明、博古、张闻天、朱德、周恩来这几个人。头一个当然是王明，他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当时中共党内对共产国际旳迷信还没有清除，加以王明善于演说，在延安颇迷惑了一些年轻学生。所以，王明是毛泽东要对付的第一个对手。不过王明确有很多错误和弱点，容易抓住。王明已在一九四 0 年十一月就提出党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最重错误的看法。王明重复了他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即曾表示过的观点，以与国内的同事博古、张闻天划清关系。眼下形势变化，王明且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一九四 0 年五月七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名义上是党内“负总责”的，可他实际上已不太管事。他真正佩服毛的领袖才能，处处听从毛的意见，重大方针都让毛做决定。然而，他毕竟是留苏的，他可以否定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但否定遇去的政治路线，却是他不能接受的。毛很清楚，中共领导曾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自己合作的张闻天。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抗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做的努力，对毛的试探气球作出强烈反应。可是，留苏派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张闻天一人何能抵抗？後来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农村做调查研究，於一九四二年初离开了延安。朱德为人宽厚，没有野心。博古因为在反围剿的军事上失败，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威信尽失。周恩来倒不大好对付。虽然周也像朱德和张闻天一样没有野心和尊重毛的领导，然而周有杰出的才能和巨大的声望，为毛所忌。毛的策略，就是以王明为主要封象，同时尽可能把周恩来牵涉进去。毛设法把刘少奇提上来，用以压倒周恩来。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在他动身之前，季米特洛夫请他带话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在实际

斗争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上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说，这是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王稼祥选集》.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二三页）王稼祥先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活，随後又在十月份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传达。他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际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同上书，一三八、一四一页）

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或，帮助毛泽东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遏制了王明的野心，对六中全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认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讨好斯大林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一周後的九月一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二次世界大战全而爆发。

斯大林签订德苏条约，违反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而这些决议本来是在联共领导下作出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任务。会议作出的决议指出法西斯是世界战争的祸根，号召全世界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打倒法西斯。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其中批评了那中要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说法，说：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对希特勒政府的侵略行径加以阻止和制裁，而不要私下里和它勾勾搭搭，为虎作伥，从而纵虎为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北京，四七四页）此外，它还批评了一中不介入战争的中立论点，警告说：法西斯侵略者所发动的战争不可能是局部战争，它必定会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大屠杀。中立的立场是对侵略者的姑息和纵容。而坚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也绝不可能摆脱战争危险。(同上书，四七四页）。

所有这些话·现在都成了对斯大林的讽刺。

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停止了反法西斯的宣傅，而且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停止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把矛头调向英法帝国主义. 世界舆论认为苏联同德国签订条约是帮了德国的忙，各国共产党也感到不知所措。

只有毛泽东的反应与众不同，他无保留地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赞成苏联的立场，不反对德国法西斯而反对英法。

毛泽东在九月一日封《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除了打破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外，在东方，还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毛浮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五八O也页）

斯大林同德国签订条约，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利益出发的，是违反共产主义者所应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而毛泽东反而大加赞扬，硬把这件事说成是对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援

助。

师哲回忆说，苏德条约签订是，他正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杂志的出版工作。最新一期已经印好，正在装钉，内容都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签约的消息突如其来，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都感到不能理解。这时毛泽东九月一日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大家震动很大。看来，毛泽东的这番话在国际共产党人中也是惊世骇俗之论，他们的思想转弯没有这样快。(师哲《历史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一三一--一三四页）毛的这个讲话德苏条约表示百分之摆的赞同，还说是对中国的援助，这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捍卫苏联，他说：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为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塑料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四六页）

可是这一次，苏德条约使共产国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斯大林的指示也是对法共和英共的最重打击，因为要使它们停止反对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的矛头转向英国和法国，这完全不能使两国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接受。它们即使想为苏联辩护，也觉得很难。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斯大林的难得的支持。显然毛想以此来换得斯大林对他的支持。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演讲，后来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为题发表，还曾收入《六大以来》。一九八 O 年这本书再版时，把这篇文章删去了。可见当时的中央也认为这篇文章不妥。

九月二十六日，毛对美国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话。

毛说的共产党领导权的问题，斯诺也觉得困惑。斯诺问：共产党自称领导着中国的工农，可是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百分之八十是件在日本占领区，共产党怎对他们实行领导呢？毛答：“在陕甘宁边区，在八路军管辖下的游击区，我们不仅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还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旁的地方，共产党的领导比较间接，但只要农民和工人是安共产党的主要方针组织起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领导下。” (斯诺《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一四四页）。

对此，斯诺含蓄地评论说：按照这种逻辑，显然共产党人认为参加抗日战争的所有军队都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因为抗日是共产党在革命现阶段的中心要求。(同上书,一四五页）。

斯诺说到，德苏条约后，重庆有人担心接着会有一个日苏互不侵犯绦约。有一阵苏联确实劝日本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斯诺问毛，你认为可能吗？

毛答：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就不会签订；如果不会，就可以签订。

历史嘲笑了毛。两年多以后，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同日本订立了中立条约。要说这不妨碍苏联援助中圆，那是不可能的。

毛当时还说；今天反苏运动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德国。它在於以英国为首的各民主国家。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各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广大的战线，企图把意大利和日本也拉进去。它们企图借此先打败德国，然後进攻苏联。

毛还说：苏联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因为双方都是帝国主义，双方都是没有正义的强

盗。

斯诺问，毛的意思是不是法西斯主义和英法等民主国家没有区别。毛的回答的意思是没有区别，而且英国似乎更坏。张伯伦正在组织世界战线，用以包固苏联、抗日的中国以及德国。他的目的是结束中国的战争，推翻希特勒，孤立苏联，以便日后组织反苏的运动。

斯诺有些不服，说：张伯伦先生的胃口恐怕没有那么大吧？难道你认为，张伯伦在打德国的同时，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灭亡俄国？在我看来，张伯伦现在对付希特勒就够忙的了，还能准备对俄国打一場更大的仗？如果可能的话，他想争取俄国的友谊·以便打败希特勒，这样做对他来说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即使他确实有在将来搞斯大林的打算。……

斯诺又说到，苏联同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占领了波兰，这使苏联看起来好像和极权主义的轴心国家进行合作来瓜分弱小国家。肯定有这么多人会主义认为。不论怎样，新的苏联政策意味着所谓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昀垮台。……

毛：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法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放案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原话如此！---斯诺的注）的政策。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利用战争来结束民主制度，这些所谓的民上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现在英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张伯伦是世界的头号公敌。纳粹德国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政策放弃以後，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衡量的尺度了。

当毛泽东谈到苏联的帮助时，斯诺插话说：既然德国也是帝国主义，和英法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苏联竟向德国提供大量小麦、石油和其他战争物资，从而参與了德国帝国主一的冒险行动。顺便也问一下，苏联为什么继续向日本出租库页岛的油田，或者给日本以捕渔权。後者价值很大，因为它使日本能输出大量的鱼，从而取得外国信贷，用以购买军火来打中国。

毛说，苏联向日本出售石油的条件，他不清楚。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向德国或日本提供任何军火。

毛在这次谈话中为塑料进攻波兰金行了长篇大论的辩护，但是未能说服斯诺。斯诺最后向毛说，他认为苏联的这种政策必然会加强希特助的地位，以致反过来威胁苏联。苏联的这种做法还会削弱英、法、美的共产党，使工人阶级队伍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反动和保守的势力将得到加强。苏德条约可能会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为对塑料进攻的战争。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这次谈话全文见《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同斯诺的谈话》）

关于苏联进兵波兰问题，毛斥责波兰政府说，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所以不能同情这样的政府。（同上书，五九七页）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至于苏联打进波兰东部，那就不同了，是为了收复苏联过去失去的领土，也是对波兰东部少敷民族的解放。还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同上书'五九九页）

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的，主要是苏联。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波兰时，苏军也进入波兰东部，双方以纳雷夫河、布格河、桑河为界。后来世界才知道，原来苏德条约附有秘密条款，在波兰划分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波兰是个苦难国家，受尽郊国的欺侮，特别

是受到帝俄的侵略。俄国从波兰获得了乌克兰东部；沙皇还曾兼任波兰国王，对波兰实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彼得一世曾是波兰的保护人。德国是和俄国争夺波兰的对手。在十八世纪末，波兰三次被瓜分，这三次参舆瓜分的都有俄国和普鲁士。波兰灭亡了一百二十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後才获得独立。苏德秘密划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表明斯大林继承了帝俄的不光彩的遗产；所谓和平解放，不过说得好听罢了。波兰政府诚然对苏不友好，但这有历史的原因，而且也不能成为塑料进兵的理由。

这里可以补充说一下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党日本占领了海南岛後，美国政府废除了同日本的贸易协定，但美国商人不顾这一点，继续把原料卖稩日本。至于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但遭到人民的反对，也遭到统治阶层的反对，最後张伯伦只好下台。张伯伦的政策要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就不要批评？

把毛泽东的观点同共产国际的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共产国际的要正确得多。一九三八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具会主席团在前述的《决议》中说，西方与东方的战争贩子竭尽一切可能支持对方的侵略计划，威逼世界各固卷入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揭露任何抹煞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之同的区别的企固，要把侵略的一方与遭受侵略者进攻的一方区别开来。这个决议指出，法国、美国目前对维护和平事业斯诺紧逼问：在现代战争中，向参战者提供坦克、飞机，跟为坦克、飞机提供燃料，这中间有什么大的区别？为什么说美国卖给日本战争原料就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而苏联卖给德日同样的原料，却不是参加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战争和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呢？表示关注，把所有国家都说成是侵略者，那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要求对法西斯国家在财政、经济上坚决实行制裁（完全拒绝贷款、停止贸易和提供原料）。

后来的是史发展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错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说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书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三页）

有些人说，苏联将得利於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同上书，五九三页)“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意识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顾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同上书，五九四页)

毛在谈到苏联积极援助正义的、谋解放的斗争时举例说到苏联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实这不国是两个帝国主义（其中一僴是社会主一帝国主义）封外蒙的争夺而已。

这个问题显然使毛觉得不好回答。毛笑了一下，承认说战争原料买卖和战争工具买卖之间的区别不大。

毛在这次谈话中为苏联进攻波兰金行了长篇大论的辩护，但是未能说服斯诺。斯诺最后向毛说，他认为苏联的这种政策必然会加强希特助的地位，以致反过来威胁苏联。苏联的这种做法还会削弱英、法、美的共产党，使工人阶级队伍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反动和保守的势力将得到加强。苏德条约可能会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为对塑料进攻的战争。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这次谈话全文见《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同斯诺的谈话》）

这里可以补充说一下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党日本占领了海南岛後，美国政府废除了同日本的贸易协定，但美国商人不顾这一点，继续把原料卖稐日本。至于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不但遭到人民的反对，也遭到统治阶层的反对，最後张伯伦只好下台。张伯伦的政策要批评，斯大林的政策就不要批评？

把毛泽东的观点同共产国际的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共产国际的要正确得多。一九三八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具会主席团在前述的《决议》中说，西方与东方的战争贩子竭尽一切可能支持对方的侵略计划，威逼世界各固卷入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揭露任何抹煞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之同的区别的企固，要把侵略的一方与遭受侵略者进攻的一方区别开来。这个决议指出，法国、美国目前对维护和平事业表示关注，把所有国家都说成是侵略者，那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要求对法西斯国家在财政、经济上坚决实行制裁（完全拒绝贷款、停止贸易和提供原料）。

后来的是史发展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错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说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书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三页）

有些人说，苏联将得利於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同上书，五九三页）“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意识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顾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同上书，五九四页）

毛在谈到苏联积极援助正义的、谋解放的斗争时举例说到苏联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实这不国是两个帝国主义（其中一倜是社会主一帝国主义）封外蒙的争夺而已。

关于苏联进兵波兰问题，毛斥责波兰政府说，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所以不能同情这样的政府。（同上书，五九七页）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至于苏联打进波兰东部，那就不同了，是为了收复苏联过去失去的领土，也是对波兰东部少敷民族的解放。还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同上书'五九九页）

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的，主要是苏联。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波兰时，苏军也进入波兰东部，双方以纳雷夫河、布格河、桑河为界。后来世界才知道，原来苏德条约附有秘密条款，在波兰划分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波兰是个苦难国家，受尽郊国的欺侮，特别是受到帝俄的侵略。俄国从波兰获得了乌克兰东部；沙皇还曾兼任波兰国王，对波兰实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彼得一世曾是波兰的保护人。德国是和俄国争夺波兰的对手。在十八世纪末，波兰三次被瓜分，这三次参舆瓜分的都有俄国和普鲁士。波兰灭亡了一百二十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後才获得独立。苏德秘密划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表

明斯大林继承了帝俄的不光彩的遗产；所谓和平解放，不过说得好听罢了。波兰政府诚然对苏不友好，但这有历史的原因，而且也不能成为苏联进兵的理由。

不仅如此，德苏条约的秘密条款还规定：关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更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就自动构成德国、苏联势力范围的疆界。后来苏联严侵略芬兰，以致被国联开除，这段历史毛就闭口不说了。

六十年代中国同苏联分裂後•毛泽东批评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这是对的：不过苏联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了，而毛泽东当时是为苏联喝彩的。

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想把纳粹德国这股祸水东引；但苏联何尝不是想把这股祸水西引？无论东引还是西引，都是错误的；应当联合起来制止侵略，像后来苏联和英美所做的那样。英法和德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英法的民主制度究竟不同于德国的法西斯制度，而且实行侵略的是德国和他的盟国意大利，不加区别是不对的。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中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和公开的法西斯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不同的。现在法西斯正在侵犯资产阶级民主，力图代之以最野蛮的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因此，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面临的问题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之间作出选择。许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权利（如罢工权、组织工会权以及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权等等）是无产阶级流了鲜血换来的，他们为维护这种权利而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北京，四三---四三三页）

毛泽东本人在一九三七年写的《矛盾论》中也提到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三二

0 页），现在他把这一点抛掉了。他说：“现在爆发的戳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五页）

晚年毛在谈到斯大林时说：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开了国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於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二五九页）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好感，他不惜做出一些违心之论。但毛还间接承认了在延安时写的那篇文章是出於内心意愿。应该说同时也是出于需要，毛需要得到斯大林对他的地位的承认。毛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斯大林的六十诞辰前夕发表的，题为（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其中称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肋，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五七页）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算了吗？斯大林对中回革命的错误指导，都不算数了吗？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斯大林秴了中共多少援助呢？靠一个人的援助去解脱人类的灾难，这个话合乎马克思主义吗？

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开始

现在，毛泽东有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又笼络了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当着王明等的面，毛泽东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剥夺王明的最後资本，即“言必称希腊”--其实是；“言必称苏联”)。毛通过改变词语，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道路。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可以说是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这以後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是整凰运动的开始阶段。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党的历史，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初到一儿三四年底的历史进行了大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三年期间，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期间，领导全党高级干部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

一九四一年八、九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决定编辑名为《六大以来》的党的历史文献集，由毛审核。在此之前，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的《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自己造舆论。毛编这本书是针对王明的书的，同时也是为七大作准备，是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这个辩法很成功，该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乔木说：“对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政治路线，要不是编辑《六大以来》时找到其错误的大量证据，就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和开展黛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活动，也就不可能在党内，即使在高级干部中取得一致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一八七页）后来，又编辑了《六大以前》和《两条战线》，后者供更广泛的干部阅读。

毛这时已决定提拔刘少奇到中央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有一篇刘少奇的检讨文章，是关于他在白区所犯的右倾错误的，毛就不收。（一同上书，一七八页）

在经过了充分准备后，一九四一年九月开始，先在中央领导层中开展整风。从九月十日到十月二十二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五次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毛作了主题报告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任弼时纷纷检讨，张闻天还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任弼时检讨了在苏区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主义”来反对的错误。王稼祥提出，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却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提出，从当的二十年来的历史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张闻天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常常结合而互相为用，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者的俘虏，教条主义者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此外，陈云提出刘少奇在白区的路线是正确的，应该提高刘少奇将来的地位。任弼时说毛主席和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检讨过去与到少奇有分歧，现在承认刘是对的；如果当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王明没有做自我批评，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问题，由于涉及到过程国际傺，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如果抛开王明不算，那么，会议形成了抬刘贬周的形势。

十月三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中央决定少奇同志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毛要提升刘少奇，用他来压倒周恩来。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凰》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

这两篇演说标志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一九四三年张闻天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还想把这两个重要人物争取到他那一边，向他们宣传中央路线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然而没有用。

这是七大前的较量。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这次会的时间长，参加的人也多。整风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部束检查。

在七月十三日的会议上，毛点名批判了王明，说他在抗战初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假马列主羲。说机会主义如不改正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胡乔木评论说，这些批评对蒋介石和王明都是对的。“但是由于对抗战初期跟着王明犯错误的一些领导人的情况没有强调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而有的批评也失之偏颇。这种状况影响了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时期路线问题的氛围。”

其实，说王明是“迁就主义”是可以的，但说是“投降主义”就不是什么“偏颇”而是根本不对。

因为，在当时提出共党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愚蠢的，既做不到，又不利于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共产党可以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不能领导国民党的军队，而国民党的军队是抗日的主力：在歧治上，共产党并下掌握全国性的政权共产党只能以它的方针和政策，以它的宣言和行动去影响国民党和全国人民，而这种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把这种影响说成是“政治领导”，未免夸大。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远不如国民党，毛泽东的威信远不如蒋介石，这是事实。毛泽东在报告里承认国民党是杭一战线的主干，再三提到“拥护蒋委员长”和引用蒋介石的话，就是这种事实的反映。

王明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口号，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因而不能提这样的问题。他又说领导问题要以力量为基础，没有力量空喊领导是不行的。说在统一战线中不能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评传》，三 O 七页）应该说这还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于王明和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工作，毛泽东宾并有探取分析的态度。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不要否定一切”时，也只是说：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的中央，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是和我们一致的。他并没有进一步肯定那些犯错误的同志的经济的贡献的一面，特剐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贡献。

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相继发言，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批评王明的错误。

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康生出来表演了。他放了一炮，对会议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说这样的讨论不解决问题，应该研究一下会议如何开法。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现，并影响到华北，这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长江局就是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团，其书记是王明，副书记是周恩来）有更多的揭发。康生批评博古讲话抽象，

不揭发事实，自我批评精神也不够。康生还不顾事实地批评王明负责的《新华日报》完全成了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康生用批评王明的方法吹嘘自己，说；在共产国际时，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戰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倜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国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问题。

康生的这种发言方法，一副左得可爱的面孔，好像只有自己最关心会议的结果，对王明的批评夸大其词，把自己打扮成受王明排挤的模样，既打击了王明，又美化了自己。他的这种语言，和几十年後“文革”流行的语言一模一样。康生本来是紧跟王明的，这时摇身一变，成了批判王明的积极分子。可是，毛泽东欣赏这一套，他需要这样的打手。康生的这个发言对后来的会议进程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正是毛所希望的。

毛的发言着重讲“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个苏区的中央局去改组，我说的“欢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到一九三八午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的名义来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在一起，危害最大。

毛说的“教条主义宗派”当然是指王明、博古、张闻天.“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指谁呢？叙述这件事的胡乔木没有说，但很明显的是周恩来。胡乔木还说，“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这些过激之词是什么，胡乔木也没有说，只说，“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反应实际上为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毛选择了一个有利的时机。这次开会时，正值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国共关系紧张之时，因此，反映到这次会上，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也紧张一些。这种空气是不利与平心静气的讨论的。

十月六日'政治局开扩大会议。毛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说：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具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毛所说的现有的五个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具，除了刘少奇和毛自己，就是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了〕。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一九四一年九月的会议是关键，否刖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毛再次强调，斗争的性性质两条路线的斗争，错错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

因此，毛选择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发出的九倜文件来加以评论，学了九篇文章。这些文章没有发表，当时也只是给很少几个人看过。这是毛争取多敷的一个手段。这些文章中，毛除了批判王明、博古和周恩来以外，正面表扬的人物就是刘少奇。胡乔木说：“‘九篇文章’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最後都是如此。”又说：“有同志提出，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曾经肯定四中全含，後来改变了。”（《胡乔木回亿毛泽东》，七四页）

他（毛）在会后的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处援引少奇同志的观点，赞赏少奇同志领导白去工作的正确主张，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少奇同志的责难。主席在“第八评”中说，到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正确的领导人物”，是唯物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下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说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在我所接触到的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很少的。这足见主席对少奇同志是多么倚重重。(同上书，二七四页）

毛对刘的评价虽然没有发表，却反映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其中赞扬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去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去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北京，九七七、九八 O 页）

但毛的九篇文章却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如果仅仅是赞扬刘少奇的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公开的。没有发表的原因，据胡乔木说，“这里涉及到对个别人的评价，又与文章的形式过於尖锐有关。毛主席长期踌躇。”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五一页)“如果在整风場合，或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不会这样讲。这里是他自己写，自己看，把话说得再凶，反正也没有人听见。” (同上书）胡还说：“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续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舆一九四二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有点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稠。(同上书，二一四页）

但毛对这些文章是念念不忘的。根据胡乔木的叙述，毛在建国后至少把这些文章拿出来看了三次，其中有两次印发。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毛重新修改后给几个同志看了一下。(注意：陆定一在一九五六年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宣布，党中央不拟编党史，只准备编辑党史文件集。(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毛又找出这几篇篇文章看了一遍，删去其中称赞刘少奇的话，原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後来只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最後一次是在毛逝世前的一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还让人给他读一遍。可见毛对这几篇文章之重视。(同上书-五 O 页，二一四--二一五页）

胡乔木说的“涉及对个别人的评价”，这是谁呢？如果是王明，毛没有什么好踌躇的；那么就只能是周恩来了。周就属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到的在一九三一年开六届四中全会时对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教条主一者“实行妥协和支持”的“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迭集》一卷本，九六五页）

毛两次印发这些文章的时间也值得注意。在本书下面还将叙述，毛在五十年代未曾想把周恩来从总理职位上撤下来。一九七四年正是“批林批孔”的时候。毛荏临死前还把这批文章拿出来，他究竟想做什么？

如果我们了解毛和周的矛盾复杂关系，这个谜就下难解开了。

一九四三年三日二十日，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未参加)，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接着中央书记处开会：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书记处设一个主席，毛泽东被选为主席。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此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前者由毛泽东任书记，后者有刘少奇任书记。这样，刘的地位显著上升，舆毛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

这样，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书记处“会议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後决定之权”。　　　此决定还决定将现有的工、妇、青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和副书记（蔡畅）各一人。还对各个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作了重新划分，这样，王明就继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女子大学撤销而自动失去校长职务之后，又被解除了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杭战部部长，而抗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昀刘少奇任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曹仲彬、载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长春，三五一页）

这意味着“国际派”的彻底失败。

清算王明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就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样，王明失去了一倜重要的后台，只剩下斯大林。他却还继续宣传他对国民党的观点。现在是清算王明的机会了。

后来毛谈到这件事说：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错误的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意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二五四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这样说：

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表现都是错误的，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王明最先从共产国际得到新的精神，提出不少正确的意见，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的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对于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更应该采取分析态度。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下，也存在缺点和错误。（《中国共彻底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五二三页）

其实，抗战初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是完全接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战争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论新阶段》）的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

下面是毛有关抗日战争的领导问题的话：

去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後，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舆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新阶段》，三页）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合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同上书，二八页）

引文中“蒋委员长”前的空格为原文所有，是当时流行的在文字中对蒋表示敬意的方式。从这些话看，很明显地是以蒋介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引者按：第一任务是抗战到底）在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汉奸政府统治中国。（同上书，三六页）

下面说到为此目的就要调节国共雨党的关系，包括“反对利用困难于政府为难之行为”“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同上书）毛在这个报告里多次提到，“在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四次引用了蒋的话：毛还说到要在组织上发展国共两党，并以国民党为主：

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到下的国民政府與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

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彻底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百万以上。(同上书，四六页)

毛在报告中还专门谈到“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并批评了怀疑的观点：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於国民党一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於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戟，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同上书，二九页）

尽管在国民党内还有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

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分子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同上书，三一页）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覆；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同上书，五五页）

在建国以后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进《论新阶段》的全文，而只节选了其中的《中固共彻底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编者在《题解》中说：“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个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其实，这一部分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相反，整个报告是强调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毛泽东选集》没有发表这个报告的其他部分，显然是感到尴尬。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还专门谈到了“我们的领导责任”，而在这里闭口不提这一点，甚至此王明更积极主张加强與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显然是一种转变，是一中服从共产国际的表示，是我了显示对斯大林的忠诚

以及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

而上面这些，都是当初为取代王明等留苏派的长长过程中的一国步骤。现在，毛泽东不仅要清算王明，而且“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寄，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毛泽东关于整访问题致聂荣臻〈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运动已进入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阶段。彭德怀从太行前线调回延安，参加了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整风学习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检查军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百团大战”的是非得失，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七大上，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其中也检讨了“百团大战”的是非得失。师哲听了后觉得受到很大启发。“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像他那样的负责干部对自己的的缺点错误所做的那样严格的自我批评。”两天后，毛问他对彭德怀发言的感想。师哲说好。毛不等他说完，就至高兴，地说：“他承认错误的熊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看到师哲没有什么表示，毛又补了两句：“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一切。”

七大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继续批评彭德怀。（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二六九-二七 O 页）

延安的这一切-被一个局外人观察到了，他就是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他在共产国际撤销前也是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在康生对他作了一次谈话后，这个苏联人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为前提的。听康生的口气，我感到王明有被开除的危险，而且实际上这是毛的一伙人策划的。”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一六七页）

弗拉基米洛夫认为延安整风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反对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的，他一直根据这个观点向莫斯科做报告。另外，王明也悄悄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发给季米特洛夫一份电报，要求这位前共产国际劳动人告诉中共劳动，他是遵循国际的路线的，是执行国际的决议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认为，毛的新路线违反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因而实质上是一条分裂的路线。（同上书，一六八页）

这一着收到了效果。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函毛泽东，对延安整风中批评王明和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并表示了对康生的怀疑。信的主要部分如下：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後，它過去的看到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出於个人友谊我不能不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您知道，从一九三五年起，我一直密切地而且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国事务。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的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除，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而从内战中获得好处的只是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我认为，现在造行的反对周恩求和王明的运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於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我还担心一部分党的干部存在的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请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互相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八月，

我们就从重庆得到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人决定派遣奸细去延安，目的是离间您同王明及其他党的活动家的关系，制造对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国民党人的这个阴谋打算，我及时提醒遇您。国民党人的意图就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以便通过这种方式轻易地摧毁它。我认为，康生的活动无疑是帮助了这些奸细。请原谅我同志式的直率。但是，只是由於我深深地尊敬您，坚定地相信您作为一个公人的党的领袖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有利的，我才这样直率地讲话。(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八六年出版。转引自《理论内参》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又见《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央成立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时，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委学委主任，成了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直接助手。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康生没有得到提升。七大後，康生的实际权力反到大大缩小，除了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被解除了。

毛泽东想开除王明，这有些出人意外。因为中共一直宣传说，延安整风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榜样，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的。然而封“无可救药”的人怎么办？我不怀疑毛有过这样的打算。他后来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照顾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反应，于是就落得表示高姿态了。至於有开除周恩来的企图，这是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话有什么根据。

在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进行了半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原则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毛觉得可以把整风有点扩大到普通党员和干部了。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

第二章　延安整风（下）：审干运动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可是恰恰在整风有点的审干阶段，大搞“逼供信”主观主义泛滥，实事求是的精神被抛到九霄云外。

反对主观主义的重点是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可是又把《联共党史》树为经典，号召学写斯大林的错误的所谓“党内斗争”的经验，继续搞组织上的左的路线。毛泽东反对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却树立了自己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

整风运动声称反对宗派主义，正确处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可是恰恰在这个运动中把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分子加以歧视，用“工农兵”来压他们，诬蔑他们要投降日本或者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整风有点扬言反对了王明的党八股，反对“言必称希腊”，可是代之而起的是毛式党八股，“言必称毛泽东”。毛泽东的话成了金科玉律。建国后的文章引证连篇，文革时期的背语录，都源于延安整风。

整风有点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还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从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始实行的，恰恰相反，正是从延安整风开始了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对待满腔热情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把他们当作敌人。

毛泽东为何发动审干

延河边上有一座嘉岭山，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因此这个山又叫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它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登到塔顶，可以鸟瞰延安全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迁移到这里后，这座宝塔成了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像是光明的灯塔。

抗日的怒潮在全中国汹涌澎湃，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失望，共产党的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立场吸引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投奔共产党。

客观环境也起了变化。七七事变后，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起草的，其中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件之一。"这个决定承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所属的许多地方许多军队有"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但强调"今后决不应重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二 O 页）这样，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拥入延安。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国有党具九十万，新干部、新党员占百分之九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二 O 五页）小小的延安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的面孔。他们怀着革命的虔诚和抗日的热情，像朝圣一样来到了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

一九三八年五到八月，四个月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昀革命青年各界人士就达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人到一百多人。(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二九页）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有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黛校，共约两万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九九页）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阻力的。毛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毛提出："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一八、六一九页）

但在延安拥入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後，可以感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於共产党需要他们。党完全可以放心，不必发愁知识分子不来，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子不尊重，也没有关系。

在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大部分来自农村，大部分加入了军队。这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排斥心理。这种心理和毛是共同的。青年时期的毛在湖南本来也可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风云人物，但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那一年去北京时却发现他在这个文化名城中只是一个五足轻重的小知识分子而已。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每月工资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知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

方话。〔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Over China）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北京，一二七页）

毛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帮助一些人去了欧洲，可是自己留了下来。在留过洋的人面前，毛只能算一个“土包子”了。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一派的人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更是对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后钻研吗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发愤。但毛从此有了一种封知识分子的仇视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缓和一些，但遇到刺激，就马上显露出来。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在这里，他把王明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狠狠地发泄了他的不满。他说，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是并不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些：

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東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钣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

那些将马列主义党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嘛，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

上面这些话，在建国后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删去了。但还保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话，如说主观主义“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胡乔木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勤，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九三页）含蓄地表达他也觉得过份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这标志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毛继续批评有些知识分子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浑柬选集》第三卷八一五页）毛在攻击别人时，总要否定对方的最强的方面，现在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骄傲的资本。（其实“比较地最无知识”这句话是欠通的：到底是“比较地无知识”还是“最无知识”呢。）

毛还提出了他的处理犯错误同志的两条著名原则：“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这可以说是毛后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雏形。但这两条原则在实践中起了多大作用，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王实味的悲剧

尽管毛批评了王明路线，可还是要继承斯大林。就在一九四一年最早提出整风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一面批评别人的教条主义，一面又在宣扬教条主义。他提出在

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O三页）

王明所孰行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是被抛弃了，可是斯大林在清党中实行的一套左的组织路线并没有被否定。上面这本被毛泽东作为经典来推荐的著作中，有很大篇幅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斗争的。该书"结束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其中第四条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了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苏共党史》，四三九页）并引证斯大林所说："党是靠清除自身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同上书，四四 O 页）一部苏共党史，除了讲列宁，就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敌人"做斗争并消灭他们的历史。

毛是欣赏这个的。"文革"不就是照这条较多做的吗？当然，不能说不要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之类，但是否要慎重呢？大规模的清党或肃反是否必要呢？要不要反对诬害呢？要不要警惕以肃反为名打击异己呢？这里面有些什么血的教训呢？这些"结束语"都一字不提了。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毛批评了用"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毛的确没有用这种手段来对付王明，可能以此题不他的大度，但也是因为王明的背后是斯大林，毛不能不照顾。但毛说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联共党吏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 "对于这种人，毫是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毒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三五也，楷体字为引者所改用）

延安整风运动是反对左的路线，但这个运动不久就转入了"审干运动". 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贯穿了一套十分左的做法。

毛泽东为何发动审干？

听信了康生的谗言？毛泽东绝不是那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他是暴君而不是昏君。马基雅维里：坏事让别人去做。曹操：借刀杀人。奸臣也要揣摩皇帝的喜好去迎合。本来，毛反复说："这一次整顿三风斗争，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可见，整风有点就其最初目的而言，毛泽东既不是针对已经躺倒的王明去的，也不是针封一般党员群众来的，他的基本目标是那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

三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批评了延安一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官僚主义，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以及延安的"歌唪玉堂春，舞廻金莲步"的昇平景象，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召课整风动员大会。王实味是这个院的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他激烈批评了李维汉的讲话。接着，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独发两篇，指名批评院领导罗迈（李维汉）。来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王实味一时成为明星。轻骑队》、《矢与的》，以及由此引发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丁玲主持）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度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文章，矛头所向，大都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去的。这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一些军队领导

人当中造成最重的反感。（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四九一页）

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在一天夜里提着马灯来看墙报。一般人以为这表示了毛对墙报的支持，而实际上毛当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同上书，四八三页）

三月三十一日，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讽的办法。"又说，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王实味是托派。（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南京，七三页）

平心而论，王实味对延安社会现象的批评是有些过火的。比起国统区来，延安是一倜相当平等的社会，共产党当时也是很廉洁刻苦的。不合理的现象是有的，但下是那度严重：跳跳舞有何不可？王实味的文章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编印了小册子，加以攻击在然而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中已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对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下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这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一七四页）

其实，这个问题在《解放日报》的社论《裤子与教条》（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也已经谈到了⋯⋯

"⋯⋯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如同盟社和各种汉奸报纸之流，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是黑，群众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

既然欢迎大家批评，就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评都那么正确或恰当，过份和不及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如国批评得过头了就要追究，那么又怎能要求"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呢？为什么只追究过火的批评，不追究不及的批评呢？对王实味批评中不恰当的地方，应当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那些批评得对的地方，则应该引起警觉。

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於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又说：

讨论语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徹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與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警语，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连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愿鼓励他，帮助他。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编，一九四九年）

此外，还谈到可以出墙报。

四日六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说，“文艺界有一个方向问题”（同上书七四页）

四月七日，中宣部批评了中央研究院整风的偏向。王实味死不认错。当时担任宣传干事事的温济泽苦口婆心地劝说：王实味哭了，答应认错，但他说他确实是出于好心。康生批评温济泽是温情主羲，说王王实味是思想问题，他是托派分子，还是蓝衣社特务。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过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否则就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了。又说：“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五页）

这个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

当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呢？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他们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九六页）

毛有什么理由认为知识分子的政倾向向是要投降日本，因而依了这些人，就要亡党亡国呢？毛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那些言论即使是错的，也提不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我想毛最忌讳的是当时丁玲、王实味等人的言论，尽管他没有明说。丁、王不过是对延安的不正之风提了一点意见，实行他们的民主权利，而且完全是善意的，这跟投降日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他们要改造党，在某种意羲上也不错，他们是希望党变得更民主一些，这不舍到致亡党。

毛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投降日本联系起来，这充分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

六月初，中央研究院开始批判王实味。会上同志纷纷对王实味提出质问。人们揭发他说过“苏联对于季诺威也夫叛国案的审批是可怀疑的”，“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等。王在会上仍然坚持说：“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八四页）

这活又激起全场义愤，认为是对斯大林的污蔑。

王实味说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个话理应得到毛的同情，但这个话是不能公开说的：至于说斯大林在清党中的错误，这正好是毛要继承的。王实味敢于发表那样的意见，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

六月，《解放日报》陆续发表文章批判王实味，其中以毛的秘书张如心的调子最为严厉。周扬发表了总结性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

六月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一条报道，说延安文艺界开会，作家们“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

到十月，搞出了一个“反党五人集团”，王实味变成了这个集团的头目；他还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中央研究院党委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

就在七大期间，毛谈到王实味还说：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於是好好整风。

这些话表明毛仍然把王实味看做是同共产党做到斗争的对手。

毛还说：“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汉荆州，那就是工农兵…………王实味挑勤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一四二--一四三页）

王实味并没有批评工农兵..他只是对延安的等级制度不满意,可是这就被毛说成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当时他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他言辞激烈，常舆人吵架，但他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只是好提意见，直来直去。他就是毛后来在“文革”中鼓励的那种“硬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只不通他不是按照毛的指挥去“刺”，触恼了毛罢了。

那么毛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到哪里去了呢？他不是说过吗：“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称为，以至於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原意医治，原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才用鲁莽的态度…………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二八页)这个处理原则，为什么不能执行昵？

问题就在于这个原则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不讳疾忌医，不固执称为”。这里事先肯了你是错的，如果你觉得目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是“下可救药”了。那么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就下适用了。而且，如果把你看成是敌人，那你就更不能为自己申辯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总之，这里是没有人权保障的。

如果一个同志有品质上的问题，严重的如贪污腐化，轻的如官僚主義，这主要是查清事实的问题。事实弄清了，就没有什么好辩护的了。在这里，批评者和被批秤者都有同样的价值标准。但政治观点上的问题，如王实味对斯大林的肃反有不同意见，就不同了。在这里，应该是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的。然而按照毛的处理方法，这是不允许的。这样就必然要发生称为处理的事。毛的原则有根本的缺陷，因为它是“有罪推定”，而凡是被认为有罪的人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几十年间，毛并没有总结经验，加以完善，而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发展下来，成为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因此也就注定了不会妨碍毛的迫害方针。

王实味的三条罪名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二月才全部平反，那已是他被定罪後近半个世纪

也是他牺牲后四十五年的事了。

“抢救运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用逼供的办法让一个年仅十九岁的投奔革命的青年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 还交代出十几个同伙。因为张克勤原是甘肃地下党员，于是康生就说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外红内白)。

同年十二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康生亲自固定名单，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二百六十多人两天后，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除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说，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思想的最好办法，也是发现内奸和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要用一年时间（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来完成这项工作。从此，整风运动进入了审干阶段。这一阶段延续到一九四二年底。

四月中旬，各部门的审干工作全面展开。

五月，张克勤到各处做典型报告，痛哭流涕地“坦白” 自己如何受国民党派遣。各单位都照此办理，千方百计找典型。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提出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但这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个能不执行，过了一个时期，华中局召开会议。黄克诚回忆说；会议期间，他同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住在一起。曾心情郁闷。黄克诚一再询问，曾才说他的爱人可能是个特务。黄问，你自己相信不相信？曾说，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据说是在第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的。她与曾的爱人是在上海的同学。黄觉得这件事不大靠得住，就通过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把那个女干部找来单独谈话。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绘声绘色。黄一听就觉得不可信，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虑，对她说，向组织讲真话，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以前讲的全是假话。黄克诚问她为什么要说假话。她说，开始时讲真话，人家不相信，大会小会斗争，逼供，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交代什么，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样一来，反而受到表扬和优待。

黄克诚告诉了谭震林，对他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谭说，他们第二师每个团都搞出了数以百计的特务。黄说:“咬呀！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又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都跑光了？”谭说，一个人也没有跑。黄克诚说:“老兄，你快回去給人家平反吧。”(《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一七八--一七九页）

七月十五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宣称经过三个月的抢救工作，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警告还没有坦白的人赶快下决心坦白悔过。于是气氛更形紧张，各部门

纷纷行动，掀起一倜高潮。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没有搞出什么“特务”受到康生严厉批评。后来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单位的一百几十人中，被逼承人是“特务”的估百分之七十左右。（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七七六页）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四百八十多人成了“特务”，只有二十个人是好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余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五一四页）假坦白的受到鼓励和优待，没有坦白的受到强大压力。那些挖出“特务”不多的机关领导受到批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一个十四岁女孩“坦白”了她参加了“复兴社”，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坦白”他受特务指使，担任了“石头队”的负责人，用石头作为去杀人。在延安，仅半个月九挖出特嫌分子一千四百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在审干中采用了恐吓和刑讯的办法。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十九岁女青年，被无端怀疑为“日本特务” 审讯时，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还威胁说要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关中分去一个县采用过，二十四种肉刑，包括压扛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有的地方还搞假枪毙。许多人承受不起那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而死的就达五六十人。

七月一日，毛提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预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一九四三年八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造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遣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一九八九年，九六页）

这一套做法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又搬了出来。这个策略是康生的发明而得到毛的批准呢，还是毛的创造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驻在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描写党时的气氛说：“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封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部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一六五页） “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同上书，六六页）在遘种气氛中，个人崇拜萌芽了。

中央派出负责干部到各根据地，推广延安审干经验。舒同奉命到山东，推广延安中央党校经验，遇到了罗荣桓的抵制。罗荣桓明确提出，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目的，是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挖出敌人。

按照延安的经验，要抓大的特务。而且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暴露敝人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暴露提意见的人，就是所谓放毒的人，要审查他；不仅如此，还要查那些被检查的人，看他是不是敌人。凡是坐过牢、办过出狱手绩的人，都在审查之列。（王力《现场历史》，二一四页）

据说罗荣桓向毛提了意见。

这种做法後来继续不下去了。八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批评了“逼、供、信”的做法，明确指出；审干不称为肃反，阐明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这个决定发得迟了一些，而且对纠正错误是不彻底的（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但多少是吸收了过去错杀人的教训。

抢救运动的刹车，应当归功于周恩来。据温济泽回忆，从七月康生做报告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所在的《解放日报》的副刊部内于主任艾思奇和他没有搞逼供信，受到了打击。他正以为要持续受到围攻时，没有再开会了。“过了几天，学委的一位同志找我谈话，对我说，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了，他认为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是抢救运动搞出的偏差。”（温济泽《征鸿片羽集》. 四二六-四二七页）据说，周恩来看到延安的审干情况大为震惊。“他非常了解大后方和大后方党组织的情况，认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可能派这么多特务到延安。他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同志写了证明，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了意见。中央决定立即停止‘抢救运动’，对搞错的同志立即进行甄别平反。（同上书，七七七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康生的报告。会议认为，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可从两方面看，好的方面是：

（一）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

（二）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

（三）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

（四）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

（五）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

阴暗方面是：

（一）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

（二）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衮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

（三）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

（四）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

（五）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概念下降。

会议决定，审干转入甄别阶段。这个阶段从一九四四年底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春结束。

这次会议虽然把成绩和缺黠各列了五条，但重点还是在成绩方面，而这些所谓的成绩是很难成立的。当时所谓真正清查出来的特务分子，後来经过甄别，绝大部分都被平反。肃反的方法本身是错误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那么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干部是什么样的干部呢？怎麼能真正克服官僚主义呢？又给群众什么样的教育呢？

在这次会上，任弼时为这事分了讲了一些话。他批评了一种“百分之百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说法。他说：延安的这是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其中初中以上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初中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十）。截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中的学生党员约三万人国民党绝不会把三万学生都送到延安来当特务。何况来延安的这是分子多数是在一儿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来的，那时是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来延安。

任弼时的这个论据很有说服力。他说关于国民党中学生党员的数字是周恩来告诉他的，看来他们雨人议论过这个问题。到延安的这是分子许多是经过长江局介绍的。长江局在一九三七年底成立后，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加抗日斗争，并向延安输送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这一批人的还疑无疑令周恩来不安。毛发动审干，重点是在国民党区域来的知识分子，这有没有暗中针封周恩来的意思呢？

从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的“特务”多达一万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榜-l 多连一半以上 t 如穗人教属三百九十人的西北公罼清出了二百零八人。

三十多年以后，一位军统人员回忆派遣特务打入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说：军统确实是想打入共产党内部来进行破坏，但“费尽心机，终不得逞。作者叙述了几次派遣特务的情况，都以失败告终。“我在西安三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辨法………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不可能上特务的圈套，累试都失败了。”（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四辑，一 O 四页）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二把手唐纵在《唐纵日记》中记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见《炎黄春秋》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整风运动：总结阶段（一九四五年春--一九四五年夏）

一九四四年四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报告，说“一年反奸斗争，我们收到了伟大的成绩”。但有的地方因“经验不足”，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在进步中产生的，是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

一九四四年五月，毛到中央党校做报告，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配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 一九四五年二月，毛又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

尽管毛明确地说，他应该负责，因为是他发号施令，可是一些党史书记仍然只说康生的责任，而强调毛提出的肃反中的正確路线和他如何反对“逼、供、信”：似乎毛是没有错误的，问题只在康生没有照毛的指示办。同是一些文章还强调毛如何赔礼道歉。

胡乔木说：“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封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简单。

甄别工作到“七大”前基本结束，不国还有不少尾巴。王实味就没有平反，并在后来行军途中被处决。毛泽东后来说，王实味的被杀中央不知道。但被杀的不止王实味一个，例如还有一个很好的革命青年蔺义。

当时有一个动脑筋独立思考的人，这就是在“民委”工作的蒋南翔。

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写了一篇万言书，表示不同意中央的结论。他在信中提出了不少一针见血的意见，他痛心地指出：“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於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他说：“当时提出的任务是要在十天半个月的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在这种短促突击之下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态度，客观上也就不可能不鲁莽、不草率。如不气势汹汹地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後，而且会被任务是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是大有问题……”

蒋南翔批评了这种说法：抢救运动是成功的，我们获得了很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有历史意义甚至是有世界意义的。蒋说，从一个运动获得经验是一件事，而这个运动是否成功，是另一件事。我们可以说从大革命和立三路线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但不能不说这两者是失败了（应当把“失败了”改为成功了，才合乎逻辑，这可能是作者的疏忽--李注）。他还批评了抢擒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说“这不是正确的启发了群众的觉性，而只是无限制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反奸斗争是复杂的，要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才能掌握。一般群众固然也能起作用，但若给予的任务超过了他们所能胜任的程度，那就反而会把事情弄坏：

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承认：那中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查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是成了依靠群中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中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采做打气加油的啦啦队！所有这些，和收集真实材料、判断客观情况，褪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这里蒋实际上此评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肃反方法信中还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

“一二·九”运动和抗战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涌进了党内；屈指计算，已将十载。在这将近十年的时期中，他们在党内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起了些什么作用，这笔历史的账，是容易考查清楚的。

蒋提到一九三九年《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其中批评了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说许多学校不敢大量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党部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说这个决定的精神至今未被全党接受；在这次抢救运动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抢救运动中大多数新知识分子被怀疑。“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作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以陇东为例，哪里因为国民党于一九三五年起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就把这一年以后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全部当做有问题的！

其实，难道信三民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吗？就要当敌人看待吗？中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宣言中，这声明“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四九页）

蒋继续说，负责审查知识分子的大多是工农干部，这些工农干部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道路和知识分子是很不相同的，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眼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有许多不能解释。加上有些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于是知识分子就更被认为有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审查者差不多没有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

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

蒋南翔说的这种情况，看来是毛泽东的故意安排。毛要发泄他对知识分子的怒气，就用工农来呀知识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整风初期，王震对中央研究院的墙报十分不满意，毛泽东就要他担任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震再三表示干不了。毛说：“就是要你担负这个工作，要你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同文化人打交道。”〔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七八页）这和“文革”期间毛派“工宣队”进驻和领导学校和机关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蒋南翔把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称之为教绦主义思想方法的反映，因为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动摇的阶层。蒋在这里又一次含蓄地批评了毛泽东，因为毛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是这样说的。

蒋南翔的信说，他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次运动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浓厚的阴影虽然经过甄别工作，但他们精神上的刨伤至今没有完生平复，有很多人流露出灰暗的心情，甚至消沉失望。

蒋南翔最后痛心地说，他认为抢救运动虽有成绩，但实际是“得不偿失”的，无论是国去的历次肃反运动还是这次的抢救运动，我们都应得到这样的教训:“在我们的统治下•我们真正受到特务攻击的损害恐怕倒是比较少，受到肃反运动的损害恐怕倒反要大得多。”蒋南翔建议今废止这种“普遍肃反”的方式。他希望中央能够根据各方面的特别是下层的实际情况，正式对抢救运动做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接受此次从痛苦中得来的经验教训。（蒋南翔的信，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五章，朝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我所以用这样多的篇幅引用这封信，是因我我绝得它说得十分中肯，十分透彻。对于一些共产党常用的辩护，也作了有力的批驳。这封信表明，当时并不是不能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并不是不可能彻底纠正的。然而这封信指出的问题，并没有受到重视。为什么蒋南翔能看到的问题，毛泽东就看不到呢？为什么他对这封信不予重视呢？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对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没有蒋南翔那样痛心疾首，因而也没有想得那样多：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作为抢救运动的领导人，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负有青任，因而在承认错误方面不愿意做得那么彻底。开“七大”的日子临近了，毛需要的是宣扬自己的正确：他如何克服了党内的教条主羲，如何纠正了左倾路线，如何否定了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如何由于有了他的领导而从此走向光明。至于他自己的失败纪录就回避了。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他还在一次讲话中以肯定的口气说:“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四三-九四四页）

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毛泽东内心中觉得这种错误的做法可以为他利用。他虽然必须公开地谴责这种方法，以表示这种方法和他没有关系，但他并不愿意断然地永远地加以抛案。因此，信中批评过的许多做法，后来甚至变本加厉，一直发展到“文革”。

我们拿延安整风和审干的一些做法和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做比较，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这里有一个行为模式：

（一）开始阶段，是中央表示要整风，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号召大家大胆提批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

（二）大家纷纷展开批评，其中有些不中听的意见触怒了领导人，但不急於反驳，一面观察形势，让对个充分暴露，一面寻找机会，准备反击。

（三）突然来一个急转弯，声称整风受到了干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进攻，或者是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是非问题变成了敌我问题，反教条主义变成了反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纠左变为反右，要抓右派或潜伏的敌人。

就这样，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转人了审干，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转为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批右倾。一九六二年初有“七千人大会”. 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但我们把这次大会和四年以後的“文革”联系起来看，许多事情就明白了。在“文革”期间的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转为批孔；一九七六年对“四人帮”的批评转为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在邓小平时代，还有从一九七六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变为一九七九年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八三年十月的整党变为“清污”. 以及一九八九年的改革开放变我“六四”的镇压。

此外，要王震这样的老粗来领导知识分子，这和一九五七年毛说的“外行领导内行”，“文革”中的让工宣队领导学校，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做法是：一定要受批评者认错。本来，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有些事需要做出决定，我们也只能要求少数服从多敷，或下级服从上级，这个服从是行动上的服从，并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个少数或下极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的。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裏，也不一定在上级手里，有时少数或下级可能是对的。因此，少数人或下级保留自己的意见就很重要，他们还可以在将有发言的机会，重申自己的意见。也许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样少数人的意见就可以变为多数人的意见，下级的意见就可以变为上级的意见。一定要受批评者认错，就是不许被批评者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是取消了他们将来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且，思想是不能用强迫的办法改变的。部种施加压力迫使人们做检讨的办法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

中共“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的经验，着重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虽然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但《决议》不但没有批评斯大林，还引证了他的正确的话，表示了对他的权威的尊重。《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北京，九七一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同上书，九五八页）其次，也高度评价了刘少奇，说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一同上书，九八 O 页）

《决议》在批判教条主义之后也批判了经验主义，说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经验主义是“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同上书，九八九页）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王明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的，这个会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其两项纲领就是反对所谓党内的主要“右”倾危险和向全国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同上书，九六五-九六七页)有一些人满足於局部经验，轻视理论，“并醉心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同

上书，九八九页）

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这样发展的主要障碍。（同上书，九九０页）

《决议》最後说到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探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但是它又不充说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其中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所以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同上书，九九七-九九八页）

七大通过了新党章，这个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一整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完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到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最后这个命题后来被无数次重复，似乎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定理。

七大是对毛泽东的给人崇拜的开始。

但是在七大上，毛反复告诫要谨慎谦虚，他自己也确实是比较谨慎谦虚的。他两次讲到了一九四一年边区的一件事：那年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县长。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听见后就做了调查，发现原因在与老百姓负担太重。那一年边区要征收二十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六万驮，群众怨声载道。毛说：“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二一一页）毛说他在弄清原因之後·就研究了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的负担。毛说：“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探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收了二十万担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 （同上书，二一三也）

然而毛泽东对王实味却没有这种宽容的态度，尽管他也承人王实味的批评是由於物资贫乏。他说，为什么出了《野百合花》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 （同上书，二一三页）“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

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资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同上书，二一三页）王实味当然被认为是托派，不国在决定整他的时候，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写了《野百合花》。王实味得到的答覆并不是物资上的，而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高级领导人也比知识分子的王实味幸运。毛动员大家选举犯国错误的同志进中央委员会。他说：“对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同上书，一六四页）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原因是错误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他毛泽东也有错误。毛说：“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同上书，一六四页）“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有写上，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同上书，一四页）对于“万岁”的口号，毛没有断然禁止，只是诙谐的说，“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同上书，一四页）他还露了一句：“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同上书，一五页）

毛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恐怕想的是斯大林。后来，在他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这个主题下断重复出现在他的讲话中。

在给七大作结论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中讲了几个问题。他讲到“干部关系问题”时列举了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但是他没有单独谈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还专门谈了.“整风、审干、锄奸问题”，现在把这一部分原文照录如下：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後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来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刖阶段以或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提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 A B 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義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 0 年十二月就打 AB 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 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这个好的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了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纠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人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義，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内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几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徹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的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同上书-二一五-二一七页）

不管工作搞得怎样糟，首先总讲成绩，唯恐人家忽视，这在毛是一贯的。不但有成绩，而且“有很大的成绩”。最后落脚点是两条，既要反对过火，又要反对自由主义：这样一来，要充分地彻底地批评错误的人就不能没有顾虑了：错误讲多了，会不会否定了成绩绩？会不会陷入自由主义的错误？

毛说到了“宗派主义”，好像是就在这个运动中有歧视知裁分子的现象，可是他说得很含糊，正像他在谈过吧关系时避免谈到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样。

毛用“有没有缺黠错误？有。”这一的口气来提缺黠错误，似乎这还是一个需要他来回答的问题。那么这是谁的错误呢？毛只说他是党校校长，没又说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这一他就好像只对党校的整风运动负责，而党校有两个部：一个部“成绩相当大”，虽然“也有缺点错误”：另一倜部“比较好，进步了”，那就是比，“成绩相当大”的前一个部的成绩还要大，至于这个第二部是不是“也有缺点错误”，没有说，但总之是“进步了”. 而且作为以後整风的榜样。这样一来，毛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了。

所谓湖西肃反的错误，指的是一九三九年八至十一月间，在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苏鲁豫边区）开展肃清“托派”的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而受逮捕审查，有的被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与瘫痪，损失极大。这

个错案从一九四O年到一九四五年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山东分局多次处理，但直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才彻底平反。（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二六七页注【 一三六】）可见，虽然毛都承人搞错了，但毛在世时这个冤案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为什么？原因不难知道，彻底纠正不就意味着否定成绩了吗？

毛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一九五七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到肃反问题时说："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七七页）

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承认中共过去也混淆国两类矛盾，但是他强调说："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七二页）照这个说法，只要规定了"分清敌我".就不会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了，可见分清两类矛盾的方法是有效的。毛没有提到他在一九五五年做出决定，把胡风一伙作家打成"反革命集团"的事。胡风是先由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然後由法院判刑的。这不是什么扩大化，它完全是一椿冤案。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是凌架在法律之上的。当然，毛泽东更不会提到三十年代中共在苏区肃反时骇人听闻的屠杀，包括他自己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运动中冤杀一大批军队和地方的革命干部的严重事件，还有四十年代延安审干期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两个错误，毛泽东是承认过的，现在他却赖账了。

现在毛是踌躇满志，等待着战争的胜利，进而统治全中国了。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女作家丁玲在晚年有一偶回忆，虽然是小事，却说明了大问题：

在延安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欷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椎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 反正是开玩笑嘛， 毛主席一连写名字，一连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弃完了造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造首词，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还记得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十六期，四三页)(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本章，参见作者的《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总第七十五期，二00一年冬季号，普林斯顿，一一九-一四九页）

第三章　毛泽东在江西的肃反

——文革做法的历史渊源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的革命急性病加强了，加上共产国际的影响，产生了第一次“左”倾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提出了“左”的“不断革命论”，方针是全国总暴动。罗明纳兹还制定了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 其中批评南昌起义的错误包括：军队所到之处，对於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裝的策略，及沿用了“不援民”的观念，抢毙了趁机抢劫的贫民。因此·南昌起义前敌委委会及其负责人周恩来受到警告处分。同样，秋收起义受到指责的原因也有一项是：在工农军所经区域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加上其他“错误”，毛泽东受到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其他秋收起义领导人也受到严重处分。

六大虽有一些严重错误，末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六大以後的两年，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虽有某些失误，但整个说来，是很有成绩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二四七页）

但这时，一九二九年四月，共产国际的宠儿，年方二十五威的王明回国了；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也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 O 年间陆续从苏联回来。

这是一个充满危机和矛盾的紧张时期。苏联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粉碎了布哈林“右派投降主义反党集团”，并从限制富农进而消减富农。资本主以国家爆发了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在国内，蒋介石和军阀卷入了大混战。这好像是革命的大好时机来到了，于是，“左”的思潮迅速泛滥。

从一九二九年六月起，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一连串加紧阶级斗争的指示。[1]

六月七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示中共要把富农作为反革命对待。七月，《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强调右倾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并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这种对暗藏反革命的夸大渲染的估计，同苏联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把富农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也明显地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二十年代末，联共在农村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富农，到一九二九年底又转入消灭富农。虽然中共六大有中立富农的政策，但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干扰。当年，中共中央作出《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过去在富农问题上犯了“错误”，要求全党坚决地“反对富农”。

十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封信，提出国民党“改组派” (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和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必须立即展开一个最坚决的、尽可能有更多群众参加的运动，以消除‘改组派’的一切影响，揭露它们

[1] 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先後四次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和决议案，“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第三种方量。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北京，三O八页）这些信中提出的有些“左”的主张，甚至改变了中共六大的正确论断。

的反革命本质。”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合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北京，八六页) “党应当把自己的队伍中的那些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义分子清洗掉。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和倾向，这种心理和倾向会削弱对‘改组派’的斗争…………”（同上书，八八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省委对 AB 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的落後”，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对 A B 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

从一九三 O 年五月开始，赣西南苏区开展了一場整肃 A B 团的运动。

A B 团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右派的地区性反共组织，AB 团即 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这个组织於一九二六年底在南昌成立，一九二七年在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四二暴动”中被摧毁，骨干分子三十余人被捕，其他人作鸟兽散，从此解体，寿命仅三个月。因此，这个祖师影响并不大。如果说它的名气变得那么大，那是共产党做反宣傅的结果，在整肃 A B 团的运动开始时，大家都弄不清 A B 团为何物，但中央既如此重视，当然是势力很大的。 A 团囤被说成是一个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估计，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当畴江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与改组派相互斗争，後者攻击前者为“A B 团”，于是共产党也误把公开的党务指导委员会混为秘密的反共组织 A B 团。另一方面，又把 A B 团的残醣分子和 A B 囤组织不加区别。（参看武国有《论肃“A B 团”误区的形成》. 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新华文摘》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最初那些所谓的 AB 团分子，是在反地主富农斗争中查出的，于是反地主富农斗争就发展为反 A B 团的斗争。首先倒霉的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的干部。进一步就把那些作风不好的、工作消极的、有牢骚怪话的、有不同意见的，全都当做 A B 团来对待，而且采用严刑拷打的方法去逼供。这并不是下级干部的胡作非为，而是有上层领导的指示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A B 团也可以打出 A B 团，而且要多少有多少。不久，中共赣西南特委就发出一份紧急通告，披露了最近破获 A B 团的经过，说：有一个叫朱家浩的发行科干部，“因工作消极，言论行为行表现不好，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有被捕的所谓 A B 团分子供告，于是把朱家浩抓起来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根据朱家浩提供的线索，抓了一批，又审讯出一个所谓 AB 团的庞大网络。“赣西南的 A B 团已成立了临时总部，各路设有办事处，兴国、泰和、永丰、吉安、吉水…………各县都有县团部的组织，尤其打入了各革命团体里去，党团两特委及西南政府，各赤色邮局，各群众团体，都发展了他们的组织。” 这真是惊心动魄！

赣西南特委在这个通告介经验说：“A 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硬，非用最残醋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五七页）通告不仅把那“犹疑不决'思想右倾的落後分子”，而且把“在工作上表现很积极，说话表示极‘左’倾，态度表示很忠实，诚恳的人，都当做 AB 团的‘可疑分子’. 这简直荒唐到不能置信！

于是，赣西南苏区各地就紧急行动起来，不到一个月，就杀了六人，捉了六十七人。（刘思齐主编，余伯流、陈刚著《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北京，一九九三年一七 O 页）

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毫无掩饰地说："所有 A 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还育"所谓软硬兼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骗)处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中国"左"祸》，五七页）当然，单是承认自己是 A B 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供出组织关系。审问对象被逼得燕可奈何，只好乱咬一气。于是又根据这个口供去捕捉新的无辜者。庄严，弄得到处都是 A B 团，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对A B回的整肃

一九三 O 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围攻克吉安。在清查敌人档案文件是，发现了几年前 A B 团的团旗和印章。有人还误传发现一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写给地主豪绅的收条。此事报告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引起当时是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的警惕：加上赣西南特委有关 A B 团的所谓组织网络的报告，毛泽东感到震动。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对赣西南党的情况做出了令人吃京的判断："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路段'，'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 B 团分子，各级指挥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 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柬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三一九页）

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背景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三 O 年初，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前者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毛则主张以人口为标准；二是前者主张不忙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毛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草率一点也不要紧。毛把这些正常的分歧看得很严重，认为："赣西有些地方割据了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土地亦刚刚分配，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武国有《论肃"AB 团"误区的形成》，载《中共党史研究》.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一九三 O 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罗坊，主持召朗杠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二十六日，会议通通决议，强调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 B 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缘故。""严厉地镇压 AB 团，处决 A B 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文聿《中国"左"祸》，五六页）于是，一场清查和镇压 A B 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十一月'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在宁都黄陂被捕（后被杀害）。他曾经带头抓过 A B 团，现在论到他自己了。谁做出的决定呢？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面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像李文林这样的中要人物，没有毛泽东的命令是不会抓起来的。可是一般有关党史书籍都避讳这一点，只有《苏区》一书做了两点暗示，说：在听到红一军团的报告後."总前委即怀疑李文林舆 A B 团有瓜葛，可能是 A B 团首领"；又说，在罗坊会议上，李文林极力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主张"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倾方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苏区》，一七 O-一七一页）

与此同时，整肃 A 团的运动也在红一方面军展开。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十万重兵向苏区发动第一次"圄剿". 情况火急。毛泽东、朱德全力准备迎战，就将肃反大权下放，抓人

由团决定，杀人由师党委定。越是强敌压境，越要肃清内奸，这似乎不错。

肃反的战果是“辉煌”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毅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画分子。在战埸上，如果国民党消减了这么多红军，那就是打了一个大胜仗了。特别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牺牲几十个团长的事，还不曾发生过。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共产党帮助它做到了。

有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情况说，黄陂河滩上，尸横遍地，河水都染杠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七三页）这就是“黄陂肃反”。

一九三0年十二月初，毛泽东根据被捕的所所谓 B团分子的虚假口供，确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内存在一个 A B团总部，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特委书记），李白芳（行委秘书长）为首要分子，即派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前往富田（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领导肃反。《赣西南的（综合）报告》作了这样骇人听闻的判断：“过去江西省行委及以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如段良弼是AB团团部部长，丛允中、李白芳、彭坤元、贺可展是AB团委具，东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在立三路线时代的）大部分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 B团，县区委支部都充塞着许多A B团（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这些分子有十分之九是地主富农出身。”在总前委给省行委的信上说：“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去。”“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还布置：“二十军需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红二十军的一些领导人是不满意毛泽东的。

信的结尾还指示：“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舆政府必是 A 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起来讯办”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七四页）

这真是最简便的识别敌人的办法：凡是不抓不杀反革命的，自己必定是反革命：不然，为什么不抓不杀？此令一出，谁敢不执行？你不杀人，就要杀你。至于那些所谓的“反革命”是不是真反革命，不抓不杀的人是有意包庇还是有不同看法，这些都是根本不考虑的。毛泽东在对真正的敌人进行阶段估量时是能够事实求是的，在整肃自己队伍内部的问题时却常常是左倾的。实际上，上述办法在以後的政治运动中一直沿用下去，只是不一定“杀”罢了。例如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个单位内部如果打不出“右派”，或者打出的右派不够数，那里的领导人自己就可能变成“右派”。

那个被派下去的钦差大臣李韶九刚二十六岁，湖南人，行伍出身。他提升得很快，一九二八年时还不过是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一个总队长，到一九三O年十月就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十一月又成为肃反委具会主任。他是刚刚提拔'身兼三职，正想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个人过去曾和李文林明傈不好。但他善与讨好上峰，经常以“湖南老乡”的身份出没於毛泽东等总前委领导人帐下，很受青睐。萧克和黄克诚都认为这个人品质不好。(《苏区》，一七七-一七八页：《黄克诚自述》，八五页）

李韶九带了红十二军一个连，日夜兼程，与七日下午赶到富田。下车伊始，就驱兵包围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等八人。当晚李韶九亲自刑讯逼供。

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到了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布置用十万军队消灭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方案。……

从七日晚到十一日晚，李韶九等苏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不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五花八门的残酷刑法（一九三 O 年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五天之内，在省委省苏两机关内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 A B 圑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十二月十日．“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十七人”。十一日又“枪决二十四人”．“其中省行委七人”。（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

富田事变

十二月九日，李韶九率领红十三军（属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一个排，从富田来到红二十军军部的驻地东固。此行的目的是实行总前委的密令“红二十军需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越想越觉得不封头。他和几个部下议论，都觉得李韶九这个人卑鄙，为了救党、救同志，决定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和后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的日子巧合，下国后果却很不相同），刘敌发动所属部队把李韶九带来的一排人缴了械，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当天下午，刘敌和谢汉昌又带兵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释放了所育被捕的人员近百名。刘敌等还通缉了逃走的李韶九等人。晚上，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在富田召开紧急会议，主张公开提出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决定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做解释，还决定由二十军一七二团的团长萧大鹏出任军长，代替腐化且积极帮助李韶九整肃 A B 团的原军长刘铁超。

次日，刘敌主持士兵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的罪行。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

接着，红二十军开到永阳，宣布成立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

从允中在会上报告李韶九在富田抓人杀人的经过，并分析说，这件事的近因，是毛泽东企图把江西的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以稳稳地做党皇帝。远因则是赣西南二中全会开除了到士奇的党籍，刘是毛的走狗，毛对此事怀恨在心。

会议的决议说：“建议总前委集中兵力马上出击敌人，消灭敌人：二十军猛攻吉安；建议中央开除毛的党籍，撤职查办；曾三、陈正人、刘铁超应有处置；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

十二月十七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布宣言，严厉谴责段良弼、刘敌、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称富田事变为“A B 团取消派公开反革命的总爆发”，“他们企图以‘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来分裂革命势力。”

十二月二十日，富田事变来的人以省行委名义发出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信》。其中说：“这一次肃清 A B 团的内幕，说来是痛心极了，你们要注意，总前委派来李韶九，唯一的目的是用极刑逼供。”“李韶九并且说，这次主张与敌人速打的是 A B 团，报告了敌情的是 A B 囤，他们并且造出一个理论：‘中农反水’．所以结论是中农是 A B 团，并且肯定赣西南的干部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农，所以大家都是 A B 团。同志们，你们相信吗？”“据刘敌同志讲，李韶九对他讲了‘这不是 A B 团问题，是政治问题。”刘敌同志敢于把我们几十个忠实的同志放出来，我们就是从这里认识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精神，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们真相信刘敌同志的行动是 A B 团阴谋吗？那么党内的

沉冤是无有表白之日了！”“省行委是根据中央正确指示去做的，尤其李文林、段良弼二同志是到过中央的，并且这次是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的，因此就首先诬他们是 A B 团。丛允中、王怀、李天柱三同志给了前委一个意见，他们也被诬为 A B 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点都不明白呢？痛心啊，我们真痛心！……”（《苏区》，一八六，一八七页）

富田事变来的人封李韶九说的“政治问题”的理解，就是毛泽东要打击异己势力，抓 AB 团不过是借口而已。这是蒙冤者的呼喊，是令人同情的。

然而这帮人为了反对毛泽东，却不择手段地搞了一个“假信事件”。

富田事变领导人称发现了毛泽东给古柏（毛泽东秘书）的密信，说，要在审讯 AB 团中，勒令招出朱、彭、黄等系的红军中的 A B 团主犯，以便捕杀。

据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回忆，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 O 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夜半。彭德怀收到这封信，很快就断定是伪造。“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此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北京，一六六页）

彭德怀马上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的宣言，并把这个宣言连同假信送給了总前委。彭德怀还号召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

会上，彭首先讲话，说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 、三军团。他努力为毛泽东辩护，解释毛的主张的正确性。讲了这些话以後，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 A B 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彭德怀自述》，一六六-一六七页）讲假信问题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慨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占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彭德怀自述》，一六六页）

这个话可以解释为黄公略对彭德怀的赞许，但至少显得不很热烈，和朱彭黄的公开信中的强烈态度并不一致。黄公略应该收到同样的信，因为这封信也是写给他的。他赶了六十里路到红二军团部，显然和假信事件有关。但有关史料都没有提到黄公略收到此信的事，是他没有讲出来吗？在赶到目的地以后，红三军团团部正在开会讲假信的事。黄公略只是听了十分分钟彭的讲话，不等彭讲完，他就不辞而别了，这似乎有点不正常。这么一件大事，黄公略不觉得需要同彭德怀商量一下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吗？看来，当黄公略了解到彭德怀的态度以後，他就失去了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的兴趣了。

这一点彭德怀可能有所感觉，只是他在《自述》中说得比较含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在写自述，主要是为自己辩护，不宜多涉及别人的错误。　关于这件事，彭德怀的叙述仍然留下一些疑点。《苏区》一书转载了这封信，落款是“毛泽东 12 支部抄”。这很清楚地说明是抄件。此书说，这封假信是夹在永阳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信》中间的。後面还有这样的说明：“我们费了一夜推敲，虽然原稿尚未找到，我们可以头颅来保障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可见，发信人已经清楚说明了这不是原信。这封信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丛允中秘密交给交通员的（《苏区》，一八八页）很可能是丛允中用他的毛体字抄的，因此给人一个这就是冒充原信的错觉。但如果是冒充原信，那么就只有一封，不可能既交给彭德怀又送给别人。另外，信中落款的阿拉伯数字，不像是年月日，而像是支部代号。当然，这并不否定富田事变领导人制造了假信事件。

在朱彭黄三人中，最坚定地拥护毛的是彭德怀。在一、三军团於一九三O年八月会合时，他不但同意成立第一方面军，而且提议把自己领导的三军团的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朱毛统一指挥，而他则在毛泽东为首的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下工作（《彭德怀自述》，一五七页）。虽然合为一方面军了，但一、三军团之间仍有隔阂。红三军团的一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吵得很厉害。彭德怀努力说服自己的部队，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这一次，又是彭德怀请毛泽东到三军团干部会议上来讲话，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富田事变领导人争取朱彭黄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他们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雕总前委的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和敌人做斗争。他们沿途还刷写“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标语。但是，他们坚持同敌人作战，没有一个人投降。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刘敌写信给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经过，分析事变原因，承认“这一行的在组织上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在阶级大战的关头，发生这一不幸更是痛心”。只是为了挽救被陷害的同志，毅然决然来了这一着.“这一行动之错误，诚恳请中央给以严重处罚。”

在这同时，段良弼为代理书记的省行委也到上海向中央面陈意见，包括军事问题和与毛泽东的分歧。

这个棘手的问题到了中央新派来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顷英那里。项英是在一九三O年年底到达的。苏区中央局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在周到达之前，由项英代理。

项英封富田事变的看法和处理方针有点和毛泽东不相同。

毛泽东力主镇压，认为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在红军中设置了大量A 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暴动旗，若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富田事变就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必须坚定地与这种叛逆行为斗争。

项英没有完全同意毛的意见，而是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在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发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表示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的斗争路线，但只是说这“在客观上”是与A B团取消派等联合一致的行勤。因此，决定开除刘敌、李白芳、谢汉昌、段良弼等人的党籍，但没有更严厉的措施，留下了廻旋馀地。此外，决议还批评了同A B团斗争中的脱离群众和盲动行为，制正“乱打乱杀”和“随便听人乱供乱咬”的现象。

这个决议是匆忙做出的。三天以后，项英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又发出了《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的指示，除维持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是一中反革命行动的判断外，强调说：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的事寅，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 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乱打富田事变的全部乱打人纯粹是A 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 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其实，说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是一中反革命行动的判断也是不很公道的。富田事变了导人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干部和红军，他们发动事变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也是保护革命力量。杀了大批革命者的是李韶九和他的指使者，为什么不说这些人在客观上是反革命呢？富田事变来的人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常然是错误的，但毛泽东的“认我为敌”的肃反方针不也是错误的吗？只有制造假信这一件事才可以说和反革命的伎俩如出一辙：

硬英注意到这场肃反背后的宗派斗争。他发出的这个指示说，富田事变是“因为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股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的斗争”演进而成的，“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业已开除党籍外，其余附和的人在证明未加入一反动组织（A B 团等)、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静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接着-项英指示做工作，把二十军带回河动，打算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当时还准备开除李韶九的党籍。　这是比较冷静的态度。对这种观点，总前委和毛泽东认为“完全是调和路线”。(《苏区》，一九四-一九五页）

三月，项英把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来开会。虽然刘敌、李白芳、谢汉昌已经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们还是抱着向动承认成错误，请当教育的态度，来到了黄陂。

这是一个转机。如果事件的有关方面都坐下来，彻底把问题谈清楚，在项英的主持下，事情可望妥善解决。

王明搬来苏共做法 毛泽东执行左倾路线

这个时期，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九三 O 年九月，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八月间的一系列决议，并且改选了政治局。全会的决议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并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毛泽东被重新选我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件事说明中央对红军邮寄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封李立三的错误的纠正还不彻底(这也是由于受共产国际的观点的束缚)，但这是一个转机。但是，会议刚刚结束，共产国际的态度就发生变化。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上封瞿秋白、周恩来进行了没有道理的批评，把王明塞进了政治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在李立三路线时期是李立三的傀儡，此後他就成了王明的傀儡。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实际上落在一个二十六岁初出茅膳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手里。一条更“左”的王明路线代替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

王明知道，党内许多人对他不服。他采取上靠下压的办法，一方面打着“国际”的旗旗帜吓唬人，一方面对不满意他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他兼任中共苏区省委书记，首先就对上海开刀。上海各去的去委书记中，凡是不臣服他的，王明就分别予以批评、调动、撤职，甚至停发生活费，同时安插自己的人，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王明所用的办法，就是苏联清党的办法，王明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是何孟雄。何孟雄是第一个起来坚决反判李立三路线的…………王明召开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布置对何孟雄的斗争，把何孟雄反对王明小宗派的活动说成是当前的上要危险，说何孟雄是“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他禁止江苏省委的干部与何孟雄有任何来往，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何孟雄等三十六人被捕後，王明还把何孟雄开除了党籍。何孟雄等英勇就义後，王明还不放遇，说他们的死是“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要用这个血的教训来警告那些支持何孟雄的人。王明还布置写文章在党刊发表，说何孟雄等虽然牺牲了，但对他们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微底清算。瞿秋白虽然被撤职并被迫按照王明的口经做了检讨，王明却还要算旧

账，说瞿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压迫”了王明等人。此外还减发了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十六七元（党时上海工人中等工资为每月二三十元）。另一个和瞿秋白同时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邓中夏，也受到王明的无情打击。

王明根据苏联肃反的经验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要求在苏区内反对“A B 团、取消派、改组派”等。在这时中央发下的文件中，有的把改组派、第三党、“黄色领袖”的都说成是“直接帮助资本进攻与‘围剿’红军”的，“是对于革命的最大危险”；有的把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不加去别的说成是“反动派别”，并批评“对于一切反动派的同争还不够”。其实，改组派和第三党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蒋介石的，他们属于中间力量，不应通通说成是“革命最大的危险”，把它们赶到敌人营垒。王明控制的中央还把他们的路线提到哲学的高度，提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超过于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的增长“不但不能减弱而且只能增加他们与苏维埃运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王明评传》，一七五-一七六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 O 午，北京，三三一、四一七页）又说：“右倾在中国革命这个阶段上，是最危险的倾向” ，对右倾“必须做最残酷的斗争啊”，“哪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都争”。（《王明评传》. 一七八页）

新的中央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报告，做出了决议，支持毛泽东，否定了项英的做法。决议说：富田事变“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 A 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项英为代表的苏区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六节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成立的。现在四中全会否定了三中全会，王明上台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不能算数了。项英受到了批评，他的错误根源被说成是执行“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彻底调和路线”。他被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替。

紧接着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开会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等全部被捕。刘敌首先被枪决。接着公审澍漠昌、李白芳等人并判处死刑。他们至死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只承认是反毛组织：然而这就够了。单凭“打倒毛泽东”这个口口号，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红二十军奉命到到中央苏区。他们还以为是参加“反围剿作战”，哪里想到毛泽东和中央局已把他们看做是敌人而要加以歼灭。一大批红二十军干部，从军长萧大鹏，政治委具曾炳春到副排长以上干部，共七百多人，都被当作 A B 团关押，先後处死。红二十军番号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是发生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真是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萧大鹏和曾炳春并未卷入富田事变。萧大鹏原是二十军一七二团团长，由于原军长被扣（后释放），他继任了军长。曾炳春当时则在家中养伤。事变法生以後，曾奉中央之命找二十军做工作。他在二十军中颇有威信，指战员纷纷向这位政委倾诉苦衷。曾劝大家以大局为重，垦持对敌作战，相信党会正确处理。曾在被关押了十个多月以後，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被杀，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很好地完成了中央指派的任务，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不料也逃不脱厄运。然而如果他活下来，也许辉比死还痛苦，因为这种结局等於是他出卖了自己的部队。

红二十军是一支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的部队。雕然建立时间不长（一九三 O 年七月

建立），但打仗很英勇顽强，迭立功勳。他们曾经协同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进行过攻克吉安的战斗，又曾先後打下安福、吉水、永丰县城。“红二十军在七月组建到十一月底的半年里，英勇奋战，驰骋纵横，使赣西南的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并协助地方党建立了江西苏维埃政府以及三十四个县的红色政权，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河山的呈梅花形的、纵横七百多公里、人口四百余万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苏区》，二 O 三-二 O 四页）富田事变的领导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后来是赣西南暴动的组织者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他们曾给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一方面军以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功不可没。（文聿《中团“左”祸》，六四页）富田事变后，红二十军的对伍到了永新。他们听说共产国际已经停止给中共以经济接济，决定筹集二百两金子送中央。他们虽然反对毛泽东，但这时仍然接受朱德毛泽东的指示，和红七军等部队联合行动，打了一系列胜仗，配合中央的反围剿，扩大了湘赣苏区。这期间，虽然指挥员是戴罪之身，全军也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但没有一个人投降敌人。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反革命”吗？

也许红二十军想以这种实际行动，来证明明他们对革命的忠诚。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

地方的情况也许更糟，赣西南地去的干部百分之几十被打成 A B 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一千八一百九十人。（《苏区》，二一四页）

李文林被捕後，一度被项英释放大概项英相信他不会乱打乱杀，就派他去做肃反工作。中央三人代表团到达後，他再度被捕，被当着“混入肃反机关陷害共产党员”的 A B 团要犯。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被杀。临刑前也高呼“共产党万岁”。

李文林是江西红二团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一九三 O 年一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把赤色根据地分“朱德毛泽东式”和“贺龙”“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 不过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中，“贺龙式”和“李文林式”被删去了。

黄克诚当时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他那个师的宣传科长何笃才被打成 A B 团而牺牲。黄克诚封个倜人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秀的干部，政治水平相当高。他们俩人接触很多，彼此无话不谈。黄克诚承认他从这个小小的宣传科长“获益匪浅”。按照何笃才的资历和水平，本不应该是这个职位，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就不受重用。然而他仍然工作认真，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他曾对我说，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麽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辣…………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于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自述》. 一 00-一 0 一页）

黄克诚后来才觉得这番话有道理。他评论说；本来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承认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但何以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呢？“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党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上书，一 O 一页）

可以补充说，毛泽东在军事路线上是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立的，但在肃反同题上是执行了左倾路线的，而且得到过王明的支持。

毛泽东的这个错误，不能用“缺乏经验”来原谅，也不能用“主观轻信”来解释。如果是缺乏经验，吗么为什么如此自信呢？如果是主观轻信，那么为什么在别的问题上毛泽东又那么客观谨慎呢？就在一九三O年十月下旬，在做出肃清AB团决议的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了解农民的家庭情况：一九三一年一月，毛泽东把调查到的材料整理成《兴国调查》：他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技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昔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特引自《毛泽东年谱》上卷，三二三页）在此之前的三月，毛泽东还在寻乌做社会调查，写了八万多字的报告。接着，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即后来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其中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瞎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O九页）这篇文章是反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的。谁也不能说毛泽东不懂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可是毛泽东自己为什么根据下面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来决定肃反政策呢？为什么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十分虚心体察情况的毛泽东，单单在肃反问题上探取了“想当然”的态度呢？封AB团的打击面如此之广，涉及的干部如此之多，乱供乱咬的情况是如此之严重，只要稍做调查，其中的瞎说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我什么毛泽东不察呢？毛泽东在农村经济问题上如此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为什么在肃反问题上就不肯花一点时间去获得一些第一手材料呢？牵涉到几千革命

同志生命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掉以轻心呢？

此外，毛泽东为什么指示“二十军需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就需要“找到”线索，就是还没有线索；既然还没有线索，怎么能事先要求“来一个大的破获”？毛泽东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一O页）可是在这里，毛泽东的结论产生於调查之前。

还有那个李韶九。他说的那句“这绝不是简单的A团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 很值得推敲。刘敌产生怀疑是有道理的。从李韶九本人的行动看，他的确是把整肃AB团当做政治问题来对待的：不满毛泽东就是AB团。可是李韶九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如此信任他，委以重任，难道不能说他体会了毛的意图？

总之，在对待富田事变和红二十军的问题上，毛泽东不能逃脱利用肃反来消灭异己的嫌疑。

我们在这里可以以两个人的例子看对待整肃A团囤的不同於毛泽东的态度：一个是黄克诚，一个是陈毅。

黄克诚对中央去取肃反感到忏悔。他在自述中说：

在这次肃反打A 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身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尤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於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往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列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黄克诚自述》，八六页）

黄克诚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就采取“顶”的办法，不肯按肃反委员会提供的各单抓

人. . 顶不住就叫人躲藏。他因此被怀疑为 A B 团分子而抓起来审查，幸亏彭德怀保了他. 但他还是被撤去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另一个企图抵制肃反的是陈毅。一九三一年二月，陈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他到雩都调查时，听说这里以前把“字写得好的人就做 A B 团杀了”,“说话有条理的人也做 A B 团消灭了”. 大为震惊，下令把被关押的所谓 A B 团分子释放。这就得罪了李韶九，受到李韶九的威胁。一次，陈毅被召去开会，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就嘱咐妻子说，如果自己下午六点还没有回来，她就马上逃，到老家躲起来。幸好那次没事，让陈毅回家了。但陈毅在路上遇到麻烦，晚了两个小时才到家。一看，他的妻子误以为他被当做 A B 团抓走，竟跳井自杀了！

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这段历史说：“在中央苏区，整我是 A B 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封我说：你是 A B 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后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 A B 虱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苏区》. 二一三页）

陈毅回避了毛的严重责任，只说毛好的方面。他当然只能这样说。毛救了陈毅，但这仅是个别的行动。毛有没有就这件事批评李韶九呢？他有没有想到可能还有别的人也在受冤枉呢？他有没有想到需要检查一下李韶九的工作呢？或者，如果他是足够负责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整个肃反方针的问题呢？

毛多次在一个同志面临危急的情况下拯救他的生命，从此这个被救者就终生对毛感恩戴德，并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其实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毛所拯救的人不过是他所迫害的人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毛后来也在这种情况下救过许世友。李志绥医生回忆毛谈过这件事：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涛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涛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需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焘，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一九九四年，台北：六四页）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当时其实是很清醒的，他并不相信许世友有什么问题，只这几句话，毛就成了许世友的“救命恩人”。

另一个给毛理发的人，也是毛救了他，适个人叫王惠。

王惠（王胡子）从一九三 0 年起就一直给毛理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王当时坦白交代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毛不信，叫找王来。王来了，见到毛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着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样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王胡子从此封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周围，许多与毛最亲近的人都受过毛的救命之恩。” (同上书，八六页）

毛这种策略可能是从《资治通鉴》中学来的。他对李志绥说：“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

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诗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徊帐篷襄，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唠。”（同上书，八六页）后来，毛在“文革”中多次玩这种把戏，在一些被批斗者面临绝境时突然表示他的宽恕和仁慈。

利用肃反造行大规模迫害的始作俑者

中央苏区的整肃 A B 团是整个苏区肃反的第一波，继之又有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的闽西苏区“社会民主党”冤案。如果说整肃 A B 回是把苍蝇当大象，那么整肃“社会民主党”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外国有社会民主党；在中国，这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可是，没有可以变成有。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红军新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有人在会上喊出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第二给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都是好的，後来出了修正主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德圆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他们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的。红军战士不了解这些情况，喊错了。这一喊错不要紧，无数人头就此落地！在此之前的李立三路路线期，中央曾发过一个宣言，其中说到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现在反革命喊出口号来了，这还了得！新十二军第一 O O 团政委林梅丁等十七名干部被诬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判处死刑，临刑时还高呼“打倒社会民主党”. 可他们至死也不知道这个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社会民主党”为何物。一些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对肃反不积极的，工作上犯过错误的，或仅仅是出身不好的，都被当作“社会民主党”而清洗。仅五月份，闽西苏区被捕的达一千六七百人，被处决的六七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杭武县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处决了十一人，大多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最小的年仅十六岁，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四十五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遇害，这次事件延续一年多时间，党员人数由八千减到五干，遇难者多达六千三百五十二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听了闽西肃反的汇报后，指示纠正。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从上海转移到苏区。

这一年的白区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四月，中共中央候捕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办。顾顺章是中央特委的三名委具之一（另外两人是向忠发、周恩来），中央特科的复责人，知道很多党的重要机密。他不但供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还要向蒋介石面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一情况为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迅速报告了中央。紧接着，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迁移，中央领导人也逃避了。顾顺章一家人被杀，埋尸空屋。此事当时报纸作了报道，震动上海。中共官方编纂的党吏都对顾顺章全家被杀的事绝口不提。近年海外为词事对周恩来谴责很严，有的人说他“心很手辣”，因为当时周负责处理此事。这件事做得太不人道，谴责是应当的；不过要和苏区的肃反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只不国苏区处偏僻之地，消息不为外间所知罢了。

顾顺章的家人都是在中央机关工作或从事秘密交通工作，封党中央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跟着顾顺章叛变，将给当中央造成重大损害。在讨论如何处理时，康生力主全部杀掉，向忠发不以为然，周恩来则说到顾顺章家看看情况再定。周恩来和康生带着特科人具到顾家。周恩来先单独告顾妻以叛变事。顾妻是共产党员，没有表示封顾不满，反而表示将听从丈夫安排。杀顾妻是周示意的，杀其他家人是康生的指挥。最後还剩下一个七岁的孩子，康生也要杀，为周恩来阻止，派洪扬生送到浦东寄养。（根摅一九九三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生死搏杀--周恩来舆顾顺章》一书。作者吴基民采访了当年杀死顾顺章妻子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并作了许多调查，以十年之力，写出此书。）

继四月顾顺章叛变之後，六月，向忠发又在被捕後叛变，形势恶化。共产国际和王明都强调中共之所以犯错误，和组织上的缺乏工人成分有观，因此要大批输入工人血液。然而事实上这些工人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王明于十月去莫斯科。周恩来于十二月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在上海成立了临暗中央，由博古负总责。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中共的工作重点从此由城市移往农村了。

周恩来路过闽西途中，耳闻目睹了肃反的惨状和恶果，甚为骇异，当即写信向中央报告。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红色首都瑞金，就任中央局书记之职。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主持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要求“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工作”，并提出给予纪律上的制裁。此後，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做出了关于处理李韶九的决议。决定给予留党查看六个月的处分，下放基层工作。(《黄克诚自述》. 一 0 三页）闽粤赣临时省委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对整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进行了检查。然而并没有听说毛泽东承认了什么错误。

一九四一年七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讲演，题目是《论党内斗争》。在中共中央内，刘第一次系统地批评了党内斗争的过火偏向。刘少奇批评了开所谓“斗争会”的做法，又指出过火偏向还表现在:“有些同志以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句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得愈长…………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四页）

刘少奇不指名地批评王明、李立三等人“用一种对党员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与惩办制度来达到或保持党内的统”，他们常用开展斗争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推动工作，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党内的同志）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来开展斗争，牺牲与打击这一个或这几个同志，“杀鸡给猴看”，以推动其他的干部当员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务（同上书，一九五页）他们收集和夸大某个同志的个别缺点和错误，“在党内同志中造成对这个同志极不好的印象，激起党内一切仇恨机会主义的心理，向着这个同志来斗争。于是‘死老虎人人可打’. 一些人的报复心理也发展起来，揭发他一切的错误缺点，任意提到原则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实，凭着主观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谣言，乱加给这个同志以各种罪状等等…………这样做了之后，他们还不允许这个被打击的同志起来做任何的辩护。如果他们有辩护的括，那么又所他故意辩护错误，承认错误不做底等等，再加以打击。”“另外有些同志，用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向党内的同志斗争…………。一切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使用出来。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辨法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同上书，一九六页）

刘少奇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作了这样生动的描写，显然是深有所感的。可是到一九五九年的卢山会议上，他所批评的那一套全搬出来了，他却支持了毛泽东。不知他当时是怎样想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把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各个方面都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而“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把一切因为成为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请况如何，一律错误地

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做斗争的方式来劲行这种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

这是说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左倾的组织路线对立的。这里只说毛泽东受左倾路线打击的一面，关于毛泽东受到王明支持的左的整肃 A B 团运动的错误，就只字不提了。所以，下面说的错误肃反及处理原则，是不包括整肃 A B 团那一次事件的：

“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蓝受到同志的纪念。”《毛泽东选集》，九八六-九八七页）

毛本人对 AB 团问题怎么看？他在《历史问题决议》之后的几十年是否有所表示呢？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说：“内战时期打 A B 团有用肉刑者，肉刑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因此，得出两条：一、废止肉刑：二、不要轻信口供。”

又说：“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二 O 八页）

建国初期，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在北京开会，向毛泽东汇报了苏区杀 A B 团的事，说这是一大冤案。据陈正人叙述，毛主席回答：“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扩大化、简單化，错杀了自己人!”陈正人还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凡是被错杀了的同志都要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苏区》，二一七-二一八页）

这两次表态，毛泽东似乎是吸收了教训，但没有承认自己的责任。第一次毛泽东说的是党当时末成熟，因此犯了错误；第二次他说是“左”倾路线犯错误：这两次他都没有说是他犯错误。他提出的两条教训是好的，但又是不绚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时肃错了人。”这是毛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承认自己有错误，这已是事隔二十多年了。

但是这句话《毛泽东选集》上没有，有的只是毛在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说的批评“假洋鬼子”的话：“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舁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八四页)这是在说别人，不是说自已。

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作他的著名的报告时，他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追溯到苏区时代，说自从一九二七年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七 O 页)这里，他又闭口不提他的肃反的教训，好像他是一贯正确的。

我在本章开头说，中共的清党方式是从苏联学来的；我应该补充说，中共有它自己的创造。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共的肃反，虽说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但那一套大规模处死的做法，都是属于中共自己的。斯大林借肃反为名大规模的从肉体上消灭异己，主要在一九三六-三八年，这还在中共苏区肃反之後。

一个老红军陈靖在封苏区肃反作了大量调查后说："我查遍了三大苏区和三大方面军的"反革命"史料，尤其是张国涛、夏曦和李韶九（一方面军肃反领导人）所肃杀的那些人，至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不是"反革命"。 他又说，一般人只知道二、四方面军肃反中夏曦、张国焘诬杀了很多人，其事一方面军也不少，主要代表人物为李韶九。尤其是一九三一年前的一段时间同张国焘相比，张真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作者只是没有点出李韶九背後的那个人罢了。

这位可敬的老红军又说;"从三十年代初到长征之初，中国和苏联在'肃反'这一行动上，基本是'同步'而行。在做法上，不但是相通的，而且是'互学'的，尤其在那个'狠'字上--杀人，苏联还吸取了中共经验。"（陈靖《诗言史》，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所有这些"肃反"都大生在国民党第二、三次围剿期间。就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来说，我们甚至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敌人杀死的多呢？还是死于"自己人"之手的多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陕甘宁，立即把被王明路线执行者逮捕的苏区创建者刘志丹、习仲勳从死囚牢里释放出来。否则，陕甘宁不会存在，是征的红军没有立足之地。陆定一回忆说："我问过习仲勋同志，如果中央红军不到，你们的命运会怎样？他回答：如果中央红军晚到四天，我们的命就没有了，而且会被活埋，活埋的坑已经挖好。他说，据他所知，跌甘宁的错误肃反，在他被捕以前已经杀了二百多名从白区来投奔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七四六页)

这几次肃反中的许多对待嫌疑犯的做法，完全是'有罪推定'的原则，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先认定某人有罪，当真正的罪犯看待。再加上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根本没有人权观念。这些做法在中国的"旧社会"本来就很普通，又有苏联的榜样，学起来是很容易的。中共并不绝得有废除这种办法的必要，因为他们认为这用来对待"敌人"的（且不说是否真的敌人)　毛泽东后来承认，"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七八页）当然，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和肃反混在一起，完全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根本改造"党和政府机关，解散党团组织，罚领导干部集体扫地，属于当时的创造了。所有这些，和"文革"中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文革"的一套，在共产党的传统中是早有根源的。

（一九九七年一月）

第四章 一九四五年：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日本进攻东北时，曾扬言要以满洲为跳板，进攻苏联，用这种办法诱使英美让步。可是以后的事情发展表明，本并没有北进，相反是继续南下。苏联表示同情中国并给予帮助，不参加国际联盟，但也有妥协。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申明不干涉，严守中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向日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为日所拒。一九三三年，被

迫将中东路以低价出售给日本。苏的目的是在远东避免日苏战争。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俄未得中国同意就这样做了。

斯大林急需依靠中国的力量牵制制住日本，避免日本入侵苏联；但斯大林又觉得，中共的力量太弱小，不能后承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国名党才行。苏联力图恢复在一九二九年中断的中苏外交关系、蒋介石也感到日本步步紧逼，英美都怍壁上欢，而日本的反苏反共是口号，减亡中国是行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苏打成复交协议。

在法西斯战争威胁日临近近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两面作战的局面，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一周後的九月一日，德国向波兰反动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封德宣战，二次世界界大战全面爆发。

本书前面已经谈到斯大林此举违反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而这些决议本来是在苏共领导下作出的），并使各国共产党不知所措，但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然而，斯大林打错算盘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物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措手不及。斯大林原想祸水西引，现在他自食其果了。看来英法也懂得德国战胜苏联并不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事：这股祸水是要汜滥全欧洲的。英法和苏联联合起来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才把口号改为赞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圆开始对中圆抗战提供支持，但当时并没有怎样注意到中共。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及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局势，决定反苏反共，驱逐苏联在新疆的势力。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夏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引起苏联强烈反应。国共摩擦严重影响了中国抗战，影响了盟军队日作战计划。美国担心苏联队中共的支持将影响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利益。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促进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兄刘德喜《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一七九页）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又同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设法同中共合作，并且必须在战争进行时期，就同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联合政府。

另一方面，美国还担心在打败日本后，国共之间可能爆发内战，届时苏联可能站在共产党一方，而西方国家可能被追站在另一边进行干预，因此它极力促进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改善关系。但苏联是要讲价钱的。在一九四三年底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一場背着中国的交易开始了。会上，斯大林表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暗示对中国大连这个完全不冻港的兴趣。关于使大连成为国际化自由港的主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长驱直入华南，国民党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许多美国观察家都认为国民党要垮台。

一九四四年六月，罗斯福首先让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征询关于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意见，然后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蒋介石对此问题的态度。六月十日，哈里曼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他说：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人，因此，应当鼓励蒋介石，首先使他想和北方的共产党和解，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其次使他在国内放宽政策，对罗斯福的看法，斯大林林表示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方面，表示支持，认为蒋介石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必须给予支持。实际上，这是苏联政府自中国抗战以来的一贯政策。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埋怨蒋

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他说他有一个印象：蒋周为的许多人都是些无赖，甚至是卖国贼，因为重庆发生的一切，日本人似乎了如指掌。斯大林还埋怨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是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他表示这种争论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冒牌的共产党。但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抗日的。（同上书，二三三页）会议后，哈里曼及时将斯大林的意见转告即将赴华的华莱士。

六月下旬，华莱士抵大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几次会晤：当华莱士向蒋介表示了，美国希望国民党舆共产党和解，并转达了斯大林谈话的某些内容，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观点时，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上述建议和意见。蒋让为美国不了解共产党，他们有意散布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并非真正的革命者，只不过是土地民主改革者而已；他们也不依附苏联。但所有这一切部是假的，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比俄国共产党更加是共产党。然而，蒋介石在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时，却要华莱士转告罗斯福总统，表示他热切地希望在美国的调停下，与苏联进行会谈并达成某种协定。根据这种协定，苏联政府将同意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为实现这一目的，蒋表示，他准备付出代价，比如俄国人在远东的不冻港问题。如果同俄国人达成了这种协定，他就可以自由地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就范，因为到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将发现他们已丧失了任何外国的支持。（同上书，二三三页）

一九四四年六月，蒋介石不得已同意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军观察组。中共力量的强大，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的抗战不力。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以美国的友好，争取中共的支持与合作，以防止中共倒向苏联。罗斯福认为，妨凝中国统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来自苏联的干预和共产党的胜利，所以他力求拉拢这两方面的力量。他企图以美国同意苏联在满洲享有特槿为条件，以换取俄国不卷入中国政治的笼统保证；与此同时，中共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因此，罗斯福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谋求同中共联系与合作。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开始，美国岁仍以扶蒋为主，但逐渐有了联系中共的内容。在罗斯福看来，扶蒋舆联共是可以统一的。（同上书，一八二-一八三页）

中共联美拉蒋杭日

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以英美记者为主的中外记者回到延安，这是美国寻求同中共联系舆合作的前奏。七月二十二日，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毛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国不能限于只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来苏联、斥责英美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

毛、周、朱都赞成在中国段立一个盟军司令部，统帅必须是美国人，以保护一切部除的平等待遇。他们不会为此感到丢脸。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提出的与美英全面合作的方案，十分灵活（比蒋介石还灵活）。（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三一四-三一八页）

陈纳德派人商谈情报、通讯和军事合作。毛指示：可同意。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一则美我配合值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

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一九一也）

美军观察组成严谢伟思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这八偶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毛对谢思伟谈到合作的思想基础，说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外国的对中国有益的东西，不仅是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等。毛还论述了这这合作在政治上的好处。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塑料和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桥梁之一。毛还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读立自主的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毛的不依附苏联的表态是为了打消美国方面在制订联共政策时的顾虑。毛又谈到经济基础，说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基础，中国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所以，美国的资本对中国就特别重要。而且，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经济发展的仅有的国家。这对美国也是有利可图的。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关联和相似的。苏联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因为苏联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而且对我们说来，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局势更糟，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苏态度。由此，中国舆美国合作将更为有利。而且，美国与中国合作，将主要是与中共合作，因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将欢迎它。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不是属于国民党的，美圆要与中国合作，必须与中共合作。（同上书，一九二-一九六页）

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共的力量，但未能为政策制顶者很好地理解。

虽然美国在一九四四年确立于中共联系和合作的政策时，让为中共可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苏联有别，但又认为，中共在政治上是依附於苏联，并受苏联控制的（蒋介石力图告诉他们这一点）。美国看到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后，苏联减弱了这个控制，但它以为这种控制并未消失。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较有生气的力量，最终可能赢得一場内战，而让一个受苏联控制的党在战后控制中国，这不是美国顾意看到的。美国同中共合作，是希望中共最终能放案共产主义。当时美国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观念，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国是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改革者，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只是土地改革、自由贸易等等有利於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相当一部分美国的友好人士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变名称。（同上书，二 O O 页）

正当中共与美国的联系和合作全面展开之际，美国驻中缅印总司令和美国委派担任圆民党政府参谋长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此矛盾早在一九四二年即开始产生'其根源是蒋介石军队抗战不力。现在，则是由于对中共军队的使用问题。史迪威认为，鉴于蒋介石军队抗战不力，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有必要由他来全权指挥中国的所有部队，包括共产党部队，联合抗击日本。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报告，并说共产党可能愿意听我的意见。罗斯福采纳这个建议，致电蒋介石，要求授予史迪威以指掉中国军队的全权和让共产党军队参舆盟军对日作战。此建议为蒋介石拒绝。罗斯福遂派赫尔利来华。九月十九日，罗斯福采纳史迪威意见，几乎以最後通牒方式致电蒋介石，要求接受史迪威建议，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同上书，二 O 二页）九月二十三日，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部署在黄河以北，与中央军脱雕接触；美国只向共

产党军队提供五个师的武器装备。赫尔利满以为蒋介石会接受，但当他将此建议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不但一口拒绝，而且正式要求美国政府调回史迪威。蒋介石看准了美国不能抛弃他，他看对了。一九四四年，史迪威应召回国。美国对中共政策开始变化。

中共继续执行联美拉蒋抗日政策，并对赫尔利抱希望，欢迎赫尔利来延安。九月十五日，中共委托董必武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改祖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通盘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方案，虽是中共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与赫尔利来华后美国实行压蒋联共政策也不无关系。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在去重庆途中，转道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赫尔利一起的还有美国当时负责经济援华事务的纳尔逊。

美国人对莫洛托失说：中国在战争中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为达到此目的，美国政府必须支持蒋介石大元帅并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莫洛托夫对美国客人追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他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苏联政府没有理会张学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道义支持，蒋介石得以返回南京，而张学良被捕。苏联本指望这个行动能改善中苏关系，但中国对此事兴趣不大。两国关系在近年来反而恶化了。虽然苏联政府被不公正地指责为要对近年来中国的一些事件负责，但苏联队中国的内政和发展是没有责任的。

下面，莫洛托夫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据《白皮书》记载：

莫洛托夫于是谈到中国的某些地区人民十分贫困的状况，其中有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和共产主义毫不相干，那不过是对他们的经济条件不满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件改善了，他们就会忘掉这种政治倾向。不应当把苏联政府和这些共产党分子联系起来，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为此责备苏联政府，(China white Paper, Aug. 1949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二卷，一九六七年出版，三七页；中译本《白皮书》，一四 0 页)

大约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通国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个电报，说：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毛）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和国际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2]

在美苏双方的压力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七点协议。

当时美国的态度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以利于对日作战，但是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吸收中共参加政府。美国的条度既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国共双方都不好拒绝。

尽管国共之间展开了冗长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但天真的赫尔利相信，事实上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两者都在为民主主义而努力。(《白皮书》，中译本，一五三页）赫尔利到达重庆后，在十二月做了一倜报告，其中不无得意地讲到他对蒋介石的说服工作已取得的效果：

我到这里的时候，蒋介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工具。现在他则确信俄

[2] 根据《峰与谷》)（陈哲，红旗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二O页）记载，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有一个电报，大意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灭亡亡的危险地步等等。师哲没有明确说明两份电报的时间，但上文说在一九四五年，下文又说到重庆谈判，显然，前一个电报应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后一个电报应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前。师哲的记忆有误。

国政府毫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座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俄固并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二）俄国兵不要中国有纷争或内战:（三）俄国极望和中国有更和睦的关系。

然而蒋介石并不想同中国共产党和解，但他倒是想同苏联和解，以防止苏联援助中共。蒋对赫尔利说：共产党寄希望於俄国加入亚洲战争，这样俄国就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对付国民党政府。（《白皮书》，中译本，一四九页）

另一方面，中共放出空气，要寻求苏联的援助。这使美国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让美国来给中共援助；他们也担心，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会便中共投入苏联的怀抱。（《白皮书》. 中译本，一五四、一五六、一五七页）

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指责美国没有给对方施加压力。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赫尔利到延安。八日，毛、周與赫尔利会谈。九日，中共拟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與中国共产党协定》，即《延安协定草案》，主要内容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赫尔利对此草案完全赞同。十一月十日，他主动表示愿与毛泽东一起在协定上签字。签字当天，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说“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们非堂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封於中国人民的同情。”（《毛泽东外交文选》，二九页）

赫尔利怀愎希望回到重庆。他确信，这个协定不仅是公平的，蒋介石也有接受它的理由，至少接受一部分。但是他的一厢情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当头一棒。宋子文说赫尔利被骗了，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表示，在他没有承认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会同意粗成联合政府。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接受这个提案，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案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赫尔利评论说，我认为，他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赫尔利还对张治中和王世杰等人大加申斥，说你们谈了五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欺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毛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说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团结的，我看是你们不愿团结。（《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二一 O 页）其实，只要成立联合政府，就必然导致共产党控制政权，国民党清楚这一点，毛泽东也清楚这一点，只有赫尔利不懂得。但美国扶蒋已是既定方针，赫尔利也不得不让步，改为站在蒋介石一边，劝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方案。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延安协定草案》上签字和赫二利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决定中止同国民党的谈判，返回延安。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继续争取与美国合作。十二月八日，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告诉他说：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地遗憾。但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芨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同上书，二一二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信在美国陆军和战略情报局中存在着同情共产党的派别，所以准备冒一场大的风险。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交给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国军事渠道直接转给华盛顿。信中说，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决定访问华盛顿。这

反映了毛泽东想同美国领导人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的迫切愿望。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此後，赫尔利回国述职，国共谈判破裂。此期间，美国驻华官员为使美国政府采取灵活政策，争取同中共合作，作了最後的努力。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批评对蒋介石采取无保留的公开支持政策，说这样使美国脱离了千百万有用的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二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具起草了一份对美国政府的报告，其中说到把共产党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话）。（同上书，二一五页）刚回到美国的赫尔利对此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坚决反封。赫尔利的态度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担心给中共部队以全面军事援助会不利於中国统一。他还担心美国对中共的军事援助会招致苏联队中共以同样的援助，从而使共产党不愿同蒋介石和解。总之，这一措施可能引起他所不希望的中国的内戥，破怀他在战后安全体系中利用和控制中国的计划，并使他遭到国内的攻击，说他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政权。看来还是雅尔塔协定最为理想：依靠苏联的力量在满洲同日本作战，并胁迫蒋介石从事国内政治妥协；依靠苏联同蒋介石打立一个同盟条约而迫使中共同意一个联合政府（大概不是平等的，否则本没有同题）。

但中共仍在争取机会，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给王若飞的指示信中，对将来美英等大国干涉中国内政，迫使蒋介石做出民主让步抱有希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一九四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八页）

斯大林；宁要软弱的国民党政府，不要不听话的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讨论苏联对日作战戟的保件。渤蒜规定，德圆投降後雨三倜月内，髁娣参加封日作的条件。协议规定，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予以维持。

二、由日本在～九 0 四年日俄战争中破坏之俄国权益应予恢复，即：

A 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

B 苏联在大连之权益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C 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

三、干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其实库页岛本是中国领土，在黑龙江外。十八世纪后日俄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一八九 O 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库页岛属于被割让范围。此后日俄屡次争议岛上画线。俄以千岛十八岛舆日交换，占领南部，全岛于是归俄。一九 O 五年日俄戟争後，俄战败，又以南部与日。这次苏联不仅要回库页岛，连千岛也索回，这成为战後日俄之见的争端。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层发表宣言，废除一切对外的不平等绦杓，当时此举感动了许多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但这个宣言后来并没有兑现。现在，斯大林又要继承帝俄的遗产，把本来是中国割让的镇土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夺回来了。

蒙古也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一九一二年，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独立。

一九一七年沙皇倒台后重归中国。一九二一年独立，一九二四年宣布成的条件。协议规定，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当时中国政府并未承认。现在，苏联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当时美英背着中国同苏联达成的一笔交易。

毛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和罗斯福、邱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二五三-二五四页）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罗斯福在同赫尔利的最后谈话中指示赫尔利在返回重庆时，途经伦敦和莫斯科，争取英国、主要是苏联再次肯定支持蒋介石控制下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正是基於罗斯福的这一指示，赫尔利才於四月二日离美赴莫斯科之际，在国务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公开扶蒋反共的讲话，攻击中共及其伦敦下的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声称中共的力量被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才是中国最大的力量。宣称不与中共合作•不向中共提供援助。美国的支持只在国民党方面，还极力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捧场。这个讲话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由原来的扶蒋联共变为扶蒋反共。四月二十八日，赫尔利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着重说明美英苏三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意见。（《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二一七页）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赫尔利同斯大林的谈话，在场的有莫洛托夫，赫尔利把莫洛托夫上次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包括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莫洛托夫当着斯大林的面说，他是这样讲的。

赫尔利向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都自称遵循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又说；中国政府和中共都是极端抗日的，他们的目的都是把日本赶出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分歧和争端，在具体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赫尔利表明：美国坚持中国产生自己的领导，自行做出决策，对自己的政策负责；在这个前提下，美国支持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并且支持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的努力。

斯大林说，苏联支持这个政策，监且他将乐意为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而与英美合作”斯大林称颂蒋介石，说尽管在某些国民政府的官员中产生了腐败，但他知道蒋介石是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苏联在过去把他当做朋友。他要美国知道他完全承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美国在立即采取的统一中国武装力量的行动中会得到他的完全支持。（《白皮书》，中译本，一六 O 页）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斯大林又通过哈利•霍普金斯（美国驻莫斯科特使）告诉杜鲁门说：苏联将忙于本国之复兴工作，因之中国的复兴大部分要依靠美国；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责任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此责任。斯大林并且声明欢迎中国官吏参加满洲行政的接收。他还说他完全支持采取行动来统一中国军队。党，莫洛托夫当着斯大林的面说，他是这样讲的的。

赫尔利向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都自称遵循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又说；中国政府和中共都是极端抗日的，他们的目的都是把日本赶出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分歧和争端，在具体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赫尔利表明：美国坚持中国产生自己的领导，自行做出决策，对自己的政策负责；在这个前提下，美国支持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并且支持统

一中国的武装力量的努力。

斯大林说，苏联支持这个政策，监且他将乐意为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而与英美合作”斯大林称颂蒋介石，说尽管在某些国民政府的官员中产生了腐败，但他知道蒋介石是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苏联在过去把他当做朋友。他要美国知道他完全承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美国在立即采取的统一中国武装力量的行动中会得到他的完全支持。(《白皮书》，中译本，一六 O 页)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斯大林又通过哈利•霍普金斯（美国驻莫斯科特使）告诉杜鲁门说：苏联将忙于本国之复兴工作，因之中国的复兴大部分要依靠美国；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责任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此责任。斯大林并且声明欢迎中国官吏参加满洲行政的接收。他还说他完全支持采取行动来统一中国军队。（《白皮书》，中译本，一六一页）

斯大林的这些话，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这些话有掩盖苏联和中共关系的成分，不过是给国民党和美国吃定心丸。据师哲说：共产国际存在时期，苏共一般不直接同中共发生关系，有事都通遇共产国际联系。(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一一 O 八页）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直至共产国际解散前，苏联与中共的往来主要通通共产国际来进行，一般不直接发生联系。但共产国际是受苏共控制的，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同苏共的联系。既然直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解散前，中共都是它的一个支部，那就不能说苏共不承认中共。一九四二年五月，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延安，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回圆。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派了一个军事情报组驻在延安。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多次电报往来，商量八路军能否抽调一部分兵力到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十分担心日本会进攻苏联。

但另一方面，这些话也确实表明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他宁要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不要一个不听话的共崖党政府。

在国民党方面，也觉得可以同苏联妥协，但不能同共产党妥协，只要素来肯支持国民党，同苏联妥协也是割断苏联对中共的支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斯大林对蒋介石似乎情有独钟。这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蒋发动反共政变前一周，斯大林还说：没有必要试图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共产党人需要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右派中有能干的军事领袖。（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固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 O 午，一三五页）五月十三日，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话，仍然说国民党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并且说，蒋介石虽然是右派，但他在同时进行一埸不管是好是坏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战争。(同上书，一一七页；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六月十四日杜鲁门在华盛顿把斯大林关于不支持共产党而支持蒋介石的话转告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满意，又指出：关于一九 O 四年日俄战争俄国所丧失的权利，由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苏条约及其附属协定，以及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协定，俄国业已放弃在华租界，包括治外法权在内，这点是必须指明的。

美国人觉得，从蒋的反应看来，俄国人显然已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让他知道了。(《白皮书》. 中译本-一七八页）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警告说：我们要求各同盟国

政府，首先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同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 O 八五页）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八三页）“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兼过的大发展，超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 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清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同上书，一八七-一八八页）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封。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同上书，一八九页）

毛还说：现在美国政府不承认解放去、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的。……美国帮助蒋介石是想控制中圜，中国将来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要好好准备，准备发生这一变化。毛还谈到外国无产阶级和苏联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时，远水不解近火。（《毛泽东集》补卷，日本苍苍社，一九五八年，二三-四七页）

六月十一七大闭幕词；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毛泽东柬选集》第三卷，一一 o 二页）

可能由于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中共担心一場美苏交易或苏会使斯大林在一旦参加对日作战时不支恃中国共产党。中共还担心美军即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这一美军就可能突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让国民党部对尾随而来。总之，到了六月，中共已经开始感觉到，美国在他们控制地区的军事行动是为国民党打先锋的。（《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二二五页）

毛和中共在此时间（五月底六月初）有此认识，从国际上说，主要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法西斯德国被打败以后，美国和苏联的矛盾开始出现。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四月下旬开始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的争端（波兰问题、阿根廷问题、联合国组织的权力行使 s 问题）。

从国内来说，主要是赫尔利贯彻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大大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气焰。五月五日到二十一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在大会期讲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同上书，二二五页）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公开声明将向盟国租借武器进行内战。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在七大闭幕词中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

国反动派的猖狂。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一 O 三页）

七月十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其中批评国民党宣称的还政于民，准备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为欺骗，说；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没有认真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毛泽东柬选集》第三卷，一一一三页）七月十二日，又发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其中说；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同上书，一一一四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中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同上书，一一一四-一一一五页）但是毛泽东避免批评罗斯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毛在谈话中说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但他不承认美国原子弹的作用，说：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假如原子弹能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毛还批评说，相信原子弹威力是受资产阶级影响：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确经常丢在脑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三三-一一三四页）

事实是，在波茨坦会议时，美国海没有对原子弹进行实验，对原子弹的威力没有把握，所以要请苏联出兵。对这一点，毛泽东当时或许不知道；但他不会不知道，苏联宣布参战的时间是在八月八日，而第二颗原子弹是在九日投下的，日本宣布投降则在八月十四日晚。在这里，名连起吗的事实也不顾了。

斯大林本来在波茨坦会议上声言将在八月下旬参战，但在获悉原子弹爆炸，日本可能要投降后，提早了参战时间。苏联参战是对中美的巨大支持，但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答应参战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恢复一九 ol 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去的权益，包括在中国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益。涉及日本方面的，苏联除了要日本交还库页岛外，还要求得到千岛群岛。如果苏联不参战，这些好处都没有了。苏联军队在满洲还移走了大批工业设备，借口说这是战利品。美国曾多次抗议。(《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一八四页）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八月，宋子文、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开始中苏谈判。谈判开始时，苏联要求：(一）对中东路及南满铁路有支配权；(二）大连和旅顺口租借的界限应以一九 O 四年日俄战争以前关东半岛的租借界限为准;. 及（三）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国和美国都觉得这些提议超过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美国认为，雅尔塔协定必须遵守。不多也不少，而苏联的要求超国了协定。美国劝中国政府于雅尔塔协定以外，不作更多的让步。(同上书，一七九页）

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一个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保留两个互相尊重其主权及不干涉彼此内政。在换文时，独立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給予国民政府中国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曾企图获得胜利承认中个对外蒙的宗主权，虽则此宗主权在多年前即实际上不存在。纵令有一九二四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在事实上自一九 O 一_中期起，即已有控制该处的力量。(同上书，一八七页）

此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感到满意。据赫尔利对美国国务院报告，蒋介石经常怀疑苏联

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现在他承认中苏条约指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莫斯科美国大使馆有疑虑，认为斯大林在玩弄外交手腕。怀疑苏联仍对暗中支持中共。

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时候，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危险的灭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三五一页）毛拒绝听从这个意见。

《卡德尔回忆录》和《苏南冲突经历》都记载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斯大林回忆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应该是打电报）的情况。斯大林说中国同志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起义。我曾劝现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後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苏南冲突经历》，二六 O 页 ）

一九四五年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发表公报说：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国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洛托夫说，苏联已从南满撤兵完毕，若非中国政府要求延迟一月，北满撤兵亦应早已完成（延期到二月一日）。（《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一八五页）莫洛托夫坚持讨论美军驻华北问题。

美苏两方同意在履行其责任和任务後，两国军队尽快从中国撤退。（同上书，一八六页）

一个 2+2 的政治游戏

英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充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日本打进中国就是对的，就是把中国从英美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为日本本身也是帝国主义。日本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不满于中国这块肥肉被英美霸占，而想自己独占，所以发动了侵略，德国也是后起的帝国主义，也要重新瓜分欧洲，这样，日德两家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说中国站争在起初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直到德国打进苏联才改变性质，但苏联进兵波兰也表明它虽然在口头上表榜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和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件以後，苏联先后與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贸易协定》，向中国抗战提供援助。毛也曾对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但抗日战争开始後，美英等国奉行不干涉政策，而且在一九三九年一度策割远东慕尼黑阴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提出战後成立一个由美、英、苏、中四国参加的执行委员会，来维持世界秩序。开罗会议文件规定；中国应取得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签字国和反轴心国的国际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与美、英、苏、法作为五个邀请国参加，也是经过罗斯福很大努力的。

罗斯福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美在二战中的基本战略为先欧后亚，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最重要的威胁来自德圆，德圆应是重点：美不能同时在两洋作战。因此，对日应取守势。特别是一九四O年德军席卷欧洲后。但也要防日，支持亚洲的抗日力量，以拖住日本。这样，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就有特殊价值。基於这个缘故，要援助中国，因此决定向中国提供各中援助，派遣军事、政治顾问团，并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中国以大国待遇，使中美结成牢固同盟。

二、从站后考虑，需要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力量。日本战败后，中国无疑将崛起，而苏联在亚洲的影响也将扩大。美从维护其在亚洲及全球的利益出发，需要一个听命于它的强大的中国。（后来中国一边倒，美国就改为扶植日本了。日本坐收渔利。（罗斯福注意到一个有成为大国条件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所具有的战略价值。

三个目的：

一、抗衡苏联，防止苏联东北亚向外扩张。美需要中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亲美的政府，以抵御苏联势力。要使中国作为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国家（罗斯福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语）。

二、削弱英法等欧洲老殖民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三、防止日本东山再起。

苏对东北政策：

一、确保东部边境安全。（西边有东欧国家）因此力争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承认。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建立亲素政权无可能。唯一可能只是使束北成为防御美国渗透的缓冲地带和屏障。

二'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美国派出大批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军抢占东北要地，根本目的是扶持蒋介石以控制全中国。

三、谋求恢复和扩大苏联在东北的传统特权和利益。一九O五年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在东北的特权大部分转让给日本；九一八后，日本独吞东北，斯大林对此耿耿於怀。

二战争结束，美苏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蒋介石用军事方法统一中国的能力表示怀疑。鉴于赫尔利的偏袒政策招致中共不满，美国派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更加强调不偏不倚。但同时又在物质上大量援蒋，这在客观上坚定了蒋发动内战的信心。调停的本意是防止内战，而援助又进一步触发了内战危机。出于夹缝中的马歇尔，多次与蒋交涉停火，并不惜以停止美援来施加压力，终无效果。内战爆发后，美国总统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派魏德迈中将来华考查。九月十九日，魏德迈返国後向杜鲁门交了份长达十余万字的报告，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困境担忧，要求美国施加影响，敦促国民党实行改革，并建议制定对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计划，以挽回颓势。但要这样做，至少要花几十亿美元，但美国已经力下从心。

一九四九年初，眼看形势不妙，蒋介石希求美、英、法、苏出面调停国共内这。苏联断然拒拒绝，但不久又由苏联大使罗申同刚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了苏联出面调停的三项条件，实际是支持李宗仁的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计划。

斯大林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怀疑中共能取得胜利，但不仅此而已。斯大林还害怕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铁托。如果毛的中共掌握了政权，和铁托的南共一东一西，把苏联夹在

当中，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更何况中国是个大国，能造成的麻烦会比南斯拉夫大得多。比较起来，蒋介石还好对付一点。蒋介石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给了苏联不少好处。所以，说来会使人惊讶，斯大林一度是事要蒋介石，不要毛泽东。这是纯粹从苏联本身的利益来考虑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刖不过是在口头上说说罢了。

然而战局发展如此之快，斯大林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到中国解放区，在西柏坡与中共中央会谈。在此之前的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急于到苏联找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答复说，他认为现在毛离开捐挥岗位是不合合适，但他可以派一国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中共方面意见。米高扬就是这样到来的。他申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不发表意见。

毛在向米高扬介绍党内情况时，特别说到王明、李立三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但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米高扬很注意这一点，后来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据说斯大林没有表态。(《在历史巨人身边》，三八四页)

毛还告诉米高扬：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充满信心，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党和人民的决心和信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这当然是针对斯大林的意见说的)。毛还谈了一通假朋友和真朋友的问题。任翻译的师哲说：当时米高样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同上书，三八五页）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在批评王明时小心地避开了斯大林问题。毛显然还想争取得到斯大林对他的支持，然而斯大林不会不明白，对王明的批评就是对他的批评。

在中共党内，斯大林支持过王明；在中国国内，斯大林又支持蒋介石。斯大林支持的都是毛泽东的封手，而不支持毛，这当然使毛脑火。

一九四九年二月，毛对到西柏坡来的米高扬谈到中共掌权后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说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它的组成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彻底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毫不能动摇的。(《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三页）

国民党和中共都在玩把戏。国民党答应寅行民主改革，以便向美国要钱，但却用这钱来打内战；

这是一个 2+2 的政治游戏。中共竭力向美国表示，它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同时它奉行独立的政策，也不是唯苏联之命是从的，以便取得美国的支持。

而蒋介石则竭力说服美国；中共不可信，中共是苏联的工具。

美国担心蒋介石无力统一中国，而苏联既不愿意也不相信毛泽东能战胜国民党。

在苏联这一方，对毛泽东并不信任。它宁肯支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可能比毛泽东好对付一些，可能更听话一些。而毛泽东如果当权，可能成为第二个铁托。他可能造成的麻烦，会比蒋介石要大。另外苏联也希望美国放心，苏联员意用支持蒋介石为条件，换取在东北的特权。而美国也乐得跟苏联做这一笔交易。蒋介石当然也同意。

所以在这个游戏中，中共一度是被美苏双方冷落的。

美苏希望中共以一个党派的资格参加政府，当然是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这又是毛泽

东不能接受的。这和毛泽东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不同的，与联合政府中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思想是不相容的。

美国扶植国民党是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见间一个缓冲地带，抗衡苏联的势力扩张。但蒋介石一败涂地，中共取得政权，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国不久，朝鮮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参战，其因素亦有证明自己并非铁托之意。但另一方面．美国转而扶植日本，作为防共的势力，日本坐收渔利。

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掩盖了两件事实；第一，在抗战结束后，英美已经宣布废除和中国的不平等条豹，中国收回了租界；同时在罗斯福的倡导之下，中国作为五强之一，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当然，这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名义上的。第二，与此同时，中国和苏联还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苏联还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中国并没有完全站起来。

第五章 斯大林和毛泽东

刘少奇访苏

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共的领袖，斯大林觉得失去了对这个大党的控制权。既然这个农民的儿子敢于不接受他的指示，那么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据赫鲁晚夫回忆，“他（斯大林）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人？

我对他一务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L 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場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急于剑见大林，显然，他考虑到建国以后要依靠这位老大哥的支持何援助。

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

“斯大林显然是在竭力弥补什么，他对流少奇的热情接待，从一开始就是不寻常的。”七月十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别墅赴宴。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雅奇等一班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 n 前迎接。宴会持续近四小时，边吃边谈。“斯大林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时带微笑，沉稳庄重重。”“以后，代表团同斯大林的直接会谈有五六次之多，每次会谈都有便人兴奋的内容。斯大林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封中国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将逐渐东移，中国在世界上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他说，後来者居上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熟情洋溢，充满真挚友好的气氛。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现了极大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听刘少奇的谈话。封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还说，“我们干预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斯大林的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反而使刘少奇为之不安，尽量把它避开。”（参见《伍修权同志回回忆录【之三】，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四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七页；朱元石《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秘密访苏》，转引自《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北京，二四三-二四四页）

在会谈中，斯大林承认了他在中国革命伟人上犯的错误。一次宴会上，斯大林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黛。斯大林心头这时可能浮上了铁托的阴影，他似乎对将来有了某种预感，说：

“我们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国结就是力量！”

斯大林还讲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苏联，现在又转移到中国。他举杯祝酒说，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翻议师哲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东移，你们身上的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顾望。”刘少奇还是不肯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通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退让了半个小时，剜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师哲《峰与谷》. 红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五二页）

对这件事，王光美有一个解释。她回忆说，刘少奇当时之所以不喝这杯酒，是因为听说苏联党内传达，南斯垃失民族主一已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更难办。刘少奇回国后向毛汇报；毛说不接受那杯酒是对的，并赞扬刘此行的成功。(《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斯大林祝愿中共超过塑共的诚意是要打折扣的，但毛泽东不赞成接受那杯酒也并不表示他不想当老大哥，只是不顾意承认罢了。刘备依附曹操时，竭力韬晦，唯恐曹操识破他的雄图。有一次曹操和他“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把刘备提出的当今英雄一一否定了，最後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恭维话把刘备吓了一大跳，筷子都掉在地上了。这就是“说破英雄惊煞人”。

毛泽东访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出发，访问苏联，为斯大林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到大莫斯科，一九五 O 年三月四日回到北京，历时三月。为什麼在苏联逗留了这样长的时间呢？

毛泽东宣扬说是他受了冷遇。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一九五 O 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去苏联谈判中苏友好条，斯大林死不签字。后来我拍桌子大骂，才签了字。签字也是假的。”

根据伍修权、师哲这样的权威的记述，我们可以相信刘少奇访苏时受到的待遇是热情的：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封毛泽东的待遇会截然不同呢？还有，斯大林真的是“死不签字”吗？

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伍修权的说法是：

去后，斯大林很客气，但仅仅是一般礼节上的客气，并没有打算签订条约。斯大林为

什么开始不愿意簇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呢？这是斯大林考虑不周，他开始只考虑毛主席去莫斯科是为了给他祝寿。这是个事实，但不能太简单了。常然苏联也考虑到它曾与国民党签订了一个条约，有一定的约束力。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到东北时，苏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怎么让国民党接收东北，保证一九四五年条约的实施。同时，苏联也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苏联打得太苦了。毛主席对斯大林的态度很不高兴，说斯大林太简单了，“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你斯大林祝寿吗？”所以後来发了睥气。（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签订的经过》，引自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 0 年，北京，一 0-一一 页）

伍修权是后来随周恩来去莫斯科的。

让我们看看当时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他的记载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所有谈话他都在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时，苏联的接待还是相当热情隆重的。到火车站迎接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畏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科等等，只是没有斯大林。

毛似乎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他第一次去莫斯科就提出不要什么欢迎仪式。幸好苏联官方没有照办，隆重地接待了毛，规格很高。所有最高级官员都到机场去欢迎毛，只是没有斯大林。斯大林从没有出来迎接或欢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苏日订立中立条约的时候。日本外相松同洋右签约后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亲自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还同他拥抱和亲吻。可以出来送日本外相，就不能出来接中国领袖吗？毛泽东对斯大林没有出来是很在乎的，为此很有气。後来斯大林逝世是，毛泽东是唯一没有去莫斯科参加葬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

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和毛泽东见面。苏方陪同会见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监、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当时在场的中方首席翻译师哲记载这次初次见面的情况如下：

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青嘛！很健康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真了不起”接着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在大厅里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律大，其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尽，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这句话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并不自知，毛主席的心里话，始终未能说出来。（《峰与谷》，五五页）

初次见面，对方摈弃前嫌，大加赞扬，自己却忍不住满腹牢骚，可见毛泽东的积怨很深。但这种场合，讲政治话，的确叫人难堪。师哲说斯大林的话堵住了毛泽东的嘴，斯大林还不自知；其实，恐怕斯大林也是有意的。

斯大林并非没有对中共表示过歉意。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向他说：“在你们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说没有。斯大林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党当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下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会注意到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四一四页）

斯大林可能觉得，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把话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但这个话在毛看

来，还差得远呢，刘少奇没有把意见说出来，因为他究竟不是第一把手，比较拘谨；毛则不然，他是有一大堆话要倾吐的。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似乎表示主人的宽宏大量，但是毛不需要他的宽宏大量，而是需要他的道歉。现在不是胜利者该不该受谴责的问题，而是犯错误者该不该受批评的问题。

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没有主动提他的错误，也没有给毛一个倾吐积怨的机会。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迴避的态度触恼了毛泽东。

第一次会谈，双方海阔天空，谈得很多，历时两个多小时。据当时苏方翻译费德林的回忆．“从第一次会见起，斯大林一直是很有分寸的，对客人很客气，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说话，从不分心。” (费德林《我所接处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三四页）师哲说，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他再三问：“毛泽东先生，你来一趟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初次见面，斯大林竟然不称毛泽东为“同志”而称“先生”。在这里他无意中流露出他仍然没有把毛看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肯定又使毛不高兴。

本来，在此前几个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对他表示国：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事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这个理由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不管一个国家由谁执政，都不应该用不平等条约来对待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四 O 五页）所以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心中有数的，但斯大林没有先提出，而是问客人有什么想法，这是等待毛泽东明确答覆。据师哲的分析，斯大林可能是不顾日後有人说他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为他国去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所以表现得十分谨慎；本来这时毛泽东完全可以明说的，偏偏他不正面答覆，而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为看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这样说，好像除了祝寿，就是来旅游了。

显然斯大林觉得毛的答覆很空洞，於是再问：“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这表示的相当明确了：苏方愿意和中国签订一个条约。

毛泽东仍然绕圈子：“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旧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这一下，苏联人糊涂了，全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还笑出声来。

师哲说，毛的话是“中国很有魅力妁语言，富有哲理和幽默” 但在我看来，这种绕圈子的话没有什么意思。

斯大林仍然继续委婉地询问。毛继续回避，只是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感到惊讶，寻根究底地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但毛不再回答了。

斯大林显然没有弄懂毛的用意。关于签约的问题，毛认为要苏方主动开口，而不是他向苏方提出。毛的心态似乎是，如果他先提出，就显得他有求于苏方。虽然这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毛也不愿意这样做，于是就让斯大林猜谜。斯大林以为，中苏之间如果要签订什麽条约，理所当然地要由他和毛泽东这两个领袖来签字。但毛泽东却不顾意这样做，而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自己站在比较超脱的地位。

会见後不久，斯大林又给毛泽东打电话，询问毛的打算要求。毛还是讳莫如深，只说：

“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等人来拜访、交谈，想摸清毛的愿望；他还亲自给报打电话，问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甚至还给翻译师哲打电话，了解毛的想法。然而师哲也不了解毛在想些什么。

但当陪同代表回到莫斯科的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有一次到别墅来看毛时，毛却对科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要说发脾气，就是这一次。毛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同尤金谈话，也说到“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拈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毛泽东外交文选》，三二六页）

有没有拍桌子，师哲没有说。但师哲在书中别的地方说，他在毛身边十八年，“从未看到他发脾气以至到了拍桌子打板凳的程度。”（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二三九也）那么，毛为什么要夸大其字，说自己“拍桌子大骂”呢？我想，不过是显示一下，他敢顶斯大林而已。他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做，但他确实是想这样做的。

事后，毛情绪很好，高兴地对师哲说：他这样教训科瓦廖夫，是想要他向斯大林反映毛的不满。师哲分析：科不会这样做。第一，他不大可能见到斯大林；第二，他也不敢。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是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对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管上级的态度。但苏联人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只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训斥。

果然，科瓦廖夫回去给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没有讲毛发脾气，却污蔑了一大通中国。

随后，莫洛托夫又求看望毛，再一次试图摸清毛的意图，仍无所获。

师哲的另一篇回忆略有不同，他说到在毛发脾气以后有一天，毛主席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同为什么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斯大林很愿意他自己同毛主席签这个条约，，而毛主席是想让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两位外长签，斯大林对此不理解。当时还有一件事，英国通寻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主席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後，苏联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主席要不要到外地走一走？毛主席理解这是他们为发表一条消息息，要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在去外地参观之前，苏联外交部发表了一个公告，说毛泽东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周恩来从北京出发来莫斯科。英国通讯社的这条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固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 O 年，北京，第五页）

据赫鲁晓夫的回忆，斯大林对毛汉是表现得很热情的，但是在毛逗留期间，曾经一连几天没有去看毛，也没有叫别人去款待他。“有些风言风语就开始传进我们的耳朵，说毛一点都不愉快，他被紧紧地关在屋子里，没有一国人理睬他，等等。毛传出话来说，他就要离开了。斯大林听到毛的埋怨之後，我想他又给毛举行了一次宴会，斯大林很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同毛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是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根据这里的叙述，毛的牢骚还是透露出来了一些的。所谓一连几天没有去看毛，大概不是一中故意怠慢，而是对毛摸不透。毛说他受冷遇，未免夸大。至于说斯大林不肯权签

订条约，更是不符事实的。[3]

十二月二十一日，祝寿大会，毛泽东的祝词两度评价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和毛说活。会后举行文艺演出。结束时观众一再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但是，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官参加祝寿大宴时，毛却沉默寡言，斯大林等人再怎样引逗，他也无丝毫笑意。

然后是参规、看几十部电影…………..

斯大林为了避免可能相中方产生嫌隙，又作了一次努力：他把科瓦廖夫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给他的秘密报告交给了毛。斯大林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

在这个报告中，科瓦廖夫议论中共的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反苏联美的，但中央领导还支持他们：还说到高岗如何受刘少奇打击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四 o-四一页）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反映这些材料，是想投靠苏方；斯大林这样做，党然把高岗牺牲了。这表明斯大林不愿意利用中共内部的分歧，唯恐这样做会损害两党的关系。

然而，苏方仍然摸不清毛的意图。

这眼过了十几天，什么进展也没有。其他国家纷纷猜测。英国通讯社甚至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为了辟谣，驻苏大使王稼祥建议，毛泽东以向塔斯社记者答问的方式，向外界发表谈话。一九五 O 年一月二日，塔斯社发出了一则电讯。其主要部分是：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你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往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人民日报》. 一九五 O 午一月三日）

毛终于点到了条约问题，苏方明白了。常晚八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的住处，询问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这时，毛提出了三中选择：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二，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就明双方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三，发表一个声明，讲两国关系要点。苏方当然赞成第一个办法。

毛明明知道苏方的意图，又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呢？

---

[3] 我问过曾经陪同江青到苏联治病的林利，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间那样长，是苏联方面有意怠慢他吗？林利认为不是，是双方都等待对方先说话，毛主席是等待斯大林认错。后来五十年代那次去，毛就自以为是斯大林以后的最权威的人物了。十月革命纪念节，毛主席不同主人打招呼，自己把宋庆龄、郭沫若拉上主席台，那时这两个人连共产党员都不是，苏联人有些意见，因为谁上主席台是事先郑重研究过的，中国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已经是特殊照顾了。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走后，夜十一时，毛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说苏联方面已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样，周恩来奉命到莫斯科。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并开始谈判后，有一次毛还向斯大林谈起自己在十年内战期间如何受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的事。师哲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毛突然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斯大林说了一句："啊，王大便！. 你还这么属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可是话刚开头，就被别的话岔开了。毛还是没有机会一倾衷肠。

会议期间，在一九五 O 年一月，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美国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合并到它的版图之中（苏方建议；中、蒙、苏三方个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这个谣言。一月二十一日，三国声明都发表了，蒙苏两方都是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的；中方的文件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但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发表。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认为中方没有按照事先商定的协议去做，因为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不能代表政府。斯大林对毛说："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来日方长，今后需要相互配合的事还很多，希望从这次事件吸取敦训。"这次事件虽然没有什麼大了不超，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去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也许毛在潜意识中对外蒙问题不大舒服，但外蒙独立已经是事寅，这次声明规格太低只能说是不妥，被苏方抓住了，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但毛显然觉得，他还没有批评斯大林，现在倒反过来受到斯大林的责怪，尊严受损了，一言不发。后来，毛泽东向尤金追述这件事时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睛，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们进攻。"（《毛泽东外交文选》，三二六页）

这次谈话结束后，大家坐在一个车上，前往斯大林别墅。在车上，空气很僵。师哲想打破沉闷，同斯大林闲聊，谈到斯大林要不要到中国代表团住处去做客的事。毛问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让他到我们那里做客。"

师哲承认所谈的正是这件事。

毛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这个话是很任性的。怎么能这样做呢？连起码的礼貌都不顾了。

斯大林似乎猜到毛和师哲谈的事涉及他，就问师哲："他说什么？"师哲把话岔开在那天斯大林我客人举行的晚宴上，毛不说不笑，气氛特别冷清。

这种情况会使斯大林有什么感觉呢？显然，他会觉得毛泽东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

在这种場合，周恩来做什么？

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個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伐和情调。然而却病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四五八页）

我援引这一段，是为了让读者看出，这就是周恩来扮演的角色。直到"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扮演这样的角色。

这一次中苏谈判，问题下在苏方的怠慢，而在所订的条约是有些不平等的，尽管和苏联同国民党政府订的条约比起来要好一些，但并没有完全的平等这也是苏联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态度。[4]苏联取得了特权，斯大林怎么会“死不肯前字”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很快就谈好了。同时还商谈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贷款给中过等两个协定。根据贷款协定，旅顺决定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作为购买苏联机器之用。苏联缺乏稀有金属，特别是钨、锑等，在条约附件中讲清楚了，我们每年要向苏联提供多少钨等稀有金属。一九五 O 年二月十四日签字。（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经过》，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二一页）

之後毛周都回国了，李富春和伍修权留下来同米高样谈经济问题。其中关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问题，苏联恃强压人，不按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平衡，得出指数，找出差距，确定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比值，压低人民币比值的办法，要我方同意。我们很不高兴，发生争執。经请示中央，中央说照顾大局吧，最後作了让步。（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经过》，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一三页）

伍修权还回忆道：按照协定，苏联应将中长铁路经营管理权、旅大的苏军根据地及其设施，全部移交中国政府。而苏方坚持要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交还，最後协议至迟不超国一九五二年底。后因朝鲜战争末结束，我方主动建议苏罩继续驻守旅大。一九五三年七月朝觧停战，一九五五年苏军从旅大撤离。苏军撤走后的武器还算了钱，是否要钱多了？但当时我末主动还价，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一四页）

毛之所以在苏联滞留三倜月之久，除了他有意和斯大林捉迷藏外，也由於他想利用这时间多作一些观光。这一点在他答塔斯社记者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到苏联。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接觸看，斯大林的表现是热情的，有礼的，谨慎的；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就是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和开始时称“先生”。毛泽东却显得不坦率，不落落大方，有些小气，有时甚至任性。如果说毛心里有芥蒂，这可以理解；然而那样的表现，却是一种不健康心理的流露。他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中对斯大林的显赫地位的嫉妒呢？

毛后来回忆说: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国《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 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後就更不高典了，在莫斯科的畤候和他吵得很属害。斯大林有脾氛，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毛泽东外交文选》，二五九页)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5]，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同上书，六三五页)

[4] 国际上普遍认为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很少，就明两国关系并不是那么好。有的说，中国想的到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的贷款，可是实际上只得到三亿美元，还不如不久前苏联给波兰的贷款多（引子《苏联的外交政策》一三五- 一三六页：费伊托《中国与苏联》. 七三页），这个话说得不对。三亿美元是中方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五O年一月三日给中央的电报说：“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多借不如少借有利。”（《毛泽东外交文选》. 一二二页）

[5] 指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造船公司这四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於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後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同上书，三二三–三二四页）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了了几次，架子都很大。（同上书，三二四页）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同上书，三二六页）

有三件事：第一、二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减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减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们进攻。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就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０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让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八六页）

毛还在个报告告中批评王明等人“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八三页）“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八四页）说斯大林和王明等人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甚至把他们杀了，这其实是说得不对的。斯大林和王明要杀的人大部分并不是犯错误的人。

一九五六年九月，毛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是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批评斯大林，我们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毛泽东外交文选》，二五二页）

毛说中共有四次吃斯大林的亏，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派王明回国，搞右倾路线，一切服从国民党。第三次是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和罗斯福、邱吉雨签订《雅尔塔协定》。“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部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同上书，二五二-二五四页）

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就像毛的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一样。毛小时反抗过父亲的权威，他胜利了。这件事对毛的性格影响很大。过去，王明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做后台，毛抵制过他，得到了胜利：现在，毛直接面对输了牌的斯大林，为什么就不可以对这个庞然大物顶一顶呢？

（一九九七年六月）

第六章　怎样总结苏共教训？

中国人习惯于说“文革”是“史无前例”，但这不应当了解为它在历史上是没有渊源的。无论是苏共的历史还是中共的历史，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都是屡见不鲜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多次发生，却从来没有当做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把真相公布於世，引起公众的注意和齐声谴责，直到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做他的有名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国际上的大事是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报告。在国内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提出了“双百方针”；中共八大召开；《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二，七四九-八 o 八页）这个报告像一颗原子弹，引起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普通人民的强烈震动。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他透露了许多惊人的内幕，包括斯大林把一九三四年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的一千一百零八名（一半以上）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逮捕，把这次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四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九十八名（百分之七十）打成“人民公敌”而枪毙。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第一届政治局成立到一九五三年底，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有十九位先后逝世，其中只有六人是自然死亡（斯维尔得洛夫、列宁、古比雪夫、加里宰、日丹诺夫、斯大林），其馀十三人中，九人被判死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鲁祖塔克、布哈林、季可夫、柯秀尔、丘巴尔、沃兹涅辛斯基、贝利亚），二人自杀（托姆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二人被暗杀（基洛失、托洛茨基）：　报告谴责斯大林在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没有正当理由，就去实行异常的大规模恐怖活勤。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从一九三六年後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这是在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下进行的。赫鲁晓夫问：“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是不是真的那样危险呢？”他用事实说明不是这样。“这种恐怖行动并非专对已经失败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而是施加在党和苏维埃埃国家的真正活动家身上。”为了使这种迫害合法化，斯大林发明了这个理论：社会主义越是胜利，敌人就越是增多：

斯大林要抓什么人，就说这个人是“人民公敌”。内务部根据斯大林的意图拟定名单，事先就判好刑，然後送斯大林批准。“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共有数千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以及阶级部门的活动家三千八百三十一份名单交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批准了这些名单。”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出於自己的猜疑心以及别人的挑拨中伤，对许多军队干部也实行了镇压，“他们包括从营长、团长，到高级军官。在这个时期，那些在西班牙及远东战争中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差不多全被消灭了。”

三十年代的大逮捕起因於一九三四年底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的被暗杀。斯大林说

这是季诺椎也夫集团的阴谋。一九三六年八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被控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秘密恐怖中心，策划杀害了基洛夫，并准备下一步暗杀斯大林，这十六个人全部处死。从此开始全国性大迫害，接着，一九三七年一月进行第二次大审讯，指控皮达科夫、图哈切夫斯基等十七人是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领导人，勾结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经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的活动，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这十三个人同样被枪决。

当时斯大林号召，全国人民和共产党员，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需要的。 于是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诬陷和告密的狂熟。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务法说明的地方。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警卫工作的某个人的协助。刺杀发生后的一个半月，这个刺客被捕，但很快就被释放。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工作人员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被传讯，但途中死於车祸，而同车的其他人却无一伤亡。内务部列宁格勒分部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一九三九年全部被处决。这使人怀疑是消灭罪证。

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补充说：刺客在行凶前层受到契卡的注意并加以拘留，发现他带有抢枝，但因某人的指示两次释放。车祸是提审人员故意制造的。“就这样，保卫基洛夫的人被打死了。然後，那些杀害这些人的人也被抢决了。这事绝非偶然，这乃是预谋的罪行。谁可能干这件事”赫鲁晓夫没有下结论，但他的所指是很清楚的。现在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是：一九三四年，因为党内有人不满意斯大林，想台出基洛夫来接替斯大林的位置。基洛夫威信很高，获得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一致拥护。在当年二月的苏共十七大上，受到全体代表的熟烈鼓掌的是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只差三票就是全票，而斯大林有约二百七十人没有投他的票。这样，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基洛夫的威胁。

斯大林独断专行，自居于当和人民之上，根本不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放在眼里，许多决议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许多决定没有通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他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相隔了十五年。

他践踏法制，指示采取残酷的肉刑手段来逼迫口供。他说：“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关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用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探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于是，一件又一件的假案就这样制造了出来：“列宁格勒阴谋总部案件”、“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运动组织事件”、“医生谋杀案”……. 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如曾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层当选党中央书记和担任国家保安机关的监察工作的库兹涅佐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鲁祖塔克，还有柯秀尔、丘巴二、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等党和国家的优秀活动家被谋害：

赫鲁晓夫报告说，两年来已经为七千六百七十九人恢复了名誉；党然，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

斯大林的迫害不仅针对个人，他还强迫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卡拉恰伊人、车臣-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全部迁移到其他地方。赫鲁晓夫没有说到的是，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远东的海参威、伯力等地的中国侨民全部迁移到高加索一带，还把其中一部分驱逐到新疆。（李正文《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赫鲁晓夫揭露露了斯大林如何喜欢自吹自擂，如何鼓励个人崇拜，如何陶醉与文学艺术中的歌功颂德。

人们可能会诘难；在那时，你们中央委员会这帮人在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不及时反对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解释说，在列领去世后，斯大林为捍卫列宁主主义行了激烈的斗争，威望很高，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开始滥用权力；谁要试图起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这个人必然成为镇压行动的牺牲品。何况，在斯大林晚年，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过全会，政治局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会。

赫鲁晓夫还认为斯大林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因为这些老同志了解他的底细。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稍稍和缓了对斯大林的谴责，他说：“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

斯大林的迫害不仅针对个人，他还强迫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卡拉恰伊人、车臣-印古什人、巴尔卡二人）全部迁移到其他地方。赫鲁晓夫没有说到的是，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远東的海参威、伯力等地的中国侨民全部迁移到高加索一带，还把其中一部分驱逐到新疆。（李正文《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赫鲁晓夫揭露露了斯大林如何喜欢自吹自擂，如何鼓励个人崇拜，如何陶醉与文学艺术中的歌功颂德。

人们可能会诘难；在那时，你们中央委员会这帮人在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不及时反对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解释说，在列领去世后，斯大林为捍卫列宁主主义行了激烈的斗争，威望很高，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开始滥用权力；谁要试图起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这个人必然成为镇压行动的牺牲品。何况，在斯大林晚年，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过全会，政治局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会。

赫鲁晓夫还认为斯大林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因为这些老同志了解他的底细。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稍稍和缓了对斯大林的谴责，他说：“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改变了这个说法。他说，“有人争辯道斯大林的动机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出於利己主义的目的。真是疯狂透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竟把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置於死地！”大概这才是他的真话。（《赫誉晓夫回忆录》，二九页）

对于苏联清党时期的恐怖气氛，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说：“那些年，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在全体苏联公民的记忆中是一个精神上非常苦恼的时期，这种苦恼是由于许多不加说明的逮捕和这些逮捕引起的猜疑所造成的。人们在夜间被抓走了，从此不知下落。”斯特朗还谈到，被抓的常常是那些不该抓的人。她所在的《莫斯科新闻》编辑部就被抓了三个，而这三个恰恰是最有能力、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七四-七五页）

当时也在苏联的师哲这样说:“那时的气氛使人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人人顾虑重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清党、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大喊大叫，造成了不由分说的局面。其做法也是这样，只要有人控告，写匿名信揭发，甚至仅仅是提出怀疑，不管你的资格有多劳，即使是列宁时代的党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即使是中央委员、苏维埃代表、党委书记、部长，还是党外著名人士，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可随时被逮捕、关押、审问、判刑，甚至可能被枪决。”（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八 0 页)

师哲举了一个亲身的例子：有一天一个年轻人约他去打网球，马上就有人告发，说这个年轻人是同日本领事馆的一个官员打球，这个人一时想不开，就拔出手枪自杀了。

当时不仅大抓国内无辜者，而且共产国际的外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苏联人民内务部把共产国际看做是外国间谍打入苏联的主要渠道，不仅抓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苏联人（本书曾经说到的米夫，就是在这一次被捕的），而且抓外国同志，给许多外国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人、曾任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际领导人的库恩 •贝拉被捕并被枪决；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十二名委员。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是全罩覆灭，连波共也被解散了。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全部领导人都被捕；铁托正好回国去了，所以幸免於难。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也全部被捕，多数被枪决。德国共产党人因为逃避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大批地逃到苏联。结果逃脱了法西斯的魔掌，却没有能逃脱斯大林的铁腕。一九三二年四月底在共产国际德国代表处登记的成员中，至少有八四二人被捕，其中有三名德共政治局委员牺牲。牺牲者还有德共中央书记等重要成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九期《莫斯科杂志》说：

如果我们说，每一个住在国外的日本人都是间谍和每一个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特务的话，这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夸张。

当时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还有一个李正文，他是在十一月被捕的。他因为懂一点日文，就被党做日本特务嫌疑而判刑，送到劳改营，在冰天雪地的苏联最北部劳动-每天劳动十至十二小时，还吃不饱。他说：

一九三五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所以，从这个时候起，苏联人被捕的凡是到过外国的，例如参加过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据我所知，加俞、鲍罗廷、阿基莫夫夫妇等，都被抓起来判为日本间谍，多数处以极刑了。凡是到过欧洲的外交人员，都被判为德国希特勒的间谍了。在苏联的外国人，包括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除了少数像王明、康生之流每天给苏联写诬告信的人之外几乎全部被捕。我住在蔡特金住过的那个招待所里，共四男三女，只有一个女的每周定期向上面写诬告信而受到优待没有被捕外，其他四男二女先后被捕。据我在监狱和劳动改造营所见，凡是东方人都是日本间谍嫌疑，凡是西方人都是德国间谍的嫌疑，因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特别会议”只好用“嫌疑”的罪名来判罪了：当时被抓的人当中，苏联人没有出过国的，则按地区分，住在亚洲的部是日本间谍嫌疑′住在欧洲的都是德国间谍嫌疑。（李正文《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单单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的大逮捕就高达五百万人之多。有人估计，在老改营里，服苦役的政治犯，至少一百万人以上，很可能达到三百万人。

沃尔科冈诺夫写道，整个卫国战期间，我们损失了近六百名将军，而斯大林在一九三

七--一九三九年期同消灭的高级将领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军队中共镇压了四万三千名指挥人员，多敷在四十岁左右，授过勳，是军队的精华。（参看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六三--六四页）

斯大林并非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样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可能使人们觉得太过分了。一九三九年，他在达到目的之后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上讲了一大通镇压“人民公敌”和清洗“蜕化变质分子”的必要和伟大成绩后，但又不得不承认：“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五七页）死了那么多人，斯大林却仅仅表示了一下“遗憾”。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清党呢？仅仅是由于他疑心重吗？仅仅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吗？

许多人愿意从好的方面来解释这一点。但是这是解释不通的。让我们从斯大林的女儿叙述的一件事来看。斯稚特拉娜和一个戏剧作家卡布勒尔谈恋爱，斯大林知道后打怒。他下令把这个作家抓起来，并且对女兄说，卡布勒尔是个“英国间谍”。那么证据呢？没有。卡布勒二多次出过国，并且认识在莫斯科的级乎每一个外国记者。这就够了。从斯维特拉娜的书中看，她的父亲并没有向她说明，她的心上人何以是间谍。但不管怎样，卡布勒尔整整十年失去了自由。自然，这对恋人被拆散了。很明显的是，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卡布勒尔是什么间谍而不许女儿同他恋爱，而是因为反对女儿的恋子而随意给卡布勒尔安了一个间谍罪名。（参看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十六章）

师哲说了一句他看到的情况，肃反除了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以外，也“助长了个人迷信的大展；那时，人们心目中最正确、最英明、最神圣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斯大林，大家只需要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话就够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八三页）

斯特朗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随着年龄和权力的增加，他变得更加多疑、更加专断、更加确信对他的最轻微的一个字的违背就是反革命。有人会诊断说这是自大狂：我认为这个名字不恰当。我宁愿说：“权力是会腐蚀人的……没有任何人像斯大林一样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享有这样大的权力。（安娜，路易新·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一四一页）

政治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大祸害。这不仅是斯大林发明的，它是从沙皇时代的“黑百团”中产生，并在列宁时代的“恐怖”中培育起来的。……这样的恐怖曾经伴随其它革命而发生，其中包括美国的和法国的革命。但是设立政治警察比废除它要容易。统治者发觉它有用，能够用来牵制持异议的人。因此，在一九二二年准备把政治警察下交给地方政府领到时，斯大林却决定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同上书，七八页）

斯大林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成功地使人民相信了这样做的必要。斯特朗记述了她的两个朋友的说法。一个说，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个嫌疑犯，但不能确定谁是叛徒，那么就该把所有的人都杀掉，而那九十九个无辜人应当宁愿死去也不能让一个叛徒活着。另一个人对斯特朗讲了一大通世界革命的道理，强调苏联对于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结论是“那些怀疑的人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叛徒”。（同上书，七九页）这番会竟使斯特朗哑口无言。

后面这个人是中国人熟悉的，他就是曾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共产党的包罗廷。他在一九四九年大约和斯特朗同时被捕，後来死在集中营中。

李正文证实，这种观点是普遍的。“这是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预防措施。因为隐藏起来的危险敌人是不容易分辨出来的，只有把所有可疑的人都抓起来，以免漏掉一个敌人给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造成无穷的损害。因此，我们这些人就应当为保卫苏联这个无产阶级祖国，牺牲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逮捕。”李正文还叙述，他在狱中碰到陈郁。这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共产党员劝李正文不要去给斯大林写什么申诉书，说：

我们不要写申诉书。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即将向苏联进攻的时候，他们派来大批潜伏特务，使得我们的阵营里面，敌我难于分清；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不要因为释放我们而让真正的敌人混出去。我们这一辈子的冤枉，认了！（李正文《苏联肃反扩大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对革命忠心到这种程度，也近与痴愚了。难道自己不是革命的一分力量？难道因为难于分清就不要分清？难道杀害革命者不正是敌人要做的事情？即使在战争中，目的也不是仅仅消灭敌人，而且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正是为了保存自己。如果用牺牲两个或更多的人为代价来换取消灭一倜敌人，此外毫无所得，这难道能说是打了胜仗？

陈郁这样的共产党员把革命和斯大林看得高于一切，革命就是斯大林，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忘掉了革命只是手段，下是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为大众的利益牺牲是值得的：毫无必要的牺牲则是不值得的。既然他们自己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如草芥，那么领袖对他们就更可以生杀予夺了。陈郁这种思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盲目地相信斯大林在当时是普遍的。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在临刑时遗高呼“斯大林万岁”！他仍对敌人是有充分的警惕性的，对共产党的领袖则从不怀疑。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愚忠的态度培养了“革命的”暴君。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愚忠的追随者，斯大林的神话才有市埸，斯大林才能为所欲为。

斯大林为了给大规模的清洗制造理论根据，用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这个观点；在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後，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三六页）斯大林说：“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斯大林选集》下卷，一四 O 页)又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消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北京，四七三页）

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斯大林作苏联宪法草案报告时，他宣布：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法生了变化，“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他们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除。（《斯大林选集》下卷，三九四-三九六页）

仅仅几个月以後，一九三七年三月初，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讲话，题为《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断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中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一二一页）

既然宣布了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界限正在消除，他们之间当然不会有什么矛盾和斗争：如果有什么斗争，那就只能是存在人民和敌对的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可是已经宣布了剥削阶级的消灭，怎么办？于是就说还有“残余”。一点点残余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他们必定是受外国敌对势力雇佣：按照这样的逻辑，斯大林说，“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

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敌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斯大林文选》上卷，一一八页）他再次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轮”，再次强调：“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加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行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斯大林文选》上卷，一二九页）

最初，斯大林只是就路线和政策问题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争论，包括阶级斗争是否激化的问题；到後来，斯大林的论敌都变成阶级敌人了。把党内正常的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又把自己的对手当作敌对阶级的代表而加以消灭，这是斯大林发明的办法。

毛泽东的反应

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一个轩然大波，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善良的普通人，赫鲁晓夫报告引起了巨大冲击波。世界舆论大哗，各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评论文章。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问题？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在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出现，而在第一个社会主一国家出现呢？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或者这仅仅是由於斯大林个人的残暴性格吗？这种现象可不可以避免？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左派知识分子都在思索这一问题。许多有名的作家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动摇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防止的办法。

然而在一片惊呼声中，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很冷静。

如果中共抓住这个机会，很好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那么后来的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共准备这样做吗？

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应当感到满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比斯大林高明。但是，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见，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五页）后来，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又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害了毛泽东，因为毛正要搞对自己的崇拜。适才是毛的真正所“惧”。

斯大林这个偶像倒下去了，按照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观念，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继承他：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袖才能和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那么，谁有这个资格呢？

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

现在，斯大林已经下再是毛的对手，赫兽晓夫也没有破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泽东。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中万人膜拜的威风。

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应，是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毛泽东指示："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封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入迷信怍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七页）从毛的这个意见看，毛并不觉得在中国有个人迷信问题。从讨论会上的发言看，并没有什么分歧。文章在发表前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6]

《一论》分析了个人迷信的社会根源，认为个人崇拜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腐朽遗产，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

二十多年後，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说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

《一论》表示了对苏共的支持，说："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主义的伟大生命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午·北京，一页（"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都争。"（同上书，七页）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所谓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去掉。"（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八-一九页）。

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在评价"毛泽东思想"时，却下允许说毛泽东思想包含错误，而说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的东西。

一个值得注意的小地方是，苏共用的"个人人崇拜"这个词，中共后来则改用"个人迷信"。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这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恢复名誉埋下了伏笔--"迷信"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好的；而"崇拜"就不一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心思想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中有一节"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在这里说："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至于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但是毛指示，"真凭实据的反革命，

[6] 关于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起草情况，参看吴冷西《忆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修改情况，参看李捷《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 收入《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查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審判”，既然是“真凭实据的反革命”，为什么不捉、不起诉、不审判呢？法院不审判，谁束判定是“真凭实据的反革命”呢？毛泽东把清查和处理反革命的权限交给机关、学校和部队的党委了，这是违反宪法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通过两年。这种做法看起来宽大，其实隐藏着危险：如果可以不抓不关不杀的人也可以是“反革命”的话，那么给一个人定为“反革命”就不算回事了。

毛没有提到他在一九五四年做出决定，把胡风一伙作家打成“反革命集团”的事。胡风是由法院盘了刑的，逼是一椿冤案。这里毛想避免斯大林抓人杀人太多的错误，但是他和斯大林一样凌驾在法律之上。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大会在对这个报告做出的决议中说：“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鉴于苏联的教训，八大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两个新问题：一个是执政党的考验问题；一个是防止个人崇拜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新党章的党纲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他指出，这种地位容易使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因此需要实行党内的监督和来自党外的监督，需要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邓还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恪的监督”。

关于第二个问题八大的党章总纲针对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思想，提出：“任何政党和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封于塑料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明线，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接着说，在中共党内，长时期内，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已形成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一旦发现，就要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接着，他把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的一大段话念了一遍，并高度评价了这个决定的意义和作用。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在承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从来没有否人领袖的作用。瓴袖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这位总书记继续说：在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禁止给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等。党中央也历来反对向领导人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人的作用。

“当然，个人崇拜是一中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这个报告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对个人崇拜的反对态度，一方面又冲淡了这个问题对中共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不要因此否认领袖的伟大作用；中国人民对领袖的爱护是正常的，并非把领袖神化．个人崇拜在中国只是有某些反映而已，而且中国共产党早已注意这个问题了。总之，封个人崇拜问题虽然要讲，但不必过分担心。

但是有一件事肯定使毛很不高兴，尽管他末便表示出来。那就是在苏共谴责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八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提法，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这是彭德怀的建议，他一提出就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彭德怀在“文革”中承认：“五六年八大师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删掉的好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彭德怀案件专辑》，香港联邦研究所，一九六八年．四四五页，转自麦克法夸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求实出扳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一八-一一九页）。

刘少奇昀八大政治报告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和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用很大篇幅盛赞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刘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刘少奇选集》上卷・三三三页）

毛泽东当时只能和大家一起表示同意。但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个人以后的厄运，难道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吗？

斯大林践踏人权，杀害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人们部下能不深思，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暴行？这是毛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毛不愿由苏联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联系到自己。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多事之秋。

一九五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在普拉市向伊斯特拉地区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讲话。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铁托说，这“不仅仅是个人迷信问题，而是一个使个人迷信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问题”。“这些根子在哪里呢？在於官僚的机构，在与领导方法，在於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他谴责霍查、澍胡和东西方一些党的领导人，“他们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们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力，他们今天正在努力恢复这个制度，并使它重新占上风。根子就在这里，这是需要纠正的（《铁托选集》一九五二-一九六 O，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一一九-一二 0 页）

铁托没有谴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相反，他认为不应该停留在这里，不应该把整个问题归结为单纯的个人崇拜问题，而应该进一步从制度上追究错误的根源。卡德尔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也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

这时的毛泽东也在思考和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他不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认为赫鲁晓夫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他也不同意铁托的看法，认为不是制度的问题或路线同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 “我看有两把刀子刀：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二一-三二三页）毛没有提到斯大林这把刀子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毛还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二三页）在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扩大民主，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南斯拉夫的。文章提出要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相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把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文章说：“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大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是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北京，二三页）

文章指责斯大林“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这个制度不好；恰恰相反，是这个制度被破坏了。至于制度制度为什么会被破坏，文章说，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不巩固，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关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还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人们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斯大林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为的根源。”（同上书，二四页）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铁托同志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后，再一次使人民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覆的问题。 ”中篇文章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立场问题。它说：“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这包括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中，帝国主一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共产党舆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属于后一种。（同上书，一四一页）

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於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

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焉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上书，一六 -一七页）

这一段文字是经过毛制度反覆修改过的，可以看做是毛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最初表述。文章还说，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我们的团结尤为重要。“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或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毛泽东含蓄地表述了这个意思：铁托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因此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是，对于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对待的斯大林，为什么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是“伟大的”呢？

在叙述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所谓“清党”或“肃反”时，《再论》批评斯大林“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蜕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又说，斯大林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上书，二二页）

这种措词小心地把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功过保持了平衡：一方面，又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反革命，也冤枉了“许”好人；“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一论》还是《再论》，都没有把斯大林鼓励个人崇拜的问题放在应该有的重要地位。《一论》中还说了几句反对个人崇拜的话；到了《再论》，却几乎没有了。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只是说“他开始迷信个人智慧和权威”，以及说苏联共产党在“破除斯大林的迷信”等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勇气，此外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话就一句也没有了。

可以看出，在毛的潜意识里，是不喜欢提反对个人崇拜的。

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把斯大林的罪行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予以原谅和开脱，把对斯大林的罪行的批判动作妨碍团结和没有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来反对，这正是毛的这个学说所要起的作用。照毛的说法，在共产党内部的肃反，无论主持其事者陷害或冤枉多少人，也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他不是敌人的间谍或潜伏的暗害者，他仍是“同志”. 应当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例如李韶九、夏曦、康生)；但如果农村的某一个小地主不守规矩，“乱说乱动”，哪怕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也要马上制裁。

毛泽东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并不指这些人，而是指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人，虽然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不同。毛的这个观点为打击不同政见的同志准备了理由。

这样，两个共产党的领袖，铁托和毛泽东，分别对斯大林问题做出了不同的总结，引出了不同的教训。铁托认为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相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而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斯大林的骄傲相思想方法问题。铁托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路线性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路线问题，是第二位的。

我们来考查一下《再论》的这一句话吧：“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

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雕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

这一句话的逻辑是混乱的。“后期的一些错误”何所指？本来，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也是错误，可是从句子看，似乎没有把这包括在内；那么．“一些错误”大概仅仅是指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了。就是说，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是因，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的恶性发展是果。可是难道后者的发展过程不也是前者的发展过程？如果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作为其原因的脱离群众和破坏民主却只限於“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其实，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的事实本身就说明，斯大林的脱里离群众和破坏民主制，已经到了严重脱离和完全破坏的地步。为了说明“一些错误”的发展，文章举出了另一些错误，但另一些错误的发展过程同样需要说明。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要害问题在于：为什么斯大林一个人能够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党和人民不能去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任其发展下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能蜕变成为一种专制制度？这个问题被文章作者回避了。

文章作者认为单是客观原因说明不了斯大林现象，强调斯大林本人是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後，中共又面临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这时他们却强调经验不足，错误难免等等，而不用毛泽东和中共评价斯大林的方法，强调个人因素了。

斯大林现象之所以产生，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斯大林的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有性格问题和个人品质问题为什么不指出斯大林的残暴呢。因为这会使中共尴尬提出“残暴”，就不能归因于认识根源，而要找阶级根源了，按照党的教条，“残暴”只能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领袖，怎么好说他有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呢？

同题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一国家的领袖在产生了骄傲和主观主义，脱离了群众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以后，竟然没有任何力量制止他，因而使他能绚继续这样做下去，一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呢？

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中共的文件想都没有想到主观问题。中共要从社会历史找跟源，但不从现实制度找根源；从个人的思想认识找根源，但不从个人的性格找根源

从文章的某些话来看，中共似乎是想接受教训的。《再论》说，这些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怍一种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个话说得很好。但是，如何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呢？只是提高共产主羲觉悟就行了吗？只是要求领导人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就行了吗？

支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思想是：他们要保护斯大林，保护那个苏联摸式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铁托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和苏联的制度有关。毛在《再论》中反驳南斯拉夫的观点说：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

於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

一个党的领导，一个民主集中制，在毛看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它们只属于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中根本的东西，是万万动不得的。企图改变这两个东西，就是修正主义思潮。毛在《再论》中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

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於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於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

这种思潮包括“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对苏联“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三三–三三四页）

当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在中央范围内进行了讨论；随後在省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由刘少奇报告中央对斯大林问题的观点。至于在广大党员中，只是对秘密报告作了口头传达，并没有发下文字材料，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的罪行究竟是共产党内的一件丑事，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还是少谈为好。

中共只是要党员学习《一论》、《再论》．并在党内造成一种看法：还是我们的党水平高。世界上其他党都只知道谴责斯大林，只有我们党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认识上的原因，并且肯定了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在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九七页）

毛泽东可能自以为，这才是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其实，这种话等于没有说，因为“错误”一词的含义，就是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如果人们问：“什么是错误？”这样回答是可以的；如果问为什么犯错误，这样回答就不行了。人们还会问：“为什么主观跟客观实

际不符合？”国内多年流行的哲学课本和读物，就是把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于“主观不符合于客观”．以为一切错误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没有弄懂或违背，“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是存在的反映”这个原理，其实是很幼稚的。

一九八 O 年八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回忆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国，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九三页）

这是人们第一次得知毛泽东说个这样的话。邓小平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是因为他要论证制度的重要性，但他说出这样的话，却在无意中改变了中共国去的立场。邓没有告诉我们毛的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从这句话来看，毛泽东是明白问题所在的。英、法、美都是宪政国家，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如果有人像斯大林那样滥用权力，早就被赶下台了。可见，要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答案本来是现成的。但毛的这个话在以前从未见诸文字，而见诸文字的话是和这相反的。《再论》批评铁托，恰恰是因为铁托认为斯大林问题的根子在於制度。为什么毛没有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呢？为什么毛公开说的话和他的没有袋表的活相反呢？原因是不难想到的：这是出于某种政冶的考虑。如果毛表大了这样的思想，岂不是美化资本主义了吗？对于毛来说，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哪怕是斯大林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何况，毛本人也像斯大林一样是一个喜欢集权的人，他绝不能容忍中个实行英美式的民主。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第七章 一九五七年：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反右派

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五六年一月份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表明这个问题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共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中共在成立初期，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后来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大批农民于是进入党内。党的领导骨干逐渐变属以农民出身为多。从成分看，中共已成为一个农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拥入延安。在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这一部分人成为批判和审查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恭恭敬敬为工农服务，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在党内的地位是低于工农的。革命战争胜利后，共产党进了城，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吸收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政，工作重点由农村转人城市，不能不大批使用知识分子。共产党接管了许多工厂和文教单位，留用了其中的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要来领导他们，和他们共事，于是，相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突出起来。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既有自卑感，又有不服气的情绪。他们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现在起用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过是坐享现成罢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惯、语言、作风，都看不惯，觉得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有的干部喜欢在讲台上说。“我是大老粗”，表面上是自眨，实际上是自傲。

在知识分子方面，尽管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很多切身的利益，可是，他们普遍对共产党有一中敬仰和感恩之情。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悔，多数知识分子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他们信仰过别的主义，尝试过走别的道路，可是失败了。现在他们不能不承认，是马列主羲和共产党拯救了中国，使中国站起来了。他们也

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的廉洁和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在共产党面前，他们“自愧弗如”的情绪，一种自卑感。尽管他们有知识，可是不懂马列主义；而且毛泽东对他们说，这种书本知识是没有什么用的。在共产党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面前，他们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他们不太了解共产党；共产党那一套，他们也往往觉得不能适应和不习惯。

五十年代，中共面临近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在客观上迫切需要采用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因而需要依靠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开始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农民地位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问题。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推翻国民党的战争和土地改革。作为一个农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能领导这个向工业国的转变吗？如果要能够，共产党必须改变它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使自身来一个大转变。

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周恩来是少数了解和关心知识分子的人之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一个全面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周恩来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要了解他们，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三、要继续改造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但是，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

四、世界科学在最近三二十年中有巨大而迅速的进步，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科学水平。为此，要在三个月内，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计划。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周恩来以他实干家的严谨和细致，不进提出方针和任务，还定出了具体措施（保证知识分子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加强图书档案技术资料的工作，扩大高校招生名额，成立中国专家局，政府各部迅速建立必要的研究机构，等等），以及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总工会等部门的分工和责任。如果照这个方案执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的意义不在毛的双百方针之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科学技术革命问题。但这个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计划后来由于毛泽东的干扰而未能实现。当世界先进国家在进行技术革命的时候，我国在进行的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七 O 年代末，才惊悟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而我们已经耽误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当时，毛泽东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在这个会上，他一改延安时期轻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批评有人说的“不依靠知识分子也行”。他强调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五月，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心思想是把国内外一叨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月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九月，召开党的八大。大会宣布，我国去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确定了在积极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这一切，揶是吸

取了斯大林问题的经验教训，为探索走我国自己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毛泽东总结苏联经验

毛泽东认为实力的经验，苏共没有能力来总结；现在这个任务落在他头上了。

其实，避免出现斯大林的错误，中国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宪法。

中国在一九五四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宪法的颁布，理应标志着急风暴雨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时期已经结束，进入正规化的和平建设时期。过去主要是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和指示办事，今有应强调法治，强调一切遵守宪法和法律，共产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合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这种权利，政府是不得侵犯的。如果公民犯了罪，就要按有关法律去处理。但宪法和法律不是只要老百姓遵守，政府和共产党也要尊守。任何人都不能凌驾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只要这样作了，就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然而毛并没有循着实行宪政民主的思路前进,他不能也不想摆脱列宁主义的思维模式;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党的领导。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毛的领导，它高于宪法，高于法律。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个方针曾经在知识界引起了热烈的响应，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好像是一项毛泽东的新创造。其实，一九五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早已明文规定了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了：不但如此，宪法还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毛泽东本应该重申共产党遵守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但他却把艺术和科学的自由挑出来，当做党的一项政策，恩赐给群众。这是一个倒退。人们对双百方针的欢呼，只是表明宪法被遗忘了，只是表明毛泽东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如果这种自由是建筑在个人的权威和党的恩赐之上，那它就成了靠不住的东西。领袖和党既然可以制定这样的政策，那也就可以收回这样的政策。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宪法之所以被遗忘，因为它没有真正实行过。五四年宪法颁布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胡风等一批无辜文化人身陷囹圄。这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违宪事件，而决策者正是宪法起草主持人毛泽东。这里的教训何在？看来不是有了宪法就万事大吉，还要解决一个监督执行的问题，如果发生违宪事件谁来追究和审判的问题。苏联也在一九三六年制定了宪法，监称之为斯大林宪法。用个人名字来称呼宪法，这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斯大林宪法，就遭到了斯大林本人的破坏。问题在于没有制约斯大林的力量--谁也管不了他。个人凌驾在宪法之上，领袖凌驾在人民之上，这就是恩格斯说的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这就是异化。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要真正实行宪政，正应该从这里出发来考虑问题。

然而，毛泽东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认为应当靠党自己来纠正错误，而不是对党的领导加以限制或提出质疑。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一些地区发生罢工、情愿事件，人数少则十多人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有万余人卷入；几十个城市相继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情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兰州一个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三百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六十多人，认为他

们是反革命。有些地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刻意求快，违背农民意愿，结果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浙江省农村发生情愿、殴打、哄闹等事件一千一百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地方党委处理闹事时，动不动就就是阶级斗争，是反革命捣乱。广东一个县的县政府不顾群众的反对，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疯病院。结果，恼怒的群众把麻疯病院的房子拆掉。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警察开枪打死五个人、打伤九个人。

这种闹事，虽然是在和东欧的波匈事件差不多的时间内发生，但是性质是不同的。波兰和匈牙利有民族问题，长期受苏联控制，人民不满意。中国没有这个问题，这些闹事是非政治性的。

在这个期间，毛有一系列讲话，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在此以前，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合议上，都讲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是在党内讲话，有些话讲得更坦率。现在我们把这几次讲话合在一起看毛的观点。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中心内容是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评自我批评）来解决。毛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远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合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然而毛泽东认为这种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这就排除了改革现行制度的需要。其实，毛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苏联实行的那种模式，在经济上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的民主集中制。毛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还可能有另外的模式。

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科学和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

毛分析闹事的原因，说是由于少数人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另一个原因则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教育，这些群众往往只注意当前的、局部的利益，忽视长远的、国家的利益。

毛指出，在对敌斗争胜利后，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许多干部不善于处理这类矛盾，往往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犯错误。毛批评了地方干部对闹事的处理方式，说他们“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足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的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二五页）“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

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二六页）

关于闹事问题，毛说，不要怕。他分析闹事的原因有三条：一、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二、工作方法不封，太生硬：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存在。对闹事的态度'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除了大规模的真正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五三-三五四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同题。……对于脑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敷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九六页）

这个思想是开明的。

这个报告的开放态度，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

毛在讲话中强调孰行放的方针。

讲话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部分，是整个报告的重点部分之一。毛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毛说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他自己的中国革命理论如何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制，下是吗？他的观点曾被那些来自莫斯科的留学生讥笑为狭隘经验主义，他们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其实，毛的这种心态，存一九五四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对文艺界的一些党员干部压制小人物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的批评感到愤怒。

毛在这次讲话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扩大到政治领域去了，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一五页）虽然如此，毛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放手让大家讲意见的范围。他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一四页)。

虽然毛的有些话讲得比较精彩，但就其论证来说，远比不上英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那样透彻。

另一方面，这个讲话有两点后退了。一是毛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一是提出了

反修正主义的任务。

尽管这样，党内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对毛的意识形态的开放政策，却不能理解甚至于有抵触。许多党员干部觉得，毛太抬高党外人士了，什么非共产党员可以批评共产党员，非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这些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东西对五十年代的许多中共党员的心态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毛感到要对党一内做工作。他先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继而和文艺界人士谈话，接着又和刘少奇分别到南方各地去对党内干部做说服工作。毛泽东到天津、山东、上海、南京等地，召开党员干部讲话，解释他提出的新课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明确提出，现在是从阶级斗争到向自然斗争，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批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三月二十日，毛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一页）

毛在外出期间读了一些报纸。他发现非党报纸，如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都热闹得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却冷冷清清。

对党报的沉默，毛非常恼怒。偏偏这时《人民日报》又登了部队作家陈其通等四人的一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百花齐放方针实施後文艺界现状的忧虑。毛泽东大为恼火，回到北京，就召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编委会。毛说：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没有及时宣传。我是党的主席，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可是现在非党报纸讨论得很热闹，党报却冷冷清清，这面旗被党外人士举起了。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毛申斥邓拓按兵下动，是死人办报，同党唱反调、他怒气冲冲地问：《人民日报》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事不能怪邓拓。《人民日报》曾写了一份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计划送上去，被胡乔木压下了。寅儏情况是，当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情绪，胡乔木就是一个。但胡乔木也有借口；文革结束后，他在一次会上说，毛在离京之前告拆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暂时不要宣传。后来胡乔木一看形势不对，才赶紧在四月十日（即毛批评的当天）袋表了社论《大蛋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那次，毛还谈了许多别的问题。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他的意思是可以。他说，他本想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后来觉得这样说不妥，所以就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允许批评，这是包括基本原理在内的。

他说到，党和这时分子的关系现在很紧张。在这个时候，党如果采取松一点的政策，这时分子就会靠近党；如果紧一些，这时分子就离党更远了。这个观点也很对。说明毛最初是诚心诚意实行双百方针的，但他后来变了。

毛还说，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曹营指共产党，汉指国民党）；党对知识分子也是探取赎买政策。这个观点表明毛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和周恩来不同的。

从整风到反右

为了克服党内的阻力，为了树立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榜样，毛决定在党内开展整凤，同时也发动党外人士对党员提批评意见。这是三月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同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一九页)。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以反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说：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氯，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六二页）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就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顺利解决，使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有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五月十日，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作为整风初期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一项措施。(《中国共产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六四页）

毛喜欢搞运动，发动党外人士批评，也探取了运动方式。

当时统战部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开会，号召他们提意兄；有些人没有意见，或不愿意提，也千方百计让他们说话。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统战部开会十三次，七十多党外人士发言。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文艺和学术范围扩大到政治范围，称之为鸣放；一般鸣放不够，还要大鸣大放。起功一些人并不想发表意见，但党组织一再做工作，鼓励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党报每天发表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于是气氛越来越热，不想讲话的人讲话了，不敢多讲的人多讲了，胆小的人胆大了。毛原来是希望搞得温和一些，所谓小民主，以保护各级党员干部，但形势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许多人已不满足於老是那样和风细雨了。

在群众性的批评浪潮前，各级党委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书记成了运动的主要靶子。过去强调党的领导，下面的群众很听话、很驯服，现在却一个一个贴大字报，指着鼻子批评起来了，各级党委书记越来越封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产生了怨气。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一点，显然再这样做下去，他会失去许多党内工农干部的支特。

毛泽东的信方针也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人民日报》一月七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真理报》转载了。伏罗希洛夫四月率团来访时，也向毛泽东表示过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不理解和担忧。(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二七页）

这时，批评中共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处理了。要党委退出学校的议论出来了，建国後几年的工作是缺点大於成绩的说法也出来了。章伯钧甚至提出轮流坐庄的主张。不但如此，批评的锋芒也指向了毛；如张奚若批评党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居然有人如此猖狂，反到毛泽东、共产党头上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毛被激怒了：当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言论出来后，毛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在听

到罗隆基等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六四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下定了反右的决心，在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八三四页）

毛泽东本来认为匈牙利事件对中国没有什么一下，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现在匈牙利事件的阴影笼罩在他心头了。他煽起了批评的浪潮；批评起来以后，他却受不了。他曾经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批秤别人；现在，他自己成为叶公了，被自己呼唤出来的龙吓坏了，毛决定对知识分子开刀了。

毛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知识分子情结。这个根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当时毛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小管理员。

我的职位低，大家都不理我，毛对斯诺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人称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

毛泽东在湖南算得上一个 0 物，没想到到了北京，那些名人都不理他。遭深深地刺伤了自尊心很强的毛。

毛也不像他的许多同伴那样，借勤工俭学的机会到国外去留学。在这些人面前，他总似乎够不上知识分子。

毛可能得不到一些大知识分子的认同，但是他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叙述他的心理变化过程说：

我是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里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

毛决定来个急转弯。

五月十五日，号召开展整风运动的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指责右派所说的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劳动都是假的。

在这之前，毛的批评矛头是对着左的教条主义，现在他认为右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他说：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还有些人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真正的条主义分子觉得 ‘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二三-

四二四页）从这些话看来，现在人们常常批评的在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源盖出于毛泽东。

毛的这篇文章是个转折点。他的这个思想和他二月份做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有明显的不同。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现象、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場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开始了。

六月十九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後一个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时的政治气候，同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这篇讲话时已是大不相同了。毛的讲话本来是重点防左，强调民主，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却要突出反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谁战胜谁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适应这个政治需要，讲话作了十几次修改。胡乔木告诉过我们，他改得很吃力，我也看过一些改後的排印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施肇诚发表文章，强调是毛本人根据当时的记录稿加以整理，作了修改和补充。）

这样，发表出来的定稿不仅观点有矛盾，文字风格也不同了。原来毛讲得生动活泼，现在固然改得严密了、周到了，但带着一种拘谨，失去了毛过去那中犀和和雄辩。

毛泽东既要把五月十五日以后的思想加入讲话中，又不便于把讲话做根本的修改，这就形成了发表的正式文稿中的矛盾。例如毛把原来讲话中所说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还不够，他又加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同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以为，他在斗争之前加上了思想之间的这样的限制词，就可以和上一句不矛盾了：但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反右派斗争不仅是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是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既然如此，怎么能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呢？

在六月以前，由与对双百方针的广泛宣传，大家都已接受了。现在突然又来这么一个大转弯，许多人思想不通。社会上都觉得很惊讶，觉得共产党说话不算数。

反右派运动中，原来那些受毛表扬的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一下子都成了右派报纸。毛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姚文元的文章《录以备考》，并亲自加了按语，冠以《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经济方向》的题目。毛还说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发表。这篇社论半句肯定过去的《文汇摆》的话都没有，相反是严属指责它孰行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指责它为反动派作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几个月是多久呢？毛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称赞《文汇报》是在四月十日，反右派斗争开始是在六月七日，相隔两个月毛的意思不可能足说《文汇报》的猖狂进攻是在四月十日以後开始的。就是说，当毛在欣赏《文汇报》时，它已经是反动报纸了。

毛也需要向党内解释，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乌烟瘴气的东西登在报上？毛泽东在七月一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门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三七页）毛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充分暴露自己，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

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二八、四三六页)

毛的这种说法只是一中事后的自圆其说，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右派进攻。可是，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後，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党的干部的怨气也超过了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所以，五月十五日以後，才是有意放毒草出笼。不过，毛的解释可以使党内那些对双百方针有埋怨的干部变得高兴，并且感到惭愧--他们太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策略了。如果按照他们原来的想法，不让党外人士鸣放，那么这些右派怎么会跳出来呢！他们觉得毛主席这一着是太高明了。毛泽东就用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转弯，牺牲几十万知识分子，换取党内保守势力对他的支持。

几十万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们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不料就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猖狂向党进攻，从而被纳入敌人的范畴了。共产党不是声称欢迎批评的吗？为什么要迫害批评者呢？毛解释说，批评有善意的和恶意的之分，共产党欢迎善意的批评，而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的情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二七页）但恶意的就要作第人来对待吗？况且，谁是善意，谁是恶意，这种判断往往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糟糕的是，这种判断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受到批评的各级党委书记的手里。他们说谁是恶意的，那个人就有口难辨了。

毛开始说言者无罪；后来却改口说，言者务罪对右派不适用，因为“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三八页）其实，大多书右派的所谓行，不通是在会上讲了批评的话，这就变成向党进攻的所谓行了。反正有罪无罪，都是毛泽东说了算，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毛还有一条对待右派的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说你有罪，你就要承认自己有罪；党说你是右派，你就要承认自己是右派，不但要承认，还要加油添醋，把自己说成是十恶不赦。这就是坦白，这就是态度好。如果你为自己辩护，那么，辩护得越多，越证明自己顽固，态度恶劣，抗拒改造，等待着你的是更加严属的惩罚。

右派有多少？毛说：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二四页）上下幅度如此大，证明毛完全是心中无数，主观猜测。后来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占当时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这个百分比是惊人的，超出了毛的最高估计。为什么会有这样多？一是各级党委要乘机队敢於批评自己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二是打击面大了不要紧，而打击面小了就有被上级批评为右倾麻痹，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危险。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再评价

反右派的后果是严重的。本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后，接着进行党内整风，是要树立一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例；后来，毛泽东认为，右派进攻，干扰了整风。整风转为反右。毛泽东说：“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三九页）

反右结束后，干扰排除，整风理应搞得更好，但实际上，群众再也不敢说话了，整风草率收场。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缺点，被冲淡了，掩羞了，那些受过批评的党委书记，都转过来对批评者进行报复。此后，很少人敢于对党组织提批评意见了。有话不敢说，或只说假话，好听的说，成为一种风气。这对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党风，是一次极大的破坏。人们接受了教训，不那么相信共产党了。运动开始时，说得好听，后来说变就变，整到提意见的人头上来了。

八月和九月-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在农村和企业中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果，大辩论的方式，带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

从毛泽东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到反右派斗争中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落网，这中间只隔牛年多一点时间。

中共党史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输基础。文革结束后，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篇文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九八五年修订出版时说，“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二七页）。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同上书五三三页）《注释本》还说，林彪把这部著作和文革联系起来的说法完全歪曲了这部著作的本意。薄一波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特别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主席和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五九七-五九八页）

林彪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做文革的理论基础的说法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的。怎么能说是歪曲呢？难道毛本人还不知道这部著作的本意吗？如果这个理论的意义真是如此伟大，为什么这个理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讲话后不久，就我生了反右派斗争，此后政治运动和迫害事件不断，一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呢？

当毛泽东在二月做报告的时候，他的本意是防左，他的重点是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到五月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本意，变为主要反右，要搞阶级斗争，要打击阶级敌人。这构成了这篇著作正式发表的版本的矛盾。从此以后，毛的思想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发展。但这不等于说毛起初的思想就是完全正确的。毛的二月讲话本身就是有很大缺陷的。后来的变化，一方面是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正确思想的违反，另一方面也是其中错误东西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思想是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在革命战争时期，划分敌我是首要问题。对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他是敌人还是朋友，然后决定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但是把这个方法搬到和平建设时期来，就不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而是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来决定是否采用专政手段。这本身就使正确的处理成为不可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区别的标准是什么？毛泽东说：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

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裹用的又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首先，这个标准是毛提出来的，并不是经过立法程序制订出来的法律条文。其次，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意思？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什么意思？这里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再次，这里不说个人，只说解决社会集团，似乎判定某人是不是敌人不是根据他本人的表现，而是看他属于哪一個阶级，似乎敌对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敌入，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不会变成反革命，这就是唯成份论。最后，谁来裁判某人是人民，某人是敌人？是法院吗？下是，是共产党，是各级党委，是党中央，是毛泽东。

毛的这个原则，斯大林也可以接受，因为斯大林也说，他所消灭的是人民的敌人，而谁是敌人是他来判定的。斯大林说谁是人民的敌人，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安全机关就要把他逮捕和处决。斯大林凌驾在法律之上，他可以制定法律，法律却管不了斯大林。固然，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承认了，这是毛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但是，承认了又怎么样？毛说，专政的手段不适用于人民内部。这并没有阻止他滥用专政的手段。如果要对一个人实行专政，只要先把他定为敌人就行了，这不是一样吗？

毛泽东认为专政只是对敌人的。他所说的专政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那么，在理论上，这些机构也应该只是对敌人的。实际上，这些机关所产理的绝大多数案犯都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而不是敌人--反革命犯。对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判死刑，但这只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做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论人民民主专政》)但人民犯法并不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在各类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只占极少数部分。另一方面，那种属于反动阶级和政治态度不好的人，如果没有触犯刑法，是否也应该镇压？是否能有公民的权利？如果两个人犯了同用的法，情节相同，是否应该根据其阶级出身加重或减轻其刑罚，还是应该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么什么是民主呢？毛不是把民主了解为多教人的统治，了解为一中政治制度，而是了解为一种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他反覆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说服教育。这是整风运动的经验。毛泽东把处理党内矛盾的这个方法，扩大到全国范围了。他说，一九四二年，共产党曾经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即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应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这里的问题是：谁说服谁？谁教育谁？谁来做批评？谁来做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时一度是正确的领导说服了不正确的党员干部，但这不能保证党的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当党的领导是不正确的而被领导是正确的时候，党的领导也要去说服被领导吗？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用专政方法推行他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区别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一般来说，是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可以用批评教育方法来解决的。党内也还有违反纪律的现象，还要进行组织处分，所以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也不能仅仅是批评教育。人民内部矛盾就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或者违反纪律的问题，而且还有经济利益问题，触犯法律的问题。对于经济利益的问题，要有适当的政策和法令来处理，对于触犯刑律的问题，还要绳之以法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进靠批评教育来解决党员也会犯法，那就不是单纯的党内矛盾了。另外，人民内部是允许比党内有更大的思想自由的，并不是各种观点都要强求统一。 比如有人信宗教，就不能硬去把他们教育成无神论者。毛泽东的专政方法是把管理党的方法拿来治理国家。这势必造成自由的丧失。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把自由和纪律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说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其中之一而否定另外一个。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六八页）在原则上，这并不错。问题是：这个纪律是什么样的纪律？是谁定的？是怎样定的？共产党当然是有纪律的，在谈党内的问题时，讲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当然可以；可是党的纪律不能推广到党外。一个工厂也是有纪律的，可是那只是劳动纪律，只能管正在上班的工人，工人回家后就管不着了。那么社会秩序靠什么维持？一靠道德，二靠法律规章。按照宪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的权利。按照这个规定，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规章。可是制定这种法律规章是有程序的，是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程序的，不是任意的。党内的纪律也不能违反宪法。毛泽东说自由要受纪律限制，这是把党内的概念推广到全社会了；而且，他只讲自由要受纪律制约，却没有对纪律本身作什么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如果党的纪律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那么这种纪律是无效的。毛泽东不讲自由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和限制，却去讲自由和纪律的关系，这表明他混淆了党内和党外的界限。

把处理党内问题的方法搬用到党外，这是毛泽东两类矛盾学说中的一个基本错误。这样，在组多时候就行不通。理论上说，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只能用说服的办法，不能用强迫的办法，但是，如果发生了盗窃、杀人的案件，怎么去说服？难道说服能代替坐牢吗？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几十年来常常把社会上的普通犯罪，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同样，如果对一个人民内部的人，甚至党内的人，要予以打击，就需要先把他说成是敌人：这就给紧接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埋下了伏笔。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而在这一个多月前，周恩来还将知识分子算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延安时期，毛泽东一般也是把知识分子算做小资产阶级的。这里，知识分子升级了，这也为以後历次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可是，毛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加上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纷纷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话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和三月份的讲话矛盾了，毛泽东三月份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知识分子中何一些人，实际上不赞成马克思义，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有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说，有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也是可以拥护社会主义的。而现在，世界观的问题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毛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占少书；那么，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和社会主义是敌对的，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这样一来，就是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了，怎么还能进行百家争鸣？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後的生产力的矛盾。政治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池是超前的、左的。政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後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重新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讲话提纲中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與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在理论上从他二月份的报告后退了，也从党的八大后退了，重新突出了阶级斗争。他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即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在小组讨论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正雅的。

毛泽东在最后讲话中，坚持说：无产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燕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7]

八届二中全会，改变了主要矛盾的提法，反映了战略决策的改变。

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中，毛则进一步宣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国文化领域的专政，我们对他们（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国阶级压迫另一个解决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中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这种宣布一方面违反了毛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个观点又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一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毛在这里不仅抛案了他自己过去关于百家争鸣的保证，而且悍然践踏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至于八大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执政党的地位的考验和防止个人崇拜问题，毛根本不提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要注意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牵涉到异化的概念。如果毛能用异化的概念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么肯定会深刻得多[8]。

（一九九七年三月）

（参见王若水《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怎样放弃了一次政治改革的机会》,《明报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五十一–六十一页。）

第八章 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

冒进的由来

毛泽东总说，一九五六年有一个跃进，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那么，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怎么回事呢？

---

[7] 这里有了一个对形势的估计的转变。由於一九五六年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乎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央估针可能出线十到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毛泽东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中心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八大一次会议正处于中国国际休战时期。八大前夕，美国人有邀请中国艺术团访美的意图。当时已组织了一个第一流的大型艺术团访问南美。毛的意图是突破中美关系的的僵局，先在美国的后院发展反对美国控制的统一战线。在南美破例地邀请美国驻各国大使出席开幕式，不料一九五六午十月到最后一站阿根廷时，爆发了匈牙利事件，世界性反苏反共乌云密布，美国去不成了，艺术团到瑞士休整，等了近一个月，反共风潮愈演愈烈，才奉中央指示回国。（参见王力《现场历史》）

[8]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第1个中译本出现在一九五六年；没有迹象表明毛看过这篇著阼。另外，当是翻译过来的哲学论文大多是来自苏联，而苏联哲学界是回避异化问题的。

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工作，主要是周恩来、陈云等人承担起来的。周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持制定者和推动执行者。当时没有经验，但由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都很谨慎，及时纠正偏差，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这为我国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一个基础。

毛泽东自己，则抓农业合作化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他认为东欧农业集集体为什么慢，是因为土改后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我们有些根据地认为，也有农民满足于土改不想再前进的现象。他的结论是工业化不是集体化的前提。（读《政治经济学敦科害》肇记，《毛泽东思想万岁》，二-三页）这样，他就可以在中国中央一个落后的国家推行集体化了，超过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十一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十七条》，要求到一九六七年粮产一万亿斤。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构想为推动力量，强调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要求八大的准备工作以此为中心。（《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九页）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像他所推行的农业合作化那样“又多又快又好”。

十二月六日作《反对右倾保守》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开展起来。大约再有三年时间，可在全个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七一七页）这样，由於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的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也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毛泽东思想万岁》，六一页）（他先抓农业合作化，以此推动工业，再说工业不神秘，干预国务院）

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月五日，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说“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去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六四页）

毛认为他探索自己的路是从一九五五年起，但随之而来的反冒进，等於否定了他的探索。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四十个部长，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封，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同上书）

在毛泽东热衷于“又多又快又好”、继续反右倾保守时，周恩来是比较审慎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二十多万人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会后全国各大城市和许多中小城市也纷纷宣布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二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告诫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些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国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广播电视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一五页）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说：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的会上，第一次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在十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得到确认和正式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楷案馆联合主办《党的文献》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八八页）

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第二个五年计划本来是可以搞得更好的。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上，周恩来提出了第二个五年机会的报告。

周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马鞍型”的教训，提出要合理地规定经济发展的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各部门按比例发展。他批评了有些部门和地方急於求成，企图把十二年内的任务，在三五年甚至一二年完成：大会上采纳的周的意见，在决议中指出，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保守主义，一是冒除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增长数字，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它要求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一倍，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十五，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一千二百万吨，粮食产量五千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约百分之五十左右。

虽然对冒进的批评起了一些作用，但在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冒进势头并没有完全抑制住。职工增加过多，基建投资增加过快，物资全面紧张，年终决算发现了财政赤字。在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报来的指标仍有许多地方偏高，不利於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针封这种情况，周恩来在十月召开国务会议，为一九五七年计划商讨对策。会议一致同意压缩基本建段投资规模。在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批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倾向，周还认为八大建议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过大，速度过快，上不去，就不要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後还得退下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七页）

刘少奇也在会上讲话：慢一点、稳当一点。毛在插话巾还表示同意。

毛泽东在最後一天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封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九九一年版，二二四页）

在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出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羲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二、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

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後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到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开始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他说，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高涨，一九五六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扫掉了一倜“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三四九页）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具会。这是毛第一次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的批评。

会后，《人民日报》在十一月十三日社论中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有右倾保守毛病的人.“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这是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还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了苏联的雄心：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国美国。

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刺激了另一个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他在台上建议赫鲁晓夫再加把劲，用十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他用这种形式来暗示苏联的劲头还不够足。至於中国，毛说：.“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参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六三页）

其实毛泽东的真正目标下是英国，而是苏联。苏共已在内部确定了一个没有宣布的目

毛当时没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当时后者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毛也表示同意在一九五七年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毛后来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妥协。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到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开始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他说，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高涨，一九五六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扫掉了一倜“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三四九页）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具会。这是毛第一次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的批评。

会后，《人民日报》在十一月十三日社论中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有右倾保守毛病的人.“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这是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还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了苏联的雄心：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国美国。

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刺激了另一个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他在台上建议赫鲁晓夫再加把劲，用十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他用这种形式来暗示苏联的劲头还不够足。至於中国，毛说：.“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参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六三页）

其实毛泽东的真正目标下是英国，而是苏联。苏共已在内部确定了一个没有宣布的目标：从一九五九年起，在十二年内（即到一九七一年）达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正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中国的经济建设怎能落在苏联的後面！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中承认：“全国解放初，我们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话，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生产钢四百多万吨，到一九四六年发展到到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此外，当时还没有提出其他具体措施。…….同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等口號：十一月…….《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的社论……

然而，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周恩来主张的反冒进方针，对雄心勃勃、急於求成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障碍。

毛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和许诺，这是一件大事。事先通过中共中央委具会的讨论吗？（注意：一九四三年，中央有决议，毛有最後发言权、否决权，这个决定在解放後仍有效）似乎没有，这个时期中央没有开会：看来毛既然提出了，中共中央只能采纳。十二月十二日，刘少奇借向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的机会，宣布了十五年感超英国的口号。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这篇社论经过迥毛修改和政冶局讨论通过的。（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六三六页）

年底，毛泽东到华东去了将近一个月，其间，还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毛表扬了安徽的治淮工程，并用这个例子来批评右倾保守。他说；安徽人民一九五七年一个冬季就搞了十六亿土方，超过通去七年，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毛还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办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同上书，六三七页）

本来，毛泽东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他不想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的时候辞去党的主席。他认为这样退居二线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让别的同志居于第一线，也是一个锻炼，以免将来继承出问题。中央本是不同意的，因毛多次提出请求，也考虑到这样做确实也有好处，才准备接受。为了这件事，八大通过的党章特地增加了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虽会名誉主席一人”这就是准备将来毛不当主席的时候，可以担任名誉主席。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年初，他又多次表示，但是，话虽是这样说，可是毛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退到第二稼。恰恰相反，从八大以後，他管的事可是越来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进，这两件大事都是他亲自抓的；接着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一个五年机会，毛自己也知道没有经验，所以他开始时没有多插手。后三年开始插手.“以农业的跃进促进工业的跃进”，结果弄得国民经济失衡，在反冒进中窝了火。现在要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他要亲自出马了。为了证明工业并非高不可攀，他当然要表现出，由于他的领导，中国经济面貌立刻大变。从八大以後，毛发动了一个又一个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攻势，矛盾指向周恩来等人。他必须贬低别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精，以此显示出自己的高明。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是这场紧锣密鼓的攻势的第一个高潮。

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

南宁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毛找了九省三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会上印发了一些参考文件。其中有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这几个是反面材料，是代表“反冒进”的思想，供批评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会上气氛紧张。一月十一日，南宁会议第一天。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德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但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 十個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凰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具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指头理论，它的流弊。）

毛禁止以後提反冒进这个词，说这是政治问题。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错误。毛提出要“不断革命”。

毛忘了，他自己就提过“反冒进”。一九五三年八月，他说：“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九四页）“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班上，都是主观主义”（同上书，五五页）

一月十二日，毛说;“我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又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小范围不行，就开中央全会，总要有点压力。毛还尖锐批评了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根》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许》的社论，说这篇社论讲，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说没弄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税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不看”，“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一月十四日，说：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搬出“用地方压中央”的办法，大大表扬柯庆施，说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狼，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很好，要大家学习“柯老”。说：这个报告把中央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许多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罹列事实。这是批评陈云。十六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

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六三九页）

如此尖锐的话语，如此逼人的气势，使许多与会者十分纳闷。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封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目十七日晚上，主席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周恩来在十九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一月二十日，毛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造放在第一位了。

毛的策略，是“以地方压中央”，“以群众压中央”。对反冒进的批评，是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毛再三强调要“打掉官风”，“要走出机关，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人民打成一片”（《工作方法六十条》）这样一来，似乎群众是要冒进的，反冒进就是脱离群众，就是不做调查研究，就是官僚主义，而毛是代表群众来批评中央的“稳妥派”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南宁会议，确定了今後不再提反冒进，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毛後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毛泽东思想万岁》，二五一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毛不善罢甘休，于是，又有一连串的会议，继续批反冒进。

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二月十八日，毛在会议上说：不要一讲缺点，就稿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三百万党具，能没有一点缺点？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选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逮，大概五十米远。又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羲。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毛还说；令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倜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纷纷在会上作检讨。毛又摆出宽大的姿态，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度紧张。今後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陈云讲到分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朱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一月十二日，毛曾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我说十个根本，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地委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我最没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毛极尽挖苦之能事，说反冒进的人是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毛主席重申要"大权独揽"。

这是对周恩来和国务院的批评，说他们"想把大权揽过去"，所谓"让党委搞点小权"，就是缩小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权力。所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评。周回避了"想把大权揽过去"和"封锁"这两点，只是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即使请示报告了，也是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对这件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说：

当时，总理的自我批评，也只能讲到这个地步。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中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 。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虑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六五一页）

薄一波认为毛是言重了。那么，毛为什么要做这样重的批评呢？我认为，毛是故意夸大的，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他的同事一个警告：毛封权力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任何人也休想碰一碰毛的绝对权威的地位。

再接着是三月份的成都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六次讲话，多次批评反冒进。他说，一九五六年吹掉了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三月二十二日）

毛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秆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把冒进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 把反冒进称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他在三月九日说：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当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种方法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路线，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割，二十年搞完，一种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以後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娇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认为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这里毛又一次忘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实践论》中从哲学高度阐述了反对“左翼空谈主义”的必要性。当时他说：“他们的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三月十九日，成都会议期间，毛为重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了说明，其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党的影响。”把反冒进与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波匈事件和右派进攻相提并论。而且，在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和在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中，也反覆说这两个“没料到”。

三月二十日又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冶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好？”“一潭死水好，遥是不尽长江滚滚流好？”

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把“反冒进”的错误提高到哲学上来分析：“会议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说了，我也不要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论的一个例子来说，那是可以的。” 毛接着说：反冒进的错误，在於“把个别的、特殊的東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

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四月上旬，毛到武汉主持了一次汇报会。会上他把反冒进说成是一个“挫折”，是压在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盖子”。他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合乎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了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毛还说有些人是“观潮派”、“秋後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会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

毛还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他当时是才取防御的，以後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针封周恩来的“稳妥可靠”，毛泽东批评说：作为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问、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毛为了使冒进变成可取的，就换用了“跃进”这个名词，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一九五六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国内没有料到来个反冒进。成都会议就说过，请大家注意，让各省委注意，要预先料到。前次大会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跟什么人走的问题。（五月二十三日全体合议上）

这次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报告，对反冒进问题作了结论。说，反冒进也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建设。不少人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响应毛泽东，

也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认为刘少奇的报告对反冒进批评得还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

毛在修改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话：“一个马鞍型，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型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周恩来在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周恩来在开始准备这个发言稿时，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有时五六分种说不出一句话来：秘书加以自己走开，让周恩来安静地构思，秘书走开後，周独自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两点多。后来，还是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周恩来口述，秘书整理成文。在秘书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删掉了这句话，他严肃地对秘书说；在延安整风后，可以这样说，整风前，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不能引用这句成语。“这说明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他说这些话时，几乎流下了眼泪。秘书发现，在起草这个检讨的十多天里，周恩来的头发又白了不少。（彭程、王芳《卢山 1959》，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三二页）

毛原来准备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高潮》序言、促进委员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论十人关系、多快好省等都是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個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过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毛在讲话时，这些话没有讲。薄一波又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气’的，但最后处理这个问题时，基本上才取了克制的熊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六四二-六四三页）

一位知情人曾向笔者透露，毛泽东那时本想把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撤下来，和刘少奇商量时，刘不同意，毛因此作罢。这大概是毛暂时採取克制态度的原因。可见，毛对周恩来如此大张挞伐，是有其目的的。后来，毛常说“大权旁落”，似乎他的权力受到过威胁，国外一些学者也信以为真，并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的起源。其实并非如此。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他同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必须崇拜班长

反“反冒进”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问题。成都会议上，三月十日，他在讲话中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战，不崇拜不得了（他说过，邓委书记是班长）。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中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乾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他讲，不要怕教授，“外行领导内行，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内行跟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是专而不红。

他表示，不相信工业高不可攀，强调要破除迷信，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怕资产阶级教授，另一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没有自己的独创风格，要模仿别人。

在他亲自发动和主持的反“反冒进”中，毛泽东俨然是群众的代言人，他说“跃进是群众的积极性”，反冒进是压制群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要“分清国共路线，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这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甚至说，政治局不是设计院，老说没搞好，实际上是封锁，设是斯大林的办法；政治局成了表决机器；“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月十一日、十二日，《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样，他便把别人置于政治上的错误位置，而可以肆意批评了。他用尖锐泼辣的语言，把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批评得灰溜溜的，什么“像蜗牛一样爬行”．什么“促退派”、“观潮派”，什麼“寻寻觅弥，冷冶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可以说把他心里的怒气发泄得淋漓尽致。而作为批评对象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不但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而且只能一个劲地作自我批评，为了息事宁人，甚至还不得不发违心之论。从前是同志和战友，这时却是明显的有上下级关系了。他曾经倡导“批秤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批评变成了他的专利，而刖人只有做自我批评的义务。

这是一个转折点。薄一波说：“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後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六五三页)

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长达八个月的批评“反冒进”，改变了八大批准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正确方针。谁要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是非马克思主义，是慢的建设方针。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接受了“教训”。以后，毛泽东说什么，大家就怎么做。各部门和各地方在经济指标越高越好、思想越“左”越好的空气中，拟定跃进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这反过来又影响毛泽东“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契机：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

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反冒进扫清了毛泽东实现他的雄心的道路。现在，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没有人敢来批评他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讨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时，毛泽东就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问题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

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吴冷西《忆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北京，九--一 0 页）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

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麽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麽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做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属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会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毛泽东选卷》第五卷，三四四-三四五页）

毛说苏联的钢、煤、石油都“不算数”. 其实自己心里是很嫉妒的。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算数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据翻译李越然回忆，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会上，毛泽东表示了封赫鲁晓夫的支持：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最好，还须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倜篱笆两个桩。”毛泽东的秸激起了掌声。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南共代表卡德尔：“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一六二--一六三页）

毛泽东的这次发言，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目为《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但是，把封赫鲁晓夫表示支持的话删掉了。不知情的读者不会知道，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好汉”和“荷花”竟是指后来被中共斥为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

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运分崩雕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地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袖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说：“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嘛。”

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

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讲话时，重复了这个思想：“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

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上上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只能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

这个豪言壮语赢得了会场上的掌声。（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一六二页）

然而毛的雄心比他宣布的还要大。早在前一年（一九五六年一的八月，他就说要在五六十年中超过美国：“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圆。”“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自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九六页）

现在毛鼓励苏联超遇美国，难道他就不想？难道他只满足于超过英国？不。

毛泽东在莫斯科谈话的意思是两点，第一，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第二，这个头必须是苏联。如果，事实最终证明苏联当下了这个头，怎么办呢？况且，赫鲁晓夫既缺乏杰出的领袖才能和理论修养，也不享有斯大林曾经享有的崇高威望。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国人的威望能和毛泽东相比，何况毛泽东还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萌生了超过苏联，作国际共运的领袖的念头是很自然的。他深谙《老子》的策略：“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先与之。” 现在还不是时候，毛泽东在等待这一天。

这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只是意味深长的伏笔。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破例在制度会议上作了六次讲话，反覆讲后来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注意：苏联是老大哥）的思想。他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贾谊、王弼、孔夫子、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等等），说明他们都是年轻时崭露头角，敢於创立新学派，向老古董开战。他批评有些人精神不振，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他讲了一件事情；中国画家画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像，把毛泽东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实际情况相反，毛泽东高一些）。这件事显然使毛泽东耿耿于怀。他评论说，这是盲目屈服於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好像塑菩萨，总是比人大好几倍，为了吓人。

毛泽东回顾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的，假洋鬼子‘不准革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止，我们提出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真了。”

在两个月後（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他讲话的题目定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这个意思就更进一步了。毛泽东在讲到学生超过先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时，重提了斯大林祝酒的事，说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毛不满足于仅仅超过斯大林。他说，马克思也是人。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马克思没有干过中个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种革命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不过对许多谨慎的（或许也是保守的）共产党员来说，这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有一个人却听懂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不久后他就以“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但在别的同志的劝说下'他在发表时还是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文章还是引起了很大昀争论。一九五九年，王任重徵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赞同用“超过马克思”，他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转引自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O 年，石家庄，一三 0-一三一页）

中国人应该有道样的雄心壮志。后人要超过前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超过马克思呢？为什么中国不能超过苏联呢？毛泽东说的有道理，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尽管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经验不能成为典范，但中国共产党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也是很不够的。

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吸收教训，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这不能宣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或成熟了，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但毛泽东仍然把经济上赶上先进国家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要沿着过去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凭着几亿人民的冲天干劲，“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魄，奇迹就会出现。

毛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

这成为他发动“大跃进”的动机之一。

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学生超过先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时，重提了斯大林祝酒的事，就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当然这些话是在中共党内讲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出现的：在这一年里海出了人民公社。毛泽东以为，这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实现了飞跃，中国可以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而超过苏联，也不再是他的潜台词，而是溢于言表的目标了。讲到现实，还承认苏联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强，但是，不忘强调我们的政治底子比他们好。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作“世界第一强国”，不过他还表示了一点谦虚：“苏联第一天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第二天再宣布嘛，要不然人家脸上不好看。”

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大跃进”的失败已经明摆着时，毛泽东还在武昌会议上说：通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要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设想一定要

让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总之，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实际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以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的头衔，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博士之实”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的一段话：“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这段话，陈毅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广州市干部大会上传达。（马齐彬、陈文彬等编写《中个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一五三-一五四页）

毛泽东的这个雄心，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后来在会议录中说，毛泽东“想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十一章）赫鲁晓夫并不欣赏毛泽东的理论和雄心，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不同意，也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抱怀疑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恼火。

又多又快又好，总路线的确立

“鼓足干劲，方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确立，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反冒进斗争的成果。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毛要求五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二千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二千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这个刚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开发表时，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随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毛从反右派斗争中发现，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大字报是个很有用的武器。现在他也用“大辩论开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毛提出了提前实现《纲要》的问题。会后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强调“不断革命”。其中，毛吸收了安徽提出的“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在《六十条》中提出了“苦战三年”和“十年取决于三年”。

“真正的左比右好”，这一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并流传开来。

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和主义的新上海！》

南宁会议后，河南省委部署，当年就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 (老鼠、麻雀〈後来改为臭虫〉、苍蝇、蚊子)，实现《纲要》规定的十二年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消灭文盲。浙江、广東、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辽宁省提出，当年实现粗食、猪肉、蔬菜三自给。毛泽东对河南的部署虽有怀疑，但认为危险不大，只要求不登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中央和省市如此之追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山东某地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百分之百，毛很重视，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干；河南长葛县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可以增产一倍至几倍，毛很欣赏，号召学习长葛经验，说：深翻一尺五，是一大发明。南方某地搞密植，毛也肯定。他提的是“合理密植”，到了下面变得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插红旗，按老方法下种的插白旗。

八大二次会议，五月八日，毛讲话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最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后，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八臆。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可见毛泽东的真正目标是要超过苏联，而他的资本则是中国人多势众。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不懂科学技术，可是，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他说：“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也想到了要防止骄傲，可那是在将来，而且是别人的问题。他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是大国沙文主义？”“我看十五年以後，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毛说，他这次讲话的题目就叫《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五月十八日，毛又说：“明年（钢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後年一千七百万吨，世界就会震动。”

五月五日，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概括了总路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六六五页）。

三天後，毛讲话。谈到总路线，不一样。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日的讲话中都提到他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就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八大时，周恩来在修改一个文件时曾勾掉了有多快好省的一句话。现在，毛泽东恢复了它。其实，其中前两句话都属于鼓动，整个是纯粹的空洞口号。实际上这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建设路线。执行过程中，实际上只有多快，没有好省。既要贪图多快，又想兼顾好省，怎么可能呢？就像他自己所批评的 “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毛常说，某地可以做到，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做到。这种说法，就是不顾各地条件的不同。後来报上批“唯条件论”。毛还提出插红旗，辨风向，拔白旗。

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总路线，才是代表人民心声的。他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既然这个合作社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那个合作社不可以？既然逼个工厂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别的工厂不可以？这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毛主席又说：“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五月八日八大二次会议上，二百五十余名各地代表纷纷发言，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他们列举本地区的成绩、经验，就明总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和指标。例如在农业方面，许多省都提出了“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四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河南长葛县提出当年要把全县一百一十二万亩土地深翻一遍，争取亩产八百斤；湖北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一千斤”；安徽桐

城县提出当年亩产达到一千斤，争取一千五百斤；广东汕头地区提出争取当年亩产达到千斤，三年左右达到一千五百斤。在工业方面，机械部门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冶金部门提出，寅现“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大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五；煤炭部门提出“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七亿吨；“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铁道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三万公里，十五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大到二十七万公里；纺织部门提出五年内主要纺织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轻工部门提出造纸工业的产品产量五年超过英国；水利点电部门提出五年内全国初步实现电气化；第一汽车制造厂介绍了“苦战半个月，三万变七万”班产百辆车的经验；包头钢铁厂提出要实现“产量增加一番，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半”的目标。

六月，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声称：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今年比去年将增加五百零七亿斤粮食，增长近百分之七十。谭震林肯定这是“飞跃”、说，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估计全国今年增产一千亿斤，就小得不像样子了。

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以及几个月来对“右倾保守”，“反冒进”、“观潮派”、“稳妥派”、“秋後算帐派”的严厉批判，各级干部发现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不仅不挨批评，而且还得到鼓励、表扬、升官。面对按指标高低分左右的局面，谁不宁左勿右昵？

于是各地纷纷提高指标，一时间，神州大地，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元帅”升帐、“卫星”上天的凯歌。

六月八日，报纸报道河南省逐平县放出亩产小麦二千一百零五斤的“卫星”；六月二十六日，又报道了江西省贵溪县水稻亩产二千三百四十斤的“卫星”。此後，一颗又一颗的“卫星”，越放越大。小麦亩产最高大八千多斤（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间什刻农场）水稻亩产最高十三万多斤（《人民日报》九月十八日广西环江县）。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出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报纸还多次提出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八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解释：“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以此强调“人是条件的主人”批判“唯条件论”。

这一年（一九五八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的调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七二四页）

一九五八年十月在西安召开的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五千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二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一种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了也够用”。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对西安会议的建议大大打了折扣。全会决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指標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指标一亿担，与钢煤指标一起，合称说一九五九年“四大指标”并公开发表。

头脑热度逹到最高点时的十一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曾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要求到一九七二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棉花亩产达到五百到一千斤。根据毛的设想，提出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同上书：六九 O 页)

大跃进的浪费：华东地区水利建设，柯庆施一九六二年也承认：一九五八年以来，国家投资二十二亿八干万元，占用耕地二万六千亩，移民近二千四百万人，已迁二百三十七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现在还不能发挥效益。有些工程打乱了原来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

从十年到两年——钢铁超英

四月，毛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宣称："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关于"大办钢铁"，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用十五年时间超过美国。毛泽东接着提出，用同样的时间，让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一九五八年三月报告，钢铁工业可以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毛对这个十分重视。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三次给予表扬，还号召其他部门向冶金部学习。

八大二次会议上，五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发言中说到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目标的。王鹤寿由於受到了鼓励，劲头更足了，提出钢产量五年可以赶上英国，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

柯庆施五月十三日的发言。他主要讲的是文化革命问题。他说：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读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人们现在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杜甫、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丽英。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将成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规范。那时，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後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他说，这样设想到底符不符合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

毛在五日的大会发言，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会上发了一个材料：《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在批语中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王鹤寿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本来说钢产量在一九六二年达到三千万吨，六月初，他根据毛的指示，拟出新的规划，要在一九六 O 年六月将钢的年生产能力提高到三千六百万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规划。

六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提出新的《二五计划要点》，认为：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毛很赞赏，批示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六月十八日，毛谈话，表示赞成提高钢指标。薄一波同意，把一九五八年预计钢产量

由九百万吨提高到一千万吨，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由二千万吨提高到二千五百万吨。二十二日，毛对他的《汇报提要》作了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雨年是可能的……"并把《汇报提要》改为《两年超超英国--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六月十九日晚，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人谈话，其中有王鹤寿。毛问王；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所以，后来公布的计划是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了一番。

毛泽东下"一千零七十"的决心，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六月中旬召开的协作去主任会议前，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主持了话动协作区会议，规定华东五省市钢的生产能力在一九五九年达到八百万吨。此外，王鹤寿多次提出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薄一波自己十七日的汇报、十八日的谈话，也有影响。

六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六月二十二日，毛在冶金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只要在一九六二年达大到六千万吨钢，超国美国就不难了。"

毛信心十足，觉得可以把这个报告对外宣布了，七月底到八月初，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毛对他说，我们今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是二千五百到三千万吨。赫鲁晓夫显然不大相信。

牛皮是吹出去了，但实际进展不大。从一月到七月，才累针生产了约三百八十万吨钢，只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月十九日他提出翻一番以后钢铁生产也末见起色。毛急了，打电话给陈云，作了八点指示，其中包括，加大保险系数，给冶金部直书钢铁厂年产量增加五十万吨的新任务；完不成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指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毛说，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北戴河会议上，毛在多次讲话中都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抓钢铁。

在八月十六日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号召大搞群众运动，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已经明摆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还是宣布要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土洋并举。于是"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九月四日，中央召开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谭震林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一千一百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了。主席要求九月十五日前钢铁要有个大跃进，因为九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十月，在河南召开了土法炼钢经验验交流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为他制造与论的除了地方的柯庆施外，中央还有一个康生，他拼命迎合。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郑州讲话。说："什么是科学研究？敢於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要说书

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同济大学视察时，说河南滦县出了许多许多小炼钢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十五斤。”

这年底，《人民日报》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实际上，把不能用的土钢剔除後，钢的产量大约是八百万吨。

这个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为此许多地方的森林被砍光了，矿产资源被破坏了，群众的锅被砸光了。由与破坏了企业的管理制度，全国最大的第十号高炉，投产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九起重大事故。一九五九年五月底，冶金部向中央汇报，几个月来，工业交通部门因事故死亡三万多人。那一年，投入所谓“小、土、群”的农村劳动力最高时达六千万以上。为了这几百万吨基本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生铁，财政部一九五八年对小高炉补贴了四十亿元）一九五八年财政总收入才二百八十七亿六干万元），光补贴小高炉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因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大炼钢铁的直接经济损失几百亿元，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力又大伤元气。

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上旬，《红旗》第三、四期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传达了毛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河南省遂平县卫星社据此试办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这时，河南各县也纷纷试办。

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质：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

四年前，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具会做宪法草案说明时，认为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五十年；次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比如说，五十年。

这时，毛却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会後，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陈伯达收到《碴岈山衡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第二次草稿）》后，即将《简章》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毛当即封《简章》作了修改，批示：“请各位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在唐山会议讲话中回顾说：“我在河南调查之后，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

八月四、五日，毛视察徐水、安国。在徐水，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炼铁，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

八月二十二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制定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一九六三年迈进共产主义。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

把社员带进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八月六日，毛到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有好多这样的社。”

九日，毛到达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同志在汇报中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大办农场时，毛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於领导。”

毛视察三省，特别是八月十三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谈话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九月，《红旗》推荐碴岈山人民公社后，大办食堂。到年底，全把农村建立了三百四十多万个公共食堂。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宣布，我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

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毛说；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产生，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于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张鲁传》，并于十二月七日和十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毛的这两大段批语，约一千五百字，是《张鲁传》的好几倍。

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时，曾讨论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几十年后的情形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和超过。后来，决定由陆定一编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邓力群编一本《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后者只供高层参阅，前者广为宣传。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讲话中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这本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组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为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租宗。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加上苏联四十一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另据胡乔木回忆：一九五八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七三四页）

陆定一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去广州的火车上，接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任务后，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宣部的同志全力突击，六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一八四五年二月八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状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主席最後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後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同上书，七三六页）

人民公社化和随之而来的吃大锅饭，耗费了大量粮食，再加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去办钢铁，一九五八年是丰产而没有丰收，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是四千亿斤；又由於虚报产量，国家徵购是按照六千到七千亿斤的产量来布置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全国共徽购粮食一千一百七十五亿斤。这样，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云南已有人浮肿，毛还写了《一个教训》。到一九五八年冬，各地粮油紧张，有的城市的食油只能供应几天了。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

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二千五百一十七万。（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七一四页）

在毛泽东大搞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时，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哲学手稿》已于两年前在中国翻译出版。马克思在书中最严厉批评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贫穷的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中没有收入马克思的这一段论共产主义的话。是有意避讳呢，还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新出的马克思的著作呢？恐怕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毛泽东从未提到过这本书，大概他也没读过。如果读到了这一段，他会作何感想？那真像是批评他的人民公社的，公社的某些设想，如吃饭不要钱，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三国志·张鲁传》，那是封建时代起义农民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干。

毛泽东在十一月九日的郑州会议上，还批评了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柯庆施听到适几句话后，授意张春桥写文章。张春桥的文章出来后，毛泽东加了编者按，让《人民日报》发表，引起了一场大讨论。直到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仍然没有说清楚。其实，资产阶级法权是封建主义特权的对立物，是在同封建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毛泽东上述的等级森严等等，都是由特权产生的，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在形式上是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商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基本原则。共产党由吃大锅饭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这是一个进步，毛却在一九五八年说这是开倒车。

（一九九六年）

第九章 庐山会议与彭德怀

不难想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多么丢了中国的脸。国际上传为笑柄。

赫鲁晓夫也在一九五九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本来想显示，从他抓经济后，形势顿然改观，和别人完全不同，说明他的反对反冒进是对的。

不料，大跃进搞糟了。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上海会议上，他终于承认：“这不是大跃进，遭是破坏大跃进，都跃不了了嘛！只有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吃不饱……”

在此以前，他可以自豪地说，他不像斯大林，他没有犯过大错误，可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自己犯了错误，但又非常忌讳别人的批评。他想自己纠正。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一步步后退，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如建议这个纲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提交八届六中全会讨论；批评了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提出压缩空气。但是，毛泽东做这些，并不是很痛快的，而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没有丝毫反思。

从此，毛有块心病(obscssion)。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帐？斯大林在世时也是一个神，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他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那么在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寻找海瑞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毛泽东作了纲要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要求多谋善断，要与多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又说，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

在这个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於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拾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想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属害，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还把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毛在讲话中说，他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全周总理也看一看。

在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讲话而不害怕。”“彭德怀说，人家提意见，可没有把皇帝拉下马的意思哦。他们两人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毛只是要别人这不怕那不怕，并没有说自己要不整人。

在上海会议上，毛层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而且突如其来，使彭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郁郁不乐。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着一本《明史・海瑞传》。(《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一三页）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你人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 他说：“不是。”第二天，毛主席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他对我说：“讲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梅白《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转引自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O年，石家庄，一三二-二三三页）

上海会议后，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党内通信》，继续提倡讲真话：“老实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催三压二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会后，胡乔木去找吴晗，让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接着又写了《论海瑞》一文，发表前，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后才看这篇文章。除了提出一些意见外，还把毛在卢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同吴晗谈了。於是吴晗怍了修改，然後发表。一九五九年下牛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约与吴晗有关海瑞的提纲准备编戏。一九六O年初，马连良等人又再三要求吴哈修改草稿，编写剧本。三月，写成五場《海瑞》剧本，经过多次修改，一九六O年底定稿。这

个剧本原名《海瑞》，后来，吴晗探纳了蔡希陶等人的意见，在一九六 O 年底彩排后，改名为《海瑞罢官》，於一九六一年初公演。

话说回来，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毛本来是很不服气陈云的，一九五八年，某次谭震林和田家英在毛泽东处谈话，谈到了管理经济问题，毛突然拍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八页）现在，毛赞扬陈云说，陈云曾经不同意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指标，主长降低钢铁指标，这都是对的。可见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武昌会议公布粮产七千五百亿斤时，陈云不同意公布，告诉胡乔木，胡乔木未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上拙评了胡乔木，但后来胡乔木私下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武昌会议时，王稼祥也向刘少奇说过，不要公布关于公社的决定。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大发脾气。

接着，准备开庐山会议。

上庐山前，毛一路视察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了解了许多情况。写了十几个问题，供会上讨论。

庐山会议於七月二日开始。大家的精神准备都是：这次会议是一次纠左的会议。会议开始时，传达了毛所拟定的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其中提到：

编三本书：《好人好事》，表扬大跃进中坚持真理，不随风倒，下谎报不浮夸的典型：《坏人坏事》，批评犯错误的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最後一本是中央和各省市的文件；

去年一年的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任务：今年钢是否一千三百万吨（这是陈云的建议，实际上仍然是完不成的），钢明年只能增四百万吨，以后几年也如此；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後是否每年三成？十五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农轻重？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好基建。现在看来陈是对的；

食堂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也是好的。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袋，供给制不要否定：

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增产部分，增四留六；恢复农村初级市場：

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对去年的估计：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缺黚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虽然毛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提出这些问题的。但他毕竟承认了一些错误。

庐山会议上，许多人认为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八个月的纠"左". 虽有成绩，但还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有不少人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会上，发下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反映，说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粮食副食品的紧张，就是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人

说，现在除了水和空气外，其他一切都紧张，“物资供应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关于大炼钢铁，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关于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帐，但也应算经济账，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炼钢损失了二十三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大炼钢铁有四大害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产；三，炼出来的钢不能用；四，国家赔了二十三亿”。

关于人民公社，认为搞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中央关于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农村现实条件。有的说，“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会议公共食堂，认为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还有许多意见，是直对中央领导的，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有点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语），我看是社会主义一年不如一年。

在这期间，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有些是对着毛的。

七月三日：“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人了点……．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件事……

七月四日：“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六日：“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主席让搞的。”

八日：“毛主席与当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九日：“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十日：“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的决定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是很危险的。”

此外，彭德怀还有私下议论。和张闻天议论到，张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属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思想，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则认为，毛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而厉害，无产经济领导也要属害才行。同皇帝有本质的不同。还对张表示，他不满意毛对他在上海会议上的批秤，说主席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毛泽东自己承认错误可以，别人的批评则让他坐不住了。

七月十日晚，毛召集各小组组长，讲了一些话，提到党内党外的一些批评，显得并不高兴，说去年的一些缺点成为要承认，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语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多快好省不会错。”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年实践，抓了工业，取得了这么多经验，同过去只听‘训话’，走过场，让签字画押，总算是不同了。一年来有好的经验，有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财务的经验；不能说只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毛在这里貌的听训话和签字画押，矛头是对着国务院的。重提当

年反冒进是对国务院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没有实权的旧怨。毛还把造成的损失说成是付学费，说“许多事，要取得经验，总得出学费” 这个学费是高的惊人的，可是毛到了多少东西呢？

毛泽东七月十日讲话后，柯庆施活跃起来。

七月十一日，毛同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似乎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点是暗指毛了，但毛似乎也不以为忤。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羲、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所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等口号不科学。毛常即表示：以后可不提这些口号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七八-八二页）李锐趁机建议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毛泽东表示同意，还讲到《三国志·郭嘉传》中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同时作了点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许多事我都要复责任，有些也真负不了。”他举例说，农业可以高产，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讲人民公社好，没料到第二天就登了报；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毛泽东忘记了他对王明的批评。王明犯错误是因为听了斯大林的指示，当时毛说，我们不怪别人，只怪自己：这里，他上半句刚说自己要负责，下半句就推卸掉了。

“海瑞上疏”

七月十二日上午周小舟向彭德怀介绍了十一日毛谈话的情况，说到他还对毛说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主席都听进去了。因此他建义彭德怀找毛谈谈。彭德怀说怕谈不好，自己言语生硬，容易顶撞。当然顶多撤职，也不要紧（彭德怀大概想到了毛所说的五不怕和海瑞精神），想写封信，周很赞成。可到了下午，彭德怀又犹豫起来了，觉得还是当面谈谈算了；他去找毛，毛在睡觉，没有见成，於是彭决心写信。

十四日下午，彭德怀的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一九五八年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首先说了一通成就和总路线的正确，然後谈到缺点说，看来有些基本建设的项目是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建议明年（一九六O年）的计划，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至于五八年和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实在无法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关于农村工作，彭德怀也是在肯定公社化的伟大意义之后说，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

第二部分，谈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彭德怀说，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又说：“我们在处理解决建设中的问题是，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接着又说道，大跃进有国际国内的客观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彭德怀认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一切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另一个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的狂人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彭德怀指出，“政治褂帅不能代替政治法

则，更不可能代替解决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信的结尾提出，总结成绩和教训，“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整个看来，这封信是写得很温和很谨慎的，彭德怀小心地照顾了毛的自尊心，首先把成绩讲够，然後谈缺点。口气远不如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那样尖锐。当然，他的助手在整理这封信设也帮他磨掉了一些棱角。和海瑞骂皇帝那样痛快淋漓的谏言相比，是客气多了。

毛提倡学海瑞，他会对眼前这个海瑞如何反应呢？

十五日，原定会议结束的日子。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十六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说要讨论彭德怀的信，要林彪、黄克诚等人上山。

同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给与会者。

十七日，开始小组讨论，这时毛还没有表态，发言的人多数基本同意这封信，只是认为个别字句如小资产阶级狂熟性值得斟酌，表示完全同意的只有一倜人（张闻天），完全反对的也只有一个人（陶铸）。许多人都认为彭德怀有胆量，但深知毛泽东的胡乔木在闲谈中对田家英等人说，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

十七日下午，毛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

这次谈话，毛的调子变了，但又有些不可捉摸。他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原文如此），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通讯（所谓右派朋友，后来证明包括在座的一些人在内，但当时他们都没有悟到）。毛说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在井冈山时期，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这几句话李锐注解说，这是证明为何自己要亲自抓经济的道理。毛接着反覆讲，一千三百万吨钢的指标来之不易，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毛接着说，现象与本质，有时不容易看清楚。真正高产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五，因此年增产百分之三十是不大可能的。随後，毛又讲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比例失调也是无可责备的）。几个人又提出由陈云主管经济为好，胡乔木还转达了刘少奇的意见，即由陈云主管计委工作。遭次谈话，毛似乎是顺便提到了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不同意中央所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是暗示彭德怀在历史上就和他有分歧？十八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还有上要求将信收回。

转折

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开场白是：“你们讲了那么多，允并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他说，会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怀话。毛说，“无论什么话都让江，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劝在座的诸公，你们都用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无非是骂租宗三代。”毛这样说，并不是劝这些人虚心接受意见。他说，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些好事，腰杆

子硬。毛说，要硬着顽皮顶住。显然，他的思想感情，是站在“一触即跳”这些人一边的。

毛说的另外一种倾向是，在紧急关头动摇，“道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毛说到自己时说，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赞成你们就驳，说毛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封，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浃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但有推广之权。”

“马克思列宁也有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

实际上，毛没有真正认错。他也在“硬着头皮顶住”，而且把抗战时期对付国民党的原则搬出来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

这是有威胁意味的。

毛讲话后，整个会议主题变了。大家一面倒，批判彭德怀。

从参加开会的人来说，康生、陈伯达、柯庆施见大局已定，一个个都慷慨陈词…….

这个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毛泽东既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纠正是很有限的），又十分讨厌别人出来税三道四。偏偏性情耿直的彭德还在这时多嘴上万言书，形势陡然改观，尽管彭德怀字斟句酌，措辞温和，表明白己完全出于善意，但还是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能猜猜想到，党内外对“大跃进”都会有意见，只是有敢说不敢说的区别：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经噤若寒蝉了，但党内的高级干部会不会有人出来批评他呢？现在果然跳出来一个彭德怀。毛泽东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後才作秘密报告的，彭德怀却在毛泽东健在时候就“发难”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上书的反应是迅速而坚决的；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纠左”是和风细雨的，因为那实际上牵涉到自己；“反右倾”却是暴凰骤雨，因为他认为彭德怀是对自己“下战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分裂黛”……这一顶顶大帽子往彭德怀头上扣了下来。

二十六日，毛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其实，毛后来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同日，印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李当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总合组组长，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他上万言书给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和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了意见。信是六月九日寄出的。毛的批示说：信的作者只对搜集关于缺点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根本不发生兴趣。因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冒险主裊、机会主义的错误。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但是毛说，“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不像我们看到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这是针对彭德怀的克制）

“他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鞋…….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很大的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的有分析的系统的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见到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

也难越衙上告。”毛泽东全部否定了李云仲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批评，但是，肯定了他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因为这是别人的责任），甚至说，十年来还没有人批评过；他鼓励越衙上告，就是告到他那里。

“必须做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总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为是一次意亿重大的争论。”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常委会。对彭德怀算历史旧账。

林彪是二十九日才来庐山的。他是毛搬来的救兵，当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也是自己立功邀宠的计划，他在发言时，猛烈攻彭德怀，声色俱厉。说彭德怀是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发表，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接着在中共中央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定中，用极重的词，算历史帐。

庐山会议后马上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撤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在全国展开“反右倾”运动。

许多人弄不清，为什么毛要对彭德怀如此心狠手辣。是历史上的宿怨（毛是记仇的）？还是彭德怀的“犯上”（毛对自己的权威是很敏感的）？黄克诚认为，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埸，建国後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一《黄克诚自述:》.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二六二页）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毛从彭德怀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庐山会议批彭之后，毛把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评印发给大家。毛说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他下来。

在小组会上，很多人都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上，毛还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二三八页）“从打击斯大林後，佩服赫鲁晓夫，彭德怀不喜欢倜人迷信，不喜欢主席这个称呼，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也是批判的重点。林彪厉声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同上书，二五三也）这个话是说到了毛心裹。

本来在开会之前，很多与会者都认为会议应该继续以纠左为主，彭德怀的信不过是讲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毛把这封信印发讨论并延长会期，虽然他当时没有立即表明态度，但不难猜测出他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从十七日到二十二日的一周间，各小组的讨论，多数是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李锐说：“神仙会阶段……包括大区负责人……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表了态：（同上书，三七三页）

彭德怀的信印发後：

彭德怀在七月二十三日给毛的信中说：“各小组经过六天讨论，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的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基本

上同意的人，他们有所保留的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狂人”这个用语。

那么，毛又何以能够取得胜利呢？

他如此反驳对手：

一、说批评者是给群众泼冷水，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其实，彭德怀是给毛泽东个人写信供参考，他的发言也是在中央的会议上，群众根本听不见，怎么说是给群众泼冷水呢？其次，吹牛、头脑发热，主要不是群众，而是各级干部，特别是中央的一些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群众对吹牛是下满意的。给这些干部泼冷水，让他们头脑清醒一点，有好处。如果受了一点批评就泄气，那就不是革命者了。使群众泄气的，不是彭德怀的批评，而是大跃进失败的事实。

二、错误难免，取得经验。毛说马克思列宁都犯过错误，那么自己犯错误，也不稀奇了？他甚至说：“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比六千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同上书，二二八页）所有这些都当学费付了。问题是，付出那那么贵的学费之后，他并没有学导什么东西。

三、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又是一个公式。毛的意思是说，只有路线正确，成绩总是主要的。如果谁多说了几句缺点，就是分不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批评者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把缺点说成主要的，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没有人敢说这是路线错误，因此只能承认成绩是主要的。这就把大家的嘴封住了。其实彭德怀等批评者并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倒是毛泽东对他们才是抓住一点，全盘否定。

四、算历史帐。把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全抖出来。批判彭德怀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怎样犯错误，和毛泽东的关系“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七开。

五、上升到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堆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说彭德怀等人是右倾，代表资产阶级。把党内的思想分歧，说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说彭德怀等人是革命的同路人；现在革命深入了，就不能继续前进了，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完全是大帽子，就是毛泽东自己批评国的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六、拿理论吓人，大谈哲学。说什么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还说“大放假卫星有几大好处，无假哪裏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同上书二四一页）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对彭德怀大谈哲学，大谈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社会观，又扯到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彭德怀承认自己也是经验主义，毛就批评他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又搬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其实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七、诬蔑。说彭德怀有野心，里通外国，分裂党，伪君子，说“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同上书，一七一页）。毛给张闻天的信，劈头一句就是“你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了部去了？”一语定案，让人欲辩不能。毛说有一个军事俱乐部，那当然就有。于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一直追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逼得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只能“屈打成招”。彭德怀没办法，拍了桌子：“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北京军区参谋长锺伟为彭德怀辩诬：“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锺伟是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具、也拿我去枪毙吧！”结果当场被捕。

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

一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德怀参加。在卢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谷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约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到处散布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同上书，三四七、三四九页）

二是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强加於常委。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据李锐说，其他常委和大家一样，也是临时得到通知去听毛讲话的。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讲话后第四天，政治局讨论。周恩来说要封彭德怀兰七开，到、朱等人同意。毛说：“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彭程、王芳《庐山 1959》，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三四页）

第三，毛一再讲要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要说服不要压服，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分析，这是有希望的，无非两种可能，能改不能改，要帮助他改。对人要有情，留有酴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二六六页）可是实际上却是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批评从严就是乱扣帽子，处理从宽就是让人家对没有杀头感恩戴德，　　第四是逐步升级。毛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说：犯错误的人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究竟中间偏左还是偏右，还要分析。到了把与会者发动起来批判彭德怀时，七月二十六日，毛又说，是右派猖狂进玫。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上，毛又说，彭德怀有野心、伪君子、瓦解党、有计划，这些话都来了。还说上次说跑到右派旁边，只差五十米，说得不准确。（同上书，二四四页）

庐山会议的教训是什么呢？有些人说，还是党内民主重要。但是，共产党本来是有民主传统的，为何丢了呢？把民主限定为一种作凰，那么领袖有这种作风，党内就有民主，否则，就没有民主，这是以领袖个人为转移的。这里面海有党文化的熏陶。

从常委们来说，毛既然对彭德怀定了性，而且多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不满（“隔靴搔痒”、“再上井同山”等等），他们就相继放弃了坚持己见；

刘少奇立刻对毛表示了支持：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党内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欢同志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时，几次提义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把功老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

周恩来在山上忙于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他自己说没有想到会出这件事，加上他曾经受到毛封他“右倾”的批评，这时当然不好为彭德怀讲话。

朱德内心同情彭德怀，迫不得已，只好敷衍几句。毛嫌他讲得不够尖锐，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脚，表示他在隔靴搔痒。弄得他涨红了脸。后来，朱德还劝彭德怀把事情想开些，无论如何不要产生对立情绪。

在军委扩大会上批斗彭德怀时，是有很多阻力的。主持会议的万毅（候捕中央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见没有人发言，就说，应该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他适一诱导，大家就打破了沉默，纷纷为彭德怀的意见书辩护。万毅事后就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被看管起来了。那个义愤填膺的锺为在被押出会场时还高声喊叫：“毛主席，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此外，“五不怕”，对人们来说仍然是“五怕”。有的人在战场上不怕死，因为死了是英

雄、是烈士，可是他们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帽子。正如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所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北京出版社，一九九O年版，二O页）那样一来，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就像祥林嫂所恐惧的那样，一旦有了罪，死後灵魂都不得解脱。这种精神上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承受不了的。

首当其冲的彭德怀，他的心态又如何呢？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那天，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中消除我的影响。"他还说过："庐山会议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彭德怀是抱着一种牺牲的态度，认为自己受些冤屈，但有利于解放军的巩固，所以是值得的。

彭德怀为什么做检讨呢？他觉得他还应该顾全大局。

许多人自己认错和劝彭德怀认错，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都要维护领袖威信，维护党的团结。

其他老帅劝彭德怀做检讨，也是这样说；主席在时，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聂荣臻和叶剑英奉毛之命去劝说彭德怀："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於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做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最後，他们都谈得热泪盈眶。（《庐山会议实录》，二O五页）

陶铸找了黄克诚三次，对他晓以大义：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在此，七月开了一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耻辱大家通不过，最後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我反覆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我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我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全大局吧。"《黄克称自述》，二六一页）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人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时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我们适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我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我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进影响我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同上书）

陶铸给黄克诚写了封信，说..

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於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於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二九九页）

总之，没有人把原则的是非摆在第一位，没有人说彭德怀是对的，毛泽东是错的；也没有人说，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

他们仍然相信毛泽东的善意，认为反对了毛泽东就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要以大局为重等等，总之，都跳不出忠诚这个范围。即使思想不通，也不敢公开反抗。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熏陶，形成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

毛说，“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同上害，三四四页）的确，他利用反彭德怀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地位，让国内的群众干部都不敢讲话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公报中说：“经过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实，过去发表的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公报宣布的粮食实际收获量是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但这个数字依然是虚夸的，以後再次核实，实际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在反右倾运动中承认过去的产量统计偏高，谁还敢议论和笑话呢？

这时，毛泽东是斗志昂扬，他有决心也有信心打败那些敢於向他挑战的人---下止是彭德怀，还有赫鲁晓夫。在八月一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外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二十三日，毛泽东又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开始，中直机关反右倾整风开始，重点批判对象一千九百人，其中司局长以上（中直机关是十二级以上）二百八十七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百分之九点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七九页）全国三百多万干部、党员被重点批评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给左的势头火上浇油。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敎科书笔记中认为：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可高速度。”（《毛泽东思想万岁》，二二四页）。一九六O年，继续“大跃进”中，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又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一拥而上，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农业所受的破坏尤其惨重，连续减产。

在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之时，中苏争论加剧和升级了：一九六o年四月，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苏共也由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苏共代表团向各国共产党代表散发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批评中共的政策。中共代表团也散发声明，点名批秤赫鲁晓夫。七月，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几百个协定与合同。……

主要是政策上的错误，加上气候条件和苏联的停止援助，出现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在这期间，饿死的灾民以千万计（据一份最近的非官方调查，这个数字高达五千万至五千五百万），超国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死亡的人数。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二部 毛泽东与文革浩劫

第十章 文革的准备（上）：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的心病

上面已经说到，从苏联批批斯大林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彭德怀上书之後，有一个阴影笼罩着毛泽东的心灵，像萝魇一样缠着他，使他无法摆脱，这就是赫鲁晓夫的阴影。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本来享有极高的威信，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可是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斯大林就从神坛上跌落了下来，激起了世界上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同声谴责。在西方，许多共产党人要退党，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幻灭；在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十分震惊，不能不使他想到自己。他本来可以引以为自豪地说，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大的错误。可是从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不能这样说了，单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千万计的人口饿死这件事，就足以使全世界震动了。

毛泽东害怕遭到斯大林那样的命运。他既不能容忍有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批评他，他也不允许有人在他身后这样做。换句话说，他不允许中国有人效法赫鲁晓夫。斯大林活着时没有识破赫鲁晓夫，反而信任他，让他爬了上来。毛泽东绝不能重蹈覆辙。赫鲁晓夫是以批判个人崇拜的名义来揭露斯大林的，毛泽东要预防中国出赫鲁晓夫，第一步就要反对批判个人崇拜。

本来，在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是支持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的。这从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论无无产阶级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部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在八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只是一般地赞扬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缺点”，没有提“个人崇拜”。在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在一九五七年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全国宣傅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也一字不提“个人崇拜”，照理在这些文章中是应当谈到这个问题的。

这并非偶然的疏忽，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讲话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思了。他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没有明确说对自己的崇拜是正罐的还是不正确的，但联系到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需要搞一点崇拜”，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在毛泽东讲完後，柯庆施发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陶铸也说了类似的话。毛当时没有说什么话。但成都会议後不久，柯庆施就进了政治局。

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列举了两党之间的一系列原则分歧。其中一条是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说：“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 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

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不久.《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在联名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九评”中的第二篇）中，又把公开信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点发挥了一通。

把这些言论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时所表示的态度相比，可以看出变化之大。一九五六年是赞扬苏共封个人迷信的批判，虽然毛泽东後来表示了一些保留，那也不过是觉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具体做法上人过分，“一棍子打死”。现在却是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了。但是，拿出来的理论根据却是根本站不住的。说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群众间的关系的学说，可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八大上，邓小平正是代表中共中央依据这个学说来肯定“反对个人迷信”的正确性。当时，邓小平是这样说的：l“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只是不满，对赫鲁晓夫则是痛恨。原先只是说赫鲁晓夫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现在却要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了。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因为他需要别人崇拜他。

有一个人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并且马上抓住机会加以迎合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人就是林彪，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林彪就以毛泽东权威的忠心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这次会议后，林彪被人命为国防部长，在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中，排名仅次於毛泽东。从此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首先在军内发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他说：学习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根据林彪的提议，在一九六O年九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中心议题。林彪在会上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的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不同意林彪这些说法和做法，受到批判，并被打为反党宗派集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九一-一九三页）

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七千零九十人与会，故称“七千人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之所以要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统一思想和认识。

刘少奇的发言比书面报告更坦率率一些。他提出了两个比较尖锐的观点：

一、他不同意一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为一个公式”，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

套”。（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虽然他仍然认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但他说这种缺点和错误的关系，“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側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不管刘是不是真的相信成绩是主要的，他提出了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小心地注意不触犯毛泽东。所谓缺点错误是三个指头的说法，应该是毛允许的，因为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

二、缺点和错误是否可以归因于自然灾害的问题，根据农民和一些省市负责干部的反映，他认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人为的错误又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的说法是“没有经验”。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也说“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但在讨论中，有些与会者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服人。于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补充说，除了经验不够外，还有不够谦虚谨慎、骄傲自满等原因。

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中说：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做初步的总结……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一定会比现在总结的更好。他还说，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最近几年，提出高指标，用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实行这些任务，因而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是我们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到:“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他只是提到政治局的集体责任，没有提到毛泽东应该担负的个人责任。毛泽东是事先看了这个书面报告的，尽管他后来说“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但是，他没有提出要在书面报告中把这一点加进去。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他可以表示承担青任，显示他的高姿态；但是，党的文件是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评他的错误的。

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时，彭真把人们心里的疑虑挑明了。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 O 二六页）

这一段或表明，在最初的草稿里，只是说中央书记处要负责，後来才修改成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照彭真说来，毛主席的错误不过是几车水和海洋、几吨土和泰山的比例，讲一下不会影响到他的威信。

细究起来，彭真的话并不符合毛泽东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如果毛的错误不止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如果批评了毛的错误会损害他的威信，似乎就另当别论了。这里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维护毛的威信比坚持党的原则更重要。邓小平转述毛的话，也是毛席自己开脱的：既然没有缺点错误的圣人是没有的，那么毛的缺点成为，也只是表明他不是圣人而已。

如果毛是一个普通党员，犯了错误而用“经验不够”来搪塞，是绝对国不了关的。同志们会纷纷批驳他，要求他深挖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诸如“小西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帽子并不算大。毛一真奉“批评舆自我批评”为党的法宝，他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是严厉的，批评彭德怀是“一棍子打死”；可到事实证明他自己犯了错误时，他就轻描淡写

地对付过去了。

即使是这样，还有人出来保驾。彭真讲话的第二天，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作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按陈伯达的话.“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别人做的，不是毛做的，毛的工作是不受检查的。可是如果不检查毛的工作，又怎样能够肯定毛没有做过“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又怎样能够肯定毛没有责任或没有多少责任呢？而如果毛要负的责任都不能肯定，又怎么追究别人的责任？

陈伯达讲完有，彭真辩白：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话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没有受到认真对待，更没有展开讨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和他的遭遇相比，彭真的话没有受到追究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相信彭真的话也反映了许多与会者的意见，只是他们没有如此明白地说出来而已。

使毛泽东感到不安的，更是贵上反映出来的同情彭德怀的情绪。刘少奇就彭德怀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固的，就可以翻案。”刘少奇说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打断他说：“是主要成员，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本来，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预计于一月二十八日结束。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开“出气会”一再邀请大家在北京国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大家满意”这样，会议有了另一个高潮。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又一次讲话，他号召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不抓辮子、下戴帽子、不打棍子。他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育很大的盲目性。”他不再提出在二十或十五年间超英赶美，而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考查一下他的这个自我批评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一月二十九日，他说：“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直到讲得人家不愿听了，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横直是有错就要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生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这里毛没有说中央要负主要责任，特别是他自己要复主要责任。“谁叫你当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他之所以有责任，是因为他有主席这个职务，而不是由于他做错了事情。那么，他要负什么责任呢？那只说犯了官僚主义昀错误。意思是下面犯了错误他不知道。

一月三十日的讲话中，毛这样自我批秤：“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後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青，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八二二页）

毛说，他过去讲过自己的缺点成为，但他没有说他是怎样讲的。他批评许多地方当时没有传达，但他为什么不说凡没有传达的地方一定要传达呢？是什么不把他过去的讲话印

发给大家呢？这个会上的许多地县级干部，是不知道毛的那个自我批评的内容的。

毛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从哲学的高度，讲“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说中共从建党到七大，一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中间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又经过三年半的整风运动，才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弄清了民主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因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個过程，现在还缺乏经验。这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一般来说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表明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具体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具体分析一九五八年以来错误的原因，单讲哲学上的道理就不够了。

哲学道理，使“缺乏经验一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毛说自己“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懂得不多”，他说，民主革命时期. 一开始也是没有经验. 这时，他显得很有自知之明。可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却并没有因为“懂得不多”而缺少自信。既然经验不够，为何不谨慎一点呢？这就要涉及“骄傲”和“好大喜功”这样的问题了，可是，毛用哲学的大道理掩盖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刘少奇的正式报告倒是谈到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犯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里谈的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但是这不能理解包括毛泽东在内：刘少奇内心深处如何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个报告绝不代表他个人，是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搞出来的，而且要在全会上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这句话之所以能够通过，正因为没有人认为它是针对毛的。

毛本人在大会上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民主集中制”，他丝毫没有说到他自己违反了这个原则，只是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还不理解民主集中制，论据之一就是听不得批评。毛还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他还说：“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据在场的人说，毛讲到这里时，声音很大，震動全场，显得十分生气。他很少在大会上发如此大的火。

毛感到很多人没有把话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就建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出气”。从一月三十日以後就是“出气”会，对工作提出批评。这次来开会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很多，他们当然对中央提不出什么批评，而是对省委很有意见。这样，毛泽东就成功地把大家的怒气引到省委头上。他作为罪魁祸首，不但躲通了批评的矛头，而且还俨然是支持大家蝎所欲言、反对压制民主的。

周恩来在二月三旦福建组讨论会上说，五年来五大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 0 年整风整社，一九六一年民主补课，夺取领导权。这五大运动每年一个，偏差不少。主要责任在中央。因为是中央提倡的。搞错了的要平反，要做细致的工作。周没有提到反反冒进，但他提到的五大运动，都是毛泽东发动的。

朱德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打击面大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

邓小平也讲了“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 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不应当伤害的干部”。

也有一些干部为六割少奇的报告对通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质问“《农业发展

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

但是，出来大唱赞歌的，只有林彪，听说：”我们党怍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此较起来，次要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事情总是不完全一样的，有成绩，就不会没有缺点。可以说，没用缺点的事情是永远没有的。”“我们党在这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斡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法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毛泽东的处境再次不利的时候，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工作中的缺点的时候，林彪讲了一通成绩如何大，缺点如何小，成绩要归功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干扰：“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回小得多，弯路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在困难的时候，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林彪的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带头鼓掌。毛泽东还对罗瑞卿夸奖林彪的讲话水平如何高，说“你就讲不出”。

毛泽东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尽管大家对他还是那样尊敬，他的内心肯定是疑虑重重的。三年困鞋是谁造成的？--他能逃脱责任吗？经济又是怎样恢复的？--还不是别人的功劳吗？党内会不会有人认为，彭德怀是对的，当初听了他的意见就好了？

主要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对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贯彻，到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济已经明显好转了。

阶级斗争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看清了党内的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林彪是维护毛泽东的，是“紧跟”和“高举”的。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开始想到林彪作接班人。毛已经从刘少奇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

形势封彭德怀有利，彭德怀也许认为，现在到了解决他的阿题的时候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长信，六月，这封信送到了中央。彭德怀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八月，彭德怀再次写信，要求查证他的问题。毛泽东从这两封信再次警觉到彭德怀翻案的危险。实际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号召大家讲话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他肯定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讲话中嗅到了某种危险：党内高层还有不少人同情彭德怀。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说。

直到这年的七月和八月，在北戴河会议和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开始算帐了。

认为一九六二年春天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黑暗风”，对他从未表示反对的安徽等省的包产到户说是“单干风”，指彭德怀向中央递交的申请书是搞翻案活动，不能袷他平反，岁错整的人的甄别和平反工作是“翻案风”，把一些正确的意见斥为右倾机会主义，说这是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的表现。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从这以後，毛泽东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他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主持制定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当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批判苏共中央的重头文章（“九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又写了第二个批示，提出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问题。随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并封一些文艺作品展开批判，这个批判迅速扩大到整个学术界（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最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批判海瑞点燃了“文革”之火，这不是偶然的，他表明了“文革”和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这两件事的联系。实际上，学习海瑞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他又一次“钓鱼”。海瑞敢于骂皇帝，彭德怀敢于顶撞毛泽东，这就是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罢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接班人的造神运动

一九六四年五月，林彪授意下，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刊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林彪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此后，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及班人？这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埋下了用林彪来换掉刘少奇的伏线了。从文字上看起来，毛泽东说的是下一代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认为老一代也有问题。两年后，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从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四八九页）这意思就很明白。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定下这个决心的时间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的时候，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刘少奇不同意，两人有过争吵。这个争吵对刘少奇是致命的。他成了继彭德怀之后敢于冒犯毛泽东权威的又一个领导人，等待着他的也是和彭德怀一样的命运。毛泽东後来对斯诺说，他就是这个时候下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刘少奇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後，他成了“头号党内走资派”。

和彭德怀、刘少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他善于对毛泽东察颜观色，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在“文革”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中，说出了毛泽东最喜歓听的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所经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封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黛共珠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说彭罗陆洋杨要搞政变。

为配合会议，《解放军报》五月四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会上，批评朱德，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会场，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八”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事先也得到过毛泽东的认可，这个讲话经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转发到全国，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现在终于有人公开说他超过马克思了。然而，毛泽东终于做是有些不安的：讲话是高度吹捧他的，他同意转发全国，岂不是有些不前虚吗？毛泽东才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批示同意，一方面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对林彪讲话中的某些提法表示保留。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後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 林彪确实是出了大力的。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另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后发动“文革”？林彪说过，“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及刘丰的谈话）这个说法是可以同意的。不过，第一条的正确表达应该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第二条是由于林彪控制了军队。林彪之所以掌握军权也是靠搞个人迷信，林彪带领在军内搞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这个运动影响了全国，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学习解放军”。

从一九五九年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號，经过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六三年的“四清”运动，和六十年代前期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一系列批判，这期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越来越加深，这就为“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今天有许多年轻人对对当时有那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感到奇怪；在那时，这确是十分自然的。

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鼓励个人崇拜，就是参与创造这样的条件。“文革”又反过来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顶峰，而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之一。

毛泽东不是没有对“文革”中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做过任何批评；他批评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然而那效果却像在一团大火上撒几滴水一样。只是到了一九七一年，当他已经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的时候，他才在接见斯诺时说了个人崇拜应当“降温”，

“．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是林彪对毛泽东加的四顶桂冠）的提法“讨嫌”的话，那已经晚了，而且仍然是很不彻底的。

“文革”不仅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有密切联系，也和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有密切联系。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话确实泄露了毛泽东的满腹心思。庐山会议后的七年，“七千人会”后的四年，毛泽东开始报复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

第十一章 文革的准备（下）：斗争哲学和批修

尼克松的女兄朱莉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会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一九七六年初，她和丈夫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朱莉在第二年写的一本书《特殊人物》中，详细叙述了适次会见。毛这时已体弱多病，衰老不堪。当朱莉看到毛在两个穿着毛式服的年轻女人的搀扶下挣扎着站了起来时，不禁感到惊讶。“不管我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主席，当我们实际上站在他面前时，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见他是一中打扰。明显地是由於一次中风，他的下颚下垂，使得他的样子有写发呆。他的黄皮肤差不多是半透明的，像蜡一般，而且几乎完全没有皱纹。他的乾净的毛式服--和他的仆人的衣服是一样的灰色--松松垮垮地褂在身上。他的长长的臂和巨大的手像不堪忍受的重担悬吊在身旁。当他说话时，聱音是咕哝咕哝的，刺耳，粗糙，吃力。”

这样一个将要见上帝（或马克思）的人，心里想着什么呢？

“年轻人吃不了苦”，他封我们说 o“要告诉他们需要斗争。”在这次会见中他第一次显得有生气了，像一个年轻人。他有力地戳着食指东强调斗争的需要。……“党内要有斗争。阶级和阶级要有斗争。除了斗争，什么都是靠不住的。” (Julie Nixon Eisenhower:SpeciaL People, P.161,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7)

朱莉评论说：“对毛来说，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词而已，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这是说得对的。斗争--是毛至死念念不忘的信条。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哲哲学辩护；作为一种“党文化”的因素，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尽管“斗争哲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眨义词，但由於它以辩证法的名义出现，对真正的辩证法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和混乱，迄今没有很好地澄清。“斗争哲学”之所以能一度大行其道，和长期以来我们对辩证法的了解不够是有关系的。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重要内容被丢掉了。为了肃清“左”的流毒，应该作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复辩证法的本来面目。

两椿哲学公案的背景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一九六四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表面上好像仅仅是围绕杨献珍的观点，其实背后都有国际背景；前者牵涉到斯大林，后者牵涉到赫鲁晓夫。

《实践论》和《矛盾论》部写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属四个特徵，第四个特徵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发展，而是通国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是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假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次赋予一种盱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一九五一年，毛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相继公开发表。

《实践论》在《人民日稿》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

《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後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後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與和平的“互相联结”；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一九五四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述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只提封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怪，他下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慨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失，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一九八八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畏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佶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了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封“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後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一九五三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法表了自我批评。

以後，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变的《简明哲学词典》的一九五四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於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於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仍是根本封立和相互一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舆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输》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平《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三七O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一九五五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後，在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

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舆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後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四七一三四八页）

接着，二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产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虽然毛在这一次反驳了《简明哲学词典》，但那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的，广大党员宾不知情，更不消说党外了，毛显然认为，既然《简明这些词典》是公开发行的，那么，也需要在公开的刊物上进行反批评。

一九五八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他也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封《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八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是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二二一页）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人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 Idenuitaet，就是英文的 identity。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 idenical (同一的)，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同一（他们的‘同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列宁《哲学笔记》，三九七 I 三九八页）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

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觉得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二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长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遇是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样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臣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稚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恩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後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後半是矛盾的：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後半却否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9]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大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揄。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後走到康德那里去。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退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国的物质的东西"。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

[9] 对杨献珍这篇文章的详细评论，请参见我的《辩证法的命运》一文。此文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本文的有些部分取自这篇文章。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作为参加争论的一方，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增写了一段话，就是后来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中毛讲到有很多同志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觉得不可理解。这是针对杨献珍的，不过说得很含蓄。

到了一九六四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转折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九八页）这是说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或两个方面，避免片面性，这里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封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中批评有些干部对工作不採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即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并号召共产党人掌握“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同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四O—-四o二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一分为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此之前.“一分为二”的“分”是指分析、区分；在这里，“分”却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章杂志曾鼓吹说，提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其实，这只不过是对立统一换了一个表述方式，算得了什么呢？而且，毛的这种说法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哲学笔记》，三九七页）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没有错，但不如“对立统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泽东把它称为“两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间状态，变成了“两值逻辑”。

例如，在毛泽东看来，文学艺术的作品，要么是“香花”，要么是“毒草”，那么，有没有不香的花和无毒的草呢？其实，这种作品是大量的。有许多作品的内容有不健康的东西，但没有严重到有毒的地步；另外也有许多作品有可读性，但未必够得上“香花”的美称。再如，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种，要么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再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怎么能把知识分子

这样简单地归类呢？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其实很多不是反革命的人，未必就是革命的，而很多不革命的人，也并非反革命。

还有，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这样提出问题："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後，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畲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想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此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毛泽东原来提的是"新民主主义"它既不同于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於资本主义，而这条道路要走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思想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毛泽东自己说过的。现在毛泽东改变了问题的提法，於是三种选择变成两种选择了。

这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明显地带上黑格尔说的"知性"的特点：非此即彼。它的好处是明确，不含糊，但是失之简单化和僵化，缺乏辩证法应有的灵活性。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一九六三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的联系着的"。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杨献珍开始转向辩证法的时候，毛泽东却从辩证法后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 因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这个"一"里而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10]？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毛自己的解释是，他关于"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以及哲学要从课堂和书斋里解放出来的换"触到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参见本书四一三页）

这个话是不足信的。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我认为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

[10] 可以注意的是，《矛盾论》引证了列宁的话："对立的统"（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这里明确地把"统一"和"合一"着作一回事。虽然後来译文有修改，这个"合一"改为"均势"．但这是一九九O年的事（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三四O页的注【三】)，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当时他引用这一段话，表农他并不认为"合一"这个词是不能用的。

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一九五八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

在我看来，只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讲《实践论》是不对的。列宁的这本书只讲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对认识论的辩证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宁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讲得不够，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讲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这两个缺点，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弥补（自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的观点来自苏联哲学家）。至于第二点，杨献珍当然是正确的，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勇气。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六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米丁、费多谢也夫），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本文的前面已经提到了马克思的有关原文。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離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部署。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九评”)。在国内农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一九六三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渭“三合一少”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一九六四年的十六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封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批评说，有人“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割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这牵涉到刘少奇的观点。一九五七年，刘少奇在阐述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曾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以同一性为主”. 敌我矛盾是“以斗争性为主” 此

外，这篇文还批评杨献珍“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外交上的一个方针。

这些言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杨献珍後来说，这是康生在整他。其实，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当然，毛泽东可能是听了康生的报告。

这篇评述被《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转载。随后，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杨献珍的文章。[11]这场批判甚至扩展到工人和军队之中，成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这里随意从当时的报纸上举一个例子。一位大庆油田的工人说：“原来‘合二而一’论是主张阶级调和，主长不斗争，不革命，反对革命。谁反对革命？只有资本家、地主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才反对革命，才会欢迎‘合二而一’：真正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绝不能同意‘合二而一’的谬论。我们一定要认清‘合二而一’论的危害，坚决同它作斗争”。这样，政治声讨代替了理论批判。中国的人民群众普遍在思想上做好同苏联分裂的准备了。

就在转载《红旗》文章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来信的覆信。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是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责苏共執行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 斥责这封信是“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号令”，覆信断然宣称“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并说，召开这种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我们已经警告通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

这封信的语气之强烈和措辞的尖刻令人震惊。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的口吻。（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O 七页）

毛泽东准备“一分为二”了！

综合：“一个吃一个？”

用“一分为二”去否定“合二而一”，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通的。在初期，当这个问题还在自由讨论的时候，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说，单提“一分为二” 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有人说，有分析就有综合，因此，有“一分为二”就有“合二而一”。还有人说，水不就是氢和氧的“合二而一”吗？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伯茂的文章《浅论关于“一分为二與合二而一”的讨论》。作者提出，有一种类型的矛盾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但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矛盾，如红与专、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等，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合二而一，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

当时我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我听说，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後，把康生叫去，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难题，不好办。但是毛并不想吸收正确的反对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在北戴河和《红旗》杂志组织的一个准备“一分为二”问题的班子谈话。二十四日，他又找于光远和周培源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文章问题。这两次谈话的纪录从未公开发表，但它们却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哲学思

[11] 作者也曾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的文章，其中批评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还给杨献珍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我已经不止一次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提一下。

想的重要材料。“文革”的混乱时期，有些红卫兵组织把它印出来了。

这两次谈话都涉及氢氧化合成水的问题。毛表示他赞成北大化学敦授傅鹰的观点，他也提到《光明日报》八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文章。[12]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观点作出清楚的解释。他就：“地球原来是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水不是随便一下就变成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毛的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氢氧化合成水是不是“合二而一”同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同他在一九五七年讲的不一致，当时他说，“所谓封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溲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搞成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一九--三二 0 页）这不就是氢和氯的“合二而一”吗？

对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显示，毛泽东还是把某些反对观点放在心上的。这些反对观点最有力的一个是：如果“一分为二” 是分析，那么“合二而一”就是综合；不能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因此也不能只讲“一分为二”而不讲“合二而一” 。

毛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现在毛泽东要讲实际的综合分析。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说分析就是说双方各有多少力量，多少军队，多少地方，各有什么强处和弱点。那么怎样综合呢？“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里来，兵士也都综合了。”

毛把这种现象提升为一个普遍原则，他继续说：

“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

毛以“大鱼吃小鱼”和共产党军队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例来说明综合并不是两者并存，这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普遍原理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们完全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男女结婚，组合成一个家庭，这应当是一个实际的“综合”例子，可这是谁吃掉谁呢？共产党喜欢讲“领导和群众结合”，这又是谁吃掉谁呢？说任何东西部是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这当然是辩证法的常识．但把“你死我活”的现象普遍化，这倒是像霍布斯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只使人感到恐怖。从社会历史来看，“你死我活”的现象当然是存在的，但更多的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情况：不然的话，人类社会早灭亡了。

[12] 这篇文章题为《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署名郁之)。其中说，氢和氧化合成水是“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其间要经过许多复杂的步骤，有很多一分为二的过程，例如一个氢分子分解为两个自由氢原子（H2→2H）毛肯定了这篇文章。其实在文章列举的方程式中，还隐藏着诸如一个氧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结合为一个自由基(O+H→OH）这样的情况。作者说这是“由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厚子组成的新的统一物”却不说这是“合二而一”。而且，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最后结果运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合二而一”(H20)。

毛回避了红与专、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工业与农业专业相反相成的矛盾，把“分”与“合”截然封立起来，只许讲“分”，不许讲“合”。这既违反现实生活，也违反辩证法。

这次讲话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共存，明确地否定了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批评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说：

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只消从自然科学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驳倒这个论断：磁铁的南北极就是不可分割的。把一块磁铁分成两半，每一半仍然有南北两极；再分也是这样。毛泽东这个论断，和他过去的观点也不一致。《矛盾论》里说，矛盾双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难道“互相依存”不就是“不可分離”或“不可分割”的意思吗？这是逻辑上的不可分离，并不否定矛盾双方的分化和分裂，并不否定“一分为二”。

过去，毛泽东批判斯大林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现在，毛却从这个立场后退了，和斯大林站在一起了。

本来，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是错误的；到了批“合二而一”的时候，毛泽东是错误的了。

从哲学上看.“一分为二”也好，“一个吃掉一个”也好，都是很浅薄的，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本来是不值得重视的；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它，只因为它在政治上起了重要作用。毛在这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要同“修正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值得重视的倒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对“否定的否定”的否定。这个观点涉及一些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且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密切关系，值得我们详加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都是肯定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从小生产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到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澄法》中提出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质量互变，封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他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概括出遣三条规律来的：“有论”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本质论”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总念论”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13]

列宁没有机会读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他在《哲学笔记》中记下这样的观点：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不过，他对“否定之否定”也是肯定的。

在一九三八年《联共党史》出版之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是依据恩格斯的提法，讲“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讲辩证法，改为讲“四个特征”，其中抛弃了“否定之否定”。此後，这条规律就从苏联的教科书中消失了。

[13] “总念”的德文是Begriff．英译作 notion。现在中译多作“概念”．虽然看起来很通俗，但一般人了解的“概念”通常指抽象概念，而黑格尔的Begriff是指具体概念，两者意义不同，很容易产生误解。已故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者贺麟教授曾用过“总念”这个译名；虽然他在一九八O年的新版中又改用“概年”．但他也说“总念”这一译名也不是不可以用的。我认为还是“总念”这个译名较好。另外，“有论”贺译为“存在论”，我这里采纳了杨一之教授的意见，将黑格尔的Sein改译为“有”。

毛泽东想沿着列宁的“封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观点前进，把“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都纳入“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中去。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说到：“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在这里，毛引人注目地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改变说“肯定否定的规律”。不过毛当时没有对这种新的表述加以说明。

毛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哲学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恩格斯提出辩证法有三条规律是不必要的，只要“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就够了。“质量互变”可以看作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定之否定”就是“再肯定”：事物发展的过程可以表述为“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根本用不着什么“否定之否定”：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应为三个规律--引者注），我就不相信那三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范畴，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地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事物的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这个意思，毛泽东後来在一九六五年写成了文字，如下：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讲对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於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就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八四七页）

在这里毛泽东企图把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论点做出提纲式的解释，把辩证法的其他内容--不仅是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还有联系与发展--都合并到对立统一规律中去。在他看来，一切联系都是对立物的联系。这样，他就把“差异”和“对立”混为一谈了。这个观点，在《矛盾论》中已经有了，其中说：“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差异可以发展为矛盾，但并非一切差异都是矛盾。黑格尔是区别这两者的；他举例说，一个骆驼和一支铅笔的关系，就是“差异”而不是“对立”。每个事物都处在极其繁多的关系中，有许多和它有关的东西，这种状态是“杂多”。杂多的事物都是相异的，但只有本质的差异才是对立。“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小逻辑》第一一九节附释）

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主要的讨论问题是否定之否定。

毛杂多并没有理解黑格而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的深刻性。他对这三条规律的理解，显然只是从苏联哲学读物中来的；这些读物确实是把这三条规律平列的。另外，恩格斯的概括也容易导致误解。“质”和“量”只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对范畴：黑格尔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范畴（如同一和差别，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普通与特殊，等等），不知为什么恩格斯单单抽出质和量这一封范畴来，韭把它们的关系提升为规律。黑格尔虽然在“本质论”中讲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但在别的部分也讲到了，不是单单在这个部分讲的：而且，要把这个规律讲透，就要同“否定之否定”规律结合起来。三条规律确实像是平列，看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辩证法的规律就好像成了“实例的总和”。毛泽东说质和量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对的，

恩格斯斯在他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举了大量例子来税明这三条规律

以後苏联的哲学读物也照此办理，“质量互变”规律之所以引起共产党人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可以用来证明革命的必要性：改良是量变，革命是质变，质变优于量变，因此，要作革命派，不要作改良派……。

这牵涉到如何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黑格尔的三段式

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和这三条规律相对应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有论”、“本质论”、“总念论”不是平列的，而是代表了辩证逻辑和认识发展的三个层次：

“有论”中讨论了“有”和“无”.“质”和“量”等范畴。它们代表人的最初的认识阶段--简单的感知。某物有或者没有。糖是甜的，花是红的；这是事物的质。山是大的，沙是小的：这是事物的量。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范畴的特点是直接性，彼此之间似乎是独立的，不相干的；如果它们之间有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是外在的，只是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如从质过渡到量)。它们之间的真正的内在联系还是隐而不显的。

黑格尔指出：“事物真正地并不像它们直接表现的那样。所以要想认识事物，仅仅从一个质反覆转变为另一个质，或仅仅从质过渡到量，从量过渡到质，那是不行的。”(《小逻辑》第一一二节附释）因此就要把事物分为表里两层，由表及里，这样我们就进入“本质论”这个较高的层次。“本质论”中的范畴不再是直接呈现在感官前的东西，而是要靠抽象的思维来把握的。黑格而这个阶段为“反思”阶段或“知性”阶段。这个阶段出现的范畴是间接性的、二重性的、互相依存的；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與偶然。说“本质”就必然意味着有它的“现象”，没有现象的本质就不是本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也是这样。“本质论”中的范畴是科学家最常使用的范畴；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给事物分门别类，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在现象背後发现本质，从结果中探寻出原因。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看成是固定的：现象就是现象，本质就是本质：必然的就不是偶然的，偶然的就不是必然的。界限分明，非此即彼。这是知性思为的特黠，也是黑格尔常常批评的形而上学思为方法的特点；它所遵循的是形式罗辑的规律。

“总念论”是最高的阶段，就是“理性”的阶段。如果思维的运作方式在感性阶段是“由此及彼”，在知性阶段是“由表及里”，那么在理性阶段就是“由偏及全”或者“由分而合”，思维看到，如果对立的每一方总是绝对肯定自己，绝对排斥对方，这是不能解决矛盾的；因此，需要把肯定的一方与否定的一方结合起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真理。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概念”. 即总念。让我据一个中国哲学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公孙龙子的“白马论”。

“白马是马”这个命题，大家习以为常。但细究起来，这里面是有矛盾的。 “马”是一般概念或普遍概念，“白马”是特殊概念，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两者的外延也是不同的：“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我说要一匹马，这对马的颜色没有限制，牵黄马黑马来都可以；我说要一匹白马，黄马黑马就都不行了。公孙龙子第一次发现了日常语言中的这个矛盾，这是他的贡献。但他对待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来否人另一个方面。

黑格尔也发现了这个矛盾，但他不是用矛盾的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而是承认矛盾的真

实性。如果我们采纳他的观点来看，大家习惯于说“白马是马”，谁说“白马非马”就会被认为是胡说，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守形式逻辑，而且只遵守形式逻辑就够了。可是要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探封，形式逻辑就不够用，而需要辩证逻辑了。大家都说“白马是吗”，谁都不感觉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说“特殊是普遍”. 大家就会惊讶了：特殊是特殊，普遍是普遍，怎么能说特殊是普遍呢？其实，“白马”是特殊.“马”是普遍；说“白马是马”，不就等于说“特殊是普遍”吗？

问题在于：说“特殊是普遍”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说“特殊不是普遍”也没有错。同样的道理，一般人说“白马是马”是对的，公孙龙子说“白马非马”也没有错。但如果用“白马是马”否定“白马非马”. 或者用“白马非马”来否定“白马是马”，那就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白马是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同一性；“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是表明“白马”和“马”的差异性。“白马”和“马”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这个差别性，是存在於同一性之中的差别性；这个同一性，是包含了差别性的同一性（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性”）。既不应该用同一性来排斥差别性，也不应该用差别性来排斥同一性。因此，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说，白马是马，白马又不是马。[14]这样，我们就可以较好地了解恩格斯为什么批评那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的观点是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三六O页）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方法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按照形式逻辑，“马”这个一般概念，是从所有的特殊的个别的马中概括出来的，其方法是把它们的特殊性全部抹去，只留下共同点。这样得出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由于把“特殊”排除在外了，这个“普遍”就同“特殊”成了不相容的东西，黑格尔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提出了“具体概念”，提出了包含差别的同一，包含特殊的普遍。按照这个观点，“马”这个普遍概念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而是有内容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它体现在千差万别的特殊之中；白马、黄马、黑马、老马、小马：公马、母马；蒙古马、阿垃伯马⋯⋯所有这些特殊的马，都构成“马”这个普遍概念的各个环节，是普遍的“马”自身内部的区别和分化。[15]

黑格尔看到，如果普遍的東西仅仅是普遍的，特殊的东西仅仅是特殊的，那么双方都没有真理性，或者只有片面的真理性，而真理应当是全面的。因此，需要一个第三者，由于它的中介，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了。如“普遍”与“特殊”的对立，在“单个”这个范畴中得到了克服；“单个”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举例来说：项羽常骑的骏马名“骓”，它有马的普通性，又有“骏”（良马）的特点，还有“苍白杂色”等特殊性；这样，这匹个别的马就把马的普遍性與它独有的特殊性统一在自己身上了。“普遍”是“正”，“特殊”是“反”，“单个”就是“合”。在合题中，“正”“反”两方面得到了统一，但同时又保持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正题、反题、合题，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好像是向“肯定”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高阶段的回归，有如螺旋形的发展。

[14] 我在这里对公孙龙子的阐释不同於冯友兰氏和任继愈氏；他们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对公孙龙子采取了简单否定的办法，斥为形而上学。其实，我认为公孙龙子的观点应属于黑格尔说的“消极理性”范畴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请参看本文後面的解释。

[15] 实际上，如果停留在思维的领域，从普遍概念是不能推导出千差万别的特殊事物的，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学说出发，坚持认为，从普遍到特殊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他的头脑中发生的过程，而且也是头脑以外的现实发展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唯心主义的表现。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以一般的“水果”和苹果、梨、扁桃的关系为例，批划了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参看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思辩哲学的秘密)。

“正、反、合”的三段式，不止是“总念论”的原理，而且贯彻在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之中。例如，质和量的统一是“度”，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是“实在”。本文开始部分所引马克思的话：辩证运动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封立，自相结合”；“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就是想说明这个意思的。

如果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也不妨说，宇宙的三段式是：

（一）太一，或太极。这是混沌的元气，或原始的统一，其中的对立是潜伏着的。

（二）一分为二。这是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对立展开了。我们还可以把“天”与“人”的对立放在这个阶段，如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西方，这种思想的先行者是弗兰西斯·培根，他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在实践上就是工业革命：这种观念起过伟大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但过度的榨取自然破坏“环境”反过来使人自身尝到苦果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中的“自然斗争”，就属于这种过时的思想，毛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了，向“自然开战”的口号，在实践中就发展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所探用的方法：千万人民齐上阵，“战天斗地”，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大破坏。

（三）合二而一。对立得到解决，阴阳调和，或天与人重新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这就是今天出现的环境保护思想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只有经过工业化的“征服自然”阶段，才会产生这种现代的思想。人与自然的斗争并没有消失，但这种地址受到节制。人把自然更多地看作是母亲而不是敌人。这里我没有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概念，虽然这个概念近年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秤价；在我看来，这种“合一”并不是经过矛盾的展开和克服而达到的“辩证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看，“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就不再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而是代表了两个发展阶段。[16]

两段式还是三段式？

现在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过度和黑格尔的作一个比较。

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立双方斗争着，待到“一个消灭一个”后，矛盾就解决了，“否定”的一方战胜了“肯定”的一方。这个“否定”又遇到一个对方，双方展开新的斗争，最後这个“否定”又被对方所否定，这就是“再肯定”。“再肯定”之後又是“再否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称为“肯定”，也可以称为“否定”。因此，三段式是没有必要的，肯定与否定的两段式就够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同他的“两分法”是联系着的。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要用三段式呢？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甲被乙否定，乙被丙否定，丙又被丁否定……这样否定来否定去，可以无穷无尽。黑格尔称这是“坏的无限性”。用中国古话来说是“往而不复”；如果“复”

[16] 不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还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都没有表达出辩证法的本质。杨献珍局限与强调“合二而一”，只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坑一只是说对立方面是一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这是不够的，甚至没有达到方以智的深度。方以智说：“太一分为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盖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里说的“交”，“相反相因，因二以济”，就有对立双方互相作用的意思。“合二而一” (对立统一）不是两者简单地相加或合并，它所产生的的“一”是一个新的一，而在这个新的统一体中，雨个对立方面都不再保持原样了，所以说“而实无二无一也”。方以智《东西均》一书一九六二年由中华数书出版。侯外卢在序言中认为：“方以智的朴素的辩证法在形式上观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是超越前人的大发现……”不过方以智说的“合二而一”并没有包括天人关系在内。

的话也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两个否定等与一个肯定）。这只能表明“变化”或“循环”，并不能说明“发展”。要有发展，就要真正解决矛盾，而矛盾并不能依靠“你死我活”的斗争，依靠“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乙方要绝对地排斥甲方，抛弃甲方，消灭甲方，那么甲方也会对乙方采取同样的方式。但甲方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根据或理由；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它的真理性是片面的，而乙方对它才取简单排斥和抛弃的态度，就说明自己也有片面性。要真正解决矛盾，就要给矛盾双方以适当的地位，承认双方各有道理，同时克服双方的片面性。这就产生新的第三方，即丙。如果甲是“肯定”，乙是“否定”．丙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正题”是甲，“反题”是乙，那么“合题”就是非甲非乙，亦甲亦乙的丙”。这就是“辩证的综合”。从“正”到“反”再到“合”，这是走了一个圆圈，但并没有简单回到出发点，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确切地说，是一个螺旋形的梯子。当然，这个丙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开始新的一轮三段式发展。这样，在事物或范畴前进的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抛弃，而是被带进了新的阶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肯定”与“否定”双方的名称是可以互换的：把“肯定”叫做“否定”，“否定”叫做“肯定” ，均无不可。之所以可以这样互换名称，因为双方都是对自己简单肯定，对对方简单否定。但是第三段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这个僵固的三元封立，它是辩证的否定，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黑格尔用的是aufheben这个德文词，它有三义；举起；取消；保留。中文译为“扬弃”：又“扬”又“弃”．也就是又否定又保留，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保留。因此，把这种“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同筒但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混淆起来，都是不可以的。[17]这是黑格尔为什么不用两段式而用三段式的理由。

毛泽东虽然也想说明“综合”，可是他的“综合”并不是黑格尔的“合题”。他说，任何人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这意思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没有第三种可能。这和他早年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综合”其实就是简单的“否定”。毛泽东用战争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是很恰常的：对待矛盾的双方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必须坚决、撤底、乾净、全部地歼灭之。（毛泽东语）

“一个吃掉一个”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辩证的否定。恩格斯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解释。在《反杜林论》中，他在用大麦和昆虫的生长例子来说明“否定之否定”之后，设定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如果我把昆虫一脚踩死，这不也是否定吗？恩格斯回答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四八四页）上面这种否定是把对方的观点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或者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补充的论证。这样，在对话结束时，双方的观点就会比开始时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或者变得一致。只要对话双方的目的都是寻求真理，那么谁胜谁负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真理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矛盾如何推动事物发展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它和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讲的有一些不同。

《矛盾论》说：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贸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

[17] 时下有些文章把“扬弃”当作“抛弃”的同义词来使用，这是误解。

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的两个方面（新与旧，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斗争的结果，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三种含义。这里说的转化，是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的转化，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而成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经过这种转化，统一体的性质就改变了，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对立双方仍然存在，继续着斗争，直到旧的方面归于消灭。当然，这时又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毛泽东的这种解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过是把社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为宇宙的普遍规律，然後又用杂烩普遍规律来说明阶级斗争。他在这里说的“统一体”，并不是合题，它并不能解决双方的对立，只是给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地盘。胜利的一方并没有从封方吸收任何东西，它的变化只是由小变大，由非主要方面变为主要方面。

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是简单否定的关系，那么，即使指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相互相转化的，这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仍是不够的；他称这个是“消极理性”的观点。之所以是“理性”．因为它已经不同与知性而有了辩证法，它承认事物的矛盾；之所以是“消极”，因为在这里对立双方只是单纯否定对方，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黑格尔认为，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思维方式是“积极理性”．或“思瓣理性”。它和“消极理性”不同；它所主张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把对立面排除在自身之外，而是把对立面加以改造，吸收到自身之内：同时，为了吸收对方，自身也作了改造，双方融合为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的差别和对立并没有消失，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互相排斥，而是和谐的、互补的关系：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相反相成”。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的同一性”。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就是指这种具体的同一。只有这样理解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才算是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

这样看来，否定三段式，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把黑格尔理解的“对立的统一”也否定了。

从“两条战线的斗争”到只反右不反“左”

根据上面的叙述来判断，需要对毛泽东的辩证法造诣重新评估。毛泽东在前期的有些著作中，确实对辩证法的运用大到了很高很熟练的水平，令人赞叹；但是，他的辩证法从总体上说仍是处于“消极理性”的层次。难怪毛泽东的辩证法最好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难怪毛泽东会把辩证法归结说“斗争哲学”。

在少数的場合，毛泽东也曾表现出“辩证的综合”的观点。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在谈到向外国借鉴的问题时，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東西”。“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他指出：鲁迅的小说，就既不同於外国的，也不同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这个“不中不西”，我们可以了解为“中”与“西”的融合，毛泽东用骡子来作比喻，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无论

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在医学方面，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在另外的地方，毛泽东在说到中医和西医的前途时，说到将来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医学，既不是单纯的中医也不是单纯的西医。

这种观黠，和上面所说的“一个吃掉一个”显然不同，倒是可以说是“辩证的综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说法，说的是党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条战线是反右，一条战线是反“左”。如果说右是肯定“左”就是否定（反过来说“左”是肯定，右是否定也可以）。这两重倾向是截然相反的，互相排斥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到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的路线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右（陈独秀是否如此，这里暂不论）。王明批判了陈独秀的路线，但他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土地革命後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左”。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呢？毛泽东认为应当是“又统一又斗争”：既应当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对同一战线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这是一中综台，“联合”和“同争”的两重性政策。（参看《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九四 O 年的《论政策》和一九四一年的《农村调查・跋》）实际上，这就是对王明路线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王明路线和它的对立面陈独秀路线双方的合理因素都加以吸收，同时批评双方的片面性。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是在很少的場合才表现出这种“辩证的综合”的思想。

“左”和右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说遇，“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一 O 页）他还批评过党内的“‘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同上书，一五三页）虽然如此，他自己也认为“左”比右好一些，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同上书，四二四页）一九五七年，在批评陈其通等人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左”的错误态度时，他没有忘记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可是在批评锺惦斐的所帚“右”的错误时，却没有这样说。难道锺惦斐就不要革命，就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吗？

此後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左”的片面性，变得越来越只反右不反“左”了。

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六九页）这最後达到的团结，似乎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程序达到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恢复了团结，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就会看出，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只是用党中央的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克服不同的意见，统一全党的思想，丝毫没有从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的思想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得到广泛赞扬的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来就有两种对待不同学派的传统。一种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一种以《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孟子以替天传道者自居，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词”。苟子在《非十二子》中虽然承认这些派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认为它们全是“欺惑愚众”，大骂了一通。总之，除了舜、禹、仲尼、子弓，其他都一无足取。这种观点导致后来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庄子・天下篇》采

取不同的态度，肯定各家“皆有所明”-“皆有所长”，问题只是“不能相通”，“不识大体。班固在《汉书 • 艺文志序》里列举了诸子十家，一一加以评论，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对这九家他都肯定了其所长，也指出了其流弊，包括儒家在内。他认为各家是相反相成，殊途同归，最好是对它们“舍短取长”。这种态度，就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办北大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绝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只不过是一种消灭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的手段而已。它和公开的思想专制只有方法的不同：一是不探采行政的手段去禁止，而是允许发表，发表出来再加以鉴别；二是对“毒草”不是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来消灭，而要采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来消灭。即使这样，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真地遵守过。毛泽东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柬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九 O 页）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从反对意见中受到启发，使自己更加完善。毛泽东说百家争鸣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锻炼，也说过毒草锄掉以後可以肥田。他本来可以从毒草肥田这个比喻中得出结论，说毒草中也可能有合理的有用的柬西；但是，他从没有明确这样说过。他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对立的学说中吸取正确的有用的东西，弥补自己的不足或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像斯大林一样，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永远正确的，违反这一条的修正主义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地驳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绝不是要肯定和吸收其中的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他既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垄断了话语权；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由他说了算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同党内外的正确思想（被称为“毒草”、右倾观点”、“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一九五七年，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敌我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见、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九七页）

“绝对地互相排斥”．这个说法显然是从列宁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命题来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重性”。这个观点既违反辩证法原理，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当时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大家普遍学会分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从那以後，“唯心主义”成了错误的代名词。批评什么人的观点，只要扣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对方就紧张起来了。

那么唯心论有什么特点？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五九页）

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同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一致的。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要多一些辩证法。他在《哲学笔记》中把那种认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的观点斥之为“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人的认为是沿着近似螺旋形的曲线进行的；这条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加以夸大，变成一条道线，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参看《哲学笔记》．四 O 三--四 0 四页)这是对的。例如，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到思想。如果截取感觉这一个片段，使之变成一条直线，就成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如果截取抽象思想这个片段，使之绝对化，就变成（唯心主义的）唯理论。

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於聪明的唯物主义。”（同上书，

三O六页）他又说：唯心主义“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任务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同上书，四O四页）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之上的花朵（就是两者的同一性），不过前者是不结实的，後者是结实的。这个比喻很好。不过我认为，唯心主义也是结实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主义。[18]

毛泽东还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看作是绝对对立，像他理解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样。这又是和斯大林一致的。影响所及，在我们国家，“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词。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无论黑格尔或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这样认为的。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列入知性的范畴，它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他指出，“对于这种认识方式，只要其目的可以说是仅仅在于求日常浅近的知识，当然无可非议……”（《小逻辑》第一二一节附释)知性的功能是将整体事物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因素来加以分析：它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应该承认它的权利和优点。没有知性，就没有思维的确定性。只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而应该把这些被知性分解的成分或因素综合起来，还原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思辩哲学或积极理性的工作。前面说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三个部分，相当于认识的三个阶段：有论（感性）；本质论（知性）；总念论（理性）。中是一个三段式，最後一个阶段就是前两个阶段的统一。理性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但是它必须善于吸收和和用知性的劳动成果。黑格尔用下面的话来表述理性相知性的关系：“理性没有知性就不成其为理性，而知性正是没有理性才是知性。”[19]所以，理性是“扬弃”了知性而不是“抛弃”了知性。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

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论证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古希腊的世界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和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方法的成果，说“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中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中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查”。（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三五九--三六 O页)这种思维方法又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三一八-三一九页）但是它迟早会遇到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和狭隘的了。

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为方法的关系，或理性和知性的关系，最好的例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牛顿力学之间的关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了而不是抛弃了牛顿力学，它指出了後者的局限性。牛顿力学可以看作是相封论的特殊情况。在宏观和低速的范围内，牛顿力学仍是有效的。牛顿力学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相对来和量子力学的方法是辩证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是有同一性的，不然，怎样从哲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

[18]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书名中的“终结”在德文原文中是Ausgang，有“出路”“结果”“结局”之意。恩格斯的原意是要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简单地消灭了，而是被“扬弃”了：“扬”其辩证法而“弃”其唯心主义，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

[19] 这是我的意译：原话是：Die Vernunft ohne Verstand ist Nichts- - der Verstand doch Etwas ohnP Varnunft_直译为：理性没有知性裁是无，而知性只是没有理性的某种东西。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原理？怎样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从当前的现实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每一方都从对方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怎么能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呢？《矛盾论》曾经讲过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同一性的，这也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同一性的。现在毛把自己否定了。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绝对肯定，对资产阶级绝对否定。他把“资产阶级”作为一切邪恶的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美德的化身。於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对道德上的缺点或思想上的错误，总要归咎与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或影响。毛还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

如果无产阶级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消灭自己呢？如果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岂不变成了绝对真理吗？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毛在一九四O年时还只是把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用“帝国主义反动文化”一词来加以抹杀，至于西方古代和启蒙时代的文化还是要批判地吸收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七O七页），现在却连这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批评许多党具干部“对于复杂事务，不愿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三九页）他还评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说他们反对党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这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同上书，八三一页）后来就走到反面，产生了洋八股和党八股。可是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毛泽东主义成了五四以来危害最大的新八股、新教条。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扯皮的主义”。这个话表明，毛泽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消极理性”来理解的。辩证法当然可以说包括了“扯皮”，但不能停留在这里。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谁也不让谁，这样吵架下去，斗争下去，永远没个完。甚至同一个人 ，今天可以抓住这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明天又可以抓住另一方面来反对这一方面；每次这样做都可以讲出一番道理，因为事物总是包含着相反方面的。知性容易产生教条主義；消极理性的好处是对这种知性的教条提出挑战，指出它必然陷入矛盾。但消极理性也会产生怀疑主义，或者变成诡辩。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如何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武昌会议上，在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虽然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虚报成绩，但又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这几句话，冲淡了作假的严重性，似乎作假是自然的、不可免的事；似乎虚报成绩的现象存在，是足以证明生产有伟大成就是真的了（当然，这实际上不是真的）。诚然，真是与假比较而存在的，但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难道如果现实中不存在虚报成绩的现象，人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了吗？另一个例子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文革”初期，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上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这个话来为“文革”辩护，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等于说，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就必须大病一场。诚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但大乱之後也许是中治，也许是小治；为什么一定是大治呢？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就不怕天下大治又会达到天下大乱吗？这完全是玩弄概念，不是具体分析。“文革”后期，天下已经乱了多年了，毛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不说“八亿人口，不和行吗？”

毛泽东为什么需要“斗争哲学”

对“合二而”的批判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牺牲了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反对过“只要斗争不要团结”的错误，现在，他自己也走上这条路了。从此，毛泽东就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文革”时期大行其道的“斗争哲学”。“团结-斗争-团结”变成“斗、斗、斗”了。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后来绝口不提团结，在政治的意义上他有时还讲团结，但是，再也没有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在一九七四年初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和谢静宜一唱一和地叫嚣：“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这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话，却是符合他的“斗争哲学”的。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推动事物进步的。像“文革”这样的斗争只是给我国带来文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批判“斗争哲学”绝不是说要从此抛弃一切斗争。我们提倡保护环境，但同时也不能放弃自然斗争，例如对付洪水和疾病。我们需要社会安定和人民团结，但也不能取消社会斗争，例如反对专制和腐败。在有的时候，这种地址可以尖锐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如此。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方式是要看具体条件而定的。无节制的斗争和无原则的和平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非由於他在哲这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动上的错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动做辩护。我们不要误以为，毛泽东是因为接受了“斗争哲学”，然後才变得很“左”．很好斗；不是的，毛泽东这种在哲学上的倒退，是他在政治上搞极左路线的反映，是适应他发动的“反修斗争”和“文革”的政治需要的产物。

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的哲学讲话中所过：“有接近斗争才有哲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从认识的顺序说，哲学当然不是最先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无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哲学又应该批判地考察实际的东西，包括阶级斗争。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把这些运动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其实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来使他进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哲学应当关心政治，但哲学不能把统治者的意志和政策当作先验的前提来接受，哪怕它打着“人民”的旗帜。那种要哲学政治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取晓了哲学对政治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审查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曾沦为神学的奴婢；现在毛也要哲学成为党的奴婢，还被他说成是“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为英雄和领袖的。一旦没有敌人，没有斗争的对象，革命领袖的光辉就有变暗淡的危险。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後，本来应该进行和平建设。新时期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领袖人物。然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不在行的；搞政治斗争，特别是玩弄权术却是毛泽东的拿手。于是，国家就不得安宁了。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里，叙述魔鬼曾想改邪归正，向上帝忏悔。但上帝拒绝了，而上帝拒绝的理由是惊世骇俗的：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

为上帝。

上帝的敌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没有魔鬼。魔鬼与上帝同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共存，这就是神圣的辩证法。上帝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消灭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魔鬼的诱惑和对魔鬼的恐惧，人们才感到需要上帝；否则，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经济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不过毛泽东搜寻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他认为试图或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分子，这些人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镇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种恐怖感，加上系统的强化的政治思想灌输，人们变得盲目地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尽管这样，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政治政治迫害到“文革”发展到顶峰。为了搜寻和肃清他认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虚假的危机感，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修正主义篡党的危险迫在眉睫，只有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於是，下级和上司斗，群众和领导斗，同事和同事斗，学生和校长老师斗，“红五类”和“黑五类”斗．子女和父母斗，朋友和朋友斗，“造反派”和“保皇派”斗。“造反派”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斗……直斗得中华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直斗得八亿人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誓死保衛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政治斗争的狂熟中，任何被怀疑为封毛泽东不忠的人就面临灭顶之灾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实际意义。

（一九九八年）

（本章有关理论分析，参见王若水《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二十七期，四三-六七页，一九九九年秋季号。）

第十二章 文革的发动：打倒刘少奇

从一九五九年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经过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六三年的“四清”运动，和六十年代前期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一系列批判，这期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越来越加深，这就属“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今天有许多年轻人会对当时有那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感到奇怪；在那时，这确是顺理成章的。

精心的策划，巧妙的部署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上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解释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

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输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育很大的心理的、性格的因素，有下少非理性的成分。毛是一个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我们从毛身边的服务人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富有人情味。不遇我们应当承认，毛的性格中有任性、骄傲、固执和多疑的一面，不能容忍别人冒犯他昀尊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毛批评过王明的“残酷斗争、务情打击”，不过他本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缺点出现在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掌握巨大权力并且被亿万人民敬若神明的“卡里斯马”(charisma)型领袖身上，就是巨大的灾难了。（本书重新打字者注：卡里斯马　最初被想像为在卓越的人物、领袖和统治者身上的神为资格，他们以此确立自己的权威和统治。传说的、先验的或者真实的、卓越的不可替代的领袖，其统治和凝集力建立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韦伯就称为卡里斯马式领袖或权威等。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是指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统治。这种类型的政治统治所依赖的权威是最高统治者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它往往产生于传统秩序发生危机，人们对原有的信仰体系产生动摇之时。其合法性来自于服从者作为信徒的虔诚态度或产生于激情、困顿和希望而致的信仰上的献身精神，因而，它是一种最不稳固的政治统治形态，往往随领袖人物生命的完结而终结，或者随最高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

如果我们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毛泽东使用的一些词汇，就不明白毛何以那样担心“修正主义”. 何以如此夸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通过心理分析来解释中些符号的隐秘含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所渭“修正主义”,在字典上的含义是指出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本人也这样解释过“修正主义”，所以他并不是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把要求纠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错误的意见成为“翻案风”，又把“翻案风”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相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关系呢？在“文革”中“修正主义”一词的实际用法发展到指对毛泽东任何一句话（包括错误的话）的不同意见。这个隐含着一个意思：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都是不能修正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休想效法赫鲁晓夫来批判毛泽东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按照字典上的解释，它是指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按照这样解释，也不会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那样害怕“资本主义复辟”. 为什么要指责彭德怀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毛泽东一样坚定；除此以外，“官僚主义”和“腐化”这样的污点他们也不沾边。对这些毛泽东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被打倒，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毛泽东误认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有朝一日会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他的“三面红旗”改弦更张。要维护“三面红旗”，把它们说成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就必须把任何改变这条路线的企图斥为“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不是赫鲁晓夫，他尽管认为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不可能在毛泽东身后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有可能的是他会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有限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例如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他也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过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当之处。即使这样，也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所以，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夸大“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

发动“文革”是非理性的行动，但是毛泽东准备和进行“文革”的部署，确是经过深

思熟虑和精心安排的，毛泽东是非凡的军事家，他把一套对付敌人的战略战术巧妙用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了。

毛泽东首先是确定打击目标。所谓“修正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何方呢？根据上文说的这两个名词的隐秘含义，这两个危险主要来自中央。毛泽东说过，“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评论员文章)“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林彪也对此作了注解：“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五·一八讲话）另一个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是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大学、新闻界。知识分子往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喜欢发议论，喜欢提意见，不那么听话。毛泽东历来不喜欢知识分子。延安时期他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建国后他却把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中看到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这使他警惕。他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吴晗的《海瑞罢官》使他疑心知识分子要替彭德怀翻案，而邓拓在杂文中讽刺“大跃进”，甚至影射毛泽东得了“健忘症”，更使他恼怒。在对文艺界作了两个批示之後，毛泽东又提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正是因说有一个改造意识形态的任务，所以叫“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结尾说：“戏里那个假海瑞，就是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化身。《海瑞罢官》大力吹捧一个因搞‘退田’‘平冤狱’而被‘罢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

姚文元文章是张春桥、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炮裂的，江青特别交代，此文“不能叫周恩来看”。

这样一来，“敌人”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五·一六一通知”就是这样说的:“这次大斗争的目的就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共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这样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过去搞政治运动，在中央内部不过是每次搞掉一两个、三五个。这是“各个击破”的办法。现在毛泽东已经不耐烦用这样的方式了，他要来个全面大扫荡。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讲话里，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造反狂澜

既然毛泽东主要想打击的是中央第一代，他不能指望得到党中央多数的同意，因此他只能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暗中策划，只向林彪、江青等邓极个别人交了“底”。党中央

是蒙在鼓里的。（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郑州，二六页）并且采取“迂回战”的策略。第一炮是《评〈海瑞罢官〉》，粉碎了“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第二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对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轰垮了文化部和中宣部。这两炮直接打击的都是文化界，使人误以为这真是一场“文化革命”，但这只不过是一场前哨站而已。第三炮是《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下台--深入到政治阵地了，这是“扫清外围”。第四炮是毛泽东亲自放的，这就是他的大字赧《炮打司令部》，目标对准刘少奇。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来是“政治大革命”。

五月十八日，邓拓自杀；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讲话若干内容捅向全国。

毛泽东要打击的目标不仅是中央第一线，而且是党内各级干部中有可能跟着中央第一线走的人。这个打击面是很宽的，既然如此，他就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整风运动的办法。道理很明显，整风要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而现在各级领导本身就可能是毛泽东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如《五・一六通知》所说，“要清理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要信用这些人去作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因此毛泽东就要撇开党的组织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要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造反”、“夺权”，并且把这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想依靠群众来摧毁党，然後重建一个党。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承人，外国人说共产党一在重建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好了，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九大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十就人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保留了五十三人，不到九届中委的五分之一。

毛泽东所依靠的力量是党外群众，特别是红卫兵。他们狂热地崇拜毛，无限热爱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还有一个依靠力量就是军队。这个军队已经为林彪所牢牢控制。而林彪是“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据得最高最高”的。

斯大林把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常作异己清除，他采用的办法是秘密逮捕和处决。斯大林死後翻案活动出现了，受害者一个一个得到了平反，斯大林本人则因此受到谴责。毛泽东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不用秘密逮捕的办法，而是让红卫兵来对付那些胆敢“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持久的“革命大批判”. 务必把这些人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毛泽东以为这样做，那些触犯他的人就会遗臭万年，永世不能翻案了；即使最后证明确实搞错了，那也是群众的责任，要“正确对待群众”。

就领导艺术的高明来说，毛泽东在这里是表现得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所有的敌人都被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就连刘少奇这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政治家也想不到，一觉醒来，就由国家元首变成了阶下囚。所有这些部署都不是非理性的任意胡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而巧妙的“文革”初期那几仗，打得如此漂亮，成果如此辉煌，完全可以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三大战役”媲美，只是这次是消灭共产党的司令部。动机的非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就是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正像《一千零一夜》利的渔夫打开了瓶子，放出了魔鬼，就无法征服它一样，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动了“文革”，然而“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就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不是毛泽东能控制得了的。

最初，一切都很顺利。毛泽东把学生和工人发动起来后，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号召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夺权”. 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具会”。夺权进展得很快，毛泽东预计，到二、三、四月份就可以看出眉目来。然而，夺权后的局面不仅没有趋于稳定，反而更乱了。不仅支持原来党政领导的“保守派”和夺权的“造反派”矛盾尖锐，这一派夺权组织和那一派夺权组织之间也展来了激烈的斗争。“打倒一切”变成了“全面内战”。各派都自称毛泽东是他们的“红司令”，但各派都对毛泽东的指示各取所需，相互打“语录战”。毛泽东不得不派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来稳定局势。然而军队的介入，一方面维护了秩序，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新的矛盾。一九六七年春开始，在中央文革出面煽动下，全国又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毛泽东想用这种大批判来促进人联合，然而确是促进了大动乱。困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砸乱公检法”，武汉的七・二 O 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交通被破坏、武斗升级、打砸抢之风刮遍全国……这是乱上加乱，乱到了毛无法驾驭，尽管毛泽东在当年七月至九月视察大江南北时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话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后来对斯诺说，“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夺权的事登了报。这个消息前面加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是毛口授的。接着，毛要周主持讨论一下中央发贺电的问题。中央贺电的署名本来是三个；中共中央、固务院、中央军委。毛说，要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本是中央领导的一个下属机构，无权向各级党委发指示，但这个贺电一发，中央文革升级了，相中央并列向各级发指示了。

毛在一月中旬的一次常委扩大会上讲夺权，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一小撮走资派以及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红旗》发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表大了毛讲话的思想，提出党权、政权、财权都要夺，这篇文章震动很大，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这篇文章是由王力、关锋执笔，交给陈伯达，由陈伯达送毛审阅批准，当天就广播。这篇文章没有给林彪和周恩来看。

在其後的一次常委扩大会上，周提出对领导干部要分析：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四种是犯了严重从褉的；第五种是犯了个别性一般错误的，这最后面一总是绝大多数。毛当时同意这个意见，还提出了五中不同的处理干法：一，全部改组；二，监督留用；三・停职留用. . 四，撤职留用. . 五，撤职查办。这最后一种要极少。这个意见当时执行了一些。

但不久，毛又说，不要仔细分了，把权夺过来再说；. 到运动后期再去分。这以后，周讲的分几类就被抛弃了。

《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是奉毛之命写的，根据毛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打碎国际机器，用新形式代替旧形式。

夺权后，全国形势大乱，出乎毛的预料。这一段时间，他着重讲不准武斗的话（打人的要法办，对老干部怎能向对地主一样，他们都是对革命有功的），又说，“各省第一书记不能都打倒，最好能站出来”，此外，他又批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大讲大联合，提出“军、干、群”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毛回来也看到，各省都是自下而上地夺权，自发地建立政权（这是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不行的。所以决定要由中央批准，并要周总理负责。

毛说了一句："冲冲中南海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过是想来看一看，只有你能保卫主席，人家就不能吗？"一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其中有这样的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都没有斥则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止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区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这个意见是毛加上的。

反对武斗的"六六通令"是毛要搞的。从夺权后，他不断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那时出现了私设公堂，毛叫"文革"小组到各地去看，看到遭种事，一律解散，把人放了。但回来他又变了。

毛也认为需要提高批判的理论水平,"不能光喊砸烂狗头". 还有什么"油炸""火烧"。毛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他认为要从政治理论上打倒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毛指示写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由王力起草，把毛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归纳了一下，后来这段话就被称为党的"基本路线"。

这篇社论的后半部分提出了"六条标准"。主要是防左，这反映了周恩来的观点，也是毛赞同过的。本来两部分的份量相当，但在"文革"小组会上讨论时，戚本禹首先说："这篇文章究竟是反右还是反左？"江青、关锋也齐声反对，周尽管是会议主持人，也务可奈何。后一部分就删掉了。只保留了毛批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和"六条标准"的引文。而"六条标准"也可做反右的解释。

一九六八年 (疑为 1967 年之误---冯注）八月四日，毛给江青一封信，提出：一，武装左派；二，群众专政，在此之前，江青大概听了一点风声，所以她在七月二十一日，讲了"文攻武卫"。在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江青得意洋洋地把毛的信拿出来传阅。信中还谈到了"夺权问题"，说夺枪问题并不很严重。

后来又把夺枪问题当成严重问题了。

八月四日后，由於广东夺枪严重，连劳改犯也夺枪了，林彪主持起草了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周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同曾思玉、刘丰谈话，十月十九日，中央批转，并给予高度评价。从此，社会秩序大乱。

毛说：乱它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

"文革"后一年多，我国与三十多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

一九六八年夏，毛泽东决定向各学校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日报》在七月；十六日发表社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当初为了造成大乱，毛泽东曾经鼓励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现在他为了控制局势，又要派工宣队来管住学生了。

上面是说的劝止方面，那秘闻最高层的斗争又是怎样昵？我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刘邓（从"文革"的开始到一九六九年的"九大"），第二阶段是"批林批孔"（从一九七 0 的庐山会议到一九七四年），第三阶段是再批邓（一九七五年以后）。在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还时起时伏地兴起了下点名的"批周"之风。在毛泽东的原定计划中，是只有第一阶段的，後来破迫延长了。

刘少奇的完结

刘少奇是怎样被打倒的？

“五一六通知”提到的“赫鲁晓夫那一的人物”连张春桥、戚本禹当时都不知所指（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五页）。 第一炮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攻击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措词激烈，语调严厉，帽子极大，可实际上没有多少内容。刘少奇当时不过是提出派工作组（这还得到过毛的同意）和转发了一个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的文件而已。可是这一炮把刘少奇在中央的位置从第二位打到第八位。

在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指责从严厉到更严厉，说是镇压，是恐怖，而这恐怖来自中央。根据他的意见，会议议程改变。七日，全会印发《炮打司令部》，会议立即转为批刘。

八日，林彪讲话，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要闹得天翻地覆…….

十日下午七时，毛泽东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日，根据毛的意见，全会印发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央又批转。

刘空出来的位置由林彪占据了。在十二日改组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林彪和刘少奇互换了位置。此后，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头衔不再被提及。十八日，新华社电讯披露了这一人事变动。

会议公报说：林彪号召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十三日，林彪讲话：对干部要全面考查，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根据毛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个办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同思想政治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完全没有革命干劲的，罢官。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要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批准印发了这个讲话。

八月二十一日，《红旗》重新刊载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对其中一段作了修改，在“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加上“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同期，《红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任何人，不管他的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问题题就必然产生”，“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

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

根据毛的意见，林彪、陈伯达的讲话会后大量印发，广为传播。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做检查。

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文革”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王光美专案组成立。

由于夺权引起了红卫兵两派的斗争，对省一级的当权派，一派要保，一派要打倒；一派拥护这个干部进革委会，一派拥护那个干部进革委会，互相攻击，全国大乱。毛泽东感到收不了埸了。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让红卫兵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身上。为此，他指示《红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毛在审阅时加了一段对《修养》的批判。其实毛在延安整风时期就看过《修养》，而且是他把这本书定为整风文件的。现在却说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对这本书的主要指责是其中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这似乎就说明刘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说明刘是“修正主义者”。

另一篇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原来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学生造反，保护党权派，现在却转过来说他们推行“打击一大片”的政策，要批判。

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这一期发表的最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刘少奇。虽然还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指的是刘少奇。这篇文章神可以说是“小题大作”的典型；由十七年前（一九五 O 年）放映的一部电影《清宫秘史》为由头，写了洋洋万余字。毛说这部影片是一“卖国主义”的，刘说是“爱国主义”的。刘否人这样说过，文中也没有引刘少奇的原话，而是根据陆定一、周扬、胡乔术的转述。可是戚本禹就大加引申，从刘少奇的历史一直讲到“文革”，历数刘的罪状，已证明刘少奇说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绝非偶然。而且断言这就表明刘少奇等人“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从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假反帝、真投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恶狠狠地加了几十顶帽子之後这样说：

“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次，发表是周恩来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使人震惊的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审判，甚至也没有轻过党内讨论，就由这样一篇文章定为“反革命”罪犯了。“五一六通知”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毛已决心置刘于死地。

难道只是到这时，毛才下决心这样做吗？如果他当初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后来并没有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主意。可见，毛以前说过的刘少奇还可以留在中央一类的话，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以减少阻力。对流少奇，毛是一步步加码的，直到把刘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能翻身的地步，这完全是早有计划的。

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去见毛，向毛提出辞职，毛沉吟不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后，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老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与君同舟风雨无悔--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炎黄春秋》一九九八年十月)。

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表示，不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原谅，反而会使他更加愤怒，因为这会让人感到，刘少奇是在顾全大局。那么，谁是不顾全大局的呢？毛所要作的不仅是从肉体上折磨对手，而且要使他名誉扫地。

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给毛写信，驳斥小报上关于他说《清宫秘史》的事。

三月二十日，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刘少奇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道么不严肃过。"他于四月六日对造反派的勒令写出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贴在中南海，几小时后，被撕得粉碎。

四月一日以后，全国掀起批判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妁狂澜。

四月下旬，毛又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除刘、邓、陶铸外，其他人都可以上天安门．四月下旬就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审阅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中南海面对面地斗争了刘、邓、陶。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六少奇和王光美。造反派命令刘少奇背毛主席语录，当时是冬天，他们还把刘的帽子夺去；第二次是二月月九日，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一同被带到群众批斗大会，戚本禹当天接见"批陶联络站"成员，鼓励他们把刘、邓、陶批倒批臭。而在这之前，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家，在院内、办公室内贴满了侮辱性的标语，并枇斗他；十八日，他们撤掉了刘少奇的电话机。四月六日，在江青的策划下，中南海揪斗刘。

七月十八日这一次斗争，毛在外地，他叫汪东兴告北京，说他不赞成面封面的斗争。这一次是很野蛮的，叫刘、邓、陶夫妇跪下，揪头发，按脑袋。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乱，他也学毛的办法，离开北京到外地转圈去了。

八月四日，刘邓陶夫妇再次被批斗。

九月初，广播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在毛泽东阅后打表，毛加了一段话，第一次提出在全国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三 0 一页)

九月十三日，贺龙专案组成立。

所有这些批判尽管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但无论从党纪和国法上都是不足以给刘少奇定罪的。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当刘少奇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只有一个中委陈少敏没有举手)。这样，刘少奇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完了。尽管这个决定案和处理都是在批判刘少奇两年之后，可是在此之前谁都能料到，刘少奇必然是这样的结局。毛泽东已经把事做绝了，他没有后退的余地，置刘少奇於死地是既定方针，"叛徒、内奸、工贼"

这样的罪名，不遇是为了使这样的处理合法化罢了。因此，刘少奇专案组样用的诬陷、罗织以及逼供等手段是毫不奇怪的。合法的外衣掩盖不了非法的事实。刘少奇是共和国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无权不经过人大而撤销他的主席职务。然而，早在这之前，刘少奇不但事实上不能履行国家主席的职务，连普通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毛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一月份，陶铸被打倒。毛当时也批评陶不好。但后来，毛看到陈伯达对“专揪王任重代表团”的讲话记录，不满了。二月十日，毛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为打倒陶铸的事，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对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又骂江青：“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这次会上，毛对林彪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还决定，以後他主持的会议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谈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冶、关锋、戚本禹、杨成武、叶群。

毛还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决定改称革命委具会，另一个问题是“要党，不能不要党”。(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曾说，学校党组织不要忙于恢复）但此时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最後结论是成立核心小组。

第三件，是要王力写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例会，原定议程是经济问题，出席的政治局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候补委员有谢富治，其他有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刚受批评，躲到後面桌子角去坐，总理叫他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由于会前几位国务院副总理都从李富春那里知道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为他们说话的机会到了，所以会议一开始就火药味很浓。几位老帅你一句，我一句，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开头是谭震林批评上海打倒陈丕显和汛期要渔船停产闹革命，和张春桥吵起来。谢富治倒是站得稳，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结果怎么样呢？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意思是现在林彪怎么样了。徐向前拍桌子说：“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李先念也发泄了一通。叶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政治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呢？”

周恩来很有技巧地处理了当时的局面。李先念批评《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说：“这篇社论一出，干部都被打倒了。”周就对康生说：“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送给我看看。”康生撒谎说他没有看，周又问陈伯达，隙也撒谎说没有看。

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拍了桌子：“回来！”

后来，周恩来说：“对待这样的祖师问题，我是不能让步的这是党的政治局会议嘛！”

又说:“我整个人，对待党的内部问题，我是不那么尖锐的，但是牵涉到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敌我问题，一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我整个认识不会合糊的。”

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没有说话，只是纪录。

会议从三点开到七点，周说:“现在时候到了，以後再说吧!”就宣不散会:

刚散会，张春桥就把王力、姚文元叫到他房间，把会上各人讲的话对了笔记，接着一齐去报告江青。江青很兴奋，说:“这是一埸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四人当即去见毛泽东。

刚开始，毛泽东听张春桥汇报还只是觉得有趣，直笑。讲到陈毅的话以後，脸变沉了，再也不笑了--陈毅是讥笑他啊!. 张春桥接着讲到了周恩来，说:“先念同志讲打倒干部是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的，总理也对这篇社论没有送他审阅不满。”毛泽东不高兴地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张春桥又说:“主席还记得去年总理送的一个文件吗?要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一烧。打倒干部，是他们这些人搞起来的。总理还说中国文件很好呢。”毛貌:“你把中国文件马上找出来，送给我再看看。”

这个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国务院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部署文化大革命，会后写的“纪要”。其中说到要把司局长以上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这个活首先是毛泽东说的，他还说这是“反修防修大演习”，所有干部都要“表演一番”。会议接受了毛这个提法。文件是李富春、陶铸搞出来的，周恩来阅后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让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纪要》送毛以後，毛压住未发，毛当时要陈伯达把意见告周，陈没有执行毛这个指示，让周知道。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生很大的气。十八日，情况陡然变化。那一天，江青跑去见林彪，林彪讲了谭震林的信，这封信骂江青是“当代武则天”，说“这个反我造定了，下了决心，不怕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毛得悉后，大发雷霆。深夜召集周恩来、林彪（由叶群代表参加)、康生、李富眷、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开会。毛说:“这么着吧，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枪毙陈伯达、江青，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党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周恩来起了缓冲作用，劝毛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毛的气稍平。决定据行业藏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王力说道，他根据主席总理反覆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已送上，不知主席看过没有?毛要王力再送，看后，毛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讨论这篇社论。

王力将此事向周恩来报告，周问;去年那个文件，主席压下以後，为什么不给我打召呼?

毛这次发脾气把康生吓坏了。他封陈伯达、土力、关锋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从此他在江青面前俯首贴耳，小心翼翼，他表示庆幸说: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伯达同志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

当时毛很欣赏谢富治在怀仁堂会上的表现，说.“谢富治是小平用的人，小平同志还是会用人呀!”毛让陈毅、谭、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批了一阵后，毛又派江青代表他去

看望陈毅。

怀仁堂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周失去了一部分权力。毛说过“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江青就用毛的话压周恩来，要周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周恩来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不久，在军委扩大会议，江青、张春桥又提出这个问题，嫌周让权不够。逼得周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张春桥反而倒打一耙说“总理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再一次'江青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多管了。他们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总理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了。”以后，这样的会，除谢富治外，其他副总理都不参加。周还主持会，但实际作用不大了。

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陈、谭、徐的会，毛叫周主持。名称叫“政治局生活”参加者有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成员，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张春桥想借机整周恩来，在国务院整理的《纪要》上做文章，他问陈毅、谭震林：“是你们搞的吗？””这些会直接批评的是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间接地是批评周。江青直接说周“动摇”，最後周只好检讨，说自己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李富春本来不在受批评的范围，可是他主动承担责任，说他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组长，主席批陈江的指示是他向其他副总理转达的，许多议论是在他家里说的。康生就攻击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会上发言最凶的是康生和谢富治。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召开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江青多次提议把怀仁堂会议的文件发到会议上去，毛泽东压住了，因为牵涉到周。

林彪在这次会上大讲了一通阶级斗争，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针对赵永夫事件讲的。

赵永夫事件：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青海西宁市发生的流血事件。赵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中央要求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但《青海日报》已经被西宁市的造反组织控制，他们还拥有一批枪支弹药。在阻挠军管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群众伤亡一百六十九人'部队死亡四人、认现场从指挥的赵永夫说事前请示过林彪办公室。

赵永夫开枪，死伤共一百多人，死的约二十多个。赵报告林彪，林彪说：“打得好！”开会说，林彪又把这件事推到叶剑英头上，开始本想把这件事作为典型经验推广，会结束时，又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典型，把赵永夫抓起来了。

这个会是周恩来提议召开的，因为当时全国大乱，周希望军队能把地方的工农业担子挑起来。讨论一下军管。周报告了林彪，林彪批准了。江青质问说，这件事为什么不在文革小组讨论？调一个营都要主席批准，为什么开军以上干部会这样大的事不报告主席？周只好向毛作检讨。他解释说，不解决这问题不得了，生产没人搞，饭没的吃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毛也赞成开这个会，没有责备周。

陈毅本检讨过通了关，毛批示：“很好”。可是陈毅在飞机场当着各派群众组织说：“我是假检讨，是江青逼的。”毛对此很不高兴。

七月缅甸发生打死我国一个专家的事件，外交部的一些群众要提“打倒奈温”的口号，康生为此去请示毛主席，群众喊打倒奈温是可以的。又说：“现在在我们国家了，群众今天喊打倒这个，明天提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

到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

“文革”初期的毛周关系及“七·二O”事件

“伍豪事件”。关锋、戚本禹找周少华谈话。周后来专门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了一下这件事。当时康生竭力为周证明，说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由康生本人处理的。周查了报纸（关于伍豪委托律师的事），亲笔写了一个材料，给林彪、“文革”小组阅。毛阅后批“阅存”。

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别名。一九三二年二月，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刊登在上海的多家报纸上，企图污蔑周恩来和瓦解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对此，当时共产党用多种形式（包括以毛泽东的名义）公开辟谣。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林彪江青等利用早已查清的伪造材料，攻击周恩来。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原委。毛明确指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行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晚，毛突然想到要发表“五一六通知”　。在件事没有开“文革”小组会讨论，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康生、江青、陈伯莲、王力知道，大概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知道。

早在二月，毛就交代王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把它归纳归纳。显然，毛觉得是树立他的理论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为了发表通知，需要写一篇社论。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起草，写出一篇《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提出了“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毛本人作了修改，加进了一段对斯大林的评论，意思是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毛现在是踌躇满志，他自认为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和顶峰。

六月初，毛觉得不对，决定要保周。他有一个批语给江青。把遭件事委托给江青，等于不办。江青没有传达批语内容，只说主席交办，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谢富治主持，也没有说是什么会。江青第一个讲话，不着边际地讲了一通“文革”形势，强调批刘邓，却一句都没讲不能涉及总理。接着陈伯达讲话，不知所云。以后其他人各讲了几句，都不涉及正题，只有叶群讲了一句“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没有参加，拉了一条线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个地方听，对这个会很不满意。

二月批“二月逆流”，四月六日下达“十条”，五月发表“五一六通知”，这一切都使周的处境更为困难。大厦将倾，只有他在顶着。天塌了一半，他是能补多少就不多少。各种会都要他参加：毛召集的会，“文革”小组的会，国务院的会，接见各地代表的会．中央各部救火的会，还有铁路阻塞、煤炭生产停顿、农业生产管理、外交事务，等等，还有红卫兵横冲直闯，各地武斗不断。道些统统要他来处理。从下午到凌晨天亮，他还不能休息，要处理文件。这一段国家的局面还能延续，生产还能进行，生活还能维持，主要归功于周，他的健康水平下降，白发明显增多，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完全成了超负荷运转的机器。

总理主持的“文革”碰头会，除了规定的议程外，就是大家哇啦哇啦一通，既无主题，又无结论，周有什么事要做到这里通过，这个有什么事要周去辨也在这里议一下。实际上周并不是什么主管（周恩来在中央“文革”中没有任何职务）。

各地建立革命委具会，毛要周管，各地代表汇报，陈伯达、康生、江青讲话，最後周还要讲。副总理只有谢富治一人参加，有时江青打着主席的旗帜，周很难办。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毛认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文革”的时间一再延长，这时他讲“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他想解决南方的问题，到了武汉，毛要谢富治负责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的问题。云南的问题出在军队，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持一派，闹得不可开交。毛指示多做两派的团结工作。他布置时，没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林彪。

毛要到武汉，说是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大家劝他不要去，他偏要去。七月十三日，周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马上去武汉，他自己也马上赶到武汉，为了保障毛的安全。毛住在东湖宾馆，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多半是“百万雄师”一派的，周预先把他们都换了。毛十七日到达武汉。第二天一早，他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并表示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解决方针是先从部队解决，周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从十五日到十八日，周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方针。

周讲话的意思是三条：一，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公开检讨；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遣是中央在北京定的方针，也是毛说的。

七月十五、十六日两天，周先对三钢三新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讲话，要他们离开据点，放弃武斗，回到本单位，并把武器交给军区。七月十七日，又队“百万雄师”讲了相同的话。

但是，到了七月十八日，毛讲话的精神变了。他对两派都支持，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得利害冲突，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就可以联合。在是当晚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锺汉华开会时讲的。毛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后来周在北京没有传达这句括）这一下，就把中央精神推翻了。这是毛的惯伎。他先让周出来讲话，然後再出来把周的话推翻。

当然，毛没有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主张大联合，这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讨论时不提，临时又变卦呢？而改变了想法也不同中央其他人打个招呼就说出去呢？至于违反中央精神而提出武装工人学生，这就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组织上都是极端错误的了。

对“七·二 O 事件”毛当时很激动，后来冷静下来了，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去了”而是“不过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出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那一次，由于确也危险（难免个别坏人乘机），毛打破了惯例，乘飞机到上海。周部署毛由宾馆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罩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毛对如此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成说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

周废寝忘食，周密布置，救出了谢富治、王力。北京机場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后来在天安们又举行万人大会，这些做法是林彪布置的。王力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搞中央的的规模。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们，是为了主席。

讨论“七·二 O 事件”处置时，“文革”小组康生等提出：“为什么‘党内军内一小撮’不能提？他们说：这件事的后台是叶剑英、徐一向前），讨论上天安门名单时，他们提出叶、徐不能上，这其实都是林彪的意见。林彪参加了天安门大会。

毛同意了这个方案，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点起来了。这是林彪的意图，他说：过去有三个军区下听我的话：北京、武汉、成都我对他们没有办法（学毛的腔调）；他还说：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锺汉华的会，林要周主持，会上攻得最凶的是林彪一伙：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还有谢富冶，周的讲话比较温和。

“七·二O事件”后，湖北在武斗中打死打残打伤的人十八万四千，仅武汉被打死的人就有六百多。（《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九九页）

八月中旬，江青对姚文元布置：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握了，会议由他支持，汇报也是他听，主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会上你还要去摸摸主席的底。

一九七O年大抓“五·一六”周也讲了很严厉的话。后来缓和了。北京市公安局抓了一个“五．一六”分子，周指示立即释放，周说：“五一六”成立时，不过三十多人，积极活动的只有十多人，坏人只有个把人，时间又很短，不过两三个月，不要小题大作。这才代表了周的真实思想。但后来在林彪、江青、康生的策动下，全国搞了一千万人，抓了三百五十万。

中共“九大”

九大宣布：

一、燕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根本胜利。但是，毛泽东没有宣布“文革”结束，看来他要保持主动权，留下余地。他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完，还要我们细致、认真地抓下去。”

二、新党章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明确宣布“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新党章还破例地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这次党章修改很大，但奇怪的是，九大没有按照惯例，有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而只有林彪一个人做报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有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就要抡到周恩来来作这个报告了。所以，取消这个报告，就是有意压低周恩来的地位。

九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新选上的，且工人农民增加很多，但最多的是来自军队，占百分之四十五；原中委保留的不到五分之一，原一百六十七名中委只有五十三人重新当选。这是一次真正的重建（和斯大林比较）。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题是落实政策，团结大多数。北大一万人，抓了九百人。这个比例达百分之九。毛显然觉得太高了，他说：“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干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放回去。教授、讲师、副教授手无寸铁，他们造不了反，造反再抓嘛！”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毛说：“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止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嘛，有八条嘛，他们是公开的，下是搞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就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像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只是一肚子气。”“二月逆流那些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么办？不选怎么办？十几位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别人下满意，我看检查就算了，以后看行动吧。”毛提议把陈云、朱德、邓子恢、张鼎丞、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闻天、王稼祥都选进去。“不把几个老同志选集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啊？你反你的嘛！”

毛还再次谈到，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去别看来。

这时毛在认真考虑准备打仗的事了。他知道，“文革”不能再拖下去了，斗争不能再扩大化了。当前的问题是要团结，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次会上，孙玉国成了风头人物。他在会上发言前，毛同他握手致意，向大会介绍这位珍宝岛“战斗英雄”。

在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强调“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打进来了我们要应付。看小打还是大打。你大打我不打。让出点地方，让它追。中国地方很大，给它点好处，不然它进不来。它进来了我们就有理有利。……为了胜利，要团结的人多些。不管哪一个山头的，哪一个省的，南方的、北方的。要多团结点好，还是少团结点好？我说还是多团结一点好。有些人和我们意见不一致，这是人民内部关系，人民内部关系何必那么紧张？你一派，我一派，搞那么对抗干什么！

毛除了在正式会议讲话外，还多次接见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和将领，讲了不少话。这些讲话绝大部分是回顾党吏，很多重复，表现出一个老年人的特徵。

毛对“二月逆流”的宽容态度，并不符合林彪、江青的心意。林彪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说了一大段谴责“二月逆流”的话：

“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为刘邓翻案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实际上是不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领导…….在“关心老干部”、“抓生产”、“稳定部队”等漂亮口号下实现他们的反党活动。”

虽然林在下面讲到毛对这些人宽大为怀，因此对他们要“一批二保”，但上面这一段话却是明显把“二月逆流”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否定了保的合理性。

在九大报告中林彪继续批判“一九六六年冬季至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说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想要“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这不能理解为有意和毛泽东唱反调，因为林的报告当然是毛审阅同意的。毛让林来严厉批评这些人，自己则出来对他们表示宽恕，这是一个扮白脸，一偶扮红脸。

（一九九六年八月）

第十三章 文革的失败：林彪的覆灭和毛泽东的遗言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宣称“文革”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是接班人：看来大局已定，“文革”接近结束了。可是，一九七 O 年春在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在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爆发了出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展开了斗争，实际上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掌握优势。毛泽东支持了后者，把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抛了出来。林彪预感到自己地位不稳，阴谋抢班夺权，没有得逞，仓惶出逃，机毁人亡--这便是“九•一三”事件。

这件事对毛泽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他已开始不喜欢林彪，可是林彪敢于策划暗杀却还是使他震惊，这种事党内还不曾有过。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打倒刘少奇，树立林彪为接班人，这是文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林彪的叛变等於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毛对林彪寄予了那么的信任和期望，到头来这个人不过是利用他喜欢别人吹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所谓“紧跟”、“高举”全是假的。他被林彪要了。

毛泽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难堪的境地。林彪本应受到比刘少奇更严厉的声讨和批判，然而毛本人过去说了那么多赞扬林彪的话，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还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这如何自圆其说？

一九七一年，林彪机毁人亡后，经过毛泽东同意，把毛在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信发表了。其中谈到“五·一八讲话”时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对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里所谓“违心地同意”，指的是批发林彪讲话，他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找出辩解的理由，他本来是不喜欢的，可是“不同意不行了”，因为“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如果公开表示不同意，那就是“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于是，毛只好一方面“违心地”对中央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又私下给江青写信，表白自己的无奈。

这封信公布後，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解释“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这句话说，这时毛主席对林彪“内心世界”的分析，“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後就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按照姚文元这个说法，毛泽东是“洞察一切”的，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就已经看透林彪了。这也可能是毛泽东同意发表这封信想袷人造成的印象。因属姚文元这篇文章是经他审阅过的，他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如果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的“高举”是假的，那他为什么不把林彪搞掉，反而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呢？这是完全讲不通的。当时《参考消息》上登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经通分析后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没有看懂这封信。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本意，完全不是像姚文元所解释旳那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准备在他身后公布的，只不过是要表示他谦虚的美德，韭不是要引起什么人对林彪的警惕。他称林彪为“我的朋友”，说林是因为要打倒刘少奇这个“鬼”而借助毛泽东这个“锺馗”，因为鬼是最怕锺馗的。这是对林彪的动机作了好的解释。

明批林孔暗批周

“九·一三事件”后，还有一件使毛泽东烦恼的事，那就是林彪空出来的位置怎么办？无论从那方面说，都应该是周恩来。但不管周恩来是多么才华杰出，任劳任怨，对毛泽东又是多么忠心耿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泽东并不喜欢周恩来。从“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股“倒周”之风，紧一阵送一阵，吹一阵停一阵。不过，这股风总是形不成气候。毛泽东不能不依赖周恩来，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好管家”，那些“左派”人物里半个也找不出。周恩来没有“靠边站”. 但他的日子比那些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的日子还要不好过。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辛苦劳累。他没有助手，所有的副总理都被打倒了，唯一的副总理谢

富治是林彪、江青的人，和他不合作。周恩来既要处理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花大量的实际来应付“文革”的风浪；他既要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违心地签署一些命令，又要尽可能地保护一些老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既要抵制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的“打倒一切”，又要同他们保持共事关系。尽管处处压低周恩来，周还是赢得了党内党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现在林彪完蛋了，毛泽东是否对“文革”的错误有所反省呢？他是否觉得有必要做一些纠正和弥补的工作呢？他是否後悔当初没有更多地信任周恩来呢？他是否会让周做他的接班人呢？“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起处似乎吸取了一些教训，调整了一些政策。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他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恢复名誉。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显得很信任周恩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教、宣传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压在周恩来头上。这些工作是足够把一个人累死的。周恩来就像超负荷的机器一样，夜以继日地运转，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进行了一些落实政策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委托，过问《人民日报》的工作。四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授意并审阅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指出革命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批林”在报纸上冷冷清清，批不下去。周恩来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版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大为恼怒，认为这些文章名为批左，实为否定“文革”。《人民日报》王若水在这种情况下上书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说他们的调子和周恩来不同。毛泽东看信后表示，王若水提出批极左思潮“并不高明”。这实际上是简批评周恩来。从此以後，批左转为批右。《人民日报》内部掀起了长时间的批判“极右思潮”运动。一九七三年十月起，迟群、谢静宜又在清华大学发动了三个月的“反右倾回潮运动”，这股风吹遍了全国。“批左”有罪了。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纠左的疑虑。这是重蹈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批右的错误，只是这一次没有把周恩来抛出来罢了。“文革”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林彪在“文革”当中的言论，有的是颂扬毛泽东，有的是重复毛泽东的观点，还有的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所以，初期的批林，只限於批“五七一工程纪要”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老张，当中“文革”遣一段批不下去了。批林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否定“文革”，甚至有损於毛泽东本人的形象。周恩来当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危险是不能不预防的。毛泽东这样做，错遇了制正“文革”错误的机会，而箇中原因是和一九五九年一样的。

为了减少突出周恩来，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让他列席中央的会议，实际上是党接班人培养。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决定，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

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想到了“批儒”。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尊孔反法，林彪也是这样。不久，他又写了一首赠郭沫若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郭沫若当年骂秦始皇，是影射蒋介石。毛泽东要通过肯定秦始皇的专制和坑儒来肯定“文革”。这也是古为今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七三年七月三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还说：“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四六九页）这个话里有一种威胁的意味，虽没有点名，但矛头所指，是洞若观火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十大”这一次，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起草的：王洪文只安排做修改党章报告（请对比一下：九大也修改了党章，可是没育让周恩

来作修改党章报告：九大报告由林彪个人包了）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排名紧接周恩来之后。王洪文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迅速升起：谁都可以看出，他将要取代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的第二把手的位置了。

七三年十一月，翻译汇报，在和基辛格会谈时，周恩末有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谭吓破了胆（大约是指周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打和不打）。毛于十一月十七日对少数人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说"周迫不及待"，与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十二月九日，在会兄尼伯尔国王和王后后，毛泽东分三次与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文生谈话。毛对周等人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很好。"他也批评了江青，但只是说她讲错了两句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在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又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圆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批评了政治局和军委，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还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几天以后再次提到"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这些话听起来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只要把这里的"修正主义"理解为"修正'文革'"．就容易懂了。

毛泽东发出的这一连串信息，"四人帮"是心领神会的。一九七三年底，江青发动了针对周的反"右倾回潮"运动。"无标题音乐"事件，从七三年十二月到七四年二月，全国发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建议全国"批林批孔"．毛批示"同意转发"。一时全国大乱，以为第一次"文革"还没有结束，第二次"文革"又来了。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提出批"周公"，矛头直指周恩来。毛泽东看到这样下去不行了，批评了"四人帮"。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以后，影射周恩来的批判文章从《孔丘其人》开始，不断发表。

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紧张的权力斗争开始了。

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三 O 五医院，从此未出院。

"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由王洪文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遭毛泽东驳回：后来，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由江青组阁，支持周恩来继续任总理。

六月十二日，江青等人名目张胆地批周。（如给天津一位女农民改名为周克周等）。

然而，毛泽东却破例地不当人大代表。为什么这样，又不加说明，引起党内外许多人不解，四届人大召开前，（十二月二十三日，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说因为我国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四届人大刚过半个多月，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就发表《学好无产阶

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接着，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指示发到全国。张春桥、姚文元又接着发表重头文章。于是全国报刊都来讨论怎样防止“修正主义”，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下，关于四届结大通过的宪法的宣传，关于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宣传，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宣传，全部冲掉了。毛泽东再一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拉到阶级斗争。可是林彪事件刚刚解决，四届人大刚刚完，为什么又要重复这个宣长了多年的老生常谈呢？毛泽东说“林彪一类”，是不是在林彪之后海有什么人要搞资本主义呢？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想不清楚的问题。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支持在四届人大被选为副总理的邓小平的工作（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王洪文去长沙时，毛建议增补登小平为副主席、常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对各条战线作了全面整顿，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偏向，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毛泽东在有些事情上，继续批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

可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毛又批准发动“评《水游》”运动。他在回答卢荻时说，要把这本书“作为反面教材，使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说宋江“搞修正主义”。许多人以为这件事是偶然的。但是，姚文元在当天写信给他，说评《水浒》不但本世杞有意义，下世纪还有意义，要在全国开展，他批示同意。而且，在卢荻问他时，张玉凤在场，她记起一九七四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就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一时间，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曾受到批评的江青又活跃起来，叫嚷“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九月十七日在大寨谈话）

大概江青解释得不准确，并且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毛禁止发表江青的讲话。病重的周恩来在病床上听到评《水浒》的指示，他足了解这个信息的含义的。九月二十日，他在进人手术室时，激动地大生说：“我是忠与党、忠于人民的，我下是投降派!”（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五五 O 页）

从再批邓到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五年春，邓小平开始得罪江青。“经验主义”问题等找毛，批江青，五月。

七五年九月，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讲全面整顿。实为纠正“文革”错误。

毛泽东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觉得不能继续动乱下去了，希望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把经济搞上去，这样，他就需要依靠邓小平．. 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担心这样做下去否定“文革”的“伟大成就”. 会损害他的个人威信，他的心头又出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他不放心邓小平。十一月一日，毛远新向他汇报，提到“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一九七二年的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覆”。“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到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九月底以来，毛远新作了寄次这样的汇报。对这些话，毛泽东听进去了。

毛泽东找来等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他说：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不满意“文革”；二，要算帐。

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的意见，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大概毛泽东意识到，“文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无法掩盖的，与其让别人来议论长短，不如自己探取主动。他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又说，“文革”是“三七开，

七分成精，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希望邓小平主持草凝个肯定“文革”的决议，被邓小平婉拒，“我是桃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示由他主持不合适。与是对邓小平的批评升级。并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专管外事。

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文革”是有错误的。可是，他又陷入了自相矛盾：既然是“全面内战”. 又是“打倒一切”怎么只有“三分错误”呢？怎么能说“基本正确”，只是“有所不足”呢？显然，毛泽东是不顾意承认这个错误的。照他的解释，“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责任是在群众。

“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都是左的错误；既然承认了这个错误，就应当纠左吧？

偏偏毛泽东又在一九七六年元旦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抛了出来。刘冰等人的信的事件成为借口。毛泽东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原先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现在却说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其实，邓小平对“文革”之所以不满意，主要也是由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而所谓他们的“翻案”，正是要纠正这种毛泽东自己也承人的错误。毛泽东把这种纠左的措施指责为没有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他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更荒唐的是说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刚刚说完要安定团结，现在又要斗了。为什么不说“八亿人口，不团结行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终于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一片哀悼，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失声痛哭。各地群众纷纷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用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哀思。然而所有这些在报纸上都没有反映。“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干预群众举行悼念议式和送花圈。一月十一日，当灵车开往八宝山时，首都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含泪送别。这种动人埸景，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第二天报纸不但不报道这些，姚文元反而匆忙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头一句就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观心着清华大学工业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四人帮”的这种态度，看来也并非是自作主长--像周恩来逝世报道的规格、版面的安排这样的问题，姚文元个人是定不了的。人们可以注意到，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中共中央的悼词对周恩来的赞扬写得很有分寸，不但没有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甚至没有说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人民的怒火爆发了。这就是首都的工人、学生、干部，利用清明节的机会去天安门，献花圈，题诗词，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恨，为邓小平鸣不平。结果遭到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天安门情况的“内参”，为给“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提供了材料。当时的北京市委也起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给天安门“四五运动”定了性，认为又烧又打.“性质变了”，指示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同时，他以邓小平是後台为理由决定撤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处于一种十分矛盾、无法摆脱的心情。他清楚地知道“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可是他不原意认错。十分害怕有朝一日什么人来翻案，从而否定他自己。他已经无法收拾局面，一方面是他已经没有这种精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他永远是不服输、不认错的。在他已自知不久人世的时候，曾召见华国

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讲了一次话，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和忧郁。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是想后事。中国有句括叫盖棺论定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接着，他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是对他自己一生作了盖棺论定。最后他说，"这两件事浚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的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番话可以看做是毛泽东的最后遗言。在这样的时刻，他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后人将如何对他评价。他知道反对"文革"的人不少，遭使他夏心忡忡，但是他还说这件事没有完，要交给下一代去完成，即使血雨腥风也不惜。关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前途，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决心不允许任何人来翻"文革"的案。然而对中件事，他的信心是不足的，他的话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的确，毛泽东管不了身后的事。他死后一个月，华国锋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没有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从此，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终于结束。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不管毛泽东如何谆谆嘱咐不能允许翻"文革"的案，"文革"还是被否定了，毛泽东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判决。

（一九九四年八月）

（本章"明批林孔暗批周"一节，更详细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三部"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等。）

第三部 历史的见证

偶像的幻灭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些经历

从一九五 O 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三十多年，其中又有二十多年是“毛泽东时代” (一九五 0--一九七六)。报社的沧桑变化和我的偶人际遇，都和毛泽东有关系。回顾以往，我对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从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失望、怀疑和批判的曲折历程。

开国前后

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一九四九年开国前，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后。那时我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北平市委的地址，就在东交民巷巷原德国大使馆。有一天晚上，市委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

我在礼堂的后排坐着，看见毛泽东走进门，在门口站着，对随从交代些什么，偶尔，他抬了一下眼睛，那眼光锐利到可以穿透一切，我感到在他面前，是什么都隐瞒不住的。那一年毛五十六岁，又值革命胜利，开国在即，给人的印象是雄姿英发，器宇不凡，那天晚上上台的最有名的演具是吴素秋。戏开演了，都后些小节目，是我这个京剧外行不熟悉的。记得有一个节目是两个人打赌，议定谁输了谁脱裤子。输者一输再输，裤子脱了一条还有一条，一直脱了六七絛，终於不能再脱了。毛泽東似乎看得很开心。我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这种庸俗不堪的戏呢？

那时，把一个干部做检查也叫做“脱裤子”。我很不习惯。心想还有女同志在场。啊，女同志做检查也这么叫吗？

毛泽东对民间传统戏曲有特殊的爱好。“文革”时期，传统戏曲节目几乎全被当做“四旧”而禁演。到了“文革”后期，毛泽东忽然担心这些节目会绝迹，於是指示把它们录像保存。当时的文化部把全国还活着的地方戏曲老艺人集中在北京（京西宾馆）和上海两地，专门表演老节目，由电视台录像，作为资料保存。每录出一盒，就送给毛欣赏。

当时是“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候，那些节目都是所渭“毒草”，不准老百姓看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张耀祠，一个劲地催快录，因为毛主席等着看；张春桥等人则强调一定要高质量，不能草率。这件事对外严格保密。要说服那些老艺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任务可不容易。起初那些老艺人都不敢表演，甚至怀疑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文革”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牛鬼蛇神、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赶下舞台，现在又来录像，是什么意思？粉碎“四人帮”后，还一度把这作为江青的罪状来批判。

话说回来，那天晚上晚会散場後，市委机关一些女孩子都抢着去和毛握手。她们兴奋

异常，欲呼雀跃。我没有去凑在倜热闹：当晴我还不觉得握个手有什么光荣。

我感到光荣的是在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上。当毛以他那雄潭有力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这是历史的声音。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终於胜利了。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诞生了！理想的新社会就在前面！而我，也是这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小兵。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自豪呢？

建国初期，社会风气非常好。那时的共产党是朝气蓬勃的，向上的，完全不同於国民党，给人民以面貌一新的印象。共产党具都富于献身精神，刻苦耐劳，严守纪律，不谋私利。他们的榜样把全社会都带动起来了。

他们都很崇拜毛泽东，以有毛泽东终于的领袖为骄傲。

毛泽东瞧不起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把知识分子狠狠挖苦了一通。这很投合那些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的心理。进城以後，他们要领导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又没有那么多知识，毛的那种贬低知识的态度，可以使他们取得某种心理平衡。

我初以为，我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又是地下党员，搞过学生运动，也许会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还是“加紧尾巴”为好，那时我们这样的人最容易受到两点批评，一是骄傲，二是教条主义。

一些老干部上台讲话，喜欢说：“我是大老粗……有人这样讲，是真的感到自己不足；有人却是透出某种自豪。

在北平市委会工作时，我学遇一篇学习哲学的笔记《普通与特殊》。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一个上司看。他当过医生，应该说也是一个正式分子，可是他在把文章退给我时毫不客气地狠狠教训了我一通。

“只会搞教条，玩来玩去玩概念，害死你!”

我无缘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可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毛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当然是对的，可是他说这是分子最无知识，灵魂也不如工农乾净，把知识分子放在低于工农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他的褊狭了。

从整风运动以後，强调调查研究，各级党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是邓拓。他富有学识，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很喜欢他。邓拓后末被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我给《人民日报》投了两次稿，都登出来了。

副主任张文送给我的印象也很好，没有架子。他喜欢读书，在同我们谈话时，常常有很新的见解，比如：“文字改革，看来拼音的道路走不通，要搞民族形式。”这一类话很能启发人的思路。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话都是毛说的。张不说他的观点的来源，倒也不是显示他自己，而是因为毛的话是不能随便传播的。那时一些领导斡部做报告，也常常这样。

一九五 O 年底，邓拓把我调到了报社，在理论组当编辑。

我到报社不久，便逢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是由胡乔木起草的。毛泽东在修改时加了一大段话。党中央出来对文艺和学术发表批评，我觉得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既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那就应该能够对一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理论部有一个编辑到上海去作了调查，回来说《武训传》的导演孙瑜是十分拥护共产党的，我内心里有些同情孙瑜。

批判《武训传》主要由文艺组负责，理论组配合。这期间我曾见江青来过一次报社。我有时去中宣部开会，偶尔听一些老干部谈起江青最近说了什么话，说“也不知是江青的话，还是毛主席的话”。说罢，大家哈哈大笑。看得出来大家对江青并不怎么看得起。不过《人民日摆》编辑部的入对她还很尊重。那说文艺组是袁水拍任组长。江青化名李进，带了个调查组到山东，袁水拍也在内。后来写出了《武训调查记》，毛泽东修改了多次，还请袁水拍去吃饭。看来毛当时在培养江青。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没有像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国家首脑一样，到莫斯科去参加葬礼；但是，他发表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其中对斯大林作了很高的评价。《真理报》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这篇文章。我当时听说，这篇文章是陈伯达起草的。

按照国际共运的传统，应该有人继承斯大林的共运导师地位。这相当于中国所说的“道统”吧。我所在的理论著有一场争论。有人说，现在该提“马、恩、列、斯、毛”了。另外的人说，不对，苏联是老大哥，应当是“马、恩、列、斯、马”。后面这个“马”指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我属于“毛派”。后来马林科夫下台，就没有人再提“马恩列斯马”了。

在延安时期，有人提过“马恩列斯毛”. 毛曾表示不同意。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斯大林还健在，而斯大林又不怎么瞧得上毛泽东，毛懂得他必须谦虚。可是斯大林死后呢？

一年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理论组想找苏联大使尤金写一篇文章。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接电话的秘书答允转告尤金。过了一星期，我又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秘书用典型的外交词令回答我：

“尤金大使知道了你们约他写文章的事。不过，他说他很忙。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他写出来。我想，你们是不是不用等了？”

苏联报刊上出现了批评个人崇拜的文章，这种思想影响到中国。一九五四年我写了一篇长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风》。邓拓看后，写了一条称赞的按语，印发给编辑部参阅，并征求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问邓拓：“编辑部的同志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能公开发表吗？”

邓拓用犹豫的口气说：“会不会有人说这有点个人崇拜啊？”

我这才明白，邓拓之所以印发编辑部，就是不打算在报纸上发表的意思。但我不甘心，又送给胡乔木看。胡乔木说：“你要节制一下你的热情。”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苏联批判个人崇拜对中国的影响。

批判胡适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初，在《人民日报》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总编辑邓拓走进我的办公室，把一叠材料往我桌上一放，说：“你写篇文章批胡适。明天发李希凡、蓝翎批俞平伯的文章；後天发你的文章。”

我觉得突然，说:“这么快？怎么来得及？”

邓拓说："不一定要很长呀，就说俞平伯研究杠楼梦的方法是从胡适那里来的，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把封俞平伯的批判转为对胡适的批判，这是主席的意思。"

我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毛泽东说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的文章是对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权威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那么我将要写的文章就是建国以后批判胡适的第一炮了。我是四十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学哲学的，当时的校长是胡适：邓拓可能会认为我写这篇文章比较合适。毛泽东的指示是要雷厉风行的，我必须赶快完成这个任务。

我看了邓拓给我的一叠参考材料，又到报社图书馆借来了《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突击写了一篇《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在十一月五日的报纸上登出来了。

那时，毛泽东是亲自抓这项工作的。我的文章发表当天，毛就看到了，还问邓拓："这个王若水是什么人？"邓拓告诉了他。毛说："这也是新生力量呀！"

"新生力量"这个名词，毛用来称呼李希凡、蓝翎后，一时成为时髦。现在毛这样称呼我，我当然很高兴。

十二月八日，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除了批评俞平伯外，又提出批评胡适。郭赞扬了我的文章，认为"值得特别重视"．说"完全赞同王若水同志的说法"，其实是赞同毛的意见。

一个月前，十一月八日，《光明日报》曾发表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这两次郭沫若都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例说明自由讨论对学术进步的重要性，谈到要"打破崇拜权威的思想"；"不论'大人物'或者'小人物'不论党员或者非党员，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正确的主张往往是由少数人开始，而终于把不正确的定案推翻"，"服从党的领导并不等於服从每一位党员个人的意见。党员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没有错误的"。批评"忽视和阻碍新生力量成长的资产阶级的老爷态度"。这里面大部分观点是毛的指示，从中可以看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苗头了。当时编辑部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看了波折后都对郭很不满，认为明明是毛主席的话，郭沫若怎么当做自己的意见法表呢？这不是"贪天之功"吗？这个意见后来反映了上去。毛说：郭老说出来好哇！你们不宣传，反而怪郭老做什么？谁叫你们不宣传？

这以后，邓拓说："毛主席的话是公共财产，大家都可以用。"

毛很重视对胡适的批判运动。那说"抗美援朝"刚结束，毛觉得要借此机会肃清美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胡适是亲美派，又是跟国民党的，毛觉得挑这样一个人来批判很合适。也许毛和胡适还有宿怨。毛早年在北大旁听胡适的课，有一次他举手要提问题。胡适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像正式学生，问他："你注册吗？"毛会答说没有，於是胡适拒绝回答他的问题。这件事肯定深深刺痛了毛。

在批判胡适运动开始时，毛曾提出要"郭老来褂帅"。他说他读过郭沫若过去批判胡适的文章，印象很好；他还认为郭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

尽管毛提出要郭老挂帅，甚至还要周扬、邓拓等人到郭沫若家开会，实际上还是他自己在领导，郭沫若并没有出什么主意。

由於受到了鼓励，我继续写了一篇《五四时期的胡适舆杜威》。这是一篇短文。五四时期杜威正在中国访问，我把他当时的言论和胡适的言论对照，发现很多地方如出一辙，看来胡适是在复述他的老师。这些言论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我的文章把杜威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代表，胡适和他一唱一和，共同反对马克思主义。

毛对这篇文章有意见，他不赞同我说他们之同有政治勾结。他举孙中山为例，说孙中山在美国到处活动，筹集经费，这不能说孙中山投靠美帝国主义。

这些意见都是邓拓转告我的。当时常去毛那里听指示，回来就向理论组和文艺组少数几个人传达。从这里看，毛当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像后来。

毛问邓拓《人民日报》下一步准备发表什么文章，邓拓说："王若水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是他政治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正在写一篇文章阐述这个观点。"毛似乎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说："哦，这个我还不知道。"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写出来再看吧。"

我写出的这篇文章题目是《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解剖》。这是篇大文章，一万二千字，用了一个整版。

毛看了加以赞许，认为"解决了阿题"。但他也提出了文章中的一个缺点。我说，实用主义重视个人的、暂时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的长远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暂畤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

后来，根据毛的指示，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学习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通知。毛要《人民日报》、中宣部等单位推荐一批好文章，供全国党员干部学习参考。后来选定了十篇，有胡绳、艾思奇等人的，有我的《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还有北大汪子嵩等几个年轻教师集体协的一篇。

我现在对胡适的看法已有改变，现在看来，对胡适不是不可以批判，但有意地搞成一个大张旗鼓的批判运动是不对的。一旦才用这种方式，所有的观点都一面倒，不同的声音就被压制了，而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从这次运动后，形成了一种习惯，一遇到被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就扣一顶帽子：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是一种很坏前学风。

邓拓写了两篇，一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意思是说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但登出来后，毛没有反应，许多天后才有人向邓拓透露，毛说不必去讲这个谁领导的问题。邓拓还写了一篇谈《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考证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那时，邓拓常到毛那里去，听到毛讲了一些话，回来就向我们传达。有一次他告诉我，毛说他不相信将来永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有灭亡的一天，邓拓对这一点感到困惑。对我说："这一点我想不通。"我想起，毛曾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後一句是"俟诸可世而不惑"．毛却没有说，看来是有意的。十年之后，一九六四午八月二十四日，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重提这个观点，说："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毛还对邓拓说过，将来有时间，他要把《矛盾论》《实践论》改写一遍，"有一两个星期就够了。"不过他这个愿望始终没实现。

一九五五年，毛还指示《人民日报》发动对胡风的批判，这件事是《人民日报》文艺组执行的，我没有参与。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是毛的决定。

一九五六年初，毛又指示批判梁漱溟。他的意思是不要发得太多，有几篇就够了。我写了一篇《梁漱溟的"理性"是什么？》

当我接着写完批判梁漱溟的第二篇文章时，邓拓说：不要登了。那时中央正准备开知识分子会议，不能搞批判了。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主要讲话，对知识分子作了全面的分析，强调团结知识分子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也似乎改变了他一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讲话中批评了有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有你们也行”。毛生气地说：没有知识分子，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行吗？

那时，斯大林问题被揭露出来了。毛显然想吸取苏联的教训。一九五六年四月，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等拓要去给毛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托拓私下说了一句：“件君如件虎。”

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等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在中共党内有限范围内作过传达。我听後十分震惊。但中共并没有组织党内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论述个人崇拜的问题。我听说初稿对斯大林的批评语气很重，后来修改时大大缓和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决议表示支持苏共对他人崇拜的批评，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也提到了中共要防止个人崇拜。现在看来，这些表示是很不够的。

但是，这些提法并不是毛泽东高兴的，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的《论十大关系》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以及同年三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都一字不提反对个人崇拜。

毛并不同意人们把斯大林当神一样看待，可是他需要人们崇拜他自己。

《人民日报》挨批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

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两点，一是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评自我批评）来解决：第二是双百方针。运篇报告本来是反左的，毛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不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社捍卫盾而前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科学和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令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

我听过这个演讲的录音。毛讲得很生动，什麼玉皇大帝，孙悟空大闹天宫啦，但也给

人一个印象：他不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有许多话像即兴式的感想，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

毛泽东大概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忙与发表，让胡乔木修改。

毛想弄清的一点是，他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不是新东西，算不算一个发展。当时他身边的助手都忙着从马、恩、列、斯著作中去找有关言论，加以比较。那时康生做报告，大讲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新问题，马恩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系统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但不彻底。但毛泽东最后定稿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说：“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兵不是这样。”

听到这个报告录音的党外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反应和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反应是很不同的。前者欢欣鼓舞，后者沉默无语。许多党员干部觉得，毛太抬高党外人士了，什磨“非共产党员可以批评共产党员”，“非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遣些迪欧十年代的许多中共党员的心态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我听说有个党员在听完报告后提出退党，因为他觉得这个报告太右了。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报纸上。非党报纸，如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都热闹得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却冷冷清清，毛外出时觉察到这一点，他说他喜欢看《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就是下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这时《人民日报》又登了部队作家陈其通等四人的一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百花齐放”方针实施后文艺界现状的忧虑。毛泽东批评了他们几个，但在批评之前还肯定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

毛在外出期见说了一句：回去要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国民党报纸）？《人民日报》闻讯，赶紧要我起草一篇《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篇社论由胡乔木修改，加上批评陈其通等人的一段话，在四月十日发表了。

这篇社论马上引起了外电和国外报纸的注意，一连几天发了很多消息和评论。这是后话。社论见报的当天中午，我刚吃完皈，就接到通知：随《人民日报》的编委去中南海见毛。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是什么事，悄悄问邓拓的秘书。他说：“主席点名叫你去的。他看了今天的社论。”我又问邓拓，他说：“看来主席对《人民日报》有意见。”他预感到这次召见凶多吉少，停顿了一下，又就：“我在想，是不是就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辞掉这个职务算了……”

胡乔木带着我们，分乘两辆小汽车，进中南海，到毛的寓所丰泽园。使我惊讶的是，毛就在卧室里接见我们。当时，他半躺在床上，床上一半地方堆着书。卧房里的书很多，绝大多数是线装书，只有一本列宁的《哲学笔记》放在床头柜上，那是新出版的。毛的起居和工作都无定睛，我不知道他是在睡午觉还是睡大觉，总之他穿着睡衣，盖着一条毛巾被。他刚从南方回来，脸孔被太阳晒得黝黑，显得很健康。

邓拓向毛二介绍《人民日报》的人，最後到我“他就是王若水。”

“哲学家哲学家！你写了好文章。”毛一口湖南腔，用一种长者的慈祥端详着我。“很年轻哪！你多少岁？”

“三十了。”

“年轻年轻！……怎么好久不看见你的文章了？”毛问。他看我一时答不上来，就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大概是好久没有下去，头脑闭塞了吧？”

勤务员在他床前搬了几个椅子，让我们坐下。毛开始抽烟--整个接见时间，他没有间断过抽烟。我注意到他的牙齿很黑，大概是长期抽烟加喝茶的缘故。一会儿，陈伯达、周扬也来了。

这是一个“床前会议”。除毛之外，大家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

毛看大家坐定，就说：

“睡不着觉，找你们来谈一谈……

他说，他看了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雅然发晚了，还是好的，总算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举着这面旗帜。　　毛要邓拓谈谈对“双百方针”的宣传。

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

“我看你多半是唱反调的，专给陈其通等人唱。”

“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辨吧，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生气地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过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没有及时宣传。我是党的主席，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可是现在非党报纸讨论得很热闹，党报冷冷清清，这面旗帜被党外人士举起了。最高圆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人民日报》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毛的怒火如此大，我们都很震动，坐立不安。

邓拓只好说，他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打断他：

“不是没有抓紧，是根本没有抓。”

毛询问了社论的写作过程，表扬了我。我说：“这篇社论乔木同志作了很多修改。”

毛说：“那总是要有基础吧。这篇社论好，我要请你吃饭。”

邓拓谈到，他听主席在一次会上讲到陈其通等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他以为毛是表扬。毛说，他不同意陈其通，这一低昂明确的。邓拓之所以会听成表扬，是他“各取所需”。毛又谈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真理报》转载了；锺惦斐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此文后被当作“毒草”批判）东欧报纸转载了。“这就叫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喜欢修正主义。”

“叫你来列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精神你都知道，有什么用？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你不要霸住茅坑不拉屎！以後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最后这句话，当时对都没有注意。二十多年後，胡乔木有一次对我提起这件事，说“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指的是我。毛后来还对胡乔木说，他的意思就是要王若水这样的人来当总编辑。胡乔木没有说为什么后来没执行。不过，我觉得幸而如此。《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有几个有好下场呢？

毛批评了邓拓后．又批评了座簃几个副总编，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都同意他吗？是不是因为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报告情况？我的意见，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拍桌子、吵得脸红脖子粗都是可以的。”

几个副总编低头不语。毛看看邓拓，接着说：“大概邓拓你有德，他们不忍心反对你。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有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大概觉得现在是提出辞职的机会了，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感到自己能力不够，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这个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这个请求……

毛又打断了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我惊讶地想，怎么毛泽东会把邓拓比做皇帝呢？说到哪了去了？可是一看毛的半边床上堆的那一大堆古书，我想他是读历史读得入迷了。

坐在那里看毛泽东对邓拓发脾气，心中很是不安。一方面，我热烈拥护毛提出的“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很同情邓拓。毛的火气大概已经积累多日了。他刚从外地回来，今天《人民日报》已发表了社论，他大概觉得，再不批评，就晚了。他表扬我，把这篇社论的功劳归于我，遭样才好批评邓拓。

看到毛的脾气发得差不多了，胡乔木开始说话。他说这事不能全怪《人民日报》，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曾送了一份宣传计划给他；他觉得没有把握，压下了。毛没有批评胡乔木，只说了句：“我看你对《人民日报》是又管又不管。”

实际情况是，当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情绪，胡乔木就是一个。邓拓准备了一个题目，共十篇社论，这不可谓不重视，而且有些社论已经写好，但胡乔木迟迟不批准。毛没有批评胡乔木，而只是批评邓拓，是不公道的。邓拓说，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正式公布前不得引用，这也是事实。但胡乔木也有借口；文革结束後，他在一次会上说，毛在离京之前告他，《归于正确出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暂时不要宣传。

毛大概是一个容易忘记的人。他在这次谈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出八个版太多了：

“纸张那么紧张，还办八个版，内容那么多，谁看？”“谁叫你们办八个版的？”

胡乔术吞吞吐吐地说：“这件事是中央决定的。”

“中央是谁呀？”毛穷追不舍。

胡乔木没有办法，只好说：“主席，是你决定的。”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决定？”毛反问：

胡乔木急了："这种事我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是有一次……"

胡乔木说出了具体时间和場合，毛当时怎么讲的。毛无法否人了，可是，他又说：

"如果是我讲的，那是我昏了头。我讲了那么多话你们都不听，为什么单单只有昏话你们就听进去了？"还是他有理。

这里我要插一段。文革初期，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去见毛泽东。毛谈到，《人民日报》出八个版太多了。主席指示，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唐平铸回来马上把报纸改为四个版。当时报上登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像很多，也很大，此外还有不少语录、口号。毛看了两天，觉得没什么内容，又说，还是八个版好。为此，陈伯达把唐平铸批评了一番："谁叫你改成四个版的？"唐辩称是主席指示。陈说："那你为什么不先打一个正式报告，请中央批准？"

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地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帐，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只有讽刺他的。

那天，毛还谈了一些问题，值得记下的有以下几点：

一、"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里，他赋予"百家争鸣"以阶级内容，而且只是两家，把封建经济、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忽略了。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毛说。他本想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后来觉得只有说不妥，所以就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允许批评"我觉得这个观点比较重要。一九三八年苏联出版的《联共党史》的结束语中曾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是可以而且应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不然。毛的这个观点进了一步。本文前面提到，毛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天会灭亡，毛再说这句话是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后来没有坚持这一点。

三、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现在很紧张。在这个时候，党如果采取松一点的政策，知识分子就会靠近党；如果紧一些，知识分子就离党更远了。这个观点也很对。说明毛最初是诚心诚意实行"双百方针"的，但他后来变了。

四、党对知识分子也是采取赎买政策。毛说："这是伯达同志提出来的"，他赞成。但封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好这样说，这个观点表明毛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看成一路货。

五、毛说：知识分子是"身在曹管心在汉"。由此说到对曹操的评价，他说："你不要信那个《三国演义》，曹操是进步的，汉是没落的。"

六、毛说他喜欢看《新民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 不喜欢看《人民日报》。

七、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

八、当时哲写界在争论一个问题：是不是哲学史上的唯心论都是错误的？有的党外老哲学家不以为然。胡绳写了一篇文章肯定这个观点。周扬说，有些人封这篇文章有意见。

毛认为，这篇文章还是好的。

九、毛谈到写文章，说马克思的文章难懂，恩格斯和列宁好些。斯大林的文章虽然清楚，但高高在上，有教训入的口吻，是教条主义的。这时，他转过头对周扬说："我看你的文章有教条主义呢！"

十、毛谈到他有意用笔名写一些杂文一类的东西。邓拓说："主席要写文章，《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榈。"但毛又说，不好办，用笔名，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猜出来。他这个主席的身份是不自由的。

十一、毛又谈到他想辞掉国家主席。以便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和写文章。还问我："王若水同志，你赞成不赞成？"

这次谈话后，邓拓向报社编辑部做了传达。编辑部人员的普遍反应是心情沉重，大家都同情邓拓。

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争鸣杂感》。邓拓没有修改就途给胡乔木，胡乔木没有修改就直接送给毛泽东。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大概是因为受了批评，特别慎重吧。我的原稿上有一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虽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毒草，但也会放出一些香花。"毛泽东说："说反了。首先是会放出一些香花，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毒草。"就这样一句话，也表明毛的原意是积极的，他想到的是一些新生力量受压制、一些好作品和正确观点被视为毒草，"双百方针"首先是把它们解放出来。我记得当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批评，说小说揭露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官僚主义，这是一种恶毒攻击。毛为此不平，说；中央都有官僚主义，何况北京！

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毛最初提出"双百方针"并不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诡计，而是真诚的，当时的背景是，苏联出了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批评了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震动了全世界。毛想认为吸取苏联的教训，避面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双百方针"。把这作为"阳谋"，是後来的事。

毛泽东提出这个"双百方针"太突然了，党内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引起的不是热烈的响应，而是一种沉默的抵制。不赞成的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但也有下少教条主义的这是分子，如陈其通等人，他们打破了沉默，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不同意见。

风云突变的"反右派斗争"

毛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同时也发动党外人士对党员提批评意见，这是三月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一九页）毛喜欢搞运动，发动党外人士批评，也采取了运动方式：当时统战部召集多次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开会，好召他们提意见，有些人没有意见，或不愿意提，也千方百计让他们说话。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文艺和学术范围扩大到政治范围，称之为"鸣放"。"鸣放"出来的意见都在报纸上发表。一般"鸣放"不够，还要"大鸣大放"，于是气氛越来越热，谨慎的人变得敢开口了，敢开口的人变得毫无顾忌了：于是，批评中共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出来了，要"党委退出学校"的议论出来了，建国后几年的工作是"缺点大於成绩"的说法也出来了。

各级党委书记成了运动的主要靶子，他们的日子不好国，自然有埋怨情绪，觉得毛泽

东的“大鸣大放”把好端端的政治局面粭搞糟了，害得他们威信扫地。

党外批评的强度也超出了毛的预料，使他吃惊，特别是有人直接批评到毛头上。张奚若批评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罗隆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章伯钧提出“轮流坐庄”等等。这些都使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恼怒，也使他担心匈牙利事件会在中国重演。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写了《事情正在超变化》这篇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以前毛是批评教条主义、批左，现在变成主要批修正主义、批右了。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指责右派所说的“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假的。” 从这时起，才有意识地在报纸上发表“毒草”文章，实行“钓鱼政策”。

毛需要向党内解释，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乌烟瘴气”的东西登在报上？毛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三八页）后来，毛泽东又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充分暴露自己，“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同上书，四三六页）“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同上书，四三七页）这个话是他在为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写的社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的，当时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了。

“反右派斗争”的公开信号是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七月九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他三月份在上海讲话，“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同上书，四四O页）“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 (同上书，四四一页)

其实，毛的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事后的自圆其说，企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右派”进攻，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钓鱼”，或“引蛇出洞”。这可以使党内那些起初封“双百方针”有埋怨的干部变得高兴，并且感到惭愧--他们太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策略了。如果按照他们原来的想法，不让党外人士“鸣放”. 那么这些“右派”怎么会跳出来呢！他们觉得毛主席这一着是太高明了。毛泽东就用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转弯，牺牲几十万知识分子，换取党内保守势力对他的支持。

《人民日报》由于需要对反右派提前做好准备，所以在正式反右之前半个多月，就在小范围怍了传达。我所在的理论部是一个好发议论的集体，同事们常常在办公室内激烈地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和工作。凭这些言论，是足够把我们打成右派的。但我们得到通知后就赶紧收敛了，而且因为几乎人人都有帐，后来部内也没有过多地互相揭露。

当时我们得到的指示是，先找一些党外中间派出来讲话，下一步再让工农出来批评知识分子。

在六月以前，由于对“双百方针”的广泛宣传，大家都已接受了。现在突然又来这么一个大转弯，许多人思想不通。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来到报社，指示反右派宣传。他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开始的话就是：“这次反右派是个考验。郭老拥护，宋庆龄就不支持。主席说，他们两人的表现就不一样……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时的政治气候，同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这篇讲话时已是大不相同了。“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了。拖了一百多天在报纸上发表，客观上给毛一个机会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毛的讲话本来是重点防左，强调民主，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却要突出反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对讲话的修改，既要适应反右的政治需要，又要照颢到和原讲话的衔接，这很下容易。胡乔木先作了十几次修改，毛泽东又亲自修改了多次。胡乔木告诉过我们，他“改得很吃力”。

这样，发表出来的定稿不仅观点有矛盾，文字风格也不同了。原来毛讲得生动活泼，现在由于作了过多的修饰，显出一种拘谨。

反右派运动中，原来那些受毛表扬的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一下子都成了右派报纸。毛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姚文元的文章《录以备考》，并亲自加了按语，冠以《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题目。毛还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发表。这篇社论半句肯定过去的《文汇报》的话都没有，相反是严厉指责它执行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指青它“为反动派作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几个月”是多久昵？毛对我称赞《文汇报》是在四月十日，“反右派斗争争”开始是在六月七日，相隔两个月。毛的意思不可能是说《文汇报》的“猖狂进攻”是在四月十日以後开始的。就是说，当毛在欣赏《文汇报》时，它已经是反动报纸了。

北大化学系知名教授傅鹰讲过一些很尖锐的批评共产党的话。毛要表明，他只是要反击恶意的批评，并不反对善意的批评，就把傅鹰树为“标兵”。那时我还去采访了傅鹰，写了一篇《傅鹰教授一席谈》。但“善意”“恶意”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后来许多人的言论远不如傅鹰尖锐，只因被看成“恶意”，都打成右派了。现在看来，毛对这个运动是否含冤枉很多无辜者并不是真正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漏掉一个“右派”。

费孝通在听完毛在二月的报告后，兴奋之余，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时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毛一次接见费孝通，谈到这篇文章时　毛表示欣赏，并对费说，有人要批评，“你同他大战三百回合”。反右开始后，因为费的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算是《人民日报》“欠了帐”．要还（发表批评文章）。邓拓觉得犹豫，对我们说：“费孝通逢人就说主席表扬他的文章。这件事大概是真的。”但后来在运动的压力下还是批评了，而且把这篇文章定为大毒草；费孝通本人也被定为右派。毛肯定过的王蒙也被划为右派。毛并没有出来保护他们。他似乎丝毫不觉得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

反右开始後，《人民日报》的日子好过了。

开始我们很多人都想不通，但后来不断开会、学习文件、阅读报纸，渐渐地转变立场了，觉得右派真是要“翻天”。我还写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篇社论邓拓没有修改，送给胡乔木；胡乔木也只字未改，批准照登。当时觉得写这篇社论是理直气壮，现在真觉得后悔。

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行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谭拓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

毛在一九五七年底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口报》人总编辑;.邓拓改人社长，不大管事了。本来邓拓对理论部和文艺部的事管得较多，后来只管文艺部，也给网易部写点散文。这样渡过了一段时间，就到北京市委去了。传说是彭真把他要去的。表面上看，邓拓的离开《人民日报》是正常的，他走时报社还开了欢送会。吴冷西在会上讲话，讲得很有分寸。邓拓还写了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

笔走龙蛇四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舆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个高潮望接天。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去看邓拓，谈到一九五七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吴冷西吸收教训，对毛采取"紧跟"的办法。"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许多耸人听闻的东西都是在《人民日报》上出来的，对当时的浮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我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躲过了，但仍被认为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干部。一九五八年初，中共中央指示一批斡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我是《人民日报》下放干部之一，到湖北的枣阳县一年。

那一年农民的干劲的确很大，可是被浪费了。成立公社时，农民很兴奋，争先恐后要求加入。他们对毛泽东有盲目的信仰，他说人民公社好，那就不会错。到了秋天，各种危机都出现了，首先是粮食不够吃。我有一次在田间劳动，忽然心里发慌，全身出汗，力气全无，这才悟到是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可是干部还在那儿吹牛皮，什么亩产万斤，消灭四害啦。我们对这种虚夸进行了抵制，同时把农村的真视情况向报社写了报告。在这年年底的武昌会议上，吴冷西把我们的报告送给了毛，听说还受到重视，但这一个举动得罪了当地干部，几乎要把我们打成右派。

从农村回来后，别人告诉我，吴冷西有一次在会上说到，毛曾问《人民日报》有没有什么理论家。吴说没有；毛说，王若水算一个。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惹祸，引得毛发动了一场"反右倾运动"。我当时强烈地感到不能同意，因为这个错误太明显了。我想很多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大家都不敢说："反右派运动"把我们整怕了，

我当时听说：毛对彭德怀说，你是魏延，有反骨，又说，我同你订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不要造反。

李锐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上没有记载毛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叙述了小组会上一些人说彭德怀是魏延。我相信这个话源出毛泽东：当时毛和柯庆施那一帮拍马屁的高级干部有秘密接触，商量如何对付彭德怀。

中国的魏延，就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我认为，从大跃进失败后，赫鲁晓夫的阴影就笼罩在毛的心头。他十分害怕百年之后有人效法赫鲁晓夫的榜样，攻击他的错误。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从"反右倾"到"文革"的毛的一系列行动的动机。

在当时，只有赫鲁晓夫在批评毛泽东。这种言论作为“毒草”发表在《参考消息》上，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气忿和警惕。可是我内心想的是，赫鲁晓夫是对的，现在只有他能公开批评毛了。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党校参加关于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康生来讲了一次话。我记得他讲到苏联“修正主义”时，脸孔突然胀得通红，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大声叫道：过去只知道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来，斯大林肃反还肃得不彻底：他漏掉了赫鲁晓夫!。

这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我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不管是毛采纳了他的话还是他转述毛的话。这是毛的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

一九六一年，中共成立四十周年时，刘少奇要作一个讲话。我参加了讲话的起草小组。大家讨论时，都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央做一个自我批评，讲讲一九五八年以来党所犯的错误，向全国人民做一个交代。后来，陈伯达跑来了。他说，这个报告应该主要是讲给国外听的，不要多谈缺点。陈伯达没有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我们猜测这是毛的意思。结果，刘少奇这个报告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说了一大通感谢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在困难时期对党所给予的支持。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刘少奇说，五八年的错误，中央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一半责任。《人民 L 日报》在当时发表了许多错误观点，应该予以清理。他举出了批判“条件论”的例子，要《人民日报》澄清这个理论问题。这个任务落在我的头上。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论条件》。文章批评了报纸上曾经流行过的说法：“这个地方能办到的，别的地方也应该能够办到。我说，这就是不顾条件的差别。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文章送到刘少奇那了后，没有下文。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哲学分歧

斯大林和毛泽东一直有哲学上的分歧。毛继承列宁的观点，主战一切矛盾都是有同一性的。斯大林则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下讲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毛泽东的《实践论》在苏联的《真理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评价很高但《矛盾论》在苏联发表后，苏共方面的评价很谨慎。哲学家罗森塔尔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文章，表示赞同《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毛的这个观点是从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家的著作那里学来的，但因斯大林不赞成，他们都不敢提了）。罗森塔尔的文章发表后，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说罗森塔而的观点不符合斯大林的观点。不久，罗森塔尔作了自我批评。一九五四年，尤金、罗森塔尔等人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出版，其中“同一性”这一条不指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原理。

这肯定是斯大林的授意，否则，词典的编者是不敢的。

当我从中译本中看到这一条时，感到十分惊讶，同时，强烈地不同意这个批评。词典说这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我想，怎么可以主义乱扣帽子呢？

我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各省、市、自治去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对《简明哲学词典》的反批评。毛的这篇讲话，我在一九七七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才看到。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去找杨献珍：“你敢不敢批评尤金？”杨献珍说：“怎么不敢？”

陈就要他针对《简明哲学词典》写一篇“矛盾的同一性”的文章。

杨写出来了，文章前半部分论证生与死、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同一性；但後半部分又大讲思维和存在（这无疑也是一对矛盾）没有同一性，这等与说，不是一切矛盾都有同一性。榻献珍在一些具体例子上反驳了尤金，但又在另一个具体例子（思为和存在）上支持了尤金。

陈伯达找错了人。当时中央党校内部杨献珍正在同艾思奇争论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什么意思。艾思奇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说这是唯心主义的论点。从杨献珍的立場来说，他必须在这篇文章中肯定自己的观点。

这篇文章没有被《红旗》采用。但是，杨献珍后来通过别人把他的否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和作者商榷，在就卷入了一場旷日持久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大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之初，《人民日报》并没有兴趣，也不想发表文章。后来开始注意了。据吴冷西透露，中央注意到了这个讨论，而且似乎不赞成杨献珍一派的观点。

许多年以后，我才看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纪录中讲的几段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话：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下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为，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於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遭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了。然後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柬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与你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桌子的哲学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的一段话。我看到这段话时，马上想到八年前他说的想改写《实践论》的话。但这段话究竟过于简短，新观点也不多。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批评有些同志“对于物这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兄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这句话，这等于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批评哲学教学中那种筒单化庸俗化的做法，而我认为中央党校有些人还在提倡这种做法。他们翻束覆去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

映”。而他们所说的“反映”，又是像列宁那样理解为“照相”或“拷贝”。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尽在其中：一切工作中的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这条原理；似乎只要弄通了这条原理，就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了。我记得当时报纸上宣传河南三官庙农民学哲学的经验就是这样：教具搬一块大石头放在桌上，问大家.“这是什么？”“石头”大家笑了。“是先有这块石头，然后你才感觉到它呢，还是你脑子里先有石头的感觉，然后才有桌子上这块石头呢？”“当然是先有这块石头，那还用说？”“对了，这就叫唯物论！”于是农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如此简单！

针封这种庸俗化的教学，我写了一篇《桌子的哲学》的对话体短文。我说明，桌子是人造的，木匠存造桌子时，脑子里一定要先育桌子的概念。当然，木匠的这个桌子的观念是他以前看到了别的桌子后产生的，别的桌子又是另一个木匠造的，他也是先有桌子的观年：如此追溯上去，到制造第一张桌子的人，头脑里海是先有做桌子的设想因此，归根到底，是先有桌子的观念，然后有桌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最初的桌子的观念，虽然是一个发明创造，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受了土墩、石头等自然物的启发；又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有了能够造桌子的技术和工具，又有了使用桌子的社会需要，这样才产生了做桌子的想法。这样解释，就不是唯心论，而是历史唯物论。因此，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要从物中见人，从桌子这个客观事物中见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人的力量。

文章登出来后，反应热烈，大概读者感觉新鲜。不久，我就听说毛泽东表扬了，但原话究竟是怎样说的，没有人向我正式传达。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大会上也推荐了我的文章，我猜想这是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多年以后（一九七六年），日本学者竹内实写了一篇分析《桌子的哲学》的论争的长文，其中猜测我可能是受法发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影响。其时我是受马克思启发。我的文章里有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的观点，也有《资本论》中讲人的劳动和动物不同的观点。马克思说，人的劳动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人在劳动之前就已经在头脑中把产品构成了。

毛随后也指出了我的文章中他认为不准确的一处地方:“人和动物不同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毛认为，动物也有主观能动性。后来我想起毛在《论持久战》中说，人与物不同在于人有“自觉能勤性”. 这很对。于是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条“补正”。我认为毛的提法比我的更符合马克思的观点。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不重视理论后，《人民日报》加强了这方面的版面，副总编辑陈某自告奋勇兼任理论部主任。他从来稿中挑了一篇反对我的观点的文章发表了，说想引起讨论。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桌子最初是人在偶然中做出来的；只有在桌子做出来后，人们才能产生做桌子的计划。作者认为我的观点是：人做出来的桌子，和他事先的桌子观念是完全一样的：但我在文章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这以后，果然来了几百篇讨论的稿件。多数是支持我的观点的，但理论版上发表出来的稿子却多数是支持相反观点的。这时传来了毛的指示，授意我再写一篇文章。毛把这意见告诉吴冷西：吴冷西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让陈某转告我。但陈某没说清毛的意思，我要求他解释，他解释不出来。直到后来《人民日报》内参上登出来毛的原话，我才弄清楚，毛的意思是：

桌子是人造的。人从土墩、石头一类的东西得到启发，产生了做桌子的设想，在做桌子的实践中，这个设想会得到修改和补充，而做出来的桌子，又会和原来的设想有所不同，使桌子观念有所发展。然后人们又会根据这个修正和丰富了的观念去做新的桌子，如此循

环往复，下断发展。若水同志可以再写一篇文章，加以补正。

我这才明白，毛的意思是，我原来的文章没有说到人们做出来的桌子，和他事先有的观念可能不完全相同，这会使读者误解。我只说了做桌子的设想或观念对做桌子的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没有说做桌子的实践和做出来的桌子反过来也会修正或补充原来的设想和观念。这是不完全的。毛泽东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我开始写文章。觉得一篇文章说不清楚，于是分成两篇文章。第一篇以飞机的发明创造为例说明人的创造，补正我的观点。第二篇从理论上反驳批评我的观点--主要不是针对《人民日报》上那篇文章，而是以杨献珍一派的观点为对象。

两篇文章先后送到陈某那里。他要求我在文章中承认错误，不要再反驳。我不同意，他就压住文章不发。到一九六四年四月，他说，形势变了，现在要批判杨献珍了。我说，我的第二篇文章就和批杨献珍有关啊。他还是不理。

这两篇稿子始终没有登出来。第一篇稿子也遗失了。第二篇我后来做了修改，收入一九八 O 年出版的我的文集《在哲学战线上》。

几年以后'有同事对我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毛主席啊？"我一想也对，毛主席指示我写补正，《人民日报》不发表，我为什么不告到他那里去呢？但是，这时已经事过境迁了。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毛的指示，但杨献珍一直强调是康生的主谋。康生当然有意这样做，但以杨献珍在党内的地位，要公开对他进行批判，没有毛的点头是不行的。我以为毛有两个原因不喜欢杨献珍。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捧着一本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很少谈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二是杨献珍在一九五八年说了不少批评"大跃进"的话，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

但是，毛选择这样的题目批杨献珍，却有些自相矛盾。本来，把矛盾说成是"对立统一"，是完整的表达，就是说有分有合.“分”是对立"合"就是统一。杨献珍并没有用"合二而一"来否定"一分为二"。毛却用"一分为二"否定了"合二而一"。这样，在否定杨献珍的同时，毛也否定了他自己，因为《矛盾论》反覆讲过矛盾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而且毛和斯大林的主要哲学分歧在于斯大林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如果说杨献珍以前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错的，那么他现在讲"合二而一"是对国去的观点做一些弥补，为什么还要批评呢？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毛过去并下反对"合二而一"甚至是赞成的。批判杨献珍之前，《人民日报》那位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在《人民日报》上发变一篇短文，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面就讲到事物下仅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批"合二而一"后，人们问那个副总编辑："我什么你的观点和杨献珍的一样？"他说，他统范若愚说，毛主席讲不仅有"一分为二"，还有"合二而一"，这才写那篇文章的。范当时是《红旗》的副总编辑，在钓鱼台参加写反修文章的班子，接近中央最高层。这件事应该是真的。那么，毛的观点为什么改变了呢？

我认为，毛泽东的突然转变，并不是基于理论上的认识，而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除了他早已有意整杨献珍外，当时中苏论战正酣，在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等口号后，苏联哲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如米丁、费多谢也夫等人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这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说过的）等论点，为赫鲁晓夫的政策提供哲学辩护。毛既然要在政治上批判赫鲁晓夫并和苏共分裂，他也需要批判“融合”论，他认为杨微珍的“合二而一”和“融合”论是一致的。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表述，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党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做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九八页（这里暗暗地批评赫鲁晓夫不懂辩证法，没有对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这里的“分”，还是“分析”的意思。

一九六三年，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几句话：“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俩号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这里的“分”已径变成“分化”的意思了。

当“合二而一”的问题还在报纸上自由讨论、两种意见都发表时，其实已经在为批判作准备了。当时康生直接领导《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而他直接从毛那里接受指示。初期，有不少人认为，“一分为二”是分析，“合二而一”是综合，不能只要分析不要综合。还有人说，水不就是氢和氧化合而成的吗？这只能用“合二而一”来解释；单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这种观点肯定使毛不高兴，因为这等于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的一种补充，制正了毛泽东的片面性。

一九六四年七日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作者是上海科学院的姚伯茂，姚提出，区别两类矛盾：一类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激烈的斗争，一方消灭另一方：另一类矛盾的解决办法不是这样，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合二而一。后一类矛盾的例子有红与专、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劳与逸、工业与农业等。

据康生说，毛泽东当天看到这篇文章，就把他叫去，问他：“看过这篇文章吗？”康生说还没来得及看，毛还批评了几句。毛说，你是管这件事的，这篇文章怎么能不看？毛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麻烦问题，不好办：这表明毛的确感到单讲“一分为二”，理论上有些问题说不清。他开始考虑到了这个难题。

但毛并没有重新审查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只是要寻找一种论据来为自己原有的观点辩护。他指示收集一些论分析与综合的材料给他看。

八月十八日，毛找几个哲学家谈话。他说，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几句话。毛企图把这个问题阐明。分析好办，就是“一分为二”：那么，综合如果不是“合二而一”，又是什么呢？

毛说，综合就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他举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为例，说“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合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o”毛泽东在这里忘掉了他自己在

《矛盾论》中讲的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互相合作”，“失去了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就以国共两党为例，国民党和共产党并不是一直在打仗，而是有国两次统一战线。即使在打仗时，双方也不是毫无联系地隔离的远远的，不然怎么打得起来？

关于氢和氧化合成水的问题，毛引用北大化学教授傅鹰的话说，氢和氧要经遇千百次的化合才成为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其实，这只说明氢和氧的“合二而一”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说明这不是“合二而一”。

就在这次谈话的结尾，毛指示《红旗》写一篇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讨论的述评，

《红旗》的评述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的报道》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一六期发表。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毛的观点，一上来就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这場论战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接着说，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檬，总是一分为二。后面说，杨献珍宣扬“合二而一”. 是“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也是适应国内敌对阶级的需要，“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接着，一场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大规模的政冶批判运动。

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说：“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即《人的正正确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要学课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我不相信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我认为毛之所以批“合二而一”，并不是出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虑。第一，他在政治上不喜欢杨献珍，这一点我在前面说了。第二，更重要的是，他要为同苏共分裂做理论上的辩护。这一点在《红旗》的文章中表现得很清楚。

但在当时，我自己的思想是不清楚的。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我是积极的，批判“合二而一”，我却不那么积极，因为自己觉得没有想通。那是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工农兵学商一齐上阵，声势浩大。我在那种压力下也写了一篇文章。八十年代初，重新讨论杨献珍的哲学观点时，我承认了这个错误。

批判“合二而一”是毛泽东哲学恩想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虽然还讲“对立统一”，但讲得比较少了，更多的是讲“一分为二”，而且似乎所谓“对立统一”. 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以前，他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批评王明“一切斗争，否定联合”. . 批评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现在，他用“一分为二”来否定“合二而一”. 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指导“文革”的“斗争哲学”。

“文革”初期

吴冷西在一个时期颇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列席政治据会议。也在起草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里起了重要作用。但“文革”前夕他失宠了，具体原因我不

清楚，只几得毛批评的几句话："'三十而立'，你三十未立，四十而不惑，你四十半惑：五十要知天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准备"文革"。这件事吴冷西是毫无所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登出来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都不理解它的含义，对这篇文章反应冷淡。《文汇报》有人到《人民日报》来，以"串门"的形式找熟人闲谈，探听大家对姚文元文章意见。我感到她的到来是有"任务"的，但还是忍不住向她指出了姚文对古书断章取义的地方。（後来我才知道，在上海，曾经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一些发表了与姚文元观点不同的学者大加批斗。）到后来，形势越求越紧，才觉得实际上是《文汇报》在领导潮流。《人民日报》落後了。大家都很困惑不解。

一九六六年初的一天，吴冷西找我，要我写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他详细口授了这篇文章要讲些什么内容，我纪录下来，整理成文。文章写出来后，他又作了很大的修改，并把题目定为《接受吴哈同志的挑战》。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我自己的文章，就署了一个假名。吴冷西想用这篇文章来扭转《人民日报》的被动局面。

那时周扬的处境也很困难，为了避免落后挨打，他也组织了中宣部的人写了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方求。我觉得这篇文章比姚文元的好得多。

无论是吴冷西还是周扬都想用自己组织的文章来超过姚文元的水平，但都没有能给自己帮忙。大概他们都觉碍姚文调子太高，说理不够（如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想要避免这些缺点。他们都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後面站着江青，而江青后面站着毛泽东。当时的趋势是提高批评的调子。毛后来还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

後来毛曾问到："为什么王若水、李希凡没有发表文章？"吴冷西后悔地说，那篇文章用真名就好了。李希凡和我都赶紧写批判文章，但由于思想跟不上，文章都没能发表出来。

吴冷西像一个断线的风筝，失去了和中央最高层的联系。《人民日报》越来越落在形势的后面。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毛派陈伯达领导一个工作组进驻了《人民日报》。

那天，《人民日报》编辑部部主任以上的干部被召到中南海。先是邓小平传达中央的决定。邓批评了几句吴冷西，但很温和。对《人民日报》内部批判吴的大字报，登说："大字报要贴就让他们贴，不要到处贴，弄一间屋子专门贴大字报。 "接着康生讲了几句，主要讲毛对吴的批评，要吴"换脑筋"。陈伯达最后讲话，语调最重，说："如果不换脑筋，人也要换掉。"听说陈伯达和吴冷西早有矛盾，陈伯达大概想借此机会整吴冷西。

陈伯达召集全报社职工开会。一开始，他说："工人同志来了没有？怎么你们不坐在前面？坐到前排来呀！"

接着，他一字一字地对编辑部的人员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正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句话令我们大惑不解。在座的编辑和记者大部分是党具，有的还来自延安，可是都被这样定性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思想。

编辑部多数同志一直对吴冷西的官僚作风不满，有对《人民日报》竟然落后于《文汇报》这样一种形势有气，于是纷纷起来对吴冷西"造反"，大字报贴得很多。吴冶西终于被撤掉了。毛后来说："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麈照例不会跑掉。"

陈伯达主持了一个短时间的报纸工作，扭转了《人民日报》的被动局面，也就是让《人民日报》转到了极左的立场上来，后来他就不那么具体管了，让工作组的另一个成员，原《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唐平铸负主要责任。毛说，他不赞成《人民日报》“另起炉灶”所以编辑部的领导班子，除了吴冷西等几个人换下来外，没有全盘大变动。毛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三分之一下乡劳动，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工作。这样《人民日报》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单位那样乱得无法工作，能每天坚持出报，没有间断过一天。

因为我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在运动初期还受到工作组的信任。陈伯达同我和李希凡谈话，给予“鼓励”。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有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一九五七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内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等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我，真是哭笑不得。那是一个愚昧的、异化的我，而自己还以为是回到了正路。

我担任了一个短时间的社论组组长。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在长江游泳，唐平铸同我一同起草了一篇社论。社论题目《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是我拟的，後来这句话流行开来了，我还很得意。那时我对毛崇拜得五体投地，决心投入这场“伟大的史务前例的革命”。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批评说，“派工作组是错的”可是，“文革”中第一个工作组--驻《人民日报》工作组，就是他本人派的。当时我并不觉得毛出尔反尔，而是认为《人民日报》这个工作组和别的工作组不一样，是发动和支持群群众来“造反”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人民日报》一些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内，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也在会上讲了话，承认自己在领导这场运动中的错误。录少奇说这是一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正当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时，周恩来宣布：我们的为大领袖毛主席来了！毛从后台走出，马上成了注意的中心。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刘少奇的讲话中断了好几分钟。等他继续讲时，听众对他的讲话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现在想起来，是毛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突出自己而压倒刘。

我在《人民日报》多年，常常感到一种压抑。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我喜欢钻研理论，可是上级对我的爱好不感兴趣，他们只要我完成组稿任务。有时我应别的报刊之约撰写发表一些文章，他们就批评这是“名利思想”。作为一个党员，每次整风或总结工作，在谈到工作中的缺点时，总要加上一大堆骂自己的话，什么对不起党啦，辜负了党的信任培养啦。有时上级对我的批评明明是错的也不敢反驳。我对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架子十分反感，但是不敢批评。现在，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

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觉得解放了，我可以贴大字报理直气壮地批评领导了。而且我还不必担心报复，因为大家都这样做。终于，报社领导被撤换了。

那时，我对文化大革命是热烈拥护的。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把大火来烧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极为欣赏。短短二百多字，义正词严，气势磅礴，音调铿锵：“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西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我反覆念这篇好文章，直到能背下来。至於刘少奇是不是真的如大字报攻击的那样，却不多想了。

後来，戚本禹发表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说：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题”！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我读到这里大为惊讶：尽管刘少奇执行了反动路线，可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能给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呢？实际上，戚本禹不过是转述毛泽东的话而已。据毛的医生李志绥在一次接受访问是说，毛那次在後台听到刘个话就说了这样的话。毛说这样的话有证据吗？毛不需要。对毛来说，不是根据证据来定罪，而是先定罪然后寻找证据，找不到就制造。毛哪里是因为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才要置刘於死地呢！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国文艺界的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周恩来和陈伯达先後赞扬了江青对文艺革命的贡献，接着由江青讲话。那次会唐平铸也参加了，坐在主席台上。他回来后说，那天其实毛也去了，是他上厕所说发现的。他走到後台，先看见了当时老跟在毛身边的那个小护士，随后看见了毛坐在那里，毛是不是还准备了适当时到前台去露面而後来放弃了这个打算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初期，尽管“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上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都”，但与此同时又说“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所以打人事件发展得很快。离《人民日报》很近的王府井大街東风市场派出所，一个时期天天发生红卫兵打死抓来的“四类分子”的事件。毛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说对打人要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过去打了，以後不打就是了”这个话江青也照本宣科地讲过。后来打人事件越来越严重。北京市大兴县和昌平县都发生消灭整个村子的地富家庭严重事件。这时才听说，毛生了气：“我还有最後一句话：‘过去打了，以後不打就是了’. 怎么不宣传？”

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号召夺权后，《人民日报》的一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夺了权。我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概因属我写过几篇理论文章)的帽子，被勒令劳动。後来王力为我讲了几句话，就停止对我的批斗了。不久，我参加另一派组织. 这派组织也自认为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但被方对称为“老保”. 我当时确实充满革命的激情和理想，想投身这场运动，在大风大浪里跟着毛主席游泳。现在看来，我够左的了，但当时总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这使我很苦恼。其时，对立的两派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派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派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

批左批右之争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动摇了我对毛的迷信。我们都震惊不已，并开始思索，毛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人做接班人？是不是因为他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

“批林整凤”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所谓批判，其实是“声讨”。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这也很快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

林彪一完蛋，政治局里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垮台了，这是一大片。周恩东变成了二号人物。毛显得很信任周的样子，什么事都要周来管，包括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　　这时的《人民日报》里，唐平铸已被打倒了，常年陈伯达率领了工作组中的其他人也先後垮台了，或是回原单位了，只剩下一个鲁瑛。鲁瑛在工作组成具中名列最後。《解放日报》的群众组织曾想把他揪回上海去批判，张春桥不同意，留下了。以後成了《人民日报》的实际负责人：本来《人民日报》的人不了解他，对他并没有什么偏见，可他一旦成为负责人，笑话百出。上台讲话、念文件，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把“罗马尼亚”说成“罗马尼西亚”．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说成“贝多芬俱乐部”等等。可张春桥、姚文元就信任这样一个人，只和鲁瑛一个人联系。张、姚对报纸工作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凡事都往周恩来那里推。于是一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也直接送到他那里去了。周一面改稿一面对鲁瑛叹气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无能的现状。他在一九七二年初指示《人民日报》成立一个临时的“看大样小组”，负责最后审阅版面，成员要有“老、中、青”。显然，周恩来的意思是，下一步就要成立正式领导班子了。

几天以後，《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周恩来给鲁瑛打电话，问为何没有报名单。鲁瑛说，他生了病，所以拖下来了。周恩来厉声说：“你死了怎么办？你死了就不辨报了？”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温文而雅，可他也有令人生畏的时候。

名单终于定出并由周恩来批准了。吴冷西是“看大样小组成员”成员之一，我也在这个小组内。在此之前，他曾写了一封检讨信给毛泽东。毛批示了八个字：“此件已阅，欢迎进步。”于是吴冷西解放了。

这时吴冷西对我的态度有些转变了。请我到他家里吃饭谈天。他告诉我，毛让乔冠话华复出时，曾让乔读桓伊的一首诗：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佑文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辅王权，二叔反流言。

毛沉湎于线装书，常常产生一种时间的倒错感。似乎他不是处身于二十世纪的、他所缔造的社会主义中国，而是回到了古代。他在这里把乔冠华看做是臣子，也就是把自己看做是皇帝。“文革”期间大反所谓封资修，如果是别人把毛和下属的关系此做君臣关系，非挨批不可；可是这反不到毛泽东头上。

周恩来开始探取一些措施，来有限地纠正“文革”的错误。第一步是解放一批老干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授意并审阅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中提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这篇社论 起很好的作用。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讲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而现在又说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上说：“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我们听到这个指示都很高兴。党的周总理讲得很及时，应当坚决执行。

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主要意思有两点：一，关于鲁瑛。张春桥说：“我说鲁瑛弱得很，他在《解放日报》也不是强的。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只能如此。你们在座的要多协助他工作。”当时《人民日报》正在筹建领导班子，张春桥说这个话就是暗示鲁瑛要当总编辑。二，关于宣传，张、姚说，批左不要过头。张春乔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在编辑部传达后，大家的思想很抵触。一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鲁瑛，这明明是“任人唯亲”。二是觉得周总理明明讲了要批左，长姚为什么要泼冷水。

用不用鲁瑛当总编辑，这实际是让不让张姚来掌握《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问题；批左还是批右，这实际是要不要纠正“文革”错误的问题。在在两个问题上，周和张姚之间展开了林彪灭亡后的第一次较量。

张姚讲话和总理不同，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听谁的？我当时的思想很明确：坚决批左：不听张姚那一套。不久，张姚去了上海。我乘这个机会，利用手中的一些权力，组织了一个版面，批极左思潮，批务政府主义。

这一版捅出去以后，社会上反映强烈。有九家省报随后也登出了批左的文章。

不久.《文汇报》出了一期内参，报道他们召集上海工人座谈《人民日报》的批左文章。奇怪的是这些工人的意见是完全一样的：都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把矛头对着群众，是批判了“文革”；竟没有一个人说那文章有道理。

姚文元把这一期内参批被《人民日报》，要我们讨论。我们问他，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姚文元说他还没有看。我心想，玩这种把戏，谁会上当？我去查阅中央转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都说要批无政府主义，有的还说“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于是我信心十足。我想，不管张姚怎么说，我要和他们顶，因为我没有错。

从前我对张姚没有很多了解，但从他们支持鲁瑛这件事，我认定他们不是正派人。如果鲁瑛当《人民日报》总编辑，这简直是笑话，也是《人民日报》的耻辱。张春桥、姚文元明明知道鲁瑛不行，却非要扶持他不可，无非因为鲁瑛也来自上海，和他们有一点老高兴，可以成为一个忠实的工具，便于他们控制《人民日报》。

这时《人民日报》不少人写信袷中央和周恩来，揭发鲁瑛的笑话，提出这样的人不能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并不缺乏适当的总编辑人选，如吴冷西和胡绩伟，为什么非要鲁瑛下可？

我觉得，告鲁瑛可以，但还要告张姚，因为是他们在支持鲁瑛；他们支持鲁瑛，和周恩来唱反调，在两件事都暴露了他们的面目。反左还是反右，这是一件大事。林彪在整个“文革”中都在搞极左，这是无可怀疑的。现在要纠正“文革”的一些偏向，当然要反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本来应当反左，毛主席却提出要反右，弄得出现了三年困难，饿死的人以千万计。这个惨痛的教训，毛主席能不吸取马？我不相信毛主席会主张反右：可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还要问个明白。

我决意给毛写信。正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了大吃一惊：心想，中央还没有这种提法呢！难道《文汇报》要出来指导批林运动了？我又感到很困惑：《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上书惹祸

我花了两天时间给毛主席写信。信中我表示赞同周恩来提的批左，同时告了张姚一状，逐条批驳了他们的论点。

这封信闯了大祸。在后来《人民日报》逼我交出信的底稿时，我悄悄烧掉了。我知道这封信的原件现在还在中央挡案馆保存着，但我无法看到。以下是根据我后来的交代和回忆写的。

毛主席：

现在报纸宣传面另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这个指示很重要。虽然总理说的是外交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内部工作，可是我觉得也完全使用于宣传。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判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春桥同志为了说明批“左”中出现过头的问题，举了批“精神万能论”和批“唯意志论”的例子，说主席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不是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因为主席将讲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我还认为，林彪既有唯意志论又有唯武器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文元同志税，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红旗》第十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了这样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报刊上还没有公阴点林彪的名字”若水注）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文元同志的话，把这篇文章的正确观点也否定了。

由于这两个机会精神不一致，在报社编辑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在十月十四日编法

了一整版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龙岩（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汇情况》第三一二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锐。这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第一次在内部情况上批评《人民日报》，而文元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同寻常，值得严肃地深思了。

对这份情况，我们感到很难听了，因为是工人意见。就在我们讨论期间，文汇报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流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情况》第三三五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的影响，其中包括某些地方报纸提出的有关论点。《文汇情况》没有直接批评这些论点，但实际上是把他们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朱示众的。其中有一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我想，如果这样的观点都错了，那就不是龙岩这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能不能批的问题了，不是龙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的问题，而是《人民日报》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错误的问题了。

这些天，我反覆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左”。根据报社记者汇报的情况和来稿的情况来看，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但“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将来适当时候，可能需要强调反右，但目前还是需要强调反“左”。只有克服了“左”的倾向以後才能有力的反对右的编向。林彪煽动极左思潮，流毒很广，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中央所批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中，也是强调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因此，我认为批左是中央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麼“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因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么新的指示的话，是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向主席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敬祝

万寿无疆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

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几个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被通知晚上八时到人民大会堂。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是领导人接见。鲁瑛可能误以为我要受重用了，在汽车里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人民日报》的事，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我们先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记不得是什么厅了），领导人在隔壁一个房间开会。接见时间比预订的推迟了半个小时，显然是领导人在讨论什么问题并没能及时结束。待到他们走出来时，我看见是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都是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和蔼地和我握手，但我发现张、江、姚三人都绷着脸，怒形於色。

我坐在靠近周恩来的地方。周恩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大学毕业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等等。後来，他看大家都已坐定，就转入正题：

“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和别人的，都联系到你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时我注意到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面前摆着一些信件，我的信也在其中，他们正在翻来翻去。我想，糟了，这封信是告张姚状的，怎么转到了他们手上呢！.

后来我听说，毛对政治局委员谈到了我的信，说：我认为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

周恩来接着解释了几句他在八月一日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至于林彪的路线，那是右到了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要负责。周在这里提到，“江青同志讲我们务虚不够”当然林彪也要利用群众的极左思潮，够形左实右，但那只是一段时间，就是六七年的三个月，火烧英国代办处，香港事件，甚至鼓动出兵。但林彪害怕苏联核武器，反对同苏联斗争，实际上不赞成利用美苏矛盾。周恩来说，他只是看了王若水的信後才去看《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他觉得那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世界也不恰当。”

“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下面周讲了很长的话，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关于《红旗》和《人民日报》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党报和黛刊对立起来了，对这件事外电有报道。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周说，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外国记者总是要挑拨的，但理论上为什么让他们挑拨？周又说，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出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 要彼此通气。

二，关于报纸领导班子问题。周说，“现在报纸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如说鲁瑛同志能力弱一点可以，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负责。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我说你们有些争权。鲁瑛能力弱一些，但维持了困难局面。这次无政府主义文章的问题，他看出来了。”周还提出.《人民日报》对新的同志吸收的不够。“我们总是希望青年同志多一些，有些朝气。”关于有些同志要求把建立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出简报送到中央的问题，周说，“文元同志不同意（姚文元插话：“我是怕你们相互点名，不是怕情况上报。”）我也不同意，因为那样就乱了。要团结起来。”

周的话，显得很散乱，缺乏条理性，也缺乏说服力。他本是卓越的演说家，但这次似乎变得平庸了。我想，一个原因是他究竟老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言不由衷。他讲的不是自己的心里话，而是别人（这些人有毛做后台）的话，甚至自己并不赞成的话，他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

张春桥说：“他们讲吧。”

于是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和鲁瑛讲了一些话。鲁瑛讲话时，周恩来多次用插话打断他。如鲁瑛说到，他现在的办法是，遇上报纸上出现批左的字样，就删掉。周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时，我讲了如下的意思：

总理“八一”讲话，是讲的外交问题和单位内部要批左，但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宣传。在是我的责任。林彪问题，我想过很久。现在中央提出林彪联系的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它的表现形式是否也是右，或者表现为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林彪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这只能是暗中策划，见不得人；“公布出来，就完了。这是一个揭发和声讨的问题，没有什么可批判的。欺骗性大、流毒也广的是林彪搞极左，这才需要深入批判，肃清影响。一九六七年主席讲过一批判极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毛主席也讲过批判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

讲到这里，我翻阅了我的笔记本。念了三个中央文件中的关于要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提法，还念了中央一九七二年第三一号文件说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

然後我说：党前左右两种干扰都有，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对形势如何估计？是不是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右的也要注意；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批林以来，报纸上出现的批左文章较多，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因为大家感到，实际情况中左的危害大。最後，我提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要求以后不再看大样。

我这一番话可能使张、江、姚感到意外，因厨我不但没有做检讨，还提出了问题。我讲完後，江青讲话了。她一讲，音条就提高了八度：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对《人民日报》的这篇鬼文章，我也勉强看完了。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林彪路线是极右，至於在某一个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气挑拨作用。我看了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同志和从理闹别扭。我认为太过份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周恩来讲话时，尽管是批评我，甚至还说到毛泽东不同意我的信，但我并不感到紧张：因说周恩来很明确地把我的“错误”看成是“认识问题”。江青一讲话，调子就提高了，什么“矛头对着群众”“挑拨中央”这些帽子都很大，变成立场问题了。我感到，她的这些话连周恩来都感到意外。本来，今天在接见我们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讨论，因此应该用一致的调子对我们进行谈话。可是江青不管这些，这是存心使周恩来尴尬。于是，在这之後，周用插话的办法，把他的调子也提高了；但如果稍加注意，仍可以听出微妙的区别。

江青继续说：“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的部分同志写的。还有另外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当然我不是说鲁瑛你这个同志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的信那样写，简直少有。简直把一个人说得一塌糊涂。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周恩来插话：“第一，你对形势的估计不对。第二，怎么能把我们对立起来呢？”

姚文元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全身埋在沙发力，一只腿跷在沙发扶手上。他喜欢插话，轮到他讲时，话却下多，他说：“我同意周总理、江青同志的分析；林彪是极右。我原来一片好意，我都不讲：我一到上海就听说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有反映，我都把《文汇报》的内参批转给你们了。”

张春桥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张姚都在这里撒谎。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工人揭发：以《文汇报》名义召集的那个工人座谈会，完全是张春桥授意的，调子也是他定的。）

张春桥继续说："我没想到底下的群众有那么多意见。你也不能低估群众的觉悟。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原文是说林彪煽动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林彪怎么会有那么多群众？那么多群众会接受林彪路线？这样一个基本估计都没有了？这是极右!"

姚文元："标题特别大，很少有。我也有这个经验：用大标题，说明编者要提倡这个东西。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新闻是有阶级性的。"

周恩来："说严重些，是适合敌人的需要。"

姚文元："主席最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漆黑一团，还是略有光明？"

张春桥："搞理论工作的也不到群众中去。以为天下都是搞无政府主义……

姚文元："主要问题是把无政府主义同林彪联系起来，同巴枯宁联系起来。我不赞成无政府主义。我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书，早的不了解，我看通巴金，他不要群众，要搞暗杀。难到几亿群众也是这样的？"

张春桥继续讲话，他针对我提出的四川文件的问题，解释说："四川文件主要是要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参加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么几句。如同你在总理、文元同志和我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空子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在总理身上找根据，在中央文件中找根据。"

我心想：林彪是不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这是大方向问题，原则问题，怎马可以为"照顾"什么人而随便改变说法呢？如果可以照顾四川参加批左的同志，为什么不照顾照顾我呢？不根据中央文件办事不行，根据中央文件又说是"找空子"，到底我该怎么办？总理是中央领导人，从他的话中找根据有什么不对？就算错了，从中央文件中找根据也不行吗？

周恩来："我看了外电。就说不要等了，明天晚上就开会。"

姚文无："另外我要说明，同志们对我提意见，我还是欢迎的。当然有些原则问题我要坚持，如无政府主义，我采取帮的办法。敌人千方百计挑拨我们。毛主席说三条，希望你们在工作中坚持。"

江青："我也想念一小段，看敌人怎样说我们：洛杉矶时报，标题是《北京的官方报纸走着不同的道路》……"她念了那一段，大意是：《红旗》支持红卫兵，而《人民日报》维护老干部。念完后，她说："敌人很注意。我不知道《人民日报》有什么问题。"江青和张、姚都把西方报纸的记者成为敌人。

周恩来："主席认为你在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你的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篇比较好的文章--《桌子的哲学》。"

下面姚文元提到我的信对"唯意志论"的批评，他刚开了头，张春桥把话接了过去："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

我吃了一惊：不是张春桥的，那么是谁的呢？糟糕！我批到毛主席头上去了。难怪张

春桥对我引用中央文件表示蔑视。中央文件算老几，尚方宝剑在我这里呢！

周恩来也提到毛的某一次讲话，他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姚文元："苏联骂我们是'唯意志论'. 我们为什么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我们坐在这里讲话，难道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周恩来："主席还要我们读《傅奕传》，主要是提倡主观能动性，不吃药。"

江青严肃地对我说："恐怕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在篇文章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批林到底是批什么？党报是指到全国的。它这一版有三篇文章，这么一整版，都搞这个东西。"

汪东兴一直在会场内外跑来跑去，虽是政治局委员，却像个打杂的。这时，他讲了一句，整个会见中他只讲了这一句："这三篇文章是互相配合的。"

张春桥："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还是要讨论。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其实林彪的实质中央文件反覆讲了，可见没有很好学习。王若水同志在信里说，究竟表现形式是什么？我认为林彪只是有些时候表现为极左，但从主要方面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江青："文化革命有些左的束西，他就利用嘛！"

姚文元："还是应该看主席在庐山会议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主席讲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周恩来："你是研究哲学的，要好好看看。"

张春桥："不要搞很多名词。我讲过，不要批林彪的闭关自守。林彪家里的东西都是洋的。编辑部的同志不知道工人农民在想什么。刚才鲁瑛讲到教育革命的问题，有人说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九斤老太的思想。提出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我。我本不想宣传，可一到上海，到处都在议论，无非说青年不好，文化水下低，等等，这不是批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算那几年停课的帐？当时我正在读鲁迅的九斤老太。我说怎么七十年代还是这个争论？考试不及格，那个自来就有：但政治觉悟就是比过去高。老师在课堂教认字，说'财'就是'发财'的'财'，学生马上站出来指着他说：'你反动'。"

姚文元："现在家里的孩子经常说：'你反动'"

张春桥："老中青要结合，但希望在青年。主席接见一千万红卫兵，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会跟主席走的。"

姚文元："报纸还有一种说法，讲鲁瑛是从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上海来的有好人也有坏人。陈敢峰、王维国也在上海嘛！"

周恩来："但不管怎样，上海工人是好的。"

张春桥："成立文攻武卫时，向主席写了报告，还问了问：发不发枪？主席想了一下说：你先不发枪，发棍子吧。"

周恩来（对着我）："你是不是因为受了冲击，有怒气啊？"

我说："没有。"

"有一点吧。"周恩来温和地说，"有一点也不好。"

以下是吴冷西讲话。他说今天的会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又谈到报社领导班子的问题，一个版和一封信的问题，说王若水同志应当看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好好检查，吸取教训。说到鲁瑛时，吴冷西说："他的工作很不容易，如果我来，肯定会犯更多的错误。"

姚文元："我也急了一些。总想先有个班子，没想到酝酿出这么多问题。"

江青："《人民日报》批林大概是批得不好。如果批得好，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这些信是这个意思：原来的班子很好，就是鲁瑛不好。这样好像原来的班子没问题，那麽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封资修？"

姚文元："你们不批林，现在看起来后果很大。《人民日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不敢说。"

大概是看到我一直没有承认错误，江青重复说：

"王若水同志，你还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在中央面前讲清楚，不要隐瞒。"

我懂得这个话的含义：江青是希望我扯到周恩来头上去，毕竟周恩来讲了批左。我如果这样讲了，江张姚都会高兴，虽然会在表面上批评我几句。

姚文元进一步点到了关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了哪里？"

我没有说话。

周恩来转移了话题："鲁瑛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鲁瑛吞吞吐吐地讲到了他工作难做，干不了，夜里还哭过，处理稿子发生争论，他也顶不住。

看到鲁瑛提出干不了的问题，张春桥感到不能不表态了，他说："对两位同志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不好。王若水同志你向主席写信，完全是可以的。但既然写了，正确与否，就可以讨论。你却提出不能看大样了。为什么这样提？没人这样提嘛！对路瑛我也不满意。现在叫昊冷西同志来主管，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西欧那个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什么打退堂鼓？"

周恩来（对鲁）："我看你留一个时期有好处。"

张春桥："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势力，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

周恩来（对王）："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

周恩来继续说："如同王若水同志刚才讲的，我那天不是讲整个工作，只是讲外交工作。主席前天晚上说，现在批判极左要少一些。我也想到外交上要注意。因为联合时期容易出现右的偏向。国际问题上是这样，国内更是这样。王苦水同志你是搞哲学的，应当搞清楚嘛！你的这封信一是把报社说得漆黑一团，一是从中央找漏洞。主席批交政治局处理。共产党员要有勇气承认错误嘛！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

江青："不能对中央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

周恩来："我讲得也可能有不恰当。"

江青："不能这样。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很不好。"

鲁瑛说了一句："报社还有人说，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他也许希望这个信息引起注意，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周还是张、江、姚都对道句话保持沉默。将近一年以後，江青在政治局批评周恩来的会上用了“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但被毛泽东批评了。

张春桥谈建立领导班子：“报社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经过这一场斗争，领导班子可能出来。”

江青：“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就要从一个版入手，一封信入手，理论部入手，这次不要分割我们几个人的讲话。”江青讲的这三个“入手”，后来就成为报社“揭批”我的方针。

接见到此结束。我们和他们一一握手。我在最后同周恩来握手时，特别把手握得紧一些，同时看着他的眼睛，想趁这短短的一瞬间向他表示我的同情和敬意，同时也努力从他脸上读出些什么。但是周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这次接见从十二月十九日晚八是开始，到二十日凌晨二是结束，整个五个半小时

毛、周之间

回到住处，我的脑子像是麻木了，倒头便睡。因为事情太大了，我反而不害怕，不着急了，对自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

真正使我震惊和痛苦的是认为到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近处观察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他们几个明显地是在压周恩来，而周恩来处于守势，因为他们後面站着毛泽东。

事情清楚了。毛泽东对张春桥（或者加上姚文元）有一次谈话。淡话的时间，应该是在《红旗》第十一期付印以后，张姚对《人民日报》谈话之前。这次谈话内容，没有向周恩来透露，也只是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点暗示。张、姚跑到上海去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这个精神告诉《文汇报》，叫《文汇报》抢在全国之前，首先公开提出批右。这叫做“抓旗帜”，也就是给上海捞政治资本。没有想到《人民日报》不听他们的话，偏偏大肆批左，一些报纸也跟着批起左来。这当然使他们大为恼怒。

我当时只是想通过枇林，纠正“文革”的一些左的错误，并没有想损害毛泽东。我想周恩来也是这个意思。但毛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他当时正处于尴尬局面。毛和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太密切了。林的许多东西是来自毛的，或者得到毛同意的，还有一些言论是吹捧毛和“文革”的。因此，批林和极左路线，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到对“文革”的评价，甚至会损害毛本人的形象。这是毛不允许的。毛对批林不积极，但他又不能说不批林。毛所积极想做的事是整周，但又苦于找不到借口。这时我的信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毛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周恩来。

这次会见以后，报社领导很快就向全体工作人员详细地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而且是反覆念给大家听。接着开始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运动，揭发和批判以我和胡绩伟（当时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一股势力、一股邪气”。前面提到的那位副总编辑陈某，“文革”初期被当做吴冷西的同伙而被打倒，后来“解放”出来，这时又投靠鲁瑛，帮助他整人。他确实很卖力，把这个应当搞得有声有色，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不消说，我的帽子最多，什么“漏网右派”、“右倾讲话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前威”一大堆。批判我的大字报从一楼贴到五楼，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

扯出来了，还连累了许多和我观点接近的同志。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没有任何隐私的。还好，我在报社多年，大家对我比较了解，挑不出多少毛病。胡绩伟更是如此。理论部是重点，结果，由于一个理论部编辑和别人常常一同走路上班，一边走一边闲谈，于是成了“马路俱乐部”。这次批判运动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来势之猛，动员之广，都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了“文革”初期。

我想，以我这样一个区区公布，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他们还有一个大目标呢！

据姚文元说，毛后来有一次在同他谈到我的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的顾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汉宣帝一次和太子（即後来的汉元帝，史稀“柔仁好儒”）谈话，太子批评他“持刑太深”．建议父亲起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我，还有当年参加会见的报社同人，都不记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只记得毛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於从此对太子疏远，甚至一度有意废太子。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就是暗示不能像周恩来那样讲王道，而要讲霸道。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毛讲这个故事还表明，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愿意周当他的继承人。尽管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指示，可是周是有偏重的。周以执行毛的改策为名（关于这些政策，毛只不过说说而已）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毛看出来周在内心中是不同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极左思潮，毛就怀疑这是要否定“文革”。从这以后，我预感到周恩来的厄运。果然，隔了一年，毛泽东就授意江青搞“评法批儒”．对周恩来极尽影射攻击之能事。

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过问《人民日报》的工作。张春桥、姚文元牢牢地控制了《人民日报》，鲁瑛也站稳了。

我给毛泽东的信，是通过总编室的秘书室送上去的。后来就加强了对秘书室的控制，规定不得私自给毛送信。姚文元还指示，凡《人民日报》编辑的内部情况简报，一律要先经他看过后，才能送给中央。姚文元很重视这件事，每份简报都仔细审阅修改。有时他要删掉“毛主席”三个字，就很小心地用铅笔在周围划个圈，而不是把名字涂掉，而且不让铅比碰到这三偶字，可谓恭敬之至。姚文元就通过这种送简报的办法让毛对他领导的《人民日报》工作有好印象。有一次姚主持写了一篇社论，发表后，就指示《人民日报》搜集读者反映上报。这些反映当然大部分是说好，但其中夹了两条说不好的意见，姚文元就不高兴，删去了。

《人民日报》对“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批判进行了几个月，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因为要准备“十大”，停了下来。

“十大”由周恩来做政治报告，那是有张春桥等人起草的，给人突出印象的是王洪文，他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这件事当时激起了很多议论，谁部觉得他的资历和水平都不够，但

谁也不敢明说运件事标志着工洪文作为一颗政冶新星正在迅速升起，可以和“九大”做一比较：“九大”通过一个新党章，照例要做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结果没有，只有林彪的报告。为什么？因说如果要做修改党章的报告，那就应该由排名仅次於林彪的周恩来做，而毛却不想突出周恩来。“十大”要抬高王洪文，于是让他来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多次用这类手法来打击周恩来。有一次，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理方华。和中国政府会谈时，商定了中国政府给予几亿元的贷款。这件事无疑是报告了毛泽东的，而且他当时并没有反对。可是，当最後周恩来陪这位总理去见毛，向毛告别时，毛却批评周恩来，说他太小气了，为什么只给那么一点贷款，他张口就把贷款的数字提高了若干亿。这样，他贬低了别人，显示了自己的权威，还作了好人。

那时，中国的外交已打开了新局面。基辛格、尼克松先後访华，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日本也恢复了邦交。来方华的外国元首和记者很多，外交工作十分活跃，周恩来异常忙碌。因为总接见外宾，他的照片就常常出现在报纸上。许多外国客人回去后，也在报纸上发表感想和评论，盛赞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风度。《参考消息》就登过斯诺的文章，说中国有两个伟人，一个毛泽东，一个周恩来，这两个人互相配合，谁也离不开谁。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心里感到很不安。斯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这是在给周恩来帮倒忙。“毛主席像太阳，太阳的光辉笼罩一切，怎么可以允许别人和他并驾齐驱？何况，这个人又是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姚文元给《人民日国》来了个电话指示：

“最近报纸上的照片太多了，主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今後照片一律不登；要登，要送总理和我批准。请从严掌握。可写一报告给中央。”

这显然是对周恩来的。毛看到周恩来太突出，不高兴了。

《人民日报》把报告送上去了，可是没有下文。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外国元首来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合影，中国报纸能不登吗？或者，中国报纸只登外国人的照片，不登他们和中国总理的合影，行吗？要真是不登，事情可就大了，不仅是外交礼节问题，还会引起全世界的纷纷猜测和议论。

从此，毛泽东出面接见外国客人了。他身体有病，而且从前一直不喜欢外交礼节。现在，他亲自会见来宾，而且，每次都由周恩东陪同前往，到了中南海毛的住处，则由王洪文在门口迎接，这样来显示毛的无上地位和尊严。

这时，我再也不用盲目信任的眼光来看毛了。同时，我越来越预感到周的厄运。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那时，我已写了多次检讨，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检讨，就在检讨里埋了一些钉子：鲁瑛看不出来，送到姚文元，姚都不吭声，观在，他说话了：“王若水问题的性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这回写的检讨，还在说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何说，另外两个常委如何说。他不久就会明白，他这样说的严重性。”

实际上，我的检讨根本没有这样说。姚文元硬要那样讲，无非是要引出“严重性”的话，无非是暗示不久就要揭周恩来的盖子了。

从一九七四年初开始，我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对我的批判又逐步升级。原来说我写给毛主席是想夺鲁瑛的权；现在说我想夺姚文元的权。这还不够，一个老干部在批判大会上说：

“王若水的这封信，性质和彭德怀的万言书是一样的。彭德怀是给毛主席下战书，王若水也是给毛主席下战书。他是不是想夺毛主席的权？”

会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表不焦虑：“会不会把你抓起来途监狱啊？”

我说：“不对，应该送疯人院。”说的太离谱，太荒唐，我反而不怕了。

这时又有人贴出了轰动性的大字报，揭露我处理一篇来稿的“罪状”。那是一九七三年，我虽然挨批，但还要“戴罪工作”，暂时还看稿子。有一篇理论性的来稿，已经排印出来，我觉得水平太低，不知所云，决定不用。大字报说那篇文章是一篇十分好的马克思主义论文，我竟然加以压制，足见资产阶级反动本性未改。这件事报告到中央，据鲁瑛说：“江青同志很生气，说‘要批他’!”

那天晚上，消息传来，干校十分紧张。毫无疑问，新一论的大批判又要开始了。我是千钧压顶。那时，我独自住一间小屋。干校的管理干部大概担心我晚上会自杀，跑来要我搬到大屋去住。我拒绝了，我说：“你们放心，我是要革命的。”当时，在运动中自杀的人，被称之为“叛党自杀”。我说我是要革命的，就是说不会自杀。

那天晚上，我喃喃不已：“我要革命，要革命，要革命……”我心里想，要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命。当然别人不会懂我的意思。

那些天我确实非常痛苦，心像被一只大手攥得紧紧的。这种巨大的压力真让我有些受不了。生命显得那么漫是，每一分钟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人好像在受煎熬。望着广阔的田野，我真想扑在她怀里。

大地啊，你承担着一切，一切重压队你都不算什么。你替我承担一下我的痛苦吧！

那时，我真想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或者，向一个知心的朋友倾诉，而只要他对我说一句：“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

“文革”中自杀的人很多，报社就有好几个。我现在能够了解，他们为什么自杀。在今天，我会藐视给我加上的这些罪名，但在当时，这些精神上的压力能够把一个人压垮：

但我不想自杀。“死是容易的，活着更难。”不记得谁说个这个话。我明白，死也是白死。那些野心家才不会在乎你死下死呢。当然，我也认为，毛主席如此批评我，我这一辈子不用想翻身了，我的后半生会是凄惨的，甚至会郁郁而终。但我不会消极无为。既然已经看透了这帮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我就要想办法和他们斗。我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我的精神支柱。

另外，我清楚地看到，许多同事尽管上台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其实内心还是同情我的。有时一个同事在路上遇到我，看看旁边没入，会悄悄说一句“多保重”，再赶紧走开。我得了肝炎，一些朋友给我送来黄芪。后来，我又被送到农村，粮票不够，还有人悄悄给我粮票。这些使我觉得不再孤立，相反，我在精神上是占优势的。

但我还必须在劳动之余没完没了地写检讨。一篇通不国，退回重写。一遍、二遍、三遍…….高高的一叠。这检讨太难写了。每写一句批评自己话：心里就有十句反驳的话。逼人说违心的骂自己的话，不啻是一种精神强奸。

我也想法来对付。我可以用写检讨的名义来请假，不去大田劳动。这时，我就在桌面上放着检讨稿，抽屉里放一本小说。只要没人，就拉开抽屉看《红楼梦》）因为毛泽东欣赏它，这时还能买到）；有人来了，就把抽屉一关。

我没有错，这一点我非常自信。要说我代表资产阶级，姚文元代表无产阶级，我死也不相信。没完没了的批判，摧残了我的身体。严重的失眠，以至任何的安眠药都无效。每天早晨起床，枕头上都留着许多断发。人瘦了，背也驼了。可是，我的精神没有垮。有时回到报社，从一楼走到五楼，全是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就昂然从骂我的大字报小巷中穿国，心里充满了藐视。

一九七五年，我还在农村改造是，有是回城，就到历史学家黎澍家。我们是无所不谈的朋友。那时，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已经传出来，而且听说政治局会议也批评了江青一伙。我们都感到高兴，常议论这件事。毛支持邓小平而批评江青，话就得那样重（“她不代表我”）看来他似乎要大义灭亲了。但又感到不很踏实：会不会又是一次“钓鱼”啊？因为毛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後年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张春桥、姚文元都表现得有些反常，他们离开了北京，也不讲话了。鲁瑛守在专用的保密电话“红机子”旁，却得不到任何指示。他六神无主，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突然，八月十四日，毛讲批《水浒》，说“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当天就向毛写了信，说这个讲话意义重大，牵涉到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提意组织评论文章。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

这一下，鲁瑛像大了一剂强心针，马上活跃起来了。《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信，立即发表社论。鲁瑛召集会议。动员批《水浒》，并向全国各地派出记者，收集讨论情况和思想动态，组织文章。他挥舞拳都，高声叫到：“拿出批林批孔时的劲头来！”

毛泽东评《水浒》的话是对卢获说的，卢获后来写回忆文章，说毛只是回答她的问题，并无其他用意。但问题是毛曾经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意思，而且这次又批准了姚文元要大做文章的报告，随後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埸批《水浒》的运动。改变了“四人帮”的困难处境。这又做何解释呢？

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测，谁是宋江？谁是投降派？江青跑到大寨讲了一通，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要架空主席呀？结果毛把她批了一通，说她“放屁，文不对题”。有人据此认为，毛提出批《水浒》并没有针封性。其实，是江青领会错了毛的意图，她想借批《水浒》整邓小平，说邓架空毛主席，而毛则是意不在邓而在周。周恩来也明白，我曾听说，康克清去医院看周恩来，周对她说，我这个人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不是投降派。

后来，毛也逐渐对邓小平产生不信任。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纠正了一系列“文革”的错误，毛担心这样做下去结果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千秋功罪，何时任人评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我非常伤心。当时，我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那些农村的青年人哭得很厉害，特别是女孩子。周恩来对农业管得并不多，可见他的精神感召力。说子来矛盾，尽管我知道毛要整周，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毛对周恩来的逝世，说几句悼念的话，或者赋一首诗，或者发表一长他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照片……然而，我失望了。报纸的版面安排，滑息报道，都表现出要抑制人民的悼念情绪。群众议论说，周恩来是累死的，气死的，这话不假。后来我逐渐相信，毛完全是有意把周

折磨死的，他不能让周死在自己后面。周和毛的关系真是一个大悲剧。

清明节前后，我一有时间，就去天安门。一到天安门，我就觉得精神上解放了。那么多人，那麽多的诗，说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他们的恨与爱，就是我的恨与爱。原本只能关起门说的悄悄话，在这里却能大声说了。好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同志。二十多年前，我从北平去解放区，下了火车，过一条河，就到了根据地了，那时我们几个大学生高兴得直蹦，唱啊，叫啊，觉得自由了，可以随便骂蒋介石、国民党，不用害怕特务了。在天安门，我又一次有了组织感觉。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一块地方小得看不见。可是一块地方有自由，哪怕是暂时的自由。

有的诗说："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下复返"，我想，秦始皇还在，他就是秦始皇！他不是说，秦始皇还不如他吗？

四月六日那天下午，我在天安门。到了傍晚，广播里一再重复吴德（北京市委书记）的讲话，要大家离开。可是，离开的人不多。晚上，我感到饿了，便回了家。不久，民兵就出动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长篇报道，宣布广场的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说过．"镇压学生的没有好下场"。但当他觉得需要镇压时，他是毫不留情的。他没有下令开枪，因为不需要；民兵的棍子就够了。

《人民日报》的内参，对毛泽东决心镇压，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能猜想到，毛本来是准备在周死後，是的时候继续批周的。不料，群众对周表示出的如此巨大的怀念，当然使他震惊。

有一句毛说的话传了出来："反周民必反。"他不能不把批周的打算搁置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是继林彪事件后对毛泽东威信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表面上毛胜利了，他把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而且撤掉了邓小平的职务，可是，毛失掉了人心。我开始怀疑他的品质。

从前，我很但心毛的死。每当想到这件不可避免的事，心里就"咯噔"一下，彷佛天要塌下来似的。可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

在漫长的几个月中，人们听不到毛的任何消息，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

九月，为了逃避地震，我请假送家属到长春，暂住在一个部对招待所。九日，党毛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只看到一个军人倒在床上哭泣，此外没有人掉眼泪。走到街上，看见有不少人到布店卖黑纱，其他和平常没有两样。

第二天，我回北京。火车上，大家都很少说话，可是也没有什么人流露出哀伤。

毛泽东的葬礼盛大而隆重。然而周恩来逝世时那种"十里长街"的场面却没出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自己却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毛的面目一步步暴露出来。人们都禁不住问：能把一切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吗？能够用"两个凡是"来限制对过去错误的纠正吗？

在一九七九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我做了批评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我说不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效果是坏的，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也是不好的；对毛的品质提出了质疑。发言稿被辗转传抄，香港刊物登出来了。有的报纸推测，我的发言是胡耀邦授意的。其实不是。在另一个发言中，我还对“坚持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我说，毛泽东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要用实践来检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坚持，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批评有些共产党员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动摇。他说：“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做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够成的科学体系。至於个别论断，那么，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够成的科学体系。”

但是，毛泽东指导“文革”的思想却不是什么“个别论点”．而是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它不是一他“科学体系”．但仍然是一个思想体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思想，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而且至死没有放弃。

在参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把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的许多错误思想，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分出来，另行处理。这样可以解决“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胡乔木起初统一这个意见，让我写“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节。可是，后来，这一节被弃而不用。

最初，胡耀邦说这个决议“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但后来他说，对毛主席要厚道一些。不过，他同时也说：“毛主席搞权术。”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了十几次指示，陈云也讲了几次。中心意思都是要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对毛的这种维护态度，使我想起五十年代苏联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扔掉了。中共没有认真从斯大林问题上吸取教训，使毛泽东重犯斯大林的错误。

决议草稿出来后，曾在党内征求意见，参加的人有四千之多，其中许多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谈起“文革”，谈起毛泽东，都义愤填膺。有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反革命！”有人纠正道：“不对，是武化反革命！”还有人说，毛主席和曹操一样，“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他们还谈到历史上许多事情。我也在讨论会上发了言。就实话，那些老干部的讲话比我尖锐很多，邓小平后了显得对这些讨论不满，不过他没有批评那些老同志，只批评我，意思是他已经讲了不同意毛有品质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坚持。

胡乔木也在讨论畲上受到指责。有些人说，是不是他作了多年毛主席秘书，怕牵涉到自己，所以对毛也要保护。

对决议草稿，尽管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中央都不接受。邓小平、陈云等的决心已定。胡乔木表示要“力排众议”　他后来有一次对外宾夸耀：我们的历史决议，曾在四千多人中征求意见，可见我们党是多么讲民主。他没有说，邓、陈两位讲的才算数，这四千多人的意见基本上等与白说，虽然采纳了一些具体意见，但最重要的批评并没有接受：后来由卢山会议上受批判的黄克诚出面，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竭力讲毛的历史功绩，以缓和党内外对毛的不满。

我的不同意见主要是两点。一，《决议》说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

认为应当反过来说，错误是第一位的，或者说，过大于功。二.《决议》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是好的；我认为不然，动机就是坏的，只是要清除潜在的赫鲁晓夫，防止他百年之后有人批评他所犯的“反右派”、“跃进”等错误。自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还有制度上的、文化的原因。毛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这个绝对的权力又腐触了他。

世事沧桑。在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之后，毛泽东近年来又以充满人情味和领袖魅力面目出现，重新“热”了起来。而他的权谋和残忍，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消极影响，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呢？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年）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周恩来大力纠“左”

一九七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无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刘少奇则反对毛主席，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林彪是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的，他对毛土席“最忠最忠”，把毛泽东的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最活”。 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值得毛主席信任。一九六九九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丁党章毛泽东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声了。

正在这时，“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怀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

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作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国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的解体。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倜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怍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作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

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全会公报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後：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後，就按姓名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一九七O年陈伯达在卢山会议上被清除後，周思来排名第三了。九．一三事件以後，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封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六月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线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琨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做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牧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四、五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汜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接受杨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畏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我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封“空硬政治”的《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一九七三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入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瑛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於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瑛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作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封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具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一九七二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瑛提出一倜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瑛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史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爱国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傅问题上具头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八月八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瑛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瑛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泼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说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 十一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瑛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瑛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瑛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这件事，讲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九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途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些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被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律》：一篇是书评，介招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十月十四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三二一期（十一月四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群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十一月四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卯下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天龙，说要讨论也要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有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力不服，嘴上不敢税，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七二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七二年当年就有二十六号文件、三十一号文件、三十八号文件、四十二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十一月一日印发的，时间还在十月十四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十一期（十一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十月十四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文汇》。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十一月六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流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峙候，有的同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情况》第三三五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进件事看出：

（一）十一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怀毛主席革命路线贯撤执行。”这和第十一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十二月一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作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作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

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就能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瑛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瑛党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於是，我索性直接粭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十二月五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後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繁。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人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八月一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八月八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桌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那么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土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五七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後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是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

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爱国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周恩来的讲话

十二月十九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瑛、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瑛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保证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么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东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同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八月一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十一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其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下

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一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瑛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瑛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镇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就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下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个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八月八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枇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设的人讲。报社军宣对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瑛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瑛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个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

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一九六七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一九七二年第三十一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十一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義，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後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这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封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下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下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期，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国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器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瑛）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搜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与我再次提到《红旗》十一期的文章，他叫秘言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十一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封鲁瑛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

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的信和对极左问题的认识。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於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括，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力，一条腿翘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橘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这证实了当时我们的猜想。

"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其中搞无政府主袭？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的文章说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就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彼"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鞭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论据，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

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屋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羞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粱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极“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说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昵？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什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瑛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 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麼，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的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卢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值得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八月八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後，才赶到上海去做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麼十一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十一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十二月六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覆。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从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说法，说鲁瑛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锁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瑛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时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橘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下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什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十九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仅仅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一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见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一颗新星升起

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纪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十九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说记下来了的：

“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向部队推荐过。主席十七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统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十七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适是根据姚文元当时做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是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住这里说到，收到王苦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字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

“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写的封我有好评，但那是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十九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十七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了显然是想严恪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这件事的含义，在纪登奎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六四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对；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来已进很左了，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

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之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遣样维护，正因为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氯，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感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爽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侗：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召兄《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种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秤了一通邓拓以後，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忧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刘爽。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刘爽；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

错了。[20]

汉元帝即刘爽，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於《汉书，元帝纪》，刘爽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词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待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昡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一九五七年经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爽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爽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 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爽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於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政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隸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模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清廉无私的人，但也结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禓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場”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样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二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下图富贵了，不知道有和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下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六十年，刘爽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五四年，刘爽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爽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爽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20]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午四月十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纪录是我在一九七三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说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业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备，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封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一九七二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一九五七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一九七二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九七四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像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想，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补充，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

评毛的一段曲折

不能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

然而高层领导人不高兴了．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面旗帜，不能丢。三月份，邓小平对会议作了讲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稿是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其中说到，“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样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蓑、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於个别的论断，那么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够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认为，问题在于对毛泽东思想作“完整准确”的理解。他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到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他仍然说，要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这样来统一全党思想。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个别论断”而是有一套体系，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无论怎样“完整准确”地解释也是错的。如果这是毛的早期观点，那好办，可以说那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成熟。偏偏这又是毛的晚期理论。毛泽东本人很重视这个理论，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因此他同意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他到死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如果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会同意吗？又要

坚持实践标准，又要先验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就陷於矛盾。

到开始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提出一个意见：是不是把毛泽东后期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中分出来，称之为“毛泽东晚期思想”. 并对这个晚期思想加以批判。胡乔木一度接受了这个意见，并让我起草这一节。但后来，这一部分作废了。

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作出了三个决定，一个为刘少奇平反，二是起草历史问题决议，三是公审“四人帮”。这三件事，目的都是想给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以完全的合法性，从党的历史上肯定下来，防止再出反覆。但是，这三件事都碰到毛泽东这个难题。《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胡乔木把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他还很得意，可读者给《人民日报》寄来了一大堆信，提出批评。他们首先对题目觉得莫名其妙，好像不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或者是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说，这好像不是为刘少奇平反，而是为毛主席平反；有的反问，为什么不说是恢後刘少奇的本来面目，或者恢如历史的本来面目。审判“四人帮”. 也不能不牵涉到毛泽东。江青看准了在一点，一口咬定：“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至于起草历史问题的决议，评毛更是中心问题。开始时，陈云说，“要在这一代完成评价，把毛主席的功国是非一个钉子一个眼地定下来。”胡耀邦说，“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但讲成绩容易讲错误难。

从科学态度说，错误要讲透：从政治上考虑，似乎就不行了所以，邓小平、陈云先后多　　次对起草小组发出指示。陈雯提出要专门加一篇，讲解放前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以便突出毛主席的功绩。邓小平至少讲了九次话，中心意思是不能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看了一次建议草稿，说“不行，要重新束”，因为这一稿对毛的批评较多。邓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于是，毛的错误愈改愈少，对毛的成绩愈讲愈多。本来，这个决议只是针对文革的，後来为了要突出毛的功绩，就从建国时讲起。实际上已经不是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是一篇建国以来的历史大纲了。

最後拿到四千高极干部的会议上讨论，普遍地是不满意。认为对毛批评得不够。会上一些老干部谈到毛时火气很大，意见十分尖锐。有人说毛主席和曹操一样，“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有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反革命！”有人纠正道：“不对，是武化反革命！”许多人批评胡乔木的起草工作，甚至说，“是不是因为你作了多年毛主席秘书，怕牵涉到自己啊？”

尽管有样多的反对意见，但邓小平、陈云等的决心已定。胡乔术表示要“力排众议”。他后来有一次对外宾夸耀：我们的历史决议，层在四千多人中征求意见，可见我们党是多么讲民主。他没有说，邓、陈两位讲的才算数，这四千多人的意见基本上等於白说，虽然采纳了一些具体意见，但最重要的批评并没有接受。

最後，这个决议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检验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是胡乔木的发明。就是说，只有正确的才是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我曾经评论说，这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错误的，而毛泽东的错误是没有思想的。

我曾在一九八三年写了一篇批评毛泽东关于“一穷二白是好事”的观点的文章。邓力群指责我批评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没有批评毛泽东思想，我只是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用这种办法去定义一个人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此例一开，国民党也可以说，

孙中山思想不包括错误在内：拥护斯大林的人也可以说，斯大林的思想不包括他的错误观点。这样一来，岂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思想、主义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

一九八三年初，秦川（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到医院见胡乔木。那年是毛九十周年诞辰。秦向胡汇报了《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准备出四十个版。胡乔木曾多次批评《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力。我们满以为，这一次胡乔木会点头表示赞许，至少他不会批评我们不重视。出乎意料的是，胡的反应冷淡。听完汇报后，他表示：四十个版太多了。“那么多文章，谁看？”“九十周年出四十个版，一百周年岂不要出一百个版？”

接着，胡乔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那上面是他事先开好的十个社论题目，部是宣传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送》的。

说实话，我当时对他的少宣传毛的意见是赞成的。但这样直率地说话，在胡乔木是极少有的。我只是奇怪他为什么变了，三年前他对我说话还是那样语重心长，老泪欲垂啊。

我继而一想，毛毕竟死了六年了，而邓还健在。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附录

附录一　一九二一年[21]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屈辱的历史。先进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学习；开始还只是感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后来才认识到还要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这种背景的产物。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满清，按照西方国家的榜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就後一点来说，这个革命失败了。但是，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并没有停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科学”“民主”两大口号，这个“民主”，指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既是立宪共和。

那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尼采、托尔斯泰、赫胥黎、逢尔文、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受到注意。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被认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产生的种种弊病和苦难，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私有制带来的人的异化，而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键，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病来批判地看待资

[21] 编注：附录所收的三篇文稿（本文及《民主·引论》、《王实味文字狱剖析》．所探讨的范围，原来并未　包括进作者一九九六年十月重新修订的写作框架。九十年代初，作者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谜，只是上溯到赫鲁晓夫情结，后来，延伸科延安整风。而在研究延安整风如何树立毛的绝对权威时，作者又发现可以追踪到更早的苏联肃反。通过对苏区肃反资料的研读，他又开始往前推进到苏联肃反，以及中共建立之初对俄国革命的解读和借鉴。这个过程，反映了作者研究过程中不断追跟寻源的思考轨迹。

本主义。接着，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中国知知识子把眼光从西欧、美国移向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次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三篇文章，欢呼“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在此之前，中国人并看不起俄国。尽管中国也被俄国欺负，中国人仍觉得俄国不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很少有人觉得要向俄国学习。十月革命带来的福音，使中国人觉得要对俄国另眼相看了。

中国要走俄国的道路吗？

俄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正被认为走下坡路时，在俄圆，资本主义还刚刚起步。俄国仍然是农业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些，和中国的情况有些相似。连列宁也承认：“俄圆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国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後的亚洲国家。”（《列宁选集》第二卷，二九０页）这个话是列宁在一九一二年说的。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的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四四一页）“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衙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四四二页）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在十九世纪末，不要说俄国，甚至在西欧，建立社义主义的希望也被推迟了。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追述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０年的西欧情况说：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克思和他都丝毫不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恩格斯承认，历史表明他们错了，党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同上书，五一 0页）

这个话是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的，恩格斯继续说：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一八四八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受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一八四八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o（同上书，五一二页）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

甚至在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

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二七八页）这个论断是过早了。恩格斯在上面的话，是较清醒的对现实的初步承认。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一八九七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同样断言俄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道路。他在《两个策略》中说：

“马克思主义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中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说来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中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同上书，五五四页）

列宁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同上书，六一六页）“除了使资产阶级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比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下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同上书，五五六页）

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有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后建立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丝毫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书，五四八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同上书，五四七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政变，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么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

然而不管怎么说，十月革命胜利了，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了。

这个事件似乎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不对的。俄国并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改变。陈独秀断言：“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我以为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

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很快实现社会主义吗？陈独秀乐观地说：

“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共和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国庆纪念的价值》，一九二０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

陈独秀本来相信民主加科学就可以救中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仍然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雨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改变了。是什么东西使得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

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主义似乎提供了更高远的理想。知识的陈独秀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肋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新青年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这种理想的社会，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能达到的，而应该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进步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民主，而是追求更高阶段的民主。陈独秀开始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力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告北京劳动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晨报》）

这个理想虽然高远，却似乎并非不切实际：俄罗斯的例子不是证明吗？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

这既不是"革命压倒启蒙"也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压倒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

一九二０年九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发表文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也著文，说："中国的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及资产阶级的经济，然有才说得上社会主义。一九二０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争论。他们的说法是：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之劳动者"，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因此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劳动阶级身上，"绝对不能建段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和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救治的辩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说，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自然的趋势"，绅商阶级的发生"是个潮流，不可能抵抗"；至于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病，则可以通过"温情主义"、"劳资协调主义"加以"矫正"。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大表文章，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辩护。他们说；十月革命後，整个世界已处在"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凤潮中"，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同时，中国早已是"万国的商场"，国际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发展自己的实业的，中国要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战争"，只不过是空想；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与社会主义。

如果这些人当时读到了列宁论述孙中山的文章，他们会怎样想呢？

列宁批评孙中山说，他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产阶级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列宁选集》第二卷，二九二页）列宁说，孙中山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但他的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却只是摧毁封建主义，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却会使之获得最迅速的发展。列宁一方面高度评价孙中山，说他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人物，而是“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同上书，二九二页）另一方面批评孙中山认为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同上书，二九四页）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人民引起不同的反应。资产阶级不消说是恐惧和仇恨，但在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中，反应也是不同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老资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不像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那样，对俄国革命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审查。用卢森堡的话来说，“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封。”(《 卢森堡文集》，人民出版社，四七七页）当然，这种批判的探封，仍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卢森堡和考茨基一派不同，後者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只适合推翻沙皇制度，但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卢森堡是肯定这场革命的，她热情欢呼：“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同上书，四七六页）

但正因为这样，卢森堡认为俄国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完善的。当陈独秀对俄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欢呼的时候，对俄国的现实情况有更多了解的卢森堡却对布尔什维克取消民主，实行恐怖统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不仅只是治标的办法，而且是败坏道德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最广泛的民主。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勤群众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日益限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上书，五０四页）

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同上书，五０五页）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附录二 民主·引论

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一八九九年，列宁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他在一九ｏ一年发表的《怎么办？》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个主张：在俄国这种专制国家，革命组织必须是一种密谋组织，必须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列宁回答那种主张实行“广泛的

民主原则”的意见说：民主原则包含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完全的公开性，二是一切职务经过选举。这在具有政治自由的国家的党，例如德国社会党，是可以做到的，但在俄国的专制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义而且有害的儿戏”（《列宁选集》第一卷，三四八页）

一九０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同马尔托夫一派在组织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尔托夫主张“自治制”或“联合制”，即建立一个松懈的，容许各种成份的党。列宁认为，这样的党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应该建立一个一元性、战斗性和组织严密的党，即“集中制”的党。列宁要求的不仅是组织上的集中，而且是思想上的统一。这次争论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孟什为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由此可见，列宁最初的确是在某种程度上把集中制作为民主制的对立面提出的。当时列宁只提“集中制”，後来才加上“民主的”这个定语，成为“民主（的）集中制”，以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相区别。一九０六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

在当时的条件下，列宁是对的。一个在专制主义国家进行暴力革命的党，必须有严密的祖师和铁的纪律.. 否则不但不能夺取政权，连自身的存在也不能维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是适应当时的情况的。布尔什维克这种类型的党的领导，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问题在于，这个本来只适用于一种特殊情况的制度，以後却被推广为一条普遍原则。

一九一０年，举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了《加入国际的条件》，把布尔什为克的经验推广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文件的第十三条说：“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年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列宁选集》第四卷，三一一–三一二页）

从那以后，民主集中制就成为所有加入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仅推广到各个共产党内部，它也适应於整个共产国际，就是说，共产国际与其成员的关系，也要照此办理。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性的党，每个成员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许接受国际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其关系是上下极关系，而不是各个党的联合组织。

不但如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被扩大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指党原则。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就把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称为“最彻底的集中制”。（《列宁选集》第三卷，二一六页）

一九一八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按照宪法，它包括了八个自治共和国和十三个自治州。虽名为联邦，集中的程度却很高，地方政府并无多大权力。列宁认为各民族应该走向融合，他把这种融合为一个民族的状态称为“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尽管列宁在临终前觉悟到对解决民族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并从而批评了斯大林，但他还是把联邦制设想为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阶段。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的思想，并不属于马克思。过去苏联理论界追随列宁，把这说成是

来自马克思的思想，这是缺乏根据的。

恩格斯写过一篇《集权和自由》的文章。他说：每个国家，不管政体如何，都需要某种集权，问题只在集权的程度。在一定的条件下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国家就总是以集权的需要为借口，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消灭个人的自由，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者。因此，“集权的历史是同专制的历史平行发展的”。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是和马克思一致的。马克思认为：“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三七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关心的是避免权力的异化。他们认为，国家起初是社会的工具，是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後来逐渐脱里社会而独立，成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就是异化。这种危险，即使在徐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存在。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官吏由社会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他们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这就是：（一）普选制；（二）低薪制。这个经验不能说是完备的；例如，这里没有提到青年马克思捍卫过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毕竟太短了，不足以从中总结出成熟的经验。马克思以后也没有把这个论点加以发挥。到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在批评《爱尔福特草案》时，仍然声明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个观点为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以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提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时，遭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许多批评。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

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本意是克服党员的毛病。以后到斯大林和毛遭到，却蜕化为一种强求统一思想，推行错误路线和整人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

附录三 王实味文字狱剖析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出了名的。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出了王实味[22]事件。王实味事件开了中共党内文字狱的一个先例，它不但引发了当时的审干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而且树立了建国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的模式。因此，对这个事件作一个个案分析是值得的。

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风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一个典型。”“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四七九页）一些当时的青年人后来回顾整风，也说是自己“深受教育”，“终身难忘”。那么，这个教育，真的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吗？

整风的主要对象，本来是要解决党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要批判以王明说代表的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主要体现在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上，其中包括留苏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转向了新来的知识分子呢？

[22] 王实味，河南人，一九 0 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失去联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毕业。一九三O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为生。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同年十月去延安，分配到马列学院编译室。後马列学院改组，王实味又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

三篇文章的背景

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书中央宣传部。中宣部长张闻天兼任院长。当时张闻天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农村去作调查了，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代张闻天领导中央研究院工作。李维汉也兼任两个研究室的主任。

延安中央研究院主要是由两部分人员组成的；大部分是原马列学院留下的同志：少部分是由延安其他单位选送并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人员的基本情况是：从末做过任何工作的占百分之六十八，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百分之八十四，抗战以後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因此，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李维汉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很多事情他们没育经历过，革命的道理也不太懂，也下真正了解我们的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四七九页）

是的，他们不了解共产党。

斯诺的《西行漫记》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那里描绘的延安充满了对革命青年的吸引力。延安就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制度，人人平等，人人可以自由呼吸和自由歌唱。延安的宝塔山上的宝塔就像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象征着光明。

和左倾关门主义不同，毛泽东懂得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大批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此外还有一些知名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春毛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五一页）毛泽东对其中的代表人物优礼有加，甚至交上了朋友，丁玲和萧军都是例子。

延安文化界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一九三九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集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一九三九年五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摊人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在这种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 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 000 年，三三八-三三九页）

其实，文化界对延安生活产生的某些不满，并不是由于他们出身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而是由於他们天真地完全相信了共产党宣传，对边区怀着浪漫的幻想。他们所受的思想影响，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在他们那里，五四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和马列主义是一致的。马列主义就是科学，而苏联的民主比西方国家的民主要民主万倍。

关于整风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致聂荣臻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 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因此，外来的知识分子，本来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不但如此，毛泽东看到他们

受老干部歧视，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整一整老干部。

“整顿三风”包括整顿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宗派主义”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

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往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的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用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标题：《教条与裤子》。其中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留苏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不顾触及自己。“他们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学习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了，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

“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割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

“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他们现在真的是已经觉悟，已经转变，查有实据了吗？”

“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如同盟社和各种汉奸报纸之流，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就是黑，群众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

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才看得见”。而每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三月中下旬.《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社论。三月十九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的排外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肖军的杂文《论同志之‘爱’与‘耐’》。其中说到：“近来竟常常接到一些不相识的同志们的信，信里大致是述说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到厌倦了……”这里说的给作者来信的“不相识的同志们”，大概都是一些外来的知识青年。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其实是一样的。但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润色和修改过的。

显然，这些言论的主要矛头，是对着党内的老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的；对新来的知识分子的牢骚，则是给予同情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王实味和丁玲的三篇文章。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谷雨》第一卷第四期，大意是：

政治家的任务偏重於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但人的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所以社会制度的改造过程，也就是人的灵魂的改造过程。政治家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在造行实际斗争方面，政治家比艺术家优越。但艺术家也有他的优越性，就是自由地走进人的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也各有弱点。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世故，善能纵横捭阖，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一般艺术家的弱点则是骄傲、偏狭，孤僻等等。我们要求灵魂工程师首先把自己的灵魂改造为纯洁光明。

鲁迅先生不会不懂得，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能由这旧中国的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样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他是多么渴望看到他的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啊！革命战士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因而我们的灵魂总不免带着肮脏与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

“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只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认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野百合花》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文章有一个“前记”，怀念一个牺牲的女共产党员、作者的北大同学李芬，说：“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在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里，说“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不起劲，而且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作者不同意说是由於伙食差，营养不良，或是生活单调，找不到爱人，因为这些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叙述了一天晚上他在路上偶然听到两个女青年的谈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并，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ＸＸ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入。”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文章第二节“碰‘碰壁’”是对报纸上的一篇《碰壁》的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为青年人“发牢骚”辩护。作者说：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依《碰壁》作者的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其实，正因为他们在外面认识了“丑恶和冷淡”，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第三节批驳几种为延安的消极面辩护的观点，题为“‘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作者说：不错，黑暗是有必然的，“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如果让这些‘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哪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是文章第四节的题目。

作者说：“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相同的题目，在他本机关的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入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个需要我来做八股。”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稍麻烦一些。”有人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为等级制度辩护。作者说．“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遢谈不上‘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属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腱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卸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具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

全文最後的话是：“老是讲‘爱’，讲‘温暖’，这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

听候批判。”

《三八节有感》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就在《解放日报》发表《教条与裤子：》的当天，该报的副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者着重描绘了来到延安的女同志由於婚姻问题所受的种种压力和歧视。她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一方面，有些艺术家议论：“一个科长也嫁了吗？”“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另一方面，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嫣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她们总得结婚（不结婚更要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然而她们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不同的命运，有的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扔在床头啼哭，“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傅播着……”那些被逼着做了回到家庭的娜拉，则不能免除“落后”昀命运，而这又成了离婚的口实。

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离，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最後她也对女同志提了几点希望。

可见，《政治家·艺术家》想说明的是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不同职能，呼吁重视艺术作品的改造灵魂的作用，为此就需要揭露黑暗。揭露黑暗和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是希望作家批评现实的权利得到尊重。

这个问题，诗人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一文中也谈到。他说：“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的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以外，不要求其他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超推进的作用。”艾青最後感叹地用诗人李白的诗句来结尾：“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野百合花》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他们在这里寻找他们的理想。他们看到了好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东西使他们失望，这倒不是延安生活的艰苦，而是上下级之间的隔膜，精神上的缺乏关怀和温暖。而这种需要，却常常被那些老干部视为“小资产阶级感情”而予以漠视。

好两篇文章引起了共鸣，因为它们反映的问题是有普遍性的，是客观存在的。丁玲在批判王实味的会上说到：“王实味的两篇文章考验了延安的文艺家，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了编者们的眼睛而在文艺的副刊和杂志上登出来的。刊登以後没有一个文艺家向编者或读者提出注意，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是出之文艺家之手的。谁登载的，文塾家；谁

发现着文章有毛病的，谁提出注意的，却又不是文艺家……”

其实，丁玲本人的《三八节有感》也是针砭时弊的。丁玲在一九八二年发表过一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谈到她当年写《三八节有感》的起因说：

“三月七号，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我连夜挥就，把当时我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了……那时的文抗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的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他们几句。”（《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后来，在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作检讨，也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说那篇文章是她“灌注了血泪”，“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的”。“到昨天我还接到署名‘同感者’的来信，问那篇文章的缺点在那里，表示对某些批评认为不适当。”

《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都对延安的跳舞晚会有所批评，这当然涉及党的高级干部。我并不认为在延安跳跳舞有何不可，但我想一些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肯定看不惯，知识分子中则会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也很自然，他们发表一些批评意见也无不可。这不是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他说他的，你跳你的就是了，当然也可以辩护，但用不着愤愤然。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的风波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领导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大会由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他见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李维汉在讲话中宣布：院务会议决定，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他还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这是针对多数人认为只着重检查理论说的）关于墙报，他说应“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那天李患感冒，讲完后即提前退席。

对李维汉提出的意见，王实味带头反对，主张检查委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墙报文章可以匿名。选举问题，会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范文澜决定举手表决。王实味的意见获得八四票同意，而同意院务会议决定的只有二八票。最後二一名检查委员名全部由选举产生。实际选举结果，院方提的名单大部分都入选了，只有两个主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落选。

事後，王实味在墙报上指责李维汉“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他不了解，各研究室研究员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群众的更大限度的民主，将对检查工作有更大的好处。他只强调些什么‘主任是中央派来’，‘要来也来，不要来也非来不可’.‘不但来，而且要来领导’.他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心念念不忘‘领导’。从墙壁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有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一三七–一三八页）从这里叙述的李维汉的话来看，的确有一副领导架子。

张如心和王思华落了选，中央研究院的群众为民主的胜利感到高兴。可是不久，在四月一日的第二次检委会议上，经李维汉提名，又把这两个落选的人补了进去。

李维汉这种做法，是对群众意见的藐视，是违反民主程序的。检委会是群众选出来的，群众没有通过的人，检委会有什么权利把他们吸收进去呢？群众没有选这两个人，总有他们的理由，应该引起这两位同志和领导注意。可是，后来批评的不是李维汉违反民主，却是王实味的所谓“极端民主化”!

中央研究院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既然是试点，就带有试验和探索的性质，目的是寻找出一套可行的较好的整风方法。院务领导是行政领导和业务领导，检查委员会是整风和思想领导，不是一回事。当然，由若干业务领导干部来兼任整风领导，在工作上有方便之处，但不一定每个领导都要是“当然委员”。能领导业务的人，思想作风未必都好，他们有可能是整风的重点对象，因此未必能领导整风。如果真是诚心诚意地搞试点，那么就应该吸收王实味代表的多数的意见，看看效果如何。这扯得上什么“极端民主化”？

会後，在《矢与的》墙报上，就出现了王实味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零感两则》。（一九四二年《矢与的》创刊号）

“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比他们正气多的人，虽然，这些人本身也不是毫无邪气，‘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点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第二篇《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矢与的》第三期)

“我决不否认我那天发言之尖刻相过头。罗迈同志威势逼人的家长武断作风，确时使我十分激动，因而联想到不知断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比猪还蠢’的领导。我骂了罗迈同志，为了这，我愿意接受一切批评。”

“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除了文章外，还出现了漫画。

《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後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闹市区南们外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中央研究院的群众不仅办了墙报，还敢于在墙报上批评领导，这在延安还是新鲜事，人们至少是对这件事感兴趣的。这件事一时轰动了整个延安。

可以肯定的是，王实味的观点曾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党委工作的温济泽在全院研究人员中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对王实味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估百分之九十五。(温济泽《征鸿片羽集》，七六六页）李维汉说：“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出来以后，我记得只有政治研究室的李宇超同志写了文章表示不赞成，多数人都赞成《矢与的》上的错误观点，这是一股潮流。”(温济择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长沙，四--五页）

四月七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会议从上午九时一直开到夜里十二时，发言非常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早在上海就与同乡康生有来往的李宇超一人。凯丰亲自讲话，严肃地批评了该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

那么，王实味是怎样由得到多数人拥护而变得彻底孤立了呢？多数人的观点，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转变的呢？这种转变，是由错误的观点转变到正确的观点吗？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立场问题

一面是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对老干部的作风、官僚主义、对新干部的冷漠、等级制度的不满，一面是老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的反感，认为是不尊重领导、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毛泽东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最后决定了支持后者，从而改变了他自己说的批判宗派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曾让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自己的意见："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胡乔木说："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注意这里的"首先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提出要学习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是立场；立场正确了，才可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立场一错，观点和方法必然都错。毛泽东在三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讲话就提出了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首先是"立場"不正确，然後才有"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所以，立场先於观点和方法。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可以讨论，立场却是简单地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毛泽东既然首先断言王实味的立场是错误的，不进是有敌意，而且"充满了"，这当然是问题严重了，毛泽东说过，如果把同志当地人，那就便自己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这样一来，王实味的所直言论当然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然而，毛泽东又是根据什么断定王实味的立场是错误呢？

是不是因为王实味的言论有挑起一般同志对领导者"鸣鼓而攻之"的情绪？那么，毛泽东自己就没有对领导干部"鸣鼓而攻之"吗？他在整风报告中说："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又说，要弄得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还不是敌意？王实味批评的对待白区来的青年同志的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不正是毛泽东说的"宗派主义"这个"怪物"吗？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指的思想，不是人，目的是"治病救人"。那王实味不也可以这样说吗？他也不是要把领导干部整死啊！何况他也根本做不到。

罗迈就紧紧抓住了立场问题作文章，他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动机与立場》一文中说：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事变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稳立場，立场不对，就是根本不对，立场错了，就是根本错了。

"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革命冒险主义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它们都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立场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平均主义，其立场也是错误的，一句话，都是反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整风运动中，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残余，又要克服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平均主义的倾向。"

这样，把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平均主义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放在同等地位，列为整风的对象，就有理论根据了。

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的李言后来回忆王震对报纸上的王实味文章的评论“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这句话时说：“真是一针见血。老同志的眼光为什么那样敏锐，我们当时为什么看不清？就是因为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０八页）

现在重新审视这个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因为触犯了他们而使他们恼火罢了。王实味在什么地方骂党了呢？他只不过批评了某些老干部，这就是骂党？“立场坚定”就不能批评老干部？难道老干部就批评不得？那么还整党干什么？丁玲不过说了一句“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作为政治家，宜大度一些，用不着愤愤然。

批评者的手法，就是把王实味文章中的负面的话收集起来，集中起来，脱离了上下文，把对局部的批评变成对整个延安的批评，把对某些老干部的批评变成对党的批评。如李维汉批评说：王实味的两篇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　‘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同上书，一四页）

从这里就发挥下去：

“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污蔑党和谩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王实味惯于使用‘左’的词句掩盖反动实质，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封为青年的‘代表’，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加以曲解、夸大，造谣中伤，耍两面派，钻空子，被揭露有抵赖顽抗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四九一页）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谈到“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时说，“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相同的题目，在他本机关的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入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这件件事很值得注意。由于批评而遭到打击，以致精神失常，这是令人气愤的。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应该调查清楚。如果是传闻失实，就应该澄清；如果确有其事，就应该追究。可是在批判王实味的文字中，这件事根本没有提及，好像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观点和方法问题：所谓“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

说“偏向”．首先是立场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进行了批评，说：“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王实味曾申明他不赞成平均主义，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他还说：“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

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不但如此，在实行薪给制的三三制政府中，“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

这是主张“绝对平均”吗？当然不是。分歧只在于中国具体的差距应该多大才算合理。王实味并不主张消灭差距，只是要求缩小差距，不搞特殊化。他的理由是“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铁一般的团结”。这不是有道理吗？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意见，但是不能说他主张平均主义，更不能说是绝对平均主义。批评王实味的人并没有拿出他是平均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的证据。既然证据还没有，怎么能不由分说给他戴上这顶帽子呢？

说王实味的方法是“冷嘲暗箭”，那么毛泽东还送了主观主义者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还不是挖苦讽刺？说教条主义者的教条此屎还没有用，既不能喂狗，又不能肥田.. 又说一些领导人的裤子藏着一条尾巴，必须脱下裤子剖尾巴：这些还不是冷嘲？王实味的批评，还没有这样尖酸刻薄，为什么就不可以？至於“暗箭”从王实味的文章中实在看不出来。

王实味批评等级制度、特殊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享受不到。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研究生三级，王实味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有四个口袋的制服，吃小厨房。可他仍然认为自已享受的主张待遇是不合理的，这不简单。他的文章引起某种轰动，主要是讲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这里面不但有青年学生，恐怕一些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下层工作人具也会产生同情。

毛泽东并不去具体分析王实味的言论怎么不对，而是用“工农兵”这样的大帽子来压人。我把“工农兵”这个词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只是农民和兵士，在前面加上一个“工”字，无非说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毛泽东不是对王实味的具体言行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用抽象的革命的词句激起人们的义愤，以感情代理智。　　毛在七大谈到王实味时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四三页）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反对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肯定不是勤务员一类的普通的工农兵，而是穿有四个口袋的制服，吃小厨房的领导干部。

如果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那就不会去挑动勤务员反对党的领导干部，而应该是反对勤务员。其实对勤务员，王实味在文章中是很尊重的，说自己并不主张平均主义，而且没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在“伙夫”这个词后面加括弧说：“（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埋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麼可怜的一点温暖呵！）”

这些话既不能证明王实味“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也扯不上“挑动勤务员”反对什么人：如果一定要说是“挑动”，王实味挑动的也不是“勤务员”（当然对跳舞之类，勤务员可能是看不惯的）；他是对青年学生表示同情。如果一定要说是“反对”什么人，王实味反对的也不是工农兵；他的矛头所指是某些领导干部。《野百合花》第一节说的就是他偶然听到的两个女青年发牢骚：这两人显然是外来的学生，她们的不满是对着领导干部的。全文都是为从白区来的青年学生说话，呼吁领导干部爱护他们，对他们要有同志的温暖：最後

在批评等级制度时，也是为“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鸣不平，说“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这里同情谁，批评谁，不是很清楚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说王实味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呢？他把王实味批评领导干部的意见，硬说成是对着“工农兵”. 这倒是挑动“工农兵”来反对知识分子。

如果王实味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和毛泽东辩论，毛泽东就不能简单地下“绝对平均主义”“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的断语，而需要拿出证据，这对毛泽东并不是轻松的任务。毛泽东当然不会这样做。他只是作结论，不作具体的论证，好像这个结论既然是由他讲出来的，就是无可置疑的，不需要论证。详加论证反而降低了毛的身份，降低了毛的权威性。这应该是那些同王实味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同事的任务，可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背景分析

说王实味是立场错误，还有一种貌似深刻的分析，那就是联系到当时国共斗争的形势来作阶级分析。

李维汉说：“当时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又面对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此时此地，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污蔑党和谩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给予坚决回击，就不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四九一页）

李言说：“对当时已经在延安部分青年中出现的一股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轻骑队》,《野百合花》）…….我也没有及时引起注意。因此，未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出现的错误倾向，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当时，大批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冲破艰难险阻来到延安追求革命真理。他们积极学习马列主义，但是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不善於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更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一般还带着比较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见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０六页）

但无论是王实味本人还是他所反映的外来青年的意见，部和“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不善於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不相干，也扯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可是李言就从这里发挥下去了：“……当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延安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遇到有人用‘左’的词句出来煽惑，就容易发生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对于我们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在整风中加以改造，它就很可能成为危险的腐触剂，以种种方式来腐蚀党、破坏党。”

李言说：“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一方面，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又处在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军队的层层包围、严密封锁之中，并面临着新的反共高潮，边区经济空前困难。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就是这样做的。然而，王实味却乘党整风之机，说延安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缺乏同志之爱’‘到处乌鸦一般黑’. 咒骂党的领导同志是

‘异类’，‘可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等等。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对谁有利？为谁说话？”（同上书，一０八- 一０九页）这就是立场问题。

要问“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封”吗？那么首先要弄清的是王实味批评的那些现象存在不存在，该不该纠正。毛泽东不是教导“实事求是”吗？李言只说王实味“乘党整风之机”“咒骂”却回避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对谁有利？为谁说话？”（这就是所谓立场问题吧），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王实味是为从白区来的青年学生说话，要求改善和他们的关系，而这样作正是帮助党整风，对党有利。王实味也是为了使党能够更好的“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才提出关心青年，倾听他们的心声吗？他呼吁领导干部和下层同甘共苦，“使下属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铁一般的团结”，这不就是“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意思吗？

至于王实味的有些话叫领导干部听了不舒服，那一方面可以劝王实味对用词斟酌一些，但对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却用得着这句古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也是毛泽东教导的。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的话更加属害啊，他说他们要求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 因此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里毛泽东还在“同志”一词上加了引号。难道这不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类？

至于国民党利用王实味的言论进行反共宣传，这个王实味的文章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对外’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这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於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其实，这个问题在《解放日报》的社了《裤子舆教条》已经谈到了：

“……有些好心的同志说，裤子是要脱，但是只能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育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查者吗？……. 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如同盟社和各种汉奸报纸之流，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是黑，群众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

“衣分三色，贪分五等”. 温济泽对此有解释。他说，边区物资条件困难只能买进少量灰蓝色斜纹布，只够首长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穿，其余的人穿的是边区自染的灰色土布。一般勤杂人员穿的都是一样的土布。干部服的上衣有四个口袋，戥士服只有两个口袋。至于伙食，当时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加上病号饭，也算不出“五等”。（但我听说还有“特灶”）他的这个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党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三等伙食的差别大不大，大到什么地步。

不过王实味文章的主要内容不是这个，他主要说的有些领导干部对外来的青年干部“缺乏同志之爱”。他听到的两个女青年的窃窃私语就是抱怨这一点。“到处乌鸦一般黑”就是其中一个女青年的话，意思是她那个单位的情况和她的同件所谈的一样。至于“异类”倒是王寅味的话，原话是说，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难道这就是“咒骂党的领导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王实味的文章也提到经济困难，但这些话并不是对物质生活的困难表示不满，而是强调，正因我这样，领导干部就更加要注意同下级同甘共苦。而李言的意见正相反：不该反对等级制度，不该批评缺乏温暖，因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对党的“危险的腐蚀剂”。

王实味的性格是爱憎分明，心直口快，容易冲勤。他的整个言论使人感到，他是以主人翁的气概说话的。他以说陕甘宁边区既然是共产党管辖的，那就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合理的社会。如果有不尽如意的地方，他有权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边区变得更好一些。他是革命者，是共产党人，用不着怕这怕那。他没有顾虑，因为他是出自公心，甚至以自己的“硬骨头”自豪。然而他错了。他不懂得，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那是对“敌人”，对国民党的：对共产党讲什么“硬骨头”，岂非太岁头上动土！他太天真了，缺乏“革命世故”，锋芒毕露，这就惹了大祸。

“四三”决定

整风转折的信号，是“四三”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李维汉承认：“在来始阶段，在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我确有不小的困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四八五页）“四三”决定给了那些受到群众批评的干部部一件武器，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这个决定是有针对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所遇到的问题。但它说得比较巧妙，两方面都说到了，只有仔细琢磨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它的真正侧重点。

“决定”要求“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检讨本部门的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

明哲保身、有话不说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病重，不可偏废。

在某些机关内应组织检查委员会，此委员会内包括该机关领导同志及从工作人其中吸收的人员。

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在规定检查期间内，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领导应善于注意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不得将错误意见变成结论。

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

在讨论与检查期间可以出墙报，并设墙报委员会领导之。

规定十八个文件：《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義:》、《〈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等等。

李维汉对这个文件的精神实质看得很清楚，他概括为：“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

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

“我们的武器是二十二个文件，我们的立场是二十个文件。轻视二十二个文件，离开它们去找法宝，或自作聪明，或单凭主观愿望，单凭热情与信仰，是不行的”（罗迈《动机与立场》，《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四月六日，在毛泽东召开的中央高级学习会上讨论“四三”决定时，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的主要偏向：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的教条主义教育。（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四八六页）

四月七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凯丰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四三”决定的精神，严肃批评了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这样，就使大家头脑一步一步地清醒过来……（《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０六页）

“四三”决定后，中央研究院的各级领导同志，进一步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开始自觉地带头学习文件，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维汉比较全面地讲了自己在遵义会议前犯的错误……范文澜同志也在群众中和报刊上，多次对照文件精神，诚恳、坦率地检查了自己在整风初期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及其性质和根源。所有这些，都使同志们深受教育，非常感动。这时候联系整风初期的思想实际，再来学习《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反封自由主义》、《论平均主义》、《论自我批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整风文件，就感到特别亲切，好像其中的话语都是针封自己的缺点讲的。

康生的话：“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於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

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召开全院的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六月十一日结束，一共开了十六天，其间开了十四次大会。（温济泽《征鸿片羽集》，七六0-七六一页）

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这是第一阶段。座谈会第一天有十一个同志发言，大家都反省到整风运动开始时我们所表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有好几个同志说，我们在动员大会上否决了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方面的“尾巴”），这些都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

其实，“割大尾巴”，正是《解放日报》社论的意见。社论把“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称之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以便割尾巴。这不就是主观意思吗？

关于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检委的问题，会上也有少数同志说，这是范副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的，不能说就是极端民主化倾向。

这使范文澜陷入尴尬地位。作为副院长的他在主持动员大会时顺从了大家的意见，把

王实味的意见付诸表决。于是，范文澜出来作自我批评，承认这是缺点，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认为衷心抱歉，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

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机关党委书记的李言后来评论说："范文澜同志是一位诚实、正派的学者，深恶痛绝各种不正之风，对毛泽东同志的整顿三风的号召是积极拥护的。可是他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对整风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在实际已经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时，还把它当作检查工作要发扬民主的一般问题。我自己更因为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错误倾向认识迟钝，整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出现偏向后更不知所措，没有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兄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０四页）

这几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天李宇超的发言，他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与一般同志的偏向根本不同……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　李宇超的发言是有来头的。

据温济泽回忆：在开座谈会的前一天，"李言找我，要我发言说明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我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同意发言，就反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总学委'我领会这是康生（党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的意兄。就推辞说：'我调来党委工作，如果我这样发言，大家会误认为是党委的意见，不是会把大会的方向引偏吗？'李言没有勉强我，他说：'那我就找李字超吧。'李宇超是中国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也是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党员，因为有一段历史未找到证明，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李言也许认为李宇超不会放过这次表示自己积极性的机会。党事先把意图告诉你，让你出来机会，你会感到在是一种荣幸。

李宇超的发言当时引起有的同志反对，说："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很深厚的，在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偏向和王实味的错误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第二天，还有人批评李宇超"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但也出现了赞成的意见，说；在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随着讨论的发展，李宇超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从形式上看，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并没有强迫，但是有一种无形的支配力量。你放心，批判王实味，不会批判到你头上来，因为王实味的错误和你的错误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为了证明有区别，你又必须批王实味，同王实味划清界限。点名批评把被批评者从人群中划分出来，使压力集中于个别人身上，而使多数人获得解脱的轻松。这就有利与动员其他人参加批评，从而形成群众运动。你若是反驳党和群众的批评，就是说党和群众都错了，那岂不是说你比党和群众更高明？就等于是反对党，反对群众。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评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评的理由或立场。

党更乐于作出语重心长、热情鼓励的亲切姿态，更乐于向你反覆申明革命大义。这就使你在被迫屈从时，倒好像是作出了一件充分主动的光荣壮举。

在三十日的会上，李维汉又对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执行纪律的问题、为什么主长"彻底民主""绝对民主"是错误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连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二四

页）

不对。民主是一种政权形式，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所以，民主制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它不但反对专制政府，也反对民主政府。

“场内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认真地听讲、做笔记，和整风动员大会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一０七页）

李维汉在三十日下午的发言中，还表示他“同意”李宇超的意见，说：王实味的立场是与我们党对立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他的错误绝不能与我们的偏向相提并论。我们的偏向的产生是偶然的，是天真的。

把王实味的言论性质同多数人的区别开来，这本来是领导的意见，是一种斗争的策略。现在却变成了是群众提出来的，李维汉不过是接受了下面的意见。这就便这场精心策划的“运动群众”有了一种“群众运动”的外观。

温济泽是个软心肠的人，他回忆说：

“我在会外不断地耐心地找王实味谈话，希望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作个诚恳的检查。我说过：‘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来，还不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救国？你写文章批评延安，站错了立场，用了不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应该参加大会，作个检讨，大家会谅解你的。’他似乎有点触动，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错，但是，我的确出於爱党的好心啊。’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言，希望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他，帮助他，不要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敌我的政治问题……”

然而温济泽错了，党的领导可不会“谅解”王实味，它需要拿王实味开刀，树立一个反面典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温济泽得到的回答是：

“李言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他找我，说是已经把我的意见汇报给康生了。康生批评了我，也批评了他，说我有“温情主义”。他还转达了康生的话，说，‘王实昧是托派分子，又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叫我们‘不要麻痹’。康生来自共产国际，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他的话，我自然相信了。”“知识即权力”--权力即知识。我们总担心自己的立足点不够高，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看不清全局，因此不敢妄加判断。等级化的学习制度造成了政治信息、政治知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加强了人们的逐唇依从性。

六月一日到三日，座谈会名字没有变，但实际上变成了对王实味的批判会，斗争会，这种形式完全不适合平等的讨论。结论是事先就有了的，依靠的是人多势众，施加压力。它对听取王实味的辩护根本不感兴趣。王实味为自己作的任何辩护，不管有理无理，都会遭到批驳。

机关党委书记李言发言。他首先报告了一个统计材料；本院研究员，在初读《野百合花》时，有许多人对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对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没有看出作者立场有根本的错误：经过两个多月整风文件的学习，特别是经过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的讨论会，关于《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的讨论会，一步一步地，到现在大家才一致认识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场和方法的错误的严重性。（思想改造是需要如何细腻的功夫啊！整风文件的学习又是多么重要啊！）其次，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至今王实味还没有承认他的错误。

六次谈话不算少。

接着一些同志发言，向大会提供许多王实味和托派关系的材料（此事他在一九四 0 年向中租部交代过）。到现在，他还常向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 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一九三 0 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由於这些揭发，反王实味的斗争迅速升了极，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

在以前讨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时，有人说："王实味的立场是错误的，但动机是纯洁的。" 有人说："动机是不纯洁的。" 这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了。（温济泽《征鸿片羽集》，五九四页）

六月二日，休会一天，个人阅读文件，包括《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中关于联共粉碎反动派阴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的论述。

上午，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不愿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他将走上一条多么危险和不可救药的道路啊!"胡平说得好："在这里，你的观点并非由于错误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而错误，对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驳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劝阻你。可见一般人之所以拒绝非正统观点，首先是出于恐惧。"（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亚洲科学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九年，第七三页）

温济泽仍然挤时间找王实味谈话劝导他不要与党封立，要承认错误，让他自己撤消退党的要求。党委也派了几个同志同王实味谈话。

六月四日到七日这四天里，只在头一天开了一次大会。斗争会升了级，从批判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到追查他的组织活动。

这次大会，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都来了很多旁听的人。王实味从五月二十七日以来，这天是第一次出席座谈会。你又看到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而你是错的。这个巨大的多数本身就具有威慑力。即使它不对少数个人采取暴力手段，个人也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使你不由得不怀疑自己，努力说服自己，采取迎合、顺从的态度。雄伟壮观的群众性场面给人一种力量感，那其实是党的力量。集体仪式的最大功能是使个体一时消融于集体情绪，使个人产生小我消融于大我的幻觉。

六月八日到十一日。斗争进入最后阶段。

八日早晨七点多钟，就有来自七十多个机关和学校的一千多人涌来旁听。

直到九日，也就是第十四天的大会上，还有一个同志发言，认为王实味有托派思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 接着有六七个同志反对。

丁玲的过关

丁玲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会的最后一天发了言，驳斥了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并作了自我批评，给人以深刻印象。她一上来除了给王实味戴上"反党""托派思想" 的帽子外，又对王实味进行了人身攻击：说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覆无常、复杂而阴暗，

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

“王实味之所以写这两篇文章，是发现了青年人（连文艺家也在内）外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延安某些小缺点抱着不满和文艺家们所感到的作家不被了解，而在一种应该开展自由论争，还是杂文时代的空气之下，攫取了这个机会再进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阴谋活动。因此他在短时间还能得到一些拥护，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对政治的钝感和浓厚的自由主义。”

“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的反党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做为自己的警惕。”

谈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那篇文章：

“到昨天我还接到署名‘同感者’的来信，问那篇文章的缺点在哪里，表示对某些批评认为不适当……我要向一切同感者说：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你们不能因为那篇文章替你们说了话就固执着成见说那是篇好文章，并表示对我个人的同情。”“尽管我灌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篇文章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哪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

“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过去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虑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下去。前边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午六月十六日）

这段话有不少语病：既然是“恍然大悟”．那就下是“有点”，也下是“渐渐”想明白的：既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那就只是小悟，不是大悟；既然已经“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那就不能又说“前边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要强调自己的学习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她已经悔过自新，以表示和王实味有区别，并取得党组织和听众的谅解和赞许。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给人以“思想改造得差不多了”的印象，搞得不好会受到“自满”“翘尾巴”的批评，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犯大忌的。这样她又要加一些话，实际上把前一方面的成绩否定了。所以，我认为丁玲的这段话不是真心话，而主要是为了取得某种政治效果。

不过，就政治效果说，她成功了。在座的听众中有人在多年之后评论说：“这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许多同志经历这场斗争之后的共同心情。”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引了这一段话，评论说：“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剑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新起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六四页）

四十年之後，丁玲回过头看《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怎么想的呢？她说：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认为还是有错误的。毛主席封我说过：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几十年来，我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审慎了。”“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干部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

原来，思想不能“太解放”，有些地方是批评的禁区，触犯不得的。丁玲触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批评了在对待妇女和婚姻问题的错误态度，也涉及跳舞这样的事，这都触犯到一些领导干部，还有江青，甚至有毛泽东。他们是处犯不得的吗？“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不包括好的影响吗？对被批评者应有“体谅”，怎么不说被批评的男同志要体谅妇女呢？怎么不在这里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丁玲没有说到的是，延安整风时期她逃脱厄运，不过是暂时的罢了。尽管她把毛主席的教诲放在心上，也还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丁玲说的“九九八十一难”没有错。建国后的一九五五年，丁玲已和陈企霞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一九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时，他们又遭受批判。一九五八年《文艺报》刊出“再批刿”特辑，受到“再批判”的文章，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有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肖军的《论同志之‘爱’與‘耐’》. 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都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丁玲和陈企霞主持）上发表过的，在延安整风中，除《野百合花》以外，这些文章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但都没有被说成是“反革命”　可是这一次，编者按语却说它们都“是反党反人民的”，并且说：“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编者还说这些文章都是“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这个按语改变了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给丁玲文章定的调子，可这个按语是毛泽东本人修改定稿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保了丁玲，说丁玲是同志，这使得丁玲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并且从此吸收了教训；可是到一九五八年，同一个毛泽东又说丁玲的文章是反革命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可见，即使丁玲吸收教训也没有用，因为那是老帐。一九五八年四、五月间，丁玲、陈企霞、罗烽和艾青被划为“右派分子”。这回是毛泽东整丁玲了。所以，丁玲变得“审慎”了的结果，是她的罪名更重了。那么，丁玲在内心里仍然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吗？

既然《三八节有感》是反革命文章，为什么毛泽东在十六年前没有看出来呢？文章还是一样的文章，可是毛泽东是喜怒无常的，遇去他要保丁玲，现在他对丁玲的态度变了，于是毛泽东的评价完全变了。还有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 明明是毛泽东润色和修改过的，现在也变成“反革命”文章了。这种评价的变化，并不表明认识的深入，而只是反映出一种主观随意性。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条件下，作家的命运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从思想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到敌我问题

十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院部工作人员支部，中央政治研究室支部，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

十一日，最後一天会上，李维汉作总结性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于《解放日报》六月二十八日一，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思想。”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实际上他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王寅味利用抗战困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和夸大，公开污蔑党和咒骂党，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风运动为派别斗争，造谣诬蔑党的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等等。“对王实味的这类反党的行为能够不允许我们党激起高度的义愤和进行严正的斗争吗？”王实味有他的一套阴险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词掩该反动实质，装着青年的

代言人，挑拨离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和党的关系；两面派和钻空子，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不对王实味的言论和行动，实行具体的揭露，进行严正的论战，能够暴露他的实质，肃清他的阴险，提高党内的政治警惕性吗？”（《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二七页）

“他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我同意把他的党籍问题提交党委处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申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最后发言的是范文澜。

康生已经肯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在当时的条件和情况下，大家都信以为真：温济泽说得好：“所谓‘挽救’，只能是王实味承认自己加入了托派，并且要撤底交代、清算和忏悔作为一个托派分子的罪行。令天已经查明，王实味的确没有加入托派。他当时不胡乱承认还是对的。这就使他个人和组织之同的要求无法调和。”

六月九日起，《解放日报》发表了范文澜、陈道、伯钊、蔡天心、陈伯达、周文、丁玲的批评王实味昀文章。到六月十七日，张如心的题为《彻底粉碎王实味托派理论及反党活动》的文章，同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则通讯，报道延安文艺界举行了三天座谈会，“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于托派王实味之愤慨”，“一致认为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特别驳斥了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中的一些荒谬的观点：把进步的政治家与进步的艺术家对立起来：极尽挑拨之能事，为文艺家所痛恶。”并建议文抗开除其会籍。

思想斗争以周扬在《解放日报》七月二八、二十九日整整两个版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我们的文艺观》为结束。

可是康生没有就此罢手……在反王实味斗争结束之后，他为了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又用“打迂迴”的办法，在中央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

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由中央研究院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临行前，他在全院大会上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报告。据李维汉自己说：“这时会议的气氛，同动员会上闹哄哄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报告完了全场鼓掌，大家情情绪高。”（《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四页）

“五人反党集团”除王实味外，有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其中潘芳在德国留过学，其他三人全是复旦大学毕业。成全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王里在丈夫机关里养病。王里在三十年代就认识王实味，王实味又住在潘芳夫妇隔壁的窑洞，这样这两对夫妇和王实味就有了几次来往。康生想把这两对夫妇和王实味打成反党集团，但群众不支持。康生想出一个办法，让中央政治研究室开会“检查领导”。当时研究室的主任由毛泽东兼，具体的领导工作由副主任陈伯达做。康生要趁伯达回避一下，好让大家毫无顾忌地发言。用康生的华硕，住头几天的会上，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两口子（指成全和王里）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就在康生的操纵，说王实味是讲“人性论”的，是“托派思想”，成全和王里讲“人性论”，跟王实味一样，也是“托派思想”。这样，“打了一个迂回”（康生的话），又把斗争的矛头转过来对着潘芳和宗铮。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联合召开的斗争会上，继续揭发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和王实味的“托派思想”以及他们的“反党阴谋、小组织活动”。揭发出的主要事实是他们同情过《野百合花》的思想。（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一九

九三年，北京，四八页）

十月二十三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作出决定。决定说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勤”。把他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以及在整风运动初期的言行，都说成是为了“反党”.“以达到其托派活动之目的”：决定最后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始终对党表示仇视，与其他党样犯了错误经过教育因而改悔完全不同，故决定开除其党籍。”（同上书，四四-四五页）

第二天，王实味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这自然没有用。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命将王实味逮捕。

与众隔离会使你失去参照系，而陷入自我怀疑：孤立与集体之中则使你面对颠倒的参照系而自我否定。

不少党员和知识分子，在昔日遭到国民党压制时尚能表现得相当顽强，但一轮到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运动中挨批挨斗时则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因为，国民党指责你是共产党而打击你，你正以身为共产党严而无比骄傲，你的精神当然不舍垮。如今，偏偏是共产党来指责你不是共产党，指责你是反党分子，偏偏是“人民”和党一条心，参加党对你的斗争，你就彻底地失去了精神支柱，因说没有另外的精神资源。

王实味并没有称王称霸，他也没有妨碍共产党前进。

毛认为，王实味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而是冶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种对王实味的批评是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的吗？

中央研究院开始召开的是座谈会，参加的有院内的一百多人；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是达到一千多人，来自七十多个单位，这就成为大规模的斗争会了。你又看到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而你是错的。这个巨大的多数本身就具有威慑力。即使它不对少数个人采取暴力手段，个人也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使你不由得不怀疑自己，努力说服自己，采取迎合、顺从的态度。

在座谈会以前，康生就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座谈会一开始，康生就把他的意图往下贯彻。十六天的会，接连升了四级；由纠正一般偏向引导到对王实味的斗争，由一般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由对托派思想都争升级为对托派分子的斗争，由对托派分子斗争进而进行组织处理。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联合斗争会上，把反对王实味的斗争扩大为反对“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每升级一次，都把康生的意图贯彻得更深一层。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较正确的、与领导想法不相符合的意见，都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反对甚至围攻。这实际上是运动群众，逼着群众屈从于上级的意图而起哄。现在看来，比较正确的意见在当时受到孤立，倒是“左”的意见得到鼓励和赞扬。至於王实味本人，只能承认那些强加与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实际上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五八-五九页）一听到到申辩和保留意见，就不同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态度不老实”。

思想改造不同于思想发展。思想改造是对独立思考的否定。它要求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是错的，党（或领导）是对的，要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思想改造指世界观的改造。承认必须改造，就意味着，你承认你认为是对的东西其实是错的，而你认为是错的东西其实是对的。在思想改造开始使，目标已经有了，结论已经有了。而且这种转变，还是一总道德的要求，意味着你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变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信仰先於理性，还

是理性先于信仰？诚则灵。）

为什么你在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错的情况下就承认自己是错的呢？因为你看到党是那么强大，令人生畏，本能地感到得罪它不起，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它靠拢。因为你看到共产党成功了，而你自己的思想碰了壁：（投降，低头）许多人急切地向共产党乞怜讨好，甚至不惜对自己横加污蔑，他们这样做，绝大多数不是为了往上爬，而是惟恐往下掉，因为往下掉实在太可怕，也太容易了。

社会上的每一群体都有一套言行模式或规范，这就对任何一个希望被该群体接纳的人构成一种群体压力。一种是内化，一种是屈从。大多数人的从众性（随大流）介乎两者之间。事实上，往往没有自己的明确的观点。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形不成自己的意见。（懒惰，缺乏交流和讨论）一个社会越专制，越封闭，越一元化，其中的个人越难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见，而坚持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所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历史决定论美化了趋时附势的心态，人民崇拜美化了迎合多数的心理。

先有观点，然後把它套在事物上。

逆来顺受。努力把逆境合理化，把无辜视为有罪，把迫害视为考验，转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否定自己。不这样，就很难得到周为人的肯定与认可，从而获得自我的肯定。（用否定自我的方式求得自我肯定……？）浪子回头。

反面教材．从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不是在启发人们辨别什么思想正确，什么思想不正确，其实是在警告人们，什么是你们可以想，可以说的，什么是你们不准想，不准说的。那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设立禁去，不是在提高认识，而是在压抑理智。

一旦确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党就快引申出王实味的一切言论相思想都是错误的，反动的。

党宣布某种思想是反动的，然后再启发我们去找出所以反动的根据。这就养成我们定向思维的习惯。以后，只要党扔下一句话“某某思想很反动”，我们就会自动努力搜寻证明这一结论的种种论据。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和积极的理智运用，人们同样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动脑筋的兴奋和愉快。有时候，我们兴致勃勃地指出“某某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既不是因为我们对作者怀有私仇公愤，也不是因为我们对文章表达的观念深恶痛绝，而是因为我们急于表明自己有高众来人的识别能力。

共产党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筑在唯有自己才正确这一前提上，因此绝不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尤其不能承认别人比自己更高明。

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是强制，即对敌斗争。

被动的强制和主动的放弃结合。既然我们出於恐惧而不敢涉入禁区，那么由於我们不涉入禁区而不再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且远离政治，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

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因为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则是我们下意裁地懂得怀疑会捂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后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地信仰了。

党完全控制着你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党根本用不着直接发出任何威胁的言辞，它也不正面侵犯你的自尊，它努力提供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让你能以体面的方式去完成那很

不体面的转变。

一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他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根据。

思想改造运动去强化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这种地步，以至於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相信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罪行。你会变得糊涂起来，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坏人还是好人。（参见胡平《人的驯化、躲避舆反叛》，一 0 三页）

完成这样一类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开始，几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气，到后来才表示自己通了，服了。

党的策略："给出路。"一旦你悔过自新，放下包袱，党和人民就会欢迎你，重新回到革命工作陈伍中来，否则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对最高权威的绝对正确性的无条件的维护和屈从。如果那个权威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使其绝对正确性可能受到损害时，这种无条件的维护就变得更加必要。毫无怨尤就成了义举。放弃自己的正确性而保全对方的正确性，成了最宝贵的牺牲，还带着悲壮与光荣。

我们常常不是思考事物本身而是思考事物的名字。同一事物或同一行为，给它安上什么名字，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名称暗含不同的价值倾向和感情色彩。当我们采用某一套语词而不采用另一套语词时，其最终结论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包含於其中了。（压制、迫害改为考验、锻炼）

当众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揭发的普遍後果是，它摧毁了人的尊严。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对王实味的问题说了一段话：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 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进行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 0-一一页）

对王实味的平反的正式决定，是中央公安不作出的，仅限于纠正加给他的"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至於如何对王实味当时的言论行勳作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评价，决定没有涉及，这很自然，因为不属于平反范畴，不是公安部的事。党内的意见，仍认为王实味在延安整风中的言论是错误的，代表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偏向。这大概是虽然承认王实味是"同志". 却没有给他恢复党籍的原因。王实味的夫人刘莹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她希望有人"客观地分析实味的文艺观和他所写的文章究竟有多少正确因素？有多少错误？哪

一方面是主流，实味写杂文究竟是忠言还是压根儿就包藏祸心？"她显然是有看法的。

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部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他提出"应该在实际上保障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的较为开明的意见，源出於五四新文化运动队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份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 000 年，三四五页）

（二００一年五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十六时五十九分，　最后一次化疗後）

作者历年来写作和发表的有关文章

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写于於一九五三年一发表於《新闻战线》，北京，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创刊号，四七-五四页：〈新观察》，北京，一九六０年四月，第七期）

二、《“三无限”析〉（写于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表于《书林〉杂志（上海），后收入《“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张鸣、乐群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九-六-九八也）

三、《“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言，最早见《明报月刊》，香港，一九八０年二月号，二-- 一五页，后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二一三-二四一页 2）

四、《“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一九八０年末-一九八一年初，本来是为决议起草，未被接受，后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二四九-二五九页）

五、《探索毛主席发动“文亿大革命”的原因》（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一个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二四三- 二四八页）

六、《关于“双百方针”的若干问题》，《文汇》月刊，上海，一九八六年七月号，四八-五二页）

七、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答覆和商榷》（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发表于《镜报》月刊》，香港，一九八八年四-五月号，四月号二四-二七页，五月号，四0-四五页：《书林》杂志，上海，一九八八年，第十期，一一-一五页：《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三八-四二页）

八、《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探索》，纽约，一九九三年，第三-五期）

九、 The Legacy of Mao and the Party-state (Pres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for the Humanities China Conference, Colorado College, June 5,1993)

十 、 Mao, the Great Machiave//ian: Why Mao Launched the Cultura! Revolution(Presentatiori at Colgate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3)

十一、Mao and Zhou in 1972 (1993)

十二、《“毛热”还要继续下去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十三、《旧错误，新辩护》（一九九四年一月）移旦堂

十四、《毛泽东的反人性思想和实践》（写于一九九三年九月. 发表于.《人与入权》，中国人权，纽约，一九九四年一

十五、 The Maid of Chinese Politics: Mao Zedong and His Ptu70sophy of Strugg/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inceton, NJ): fall 1995* pp.66-80)

十六、《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明报月刊〉，香港，一九九六年十月号，二0-三0页)

十七、《<文汇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文革”期间的一段插曲)(九十年代中期为《文汇报回忆录》而作)

十八、《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怎样放弃了一次政治改革的机会》(写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发表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五一- 六一页)

十九、《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本文第一稿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三月，收入《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一八0-一九七页:《位卑未敢忘忧--“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余习广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一八八九年，一八四-二o四页;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补充后，发表于《百年潮》．北京，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三七-四八页)!

二十　《毛泽东舆霸道》(写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用题“汉宣帝时期的儒法之争”)修改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稿曾

二十一、《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第二十七期，一九九九年秋季号，四三--六七页)

二十二、《毛泽东时代的两椿哲学公案--“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讨论到“合二而一”批判》(《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九年十一期，一四-一九页)

二十三　《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碰撞》(《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普林斯顿，总第七十五期，二00一年冬季号，一一九-一四九页)

二十四、《王道乎？霸道乎？---毛泽东缘何两次提到汉元敌帝》(《星岛日报》，旧金山，二00二年一月三十-三十一日)

部分参考书目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莫斯科，一九五三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褊，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七年

•〈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北京出版社·北京，一九九0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一》，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八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 一九九三年

•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一九九一年

• 戴晴， 《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一九八九年

•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四年

•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

•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 刘思齐主编，余伯流、陈刚著，《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北京，一九九三年

•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译本，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０ 年

• 师哲，《峰舆谷》，红旗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

•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北京，一九七九年

• 王力，《现场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三年

• 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五年

• 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吴泠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北京， 一九九五年

• 席宣、全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一九八０年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九四五年四--六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五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四年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五-一九四七一）（十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

•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一九八九年

王若水的“美丽境界”

冯媛　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

最近，一部名为 A Beautiful Mind 的电影在美国上映，这里的中文报纸将它译作“美丽境界”。每看到这个片名，就想起大夫对若水脑 C T 照片的赞叹：“多漂亮!”我也曾再三端详那些角度不同的轮廓，那些明暗更替的区域和往复绵延的沟回，不免好好奇---什么造就了这颗大脑，使它在医生的眼光中也堪称美丽？

也许，是永远活跃的思想让这个大脑如此美丽？

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中，有一个叫做“新见解”的文件。这是此次若水的第一篇口授，是他对中国民主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这篇文稿创建於二 oo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多，他做完几个小时的治疗之后。当时，我记录了七百多字。元旦上午，若水精神比头天更好。大夫说他治疗时，我们也可以工作。于是，若水回到他的思路上，进行到十二点多，大致完成，约二千六百字。

谁也没料到，午餐后，治瘵即将完毕之际，在大夫和我眼皮底下，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对治疗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作用，转眼间，医生护士挤满了一屋子。也许是觉得我这个外行在旁连傻站着反而误事，也许是担心目击抢救会让我更加不安，当班负责的医生让护士把我带到家属休息室。过了好一会儿，他来找我，说没事了，可以回病房了：我道了谢，回去看到若水平静安详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刚才的反应正是死神对医学发起最后挑战的信号。傍晚，重新看一遍那些记绿，发现除了我打字时的误植和需要查对原文的引语之外，几乎不需要有什么编辑，若水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语言还是那样乾净:

“毛本人和中共党史的说法，都是民主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看起来，民主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民主革命有两个必要内容：一是土地革命，第二是资产阶级取得一定的权利。摆脱知识分子的积极影响，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要失败（所谓失败，不是指取不到政权）

“我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倾向，要负责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者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类似宗教。列宁所谓的‘共产党人的自大狂’，也是类似于此，他们好像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这种信心，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後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但也产生一种盲目的信仰。这个思湖，属於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是不同的。”

也许，泰然自若的态度也使他的大脑如此美丽？

一九九六年七月，若水做了肺癌肿瘤切除。手术前夕，大夫半开玩笑：“手术不会死人，

只是人没从麻醉中醒来。”为了预防万一，当晚，他倚在床头口授，我在电脑上敲下了三篇文稿：《失乐园--我看〈红楼梦〉》、《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中国共产党研究写作计划》。第二天，上手术台之前，他告诉我：“昨晚失眠了。脑子里净想的是这辈子的好事。”照许多人看来，他的一生历史坎坷。他祖籍江西，生在上海，四岁时随家迁居湖南。十一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们全家又逃难到四川。幼年多病，经常辍学，直到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短暂的大学生活，是他的黄金时代，以后则经历了个人迷信岁月里自我的丧失。当他在七十年代初终於逐步恢复独立思考后，却因此招致十年之内两次被撤职、被两代最高两代人点名批判、被限制发表文章的厄运。而他得出的教训竟是“我再也不放弃我的自由权力了”。他相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并在《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九八八年）中，提出了“克礼复己”的口号。尽管这有限的自由没能享受几年，在那样一个失眠夜，他的心中，洋溢的却是对生命的美好回忆！

二 ooo 年初，医生在若水的淋巴里发现了另一类型的低分化转移癌。二 00 一年初，这种很猖狂的病魔开始侵袭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些都使他有一种紧迫感，不过他仍然不改那不厌其烦地修改的写作方式。五年来，为破解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谜，他先后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文章。他还写作了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和论文，只身到印度、美国和香港参加学术会议。

二 00 二年一月四日上午，他的医生、亲切的拉宾大夫来到床前告诉我们，看来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大夫走后，若水对我说：“这回是头一次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很奇怪，对那些鼓励你战胜癌症的谈话仍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周恩来的悲剧，这是个大工程。还有哲学的基本问题，以那篇发表在《马恩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为基础，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许多人都想突破，但突不破。”于是，他继续口授。这当中，他的思路偶尔又会跳回来：“在人民日报社种一棵树。不要雕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一月八日，他最后的一个白昼。早上，他对值班医生说：“现在我知道了，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说这话时，竟带着一抹微笑。我站在床边，看着被感动的医生，第一次忍不住泪水，为他骄傲，也为他悲哀--他还有好多没完成的思想。医生离开后，他说：“我脑子运行，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我安慰他：“既然如此，看淡些。从我认识你开始，你的身体就跟不上你的脑子了。”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们在人民日报社大院邂逅。那时，以他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有尘埃落定。那场运动给刚刚进入研究生院的我带来了精神危机。正是一九七九年后的思想解放过程，使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封中国前途有了信心。而当时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大肆批判，不啻扼杀我们脆弱的兴趣和信心。因祸得福的是，因若水被免职，使我们可以平等相处。由於身体不胜负荷，他晚上都不工作，于是我们有了很多聊天的时间。几年来过从甚密，奠定了我们十五年婚姻的基础。

也许：永远年轻的心理也使那颗大脑如此美丽？

一九九 0 年，为从“六四”惨剧的创痛中走出来，我父母请我们游览九寨沟。那次旅行的间歇，若水捡起大学时代学过的德文。当时是希望能对照中译本，研读马恩原著中的一些关键地方，以利他“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后来，尼采的散文、海涅的诗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在北京时，有一次若水做化疗，不巧我与人有约在先，而那天我弟弟和若水的儿女都没时间来陪他，情急之下，我只好让人家来医院会客室。当若水知道采

访的是一位德国人是，便问我："你们谈完后，能不能让她来纠正一下我的德文发音，把海涅的《罗洛菜》录下来？"事后，他兴奋了好几天。

这几年，他同病魔作斗争，我也特别忙。上下班路途，还不时离开北京几天，节假日也不一定都能陪他。我们曾经凑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我的忙碌，但对追求性别公正和平等的工作，他始终充满兴趣，并尽力支持。有时候，我赶完一篇稿子，实在不想再检查一遍，便求他替我看一看。他常常用欣赏和骄傲的口吻评价我的工作，并认为我介绍给他的一些书和文章对他也有启发。聊天是，他总说："你应该写出来发表!"尽管有时对某些女权主义学派的具体观点和方法不尽认同，在他心目中，"女权主义"始终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字眼。他总是在这个意义上，向人宣传我是"女权主义者"。

若水一直希望我申请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工作者进修和研究项目。他再三说："我去给你当家属，好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继续毛泽东和文革研究。"去年八月，我们如愿以偿，到了哈佛。他一边治疗，一边尽量利用图书馆。这期间，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最后回答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篇哲学和科学小品（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开始於两年前他在北京住院期间，和他一九四六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题。十月底，听麻省理工学院几位教授关于生命和基因科学的讲座，他在提问中趁机讲了自己文章的结论，得到了权威的首肯。对此，他不无得意，成了庆祝他七十五对生日那天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九七八年，若水初次访问哈佛，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这一回，他第五次到哈佛，却是第一次在美国做病人。即使是久病缠身之躯. 即使已经不良于听，他都很快在新环境里赢得了尼曼同人、邻居、医生、护士和病友的敬重和喜爱。一位朋友去普院探视时，正好碰上护士们换班，目睹了他们争着"我来管王先生。"一月八日，一位护士要休假几天，下班前特来告别，含着眼泪对他说："很荣幸有机会照顾你。我在医院工作很多年了，要制伏癌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他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用他自己的方式--"我断然拒绝宿命、无奈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异化了的哲学，是甘居异化状态而不想超越、自拔，而自以为正常。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能让人绝望？"是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绝望。如果有人请他题词，他不是写"克礼复己"，就是写"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有忧"。如果说这也是夫子自道的话，他的确不惑不惧却有忧。他不能不忧国爱民。在一篇最终未能面世的自述中，他写道："最近一二十年来，我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但我还像少年时代那样爱我的祖国，还像青年时代那样追求真理。我还要用我的余生求索。"

也许，这种忧患，抑或智慧的痛苦，也使那颗大脑如此美丽？

（《明报月刊》二００二年四月月号）

编后记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王若水就计划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这两个中心的图书馆的南希和戈定渝两位女士，给作者提供的便利和帮助是巨大的。后来，在书稿即将完成时，一些新出版的关于建国前党史的著作，使他突破了最初的研究框架。他开始追溯到延安整风和苏区肃反，乃至中个共

产党建党时期。最初，他的主要着眼点在与从性格和心理分析的角度来探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的“文革”，后来，他试图在历史的视角中同时展现出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制度因素的形成。

在国内，无论是毛泽东研究还是“文革”研究，都有许多禁区，这样，无论是史料的搜集还是观点的探讨都大受限制，而且，图书馆系统也有种种欠缺和使用上的不便。王若水以一已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

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完成他很重视的一章：“周恩来的悲剧”。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草拟的提纲中，作者写道：中共把发动“文革”说成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其实其正的悲剧人物是周恩来。这个悲剧是由他的性格和他所受的党文化的教养造成的。他既要忠於毛，严格遵守所谓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又真心实意地想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周却想兼顾。尽管周对毛毕恭毕敬，驯服地执行毛的指示，毛对他还是不放心，因为毛看出来周在内心深处是不同意“文革”的。周在“文革”初期多次制约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保护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一点连普通庆祝也看得出来。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已经表现出他对周的强烈不满。尽管从这以后周再也没有反对过他，可是这并未消除毛对周的怨恨和嫉妒心理。毛在五十年代猛烈地批评过周的“反冒进”，并想把周从总理的职位上撤下来，换上善於投毛所好的柯庆施，但未能成功。周违心地做了检讨，此後更加小心谨慎，即使在庐山会议那样的场合也没有表现出动摇。但毛并不就此罢休。有迹象表明，在刘少奇等人被打倒之后，下一个牺牲者就将轮到周恩来。但“文革”已乱到不能控制，而又没有别人能代替周恩来这样的大管家，毛只能暂时容忍，把这个任务推到下一次“文革”。尽管“文革”是“左”得不能再“左”．但毛的公开讲话和指示却往往不是那么极端的，而往往是留有余地，似乎合乎情理，兼顾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毛知道，他的所有讲话和指示都是历史文件，要受到后人的审查。周利用了这一点，在执行时尽量采取缓和的方针毛对这点也是看在心里的，毛并不让周白白地留在总理的位置上，他要周轨行周最不顾意执行的方针，如打倒刘少奇。“文革”中许多逮捕令，是周恩来签署的。这一点令一些研究者吃惊。毛知道周的温和态度博得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好感，他正是要用这种手段败坏周的声誉。二 00 二年一月，弥留之际，作者仍在口授有关想法。但他实在无法继续研究了。也许，其他研究者今後的成果会弥补这个遗憾。

王若水向来追求平易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的统一，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因为希望自己向读者呈献的都是精品。但是，由於写作跨度长达八年，由於病魔的侵袭，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本署有他的名字的书，不能由他自己最后完成，因此也无法始终贯以他向来的标准和风格。这是要向读者道歉的。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更能反映出他思考的过程，一些刚完成了史料的罗列和分析大纲的章节，更便与读者和作者一起探索。

将一个正在逆行中的写作计划，变成一本书，我不得不做一些整理工作，为了既保持原著风貌，又适合出版标准和可读，我所做的事情限於：一、校读已经和大致成型的章节，删除某些重复之处：二、核对注释，尽量标明引文出处；三、将作者后来的少许思想片断插在原先写好的文稿的我认为适当之处；四、在每章後面表出时间，表明作者中止写作或修改该章节的日期，或标注出作者其他相关文章供读者参考。此外，“见证”部分是我加上的，包括作者的回忆文章，其主要部分是“偶像的幻灭”。我还将作者发表在其他地方的有关文章，编了一侗目录，以便查阅。

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查找和标明引文出处，但可能仍有一些地方作者转述或引用了

别人的分析和观点而未及表注。敬请读者和有关作者谅察，以便有机会时修正这些无心之失。

感谢潘耀明先生和明报出版社编辑部同人的热情加以和决策，以及责任编辑花费的心力，使这本书得以问世。早在一九八0年二月，《明报月刊》就在海内外率先发表王若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他晚年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研究，也多在《明月》与读者见面。现在，本书由明报出版社出版，真是一种机缘。

冯媛

二00二年三月二十四日